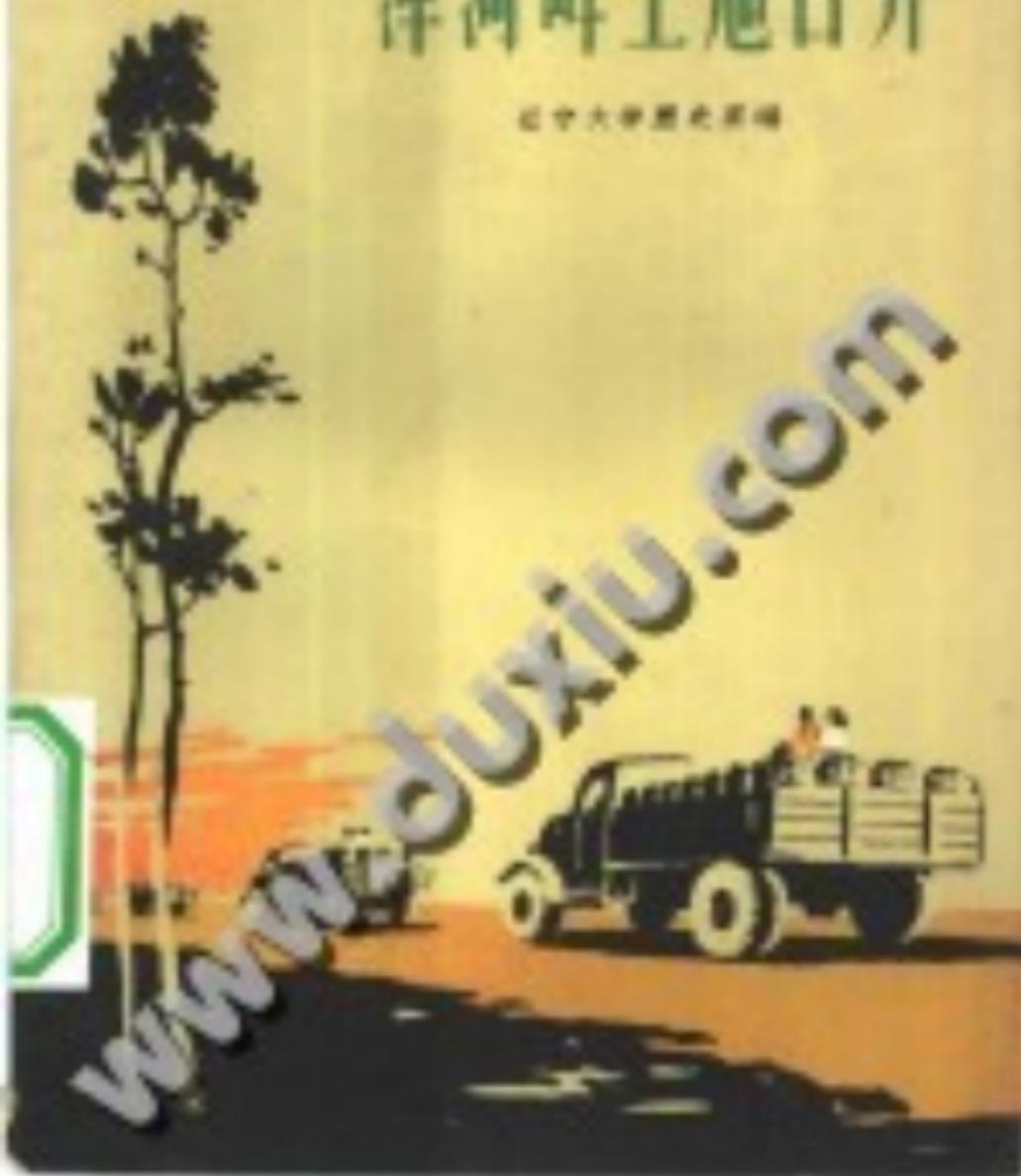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浑河畔上旭日升

辽宁大学历史系编



浑河畔上旭日升

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写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的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4%印张·4插页·10插图·92,000字·印数：1—3,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7090·416 定价(6)0.70元

序

“熱風”編輯部

這本書——城門人民公社史，是在黨委領導下，由我們“熱風”編輯部具體組織和輔導，由福建師範學院中文系二十多位同學以及其他同志與城門人民公社社員合作寫成的。整個編寫過程，斷斷續續，延了好幾個月，但絕大部分工作卻是在四十來天內突擊完成。能在國慶十周年把這本反映建國十年來農村偉大變革的公社史呈獻給讀者，我們衷心感到快慰。因為，不管書的質量如何，它總是有助讀者回顧建國十年來農村的光輝的戰鬥歷程的；特別是當前全國人民響應黨的號召，正在熱烈展開反右傾、鼓干劲、增產節約運動，到處響徹了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的歡呼聲，這時候，我們更急于讓這本書和讀者見面。我們相信，廣大讀者一定樂意將這本書當作人民公社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個實證而來肯定它，接受它。

城門人民公社位居福州南台島東南，三面臨江，景色秀麗，是個四季長青、盛產水果的好地方。辦公社前，原是閩侯縣的一個區，包括城門、鰲峯等十五個行政鄉，四十三個高級社。本書中的故事，即分別取材於這些鄉、社，如“黎明前的鬥爭”是鰲峯的故事，“此路不通”是城門的故事。城門地區工作基礎好，歷來是省委、縣委的工作基點。大躍進中更是成績顯著的不斷革命的先鋒。遠在一九五八年春天，——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未公布前，城門地區羣眾就感到原有的由數百

戶組成的高級社已不能適應生產發展的形勢，需要尋找更高的組織形式來適應躍進的生產形勢，實現改造自然環境的宏偉志願。於是，他們就實行并鄉并社，小社并成大社，大社之間又組成聯社，初步具備了組織規模大的特點；接着又實現了農業、供銷、信用、手工業、運輸業的五社合一，擴大了合作社的經營範圍，初步做到工農商相結合；為了把婦女勞動力從煩瑣的家務事中解放出來，公共食堂、托兒所等集體福利事業也早在公社成立之前就大量舉辦起來了；隨着農村社會主義大辯論和總路線宣傳，農民羣眾的社會主義覺悟與共產主義風格得到極大的提高與發揚。這樣，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公社就在上述長時間醞釀和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也就是說，循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誕生了。

象初升的太陽在地平線上出現一樣，人民公社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剛剛誕生，就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發射出萬丈光芒。在短短的時間內，城門地區農村面貌和人民生活有多么大的變化啊！全面規劃平整土地，在寬廣沃肥的田野上開始有拖拉機在奔馳；原來只能灌溉八千多麼土地的十四部抽水機，由於全面規劃調整使用，擴大了灌溉面積七千多麼，使全部田地實現了灌溉自流化；組織規模大，活動範圍廣，在良田與果園之間建起工廠和畜牧場；羣眾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繼早稻丰收之後，又打了個晚稻和水果雙丰收的勝利仗；托兒所、食堂、敬老院、文化宮普遍建立起來了，老有所依，幼有所養，生產、生活、文化娛樂都得到統一合理的安排；……今年上半年，城門人民公社工農業總產值共達一百四十八萬八千多元，比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未辦公社時的總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隨着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今年上半年公共積累增加到二十二萬多元，超過了原有四十三個農業

社三年積累的總和；同時，全社百分之九十五點八的社員也普遍增加了收入。所有這些，說明人民公社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正在越來越顯著地發揮出來。一切國內外反動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叫囂說：公社搞糟了，那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謠言。他們已為萬千事實駁得體無完膚。我們的人民公社正以勢不可擋的步伐，向前邁進，鵬程萬里。讓我們以萬分欣喜的心情高呼：人民公社萬歲！

這本書，主要是反映城門地區農村解放前后的階級鬥爭和農民羣眾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合作化道路進入公社的巨大的歷史變革。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英雄人物和先進事跡是本書描寫的主要對象。由於人力和時間的限制，本書只寫了解放到公社成立的一段歷史。公社成立後初期的情況反映了一些，但很不充分。我們希望今後還有“城門人民公社史”第二集，第三集……出版，以便把公社越來越顯著的優越性和人民新的建設鬥爭業績更充分地大書特書！

從文學說，編寫公社史是組織羣眾文學創作的一種新方式。在一個公社里，組織與輔導羣眾創作，組織一批知識分子作者和農民作者直接合作，共同編寫出一部書，這在我們來說，還是頭一回。我們在編寫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也獲得了一些不成熟的體會，願在這裡提出來研究，請讀者和專家們指正：

編史有編史的特點和要求，文學創作有文學創作的特點和要求，將兩者統一起來，有一定困難。解決這個難題，經過多次研究，我們採用了這樣的辦法：全書選題計劃較多地從編史的角度着眼，文章具體取材較多地考慮到文學創作的特點；就單篇文章說，要求它是獨立的文學作品，要求它選取有典型代表性的題材，作藝術表現，通過具體反映一般，使得讀者能從作品的具體

描寫中看到生活的一般本質；許多篇作品彙編成書，又要求有枝葉分明的史的內在聯系，使得讀者能從許多幅圖中看到整個歷史概貌。按這辦法制訂計劃編寫的結果，就成為現在這樣的體例——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的文章反映了解放十年來的重大事件，包括臨解放時的鬥爭，按歷史的先后順序排列；第二輯是公社成立前後各个方面生活的橫斷剖圖；第三輯則是一些典型事物的特寫，如人物志，村、廠小史。讀者通讀全書可以看出，這樣一條兼顧編史和文學創作的不同要求和特點的途徑，大体上是走通了，但還沒有完全走通：若干文章“兼顧”得不很好。這些文章所反映的史實內容，多半是頭緒紛繁，矛盾複雜，展開作文學描寫，遇到的困難比較多；當然，這不是無法克服的困難，只是由於種種原因（如水平所限、沒有較長期的深入生活），我們還不會克服這個困難。因此，本書還遠不能把城門公社人民羣眾的種種生動的豐富的鬥爭充分地表現出來。此外，有些文章，還比較粗糙。

編史要寫真人真事，這就不可避免會限制藝術加工。不過經過努力，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種限制的。限制大小是和掌握材料多少成反比例，掌握材料多，限制就小。生活的蘊藏是無窮盡的，只要我們努力深掘生活，那麼通常還是可以在掌握豐富材料之後獲得有限制的自由。本書許多篇較優秀的作品編寫經驗證明，作者還是能夠在比較寬闊的範圍內施展藝術加工的能耐。譬如“奶牛入社”，把重大的社會事件和日常的个人生活揉在一起，從一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貧農的經歷和感受角度，反映出公社化前的一場經濟革命，文章就充滿貧農階級感情，讀來親切生動；譬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黃寶洛”，以“沒有黨就沒有我”作為綫索，由此及彼地串連了不同的材料，敘事而兼抒

情，構思是很巧妙的；譬如“美滿婚姻”，故事固然曲折引人，作者却更致力於刻劃人物的內心，豐富了故事的血肉，就顯得益加饒有意趣了；譬如“方岐洲上九戶貧農”，並沒有一個完整的貫穿的故事，只是選擇几桩自成片斷的事件和一些細節，組織成文，再烘染以濃烈的感情色彩，便頗有藝術力量地概括了一個貧農村數十年的生活；譬如“林碧英互助組”和“王茂玉辦社”，用個性化的語言、樸素天真的風格敘述故事，把農民淳樸的思想感情表現得格外真切，別有一種引人的魅力。對於文學創作，僅僅掌握了史實的一般梗概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深深發掘生活的具體血肉內容。某些反映複雜、重要的歷史事件的作品之所以沒寫好，很大程度是由於寫好它需要掌握更為豐富的血肉生活的具體材料，但作者卻掌握過少。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客觀生活通過作者主觀的積極反映，寫真人真事的公社史並不能例外。客觀生活被描寫在作品中，就象裁布成衣一樣，總要依照作者的主觀尺度來剪裁集中，重新組織，這樣，作品中再現出來的生活，不可能和自然形態的生活一模一樣，而應該比自然形態的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強烈、更理想、更帶普遍性。純客觀的作品實際上不存在。客觀主義的做法，表面上忠實於生活真實，凡實有其事必錄之，不剪裁加工，結果倒常常損害了生活的本質真實。相反的，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作尺度，對生活素材作積極加工，才可能表現出比生活的表面真實更高的生活本質真實。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黃寶洛”一文，本來另有一篇初稿叫“寶洛教書”，寫寶洛如何接到聘書；如何備課，如何走上講壇，大學生如何拍掌歡迎他，他又如何講課，等等，平鋪直敘，十分平淡。一個農民當了大學教授，意義多麼深刻，可是文章表現不出這個意義。文章羅列現象，缺乏加工，進

一步看，沒有確定的主題思想，作者不是積極地評價生活，因之，藝術加工缺乏思想標準，只好無目的地羅列現象。以後執筆的練向高同學和寶洛同志作更深入的談話，進一步挖掘思想深處的東西，文章重寫過，主題思想明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黃寶洛”，作者十分執著要表現這個思想，對同一題材作了進一步加工，較之前一稿，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大為提高，而且更真實。創作原理和實踐經驗都指明藝術加工的積極作用，因此，編寫這本書，在不能任意虛構假人假事的前提下，我們提倡百花齊放，強調藝術表現上自由競賽，發揮創造性。現在書中所有人和事都是真的，但這裡有作者的藝術想象，例如“方岐洲上的九戶貧農”中“溺死女兒救丈夫”一節，依發嫂溺死女兒時的悲哀情緒和氣氛的描寫是作者藝術想象的結果。這完全合理；如果說溺死女兒而不悲哀，那就太不真實了。

從掌握豐富的材料到給予藝術表現，這中間還有一個關鍵，即對所掌握、所表現的生活要有正確、深刻的理解。但是，十年來農村的歷史發展相當急劇，相當複雜，要深刻理解它並非易事，特別是對於實際鬥爭經驗不多，馬克思主義修養不高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我們工作中又一個大困難。我們學習研究黨的文件，向黨委和羣眾請教，這樣，許多我們不了解的、了解不深的，逐漸了解了、了解深刻了，但仍有至今尚不了解、尚了解不深的。這本書，人民內部矛盾還寫不好，公社化以後農村的偉大變化還表現得很不全面，很不充分，這都是由於我們思想水平不高、理解生活不深刻的緣故。

目 錄

序.....	(1)
黎明前的斗爭.....	(1)
八十六比二.....	(18)
三斗教里金.....	(23)
土改中的故事.....	(40)
不斗不相識.....	(40)
分配委員.....	(43)
陈大妹变了.....	(46)
林碧英互助組.....	(50)
王茂玉办社.....	(60)
合作化高潮来到鰲峯乡.....	(72)
紅星高照幸福路.....	(81)
一場风波.....	(85)
此路不通.....	(95)
果園里的斗爭.....	(102)
奶牛入社.....	(109)
連坂社水稻高产記.....	(115)
刻苦钻研的人.....	(126)
三攻三叉港.....	(133)

荒山变了样	(137)
拖拉机来了	(141)
筑路	(146)
猪宝宝	(152)
当好后勤部	(158)
炊事员	(160)
卫生模范黄老妈妈	(164)
一定要把孩子带好	(170)
我的老婆	(173)
幸福的晚年	(177)
公社的第一个春节	(179)
方歧洲上九户贫农	(18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黄宝洛	(194)
王茂玉	(200)
永不褪色的红旗	(205)
郑鸿仁	(214)
美满婚姻	(227)
一块柑桔园的变化	(240)
一个小榨油厂的历史	(245)
从黑夜到天明	(254)
幸福来自斗争	(269)

黎明前的斗争

成立了地下党支部

敖峯乡三角埕有个林知仁，小时在私塾里读过几句古书，能写一手字，为了糊口，在伪乡公所里当个抄写文书。他为人鲠直，好主持公道，乐于帮助人，时常帮乡亲们办个事，从不从中要挟肥私。城門乡的地下党员林家元，早就跟他做了朋友，经常托他搞一些不留底的身份证。那时山上的游击队，最需要这些身份证，好在城乡自由活动。

家元经常跟知仁谈革命的道理，知仁听得津津有味。不久，家元就跟他谈起党的事，他真象是久旱逢甘雨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可是这以后隔了许久，都没听到家元的消息，知仁焦急得很，担心着是不是出了意外。那时地下组织每发展一个成员，都要经过一段考查时间。组织上也正在考查知仁同志。

一九四六年开春的一天，天气晴朗。一个戴高帽穿长袍的陌生人，来到林知仁家。他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兴趣。常跟老婆婆闲谈，从孙儿几个？淘气不？一直谈到乡里各家的生活情形，谈到孩子们的将来……他待人和藹，平易近人，话也说得句句在理，说的常常就是你心里想要说的话。

知仁家里跟大伙一样，吃了这顿愁下顿，刚开春粮食就吃得差不多了，顿顿只能吃番薯。老妈妈过意不去，关照自己的媳妇：

“人家是城里讀書的，怎吃得慣番薯？还是到家貴家里量两斤米来吧。”

知仁媳妇借了米，煮了稀粥。可是客人无论如何要跟大家一样吃地瓜，而且連皮都吃进去。老媽媽被感动得流下泪来：“想不到你也能跟我們一般吃苦。”

这位客人就是地下黨員顧敏同志。他由家元介紹，在三角埋住了三天，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二月里林知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敖峯第一名共產黨員。他象暗夜里手执火炬的人，乡里許多穷哥儿都跟着他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不久三角埋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林知仁担任支部书记，知清、梧官、家貴和志中等也都在那时先后参加了共产党。自此敖峯乡广大农民就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和伪政权、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而巧妙的斗争。

智夺伪政权

林傳亨綽号敖里金，是敖峯的大恶霸，說錢有錢，論勢有勢，儿子讀書的讀書，做官的做官，还認了三个律师做干儿子，准备随时跟人家打官司。敖里人誰也不敢惹他。

敖里金驕橫跋扈，連伪保长也不放在眼里，素来不出壮丁不納稅。敖峯保长林家鏗，是个怕事的人，他知道敖里金的厉害，凡事都迁就着他，这样敖里金为了拉攏他，也常施些小恩小惠。两人酒来酒往，看去似乎搞得蛮亲热的。

地下支部要想在敖峯生根、发展，首先必須夺取伪政权。伪保长这个职領，如果掌握在我們手里，还很有用：第一，消息比別人都灵通，例如反动派要在乡里抓什么人，一般事先都要会同

保长去做，这样一来，他們还没动手抓人之前，我們就可想法把人先弄走；第二，可以随便簽署身份証，游击队员拿着很有用处；第三，还可以抗丁抗税；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可以利用来进行半公开的宣傳活动。

历年担任敖里保长职务的，总是林傳亨和林家鏗两家的人，这已經成为“傳統”了。我們的人要得到这个职位，是很难的。为了取得伪保长职位，支部計劃：第一着就要利用和扩大敌人内部矛盾，破坏地主敖里金和伪保长林傳亨之間的亲密关系。

地下党员志中那时是伪保长的警卫兵，还兼乡公所的事务員。这人聪明灵活，善于临机应变，又是条光棍，支部认为他是未来保长最适合的人选。

旧历九月初三，敖里金替母亲过生日，办了八十多桌酒席，大厅里天井上摆得满满的，来客全是省里县上的主要人物，一个个长衫馬褂来头都不小。

刚好那天早晨来了十几个催粮的保安队，保长又去乡公所开会，带路的差事就交给志中。他心中暗喜：

“走，到敖里金家去。”

那些兔崽子保安队，听到去敖里金家，也有些心寒，面面相觑没人敢动。

“去吧，去看看也好，今天是他母亲生日，摆了几十桌酒席，我們趁这机会去吃他一頓。”

保安队听说有酒吃，乐得什么似的，一行人活跃起来，扣上破軍帽，掂着枪跟志中去了。

敖里金的院子里这天大放异彩。正厅貼着一个剪金大寿字，案上摆着十几对胳膊粗的紅腊烛，后院几十个杂工跑来跑去，忙得满头是汗。大厅里“贵宾”們，三五成群地交談着。忽然看見

保安队进来，大家都皱起眉头，刹时鸦雀无声。主人正对一个戴高帽的谈着本行的生意，这时刷地变了脸，冲出来。

“喂，志中，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来催粮。”

“我粮都缴了，还催你妈的什么粮！”

“没有吧？缴粮的粮票给我瞧瞧。”

“你是什么东西，要看我的粮票。”

“我是保丁，事情不与我相干，一切都是保长的吩咐。他叫我到谁家催粮，我就只好去。”

满桌子上鱼呀肉的，香喷喷真诱人，保安队的兵怕志中把他们带走，丢了口福，因此也来帮腔。敖里金不便多说，当着贵宾的面，只好和保安队吵嘴。看到保安队几个已经坐到桌子跟前，只好顺水推舟，笑着脸招呼大家：

“来，吃饭吧，吃了再商量。”

吃完饭，保安队自动走了。敖里金气得浑身发抖，肥胖脸上的横肉一块块地抽搐起来，一手拉住志中大发雷霆：

“你太荒唐！今天是我母亲生日，请了这么多的客人，你竟敢当众拆我台，摘我的脸。”

“这事可怪不得我，有事你跟依姆（家鏗俗名）保长说。”

敖里金气坏了，眼睛一瞪，黄澄澄的牙齿咬得“咯咯”响，猛地把拳头一捏，好象就要把谁锤扁。

“好呀，我跟依姆这狗养的算账！你去叫他来。”

志中心中暗啻喝采：“敖里金，也会上当呀！真是聪明一世，朦朧一时。”他一面走，一面盘算着怎样对付保长，因为家鏗这人腰杆不硬，惯做好好先生，担心着这场好戏他“演”不好。

乡公所里圍着五六个保长，七嘴八舌地鬧嚷着。家鏗看見志中回来立刻問：

“保安队的人呢？”

“回去了。我帶他們在乡里按家去催粮，他們要在你家里吃飯，一看菜沒有，去买又要花錢；今天剛好敖里金家請酒，就領着他們到敖里金吃去了。”

那个保长最吝嗇，听說替他节省了一餐飯，心里滿高兴，但想到敖里金不免又有些不安。

“敖里金耕什么沒有？”

“哼！敖里金呀，他当着众人的面大罵你一通，罵得真难听。”志中停了一会儿，佯装关切地說：“他叫你馬上回去見他。保长，我看不要和他計較吧！罵也罵过了，就算了，免得招惹是非。”

“他凭什么要罵我！哼！他以为我会怕他？”这不过也是說說气話，在众同事面前挽回面子。

事也湊巧。敖里金气急不过，为了在众位“貴宾”面前挽回面子，便在門口大罵家鏗，正好家鏗的哥哥路过听见。家鏗的哥哥是做生意的，很有錢。家鏗的势力就靠着，也不是个好惹的。他听到敖里金罵家鏗是婊子养的，按捺不住，便跟敖里金冲撞起来，差一点要动武。正在这节骨眼上，家鏗跟志中赶到了。敖里金二话沒說，劈面就罵依姆的三代祖宗。家鏗看他哥哥已經跟敖里金吵起来了，和解无望，也对着面罵敖里金的娘。两个人象小公鷄一样，又是差一点要打起来。志中看到一場好戏已經串演成功，心中欢喜，不禁在一旁暗笑。敖里金正在气头上，看到志中在笑，上前“啪……”一巴掌，打得志中滿嘴流血。志中便趁机拖着家鏗的袖子說：“我被打一下不要紧，你的臉可是

丢尽了。我这保丁不干了，人家当着你的面打我，还有什么干头呢！”火上再一添油，家鏗更冒起火来了。指着敖里金破口大罵。

“你瞧着吧，我明天就叫你进监狱去，”敖里金說。

“好，咱們騎驢看书，走着瞧罢！看到底誰厉害。”

夜，静悄悄的，空气显得特别沉闷，敖里金象挨打的狗，在床上拼命翻动，一会儿出气，一会儿咬牙，弄得那六个大小老婆，慌作一团。鸡才叫两遍，敖里金就吩咐抬轎进城。

这天，天气特别好，太阳暖烘烘的。敖里的老百姓都活跃起来了。老人家围在一起，交談着敖里金与林家鏗爭吵的經過，乐得直敲烟管，小孩子也不甘沉默，到处嚷着，——訛傳着保长怎样挨了敖里金的打。

誰有錢誰就有理，这就是那时候的法律。敖里金是敖峯的“金牛”，告状自然是他贏。家鏗撒职不算，还判了一年半徒刑。后来他哥哥花了錢，才免去坐牢。

这件事发生以后，敖里金更是威势逼人了。动不动就抬出依姆做范例，大拇指一翘就是：“你也想当第二个依姆嗎？”敖里的保长空懸着，没人敢干，大家都怕跟敖里金惹起是非。

我們通过在伪乡公所里工作的知仁、傅务等同志的活动，給志中当上了代理保长，第二年就做了正式保长。自此后，地下党难以活动的僵局打开了。地下党借伪保长的名义，半公开地宣傳领导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

欺軟怕硬

四七年夏天，陣雨刚刚过后，地下还是湿漉漉的，低低的烏云迅疾地跑着，醞釀着新的一場大雨。志中从敖里金門口大榕树下經過，敖里金恰好站在門里，用手杖指着志中：

“过来，过来，”他挺着个大肚皮，威风十足地喊着，把志中吓了一跳。

“你要識时务些，别老跟我找麻烦。依姆的事你清楚，他不比你穷，结果还不是保长下台，一年半徒刑！……”敖里金没好声地警告着。

“金叔，这话可不对，依姆是依姆，我是我，你别认错了人。你是羊肉，依姆是酱油，我是井水，酱油得钱买，井水到处都是；你有官、财、势，我有打、逃、跑。依姆会怕你，我可不一定就怕你！”

敖里金那容得下这一席话，没听完脸就气得紫红，拿着手杖在地下敲个不停，“你、你、你……，敢在我面前撒野？你，你是什么东西……你……”

“我是条光棍，好歹就我一个人，无牵无挂，你真要跟我动起手来，老实说，你也便宜不了”。

“你、你简直要造反”。

“你是财主，我是光棍，琉璃缸对破钵，你的命可不比我，我们一起拼上，我还豁得来。”说着扬长走了。

敖里金气得直瞪眼，停好久才喘上一口气，大喊：“来人啦！来人啦！跟我到乡公所去。”

志中记住组织上曾经研究过的：地主欺软怕硬的特性。所有地主都因为有钱，所以最怕死。你要真干，他也就变软了。

志中见敖里金向乡里走去，心里暗笑：“乡里尽是我们的人，真是到金鑾殿去告皇太子——白搭。既去了，就不能便宜他。”原来我们的地下党也已经打进了乡公所。里面十一个人，就有六个是自己人。

志中一不做，二不休，跑到伪保安队借来一把坏手枪，插在

腰間，叉着腿站在大路上等敖里金。过了一会儿，敖里金出了城門乡公所，折回敖里来，挺着个肚皮，远远摆来，才走到公路上，远远看見志中那个姿势，便赶忙放慢脚步趑趄着，回头問长年：“誰站在那儿？”

“志中，他别着枪在那儿等你呢！”

“啊！什么？快，看着他，拦着他，拦着他。”說着迈开腿赶紧繞道回去。志中在远处高声嚷着：

“有种的过来，見个高低，拼个死活！看誰斗得过誰？”

这时云越发低沉，大滴大滴的兩点向下落着。敖里金迈开大步往家里跑，淋了一身雨，活象落湯鸡，走到家門口，气都喘不过来。他回头一瞧，志中就站在榕树下，一手指着腰里的枪，向他示意。他赶紧钻进門去，“嘭”一声把大門关上栓上。一連好几天都沒敢出門，乡里人說：“敖里金碰到光棍志中，头皮也有些麻呢！”

反 圍 捕

一九四七年初，剛过完旧历年，正当正月大寒时节，連日落霜，田沟里的水結了一层薄冰。农民們缺衣少吃的，天还没暗就钻进被窝里。所以一近黄昏，路上就少有人走动。这时，我們的游击队在螺洲桔子園里剛开完会，一行四人，要到三角埕过夜；为了鎮寒，大家都喝了两盅酒，火气不免要旺些。一路上不住罵着驻扎在螺洲鎮的一个偵探队。这些家伙住在鎮上专门对付我們，給我們添了不少麻煩。不想事有凑巧，走到杜園，正好迎面有一个偵探，歪戴着一頂呢高帽，耀武揚威地在路上大搖大摆走过来。秉华同志見了气不过，順手抽出家伙就給他一下。这小子应声摔倒在路旁的田沟里，腿一蹬，一动也不动了。

大家一瞧，都乐了：“这个婊子养的，跟閻罗王算賬去啦！”說完就揚長走了。想不到那小子，是个狡猾的家伙，子彈只不过擦破他的耳朵，他見人多，逃不了，就順勢躺下裝死，一等游击队走远，就提着礮头拼死命往螺洲逃去！

这一枪不打紧，可惹出麻煩来了：敌人原来还蒙在鼓里，这一来便想到，这儿减息、那儿减租，原来是“土”共产党搞的。第二天，便出动了两营保安队，从义序到峡北，拉开了一个大包围圈，說是“土共”有一大伙在这一带潜伏活动。

恰好那天在城山頂娘娘宮里，有个重要的下部会。情况非常紧急，敌人一进乡来，就在城門祠堂里召集保长、乡公所人員等开会，布置圍捕計劃。以为这一着做得神不知、鬼不觉，那知道城門乡六个伪保长中倒有三个共产党员，伪乡公所十一人有六个是共产党员。这些同志一听要圍捕，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恨不得立地奔去报信。狡猾的敌人也防了这一着，在祠堂門口安上个崗，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那儿守着，不許任何人出入。

扁鼻子保安队长，用那甕声甕气的鼻音，提高嗓門嚷着：“吃过飯出发，你們帶路，不許任何人走出祠堂一步！”敖里保长、共产党员林志中同志附和应着：“是啊！誰也不能走，誰走一步，以后漏洩机密就找他。”扁鼻子象蒙在鼓里一样，不断贊許地点头。

这个志中，綽号“疙瘩”，因为說話又快又大声，又有些結巴。他原是个单身汉，出入无定。你要是到敖里找他，准是沒在家。可是他每会必到，坐在靠近門边上，有事时，溜走了連坐在身边的人也不知道。今天，可也象船擱在沙灘上了。

散会后，志中四处一望，真是无計可施：后門也惹关死，祠堂簡直成了四堵高墙的監獄。他急中生智，見梧官、知青在那儿

发楞。他們倆是城門这边的伪保长，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的老哥，你们是主人，还楞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快去搬桌椅，招呼大伙吃饭。”志中说着，还在知清背上槌了一下，示意他快借搬桌椅为名溜出门去。

没想到他们俩出去，真的把桌椅搬了来。他见了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暗暗叫苦：“真是太老实了！”情势紧急，不容犹豫；他灵机一动，顺手接过一张椅子，举脚一踩，用劲把一条椅腿掰下来，狠狠瞧了知清一眼，骂道：“真是个蠢货，把坏椅子搬来干啥，三个腿怎么能坐？待我修去。”一边大声叫骂，一边跨步出门，到得门口，正好看到阿佛嫂，忙喊她：“家里有斧头吗？楔上椅腿。”

“有，在厨房里放着，我去拿。”

“不，还是我自个拿吧！”

一个箭步，窜进阿佛嫂的屋里。站岗的见是修理椅子没有吭声。志中由后门溜出去，沿河沟拼命奔到转弯口理发馆去。地下交通站就设在这里。交通站的加林正好在那儿望风。他一见加林，喘息未定就恨不得一口气把情况说完。心里一急，说话就更结结巴巴了，好不容易才把话讲清，约定好我们的人一撤走，就在门口电杆上画两个圈圈。

志中办完这事，赶忙回去修好椅腿，大摇大摆地端进祠堂里。

吃饭时，大家还有些不安，怕同志们撤不及，便特意找伪保安队长磨扯蛋，拖延时间。

饭后，太阳就在头顶上，天气比早晚暖和得多，但几个党员的心里还是感到冷嗖嗖的。他们领着保安队尽量放慢脚步，到得转弯处，看到了电线杆上白白的两个圆圈，志中才安下心来，快

步把伪保安队引进村去。

“先搜誰家？”志中問。

“你看呢？”

“到这家吧！”他指着紧靠路口的大地主敖里金的家。

“农民怕死不会干險事，他們家几个小子全是讀書的，搜一搜？”扁鼻子应声“搜”，保安队就一涌而进……

搜地主的家也有目的：一則地主的屋子大房間多，搜一搜起碼半天，就免得再去麻煩他家；二則也給这些飽食終日的老財們一些麻煩，否則他們也活得太安逸了。

搜完敖里金的家，太阳已經西斜，这些家伙十分扫兴，拔腿就走。志中跟着也就溜之大吉。

不知扁鼻子是有意搗鬼呢，还是因为天太早回去不好交差？便領着保安队又翘起着折回村里。他們走到志中家門口，見門上上了鎖，估計沒人在家，又撞到私塾先生家貴同志家里。这家貴同志是三角埕地下党支部的組織委員，以教私塾为掩护。这时，他剛好坐在案前填写最近发展的加林、水水、香官、友林和加彩等五名新黨員的表格。保安队从他背后进来时，幸好一个学生先喊了声：“先生，有人找你。”家貴回头一望，保安队已經进門来，便鎮靜地随手把登記表对折过来，压在桌上。

“領我們查戶口去。”

“好的，好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把表格折迭起来，裝在兜里，領着他們去搜查了几家，結果敌人依然一无所获扫兴回去了。

减租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点綴門面，成立“农会”，名义上实行减

租，實質上成了地主豪紳的工具。租息愈來愈重了。農民唱出了這樣的歌謠：

敖里農民白白苦，
一担收成八斗租。
明減租息暗加秤，
到頭還添一斗租。

農民也想起來反抗，可就是少人來領個頭。古語說“單絲不成綫，孤樹不成林”，沒人領導大家去作鬥爭，那怎能搞得過地主階級。逢年逢節農民還得給地主送禮，有的沒錢買厚禮，只好把家里一只仅有的老母雞送去。否則，就要加租撤佃。農民總是提心吊膽的，今年這塊地是你種，說不定明年就被收回去給別人種了。

地下黨支部下決心一定要選自己人掌握這個“農會”，好利用它來進行減租鬥爭。有個晚上，志中、家貴、知仁、康梯幾位同志在知仁家小樓上開會，研究分頭到群眾中去宣傳，推薦知仁同志當“農會”主任，還擬個提案，準備在民眾大會上通過。

平常靜得出鬼的祠堂，今天分外熱鬧。早來的人坐在石階上“巴答巴答”抽旱煙，臉上挂了一絲微笑。

舊“農會”主任林可師奉命前來競選，油腔滑調地大談減租減息。誰去聽他的呢？誰還不知道他和地主是穿一條褲子。他談完了話，鼓掌的只有幾個地主、富農和流氓、歹徒。

輪到知仁講話，他兩手按住桌角，由種田講到反對退佃。庄稼人講庄稼事，句句打進農民心里，台下的群眾伸長脖子細聽，唯恐漏掉一句話。老年人听得低下頭收斂了微笑，深陷陷的眼眶上閃閃淚花，低聲嘆息：“我們的命運怎麼這樣壞呀！”火氣大的青年人自動地喊着“我們要減租”的口號。在熱烈的歡呼聲

中，知仁同志被选为主任了，其他的几个党员也成了委员。会议通过了减租减息的决议案：（原文已失，只记大意）

- 一、耕者有其田，保证永佃权；
 - 二、田主卖田要给佃农25—40%的田款；
 - 三、服从农会决议，卖田须经农会许可，否则一律无效。
- 地主和富农看可师没选上，气得跑了。

会后还有许多人喋喋不休地叹息争论。这个说，地主这下不能再退佃了，他不能让土地长青草；那个说，你不种别人会种；第三个马上反驳说，谁种谁就是巴结地主，我们找农会。原先想来看看的人，心里也有点动，但还不相信：“说还是说呀，没做出来那有个准。”

为了打响减租斗争的第一炮，事先召开了群众会，说明了减租步骤，人人心里都有了个底。然后下通知：今年的祠堂租全部打八折。祠堂租说是公众的，其实操在几个大地主乡绅手里，大部分都入了他们的私囊。自古以来，不论天年丰、歉，祠堂租都一粒不能少；今年要打折，还是破天荒第一遭。

大恶霸敖里金，伪省政府委员、大地主知渊，都是掌管祠堂的当事人。听到祠堂租要打折，他们冷笑一阵认为这是妄想。

到议租时，他们在祠堂大摆筵席，请所有耕种祠堂田的佃户和乡里有威望的老人家。聚集一堂，对新成立的保农会的负责人，一个也没请。酒过三巡，知渊首先出台唱白脸：“诸位乡亲父老兄弟们，祠堂是公众的，祠堂租是祖宗的烟火钱，我们再穷，烟火钱一片也不能少。……”一大套宗族的大道理说得堂哉皇哉！那晓得，这一套知仁早跟群众讲清啦，谁也没上当，有人当场就喊起来：“今年歉收，我们连一口饭都吃不上，打八折已经很对得起在天的祖宗啦！”敖里金见知渊唱白脸不见效，就扮

起一付老黑臉，用沙啞的聲音呼喝道：“不要祖宗的叛子逆孫，誰要敢再提什麼祠堂租打折，我就敲斷他的狗腿。”說着把他那把慣子用來打人的文明杖在戲台上“啾啾啾”敲個不住。群眾不但沒被吓住，反倒裏起來。有人反罵：“叛子逆孫正好是你們這一起人，年年祠堂租都被吞到你們肚子裏去……”

“讓保農會來給我們議租。”“租不議好，我們不担谷。”……鬧嚷到不可收拾時，知淵他們才着急起來，忙差人去請知仁來。知仁想刁難他們一番，回答說：“我又不是皮球可以隨意讓你們踢來踢去，既然早不來請，現在我也沒兴致去。”最後沒法，知淵親自出馬把知仁請到祠堂裏，結果議定按八折担租，群眾這才散去。這次急得敖里金直敲文明杖。

減租的第一炮打響了。

群眾四處傳揚：“祠堂的租都打折，其他的还用說嗎？”可是唯獨敖里金就不讓減，還威脅佃戶：“我到古田山頭角落里找一批鄉下哥來當長工，把田全收回來，你們就得活活餓死。”

這年早收後，反動富農林傳添將在三角墪的十八畝田，不經過保農會許可，就向山東（人名）撤佃。山東無奈他何，把這事告到知仁那兒。知仁他們一面安慰他，想辦法給他新佃田做；一面警告傳添，不得擅自撤佃。傳添那里肯聽，強要撤佃。知仁他們說：“他撤，就讓他荒！”果然大家拧成一條心，誰也不去租這塊田。傳添沒法可想，便親自出馬去種；窮哥兒們在保農會領導下，來了幾十人，圍在田頭不讓他下犁。只聽到知仁洪亮的嗓音在說：“不論是誰，要撤佃就只好讓它荒！傳添就是第一個例。”結果這十八畝田荒了一季。春耕時，傳添央人跟保農會說情，陪了不是，田仍歸山東種。

這一來，群眾歡騰了，減租運動裏裏烈烈地開展起來了。除

了个别特别怕事的保守人家，仍旧是明减暗不减外，其他全都进行了减租。最可恶的教里金也不敢轻易乱动，也只得乖乖减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城門乡召开了减租磋商会，地主富农勾結了伪乡长傅涵，想要花招用压力，使农会屈服。于是派了大批走狗特务混入会场，准备捣乱。

伪乡长长着一副猴子臉，首先上台說：“我知道种田的不易，加上今年收成不好，所以同意“九五”减租。

“是的，‘九五’减租就好了，做事該适可而止，过火了就不方便。”一个特务赶紧尾接上去說。

这时，知仁同志站起来大声喊說：“我們要实行‘三五、六五’减租，‘九五’那还不是等于沒有减。”

会场开始騷动了。几个便衣队恶狠狠地盯着知仁，然后湊在一起鬼鬼祟祟地噤咕。志中全看在眼里，便站起来补充說：“‘三五、六五’减租是农会決議，‘三四、六六’都不行。誰敢不减找农会，有事由我和知仁負責。”

一通話說得地主、特务暴跳如雷。双方都不退让，會議只好不欢而散。

散会后，伪乡长带上三个特务尾随志中。到門口拉着志中的手假裝亲密。志中早知道有这么一着，心里有准备，便鎮靜地与他们瞎扯应付。到了僻靜去处，伪乡长傅涵突然問道：“你到底要不要‘三五、六五’，减租？”志中猛抽回手說：“‘三五、六五’就是‘三五、六五’多一点也不要，少一点也不行！”这时伪乡长突然露出猙獰的面目，向特务一使眼色。特务們正想上前行凶，就在这一瞬間，伪乡长看見田埂上站着十来个濃眉大眼庄稼汉。原来这是地下党組織預先布置的游击队。伪乡长，吓得魂

不附体，轉臉叱特务：“你們干什么？……滾，回去！”一面賠笑臉：“志中，我們好講話，你說‘三五、六五’也有理由，农民現在的确苦了点。好，好，以后我們再商量。”說着头也不敢回一下，就溜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螺州地主陈永生因卖田的事情与农民发生了冲突。陈永生有块四亩二分的田地租給貧农鍾金耕种，头年减了租，地主很不甘愿，一心想报复。要起佃怕农会干涉，不起又沒法子，最后把土地卖給有势力的城門富农林傳添。傳添是伪乡长傳涵的弟弟，这次他想仗着自己哥哥的勢，沒有接受去年荒田的教訓，以为他哥哥能吓住农会。

鍾金一户八口，沒这块地就沒法子生活。于是要求农会帮助解决。

天剛破曉，傳添的儿子家鍾牽一头老大水牛来了。但又先在村口瞧了又瞧，眼看沒人干涉，就大模大样吆喝着牲口向田里走去。剛下犁，知仁、康福等几个同志来了。知仁責問道：

“誰叫你来犁田？”

“我买的田，怎么不能犁？”家鍾有点胆怯地回答，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繼續吆喝牲口。

“有沒有經過农会許可。”

“我花錢买的，还要什么許可不許可。”

正說着，群众一下蜂拥上来，把家鍾团团圍住，看他那股野蛮相，大家都憤怒极了。“不許他犁。”“把犁拿起来！”群众講話力量就大了。家鍾不敢答腔，也忘了犁田。忽然，村子里奔出十几个年青小伙子，手拿扁担喊：“打！”群众也跟着喊：

“打呀！”“打呀！”一声未落一声又起。这个富农的儿子吓得深恨无处藏身，犁也不拿，牛也不牽，夾着尾巴拼命逃走了。

下午，知仁被叫到乡公所。傅涵坐在靠背椅上，“彬彬有礼”地对知仁讲起话来，很象责备他的弟弟，又很象是向农会道歉。他说：“我弟做事太粗心，买田也不跟农会说声，其实是件小事，说一下就好了。”知仁说：“不见得是小事，钟金全家八口人，没这块地耕就得饿死。”傅涵一声冷笑：“天下没地种的人多得很呢，不见得都会饿死。凡人做事都有点私情，帮来帮去，那能太认真。”知仁一步不让地说：“有的人做事全为私情，我们这是执行农会的决议。乡长当初不是也同意了农会的决议？”傅涵的嘴被堵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伪乡长虽然亏了理，可是仍想要替弟弟出气。第二天他便亲自上县去告状。县里看到农民情绪激昂，怕事情扩大，不敢袒护，判定这块地仍由钟金耕种。

这件事教育了群众，贫苦的农民认识到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就能和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

这以后城門减租的消息传遍四方，下洋、尚干各乡农民都来请教。自此知仁洪亮的声音和魁伟的身影，便经常出没在闽江和乌龙江边的各个城镇乡村。

减租运动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斗争的发展。到一九四九年临解放时，我们地下党已经发展到了二十几人，并且培养出了几十个积极分子。

(笔禾则、郑星象)

八 十 六 比 二

說起来是二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們种田人的生活是冬天蓑衣当被盖，夏天树叶野菜充飢腸。人說道：逼上梁山；我們梁厝洲的一場斗争就是穷困逼出来的。

十一月里的一天，我們照例聚集在龙瑞寺做“福”。不管怎么穷，家家户户总要湊合做几担糍粿，杀两三头猪羊，买些京果酒食焚香敬神，祈求菩薩显显威灵，賜个来年大丰收。年年这么求呀拜呀，我們的光景反而一年不如一年；丰收也罢、歉收也罢，在这财主当道的世界，穷人那有出路。那天下午，大家抱着火籠圍在庙厅里愁眉不展，你說“今年扫仓还不够还清大保的田租”，他說“正月就要向大保借粮了。”……越說苦越多，先別說来年的事，眼面前就过不下去啊！天官姆喝了几盅敬神的酒，臉孔紅丹丹的，他拉开嗓門說：“梁厝洲那块冲积土都快成洲了，干嗎还让給大保做蛄蝗不收回来？”这一提，大家的話头，都集中到洲地上来了。

烏龙江沿岸常常因为泥沙沉淀淤积成洲，这种洲，过不了几年，又会被大水冲走，再在其它地方出現新洲。每当发现新洲，我們就去圍洲，等冲积土厚了，就可以种稻。天官姆說的这块洲，是梁厝公众圍起来的，家家户户都付了劳动。因为前两年冲积土还不够厚，不能种稻，被梁大保、梁功守借去做蛄蝗。字約上写明：高地种席草、低地养蛄子，每年交一百五十块钱給村里

做公益事业，等土层厚了随时可以取回。这两年，梁大保和梁功守从来不交出一分錢。他們不但在那里种席草、养蛄子，还可以揀螃蟹，洲地上的螃蟹多得象森林里的落叶，揀它半天就有好几担；来潮时还能捕鱼。现在，这足足有一百多亩大的洲地冲积土厚了，来年就可种稻，早应该向梁大保、梁功守拿回来。

梁大保是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收田租三百多担，不容一个人欠他半斤四两。他一年要放两次高利贷，春天借给你一担谷子，夏收时要还给他两担。穷人家夏收完，常常是刈完稻又空米缸，他就假惺惺地说：“再到我家里去挑一些吧，不过年底一定要还我。”就这样本生息、息变本，一年内一担谷子翻了两三番，人说他是“笑面虎”。梁功守也是村里地主，他又是福州船篷行的大老板，这人一贯在商场上混，诡计多端。

天官姆见大家有意收回洲地，就说：“他们霸占住梁厝洲，真要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要收回洲地，软说好劝是没有用的，只有站出来去要！一个人不顶用，人多他就害怕了。”

经他一說，当场就有八十六户表示出面去交涉，他们推举天官姆领头；只有几户胆怯怕事的，或是家里还过得去的没有入伙。

天官姆說做就做，当天晚上，就去叫了功門、細发等七、八人，到大保家里去。一見大保，就单刀直入地說明要收回洲地。大保一陣惊慌之后，慢吞吞地说：“蛄蝗是我和功守合伙經營的，功守人在福州，我无法作主呀，要商量商量再說。”天官姆說：“好吧，你明天通知功守，叫他回来合計合計。”大保含糊答应：“是，是，明天吩咐人去叫他。”可是，事隔十多天，还沒見到功守的人影。

天官姆对大家說：“向財主講好求情是沒用的，我們应当强

硬些。”当即又召集了二、三十人去找大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限你明天叫功守回来，要不，我们明天就兴工围埕，踩散了蜆埕不管你！”

大家态度坚决，大倌变乖了；隔天午后，功守果然回来了。

当晚，我们就去找他们交涉。没想到功守老奸巨猾，他好象什么也不懂似地问我们：“为什么现在又提起这桩事？”说着伸手从皮袍袋里掏出字约来，神气活现指着白纸黑字说：“这里明明写着：高的给我们种草，低的给我们养蜆子，‘永远无限’，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纸在我们面前一扬。

这狗杂种知道我们不识字，耀武扬威的。也不知是伪造字约呢，还是原先就贿赂代笔的乱写一通。他们撕下面皮要霸占这块大洲地，还吓唬我们，要到福州去请律师打官司。我们三、四十人怒气腾腾，面对面就和他们吵起来。大倌心狠胆却小，怕挨揍，说要拉屎溜走了。功守见大倌溜走，就推说：“要和大倌商量、商量。”用软的办法来应付。

顶到三更，我们见到闹不出结果，也就另想对策。天官姆说：“洲地是梁厝公产，全村男女老幼都可做证人，乡邻也知道，他两人想赖也赖不去，我们反正不识字，管它‘永远’不‘永远’，明天就动手围埕……”

第二天，村里风言风语说：“昨天夜里，功守和大倌去拿了枪，准备打死天官姆！”

天官姆一听火了，赶紧集合了八十六户，他说：“我们是八十六户，他只有两户，只要我们齐心，每人吐一口唾沫都会淹死这杂种！他有两条枪怕什么？我们大家预备尖刀，要拼就拼，死了一个，家庭由八十五户来扶养！”

财主欺人太甚，谁也不愿再忍受，马上买齐了刀，由天官姆

帶着到龍瑞寺，捧碗成立“保農社”。這“保農社”，就是討回洲地和今後保護它不讓再奪去的意思。大家公推天官姆當社主；天官姆手捧一迭碗對着大家說：“就是死我一條命，也要把大家的百畝洲地討回來！”說完猛地把碗摔在地上，“乒”地破成粉碎。

過了半个月，大保和功守看我們沒有動靜，以為我們給兩支“月排”吓住了。就在這時候，他們兩人晚上喝得醉醺醺的、躲在識字會里賭牌九。我們八十六戶齊集了闖進識字會，天官姆劈頭就問：“到底還還不還我們洲地？”大保滑頭滑腦地說：“過幾天請爹長來理論好了。”功守却強橫地把頭一歪：“字約上寫得清，急什麼？”大家一聽更惱火了，天官姆逼進一步，問：“你回答，洲是誰的？”他兩人不回答。這時人群鬧鬧嚷嚷，有的喊：“說呀！”有的喊：“不說，打死他！”眾人就“打！”“打！”喊開了。

屋裡人圍得密密層層的，又大聲一喊，氣勢真壯！那兩個狗彘種一看情況不對頭，笑面虎已經嚇得全身打抖，平時氣勢凶凶的功守，也吓得臉色煞白。天官姆指着他們說：“今晚不交還洲地，老實告訴你，不要想活命！”大家也跟着摩拳擦掌，鬧得天翻地復。

大保怕死，先開口求饒：“都是叔伯兄弟，有話好說，有話好說，何必傷和氣……”。

“誰和你叔伯兄弟，快把洲地還給我們！”大家氣憤地喊起來，那笑面虎連連說：“還、還，還給大家就是了。”

功守看到我們人多力量大，知道洲地再難霸占，裝模作樣地說：“一点点洲地算什麼，我們也不差這些，既然大家需要，就給了你們……”話還沒說完，被天官姆一手抓住衣領提了起來：

“还給我們！把字約拿来！”那功守吓昏了，才把字約交了出來。天官姆放了功守，一伸手就把字約放在煤油灯上燒了。

收回了梁厝洲地，梁厝家家戶戶都象办喜事一样高兴。第二天，大男小女都到洲地上去种席草，捉来螃蟹打来魚。第二年开春，保农社就把洲地分給各家各戶去种稻了。

这以后，又鬧洪水，老百姓还是过的苦日子，大梯和功守还是喝我們的血汗。不过，夺洲地的事叫大家記住了：穷人只有团结一心才有出路，能夺回洲地，就因为我們有八十六戶，他們只有兩戶啊！

（梁功門、梁廣象、梁守泰江地 阮勃整理）

三斗敖里金

一

在敖峯誰人不知，那个不曉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林傳亨。這人綽號敖里金，滿臉橫肉，又矮又胖，陰險凶狠，惡似煞神。那時，連三歲的小孩子也怕他。小孩哭時，只要媽媽說一聲：“敖里金來了！”就剎時停止哭声，扑到媽媽怀里，動都不敢動。

人人都說敖里金家大業大，田連阡陌，果園成林。可是那知道他原來却是个破落戶。他這家業全是从血污里搶來的。他的這部發家史，也就是敖里人民的痛苦史，不知里面包含了人民的多少血泪。為了把原委弄清楚，我們先从头說起。

暴發戶

敖里金原是个浪蕩子，吸、喝、嫖、賭，无所不為。祖傳的几个錢，只几年就被他敗得精光。他有个駝背哥哥，在福州開烏烟行，頗有些家底。敖里金看了眼紅，心起歹念。有一天，他手執鋼刀闖進哥哥家里，對准哥哥的脖根，威脅喝道：“你不把烏烟行給我，我就宰了你！”駝背哥哥胆子小，怕惹是非，就乖乖地把烏烟行給了他。

不管怎樣，敖里金當起烏烟行老板來了。這以後，為了贏利，他更挖空心思，從柑桔園里挖出黑泥，摻到烏烟里去矇騙別人。

為了謀取更大的暴利，敖里金又做了鴉片烟販，不知毒害了

多少人。几年后，他发了横财，乌烟行、木材行、福州下杭街有名的金龙福杂货行都是他的产业。在乡下还半夺半抢了一千多亩土地，和无数的房屋、鱼池、柑桔园。他的田产遍及臚下、杜园、城門、敖峯、謝坑、臚雷和石步等乡村。

高利盤剝

农民有句話：“百八算，养孩子沒有屁股眼儿。”百八算就是：春分借一百斤谷子，晚收时要还一百八十斤。敖里金的高利貸更特別，竟然算到二百、二百四，甚至二百八。天君若有眼，他养的孩子連嘴眼都不應該有！

別人押地，三年滿期，敖里金一年半、两年就要滿期。反正他想滿就滿，誰要不服去告狀，但結果注定要輸的。你官司打輸了，還要賠他的損失；賠不起的，只好給他当长年或是坐牢。

現在杜園乡的党支部書記陳詩鑾同志，祖父在世时，借敖里金五十元錢。还了一輩子，还是还不清。“父死，子还債”，殃及了詩鑾的父亲，年年谷还没晒干就被搶走，連仅有的田也被夺去，这还抵不清債。敖里金竟想把九岁的詩鑾逼去給他当长工。孩子是父亲的心头肉，誰不心痛？到敖里金家当长年，等于把一块肉送到老虎洞里。可怜做父亲的苦苦哭求，答应等詩鑾长大点再去当长年抵債，他才罢休。

敖里金下乡收租，每次都坐着三人抬的轎子，轎錢强要佃戶付給。詩鑾他家，一貧如洗，那付得起轎錢。喪尽天良的敖里金，竟不顧穷人死活，叫人把詩鑾家破鍋、破棉絮拿去頂轎債。这事連轎夫都不忍心下手，甘愿自抬了他这只死猪。敖里金恼羞成怒，文明杖象雨点般劈头盖臉打下来，打得轎夫拿了棉絮、提了鍋才算完。詩鑾父子不知度过多少个无被遮身的寒夜。如今談

起这件事，詩鑾还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填胸！把敖里金砍成肉酱，也偿不完穷人流出的血和泪。

强取强夺

敖里金常常宣扬：他做生意，年年赚大钱。这骗得一些小康人家，卖了田产家具，凑足钱数，跟他合股做生意。跟敖里金合股，简直是跟狼结拜兄弟。常常是赚了钱，他却说没赚钱；有时干脆连本带利，全部吞没。不知多少人家就这样被弄得倾家荡产……

城山顶郑连保与他一起做生意，年终分红，敖里金不给，两人都告起伏来。结果，连保连本带利赔敖里金“损失”不够，还要给他一亩二分田做“钱尾”。

敖里金放钱债是看人办菜。你家若是有好田肥地、值钱的东西，你不借他的钱，他也要送上门来；但等你落入圈套，就再也无法救了。农民说贪婪的敖里金是：“见人财，谋人财；见人宝，谋人宝。”

温墩农民林祥兴家里有一只大肥猪，林仁寿有六亩好田，被敖里金看上了，结果肥猪和好田，全归到敖里金名下。

加租撒佃

“损年租不减，丰年定加租。”这是敖里金不成文的法律。著名的农民科学家、劳动模范、城門公社副社长王茂玉同志，早在解放前就开始选良种，那年多收了几担谷子，肥胖得象只猪的敖里金，驾临他家，双手撑在文明杖上，猪脸略略向上，用沙哑的声音嚷道：“今年你要加我一担租，否则我田要收回去自己种”，弄得茂玉没法，只好答应加租，把自己辛辛苦苦改良品种所

多收的谷子，給了貪得無厭的敖里金。

凡是加不起租、还不起債的，就毫不容情地全部撤回。別人撤回在秋尾，敖里金撤回在二月初。那時田里犁、耙、耨、肥全都搞好，單等播種了，敖里金却把田撤回“自己”種。許多農民因為動了血本，問他拿肥料錢，而遭他毒打！

東塔農民叶依欽，租他兩畝地，半飢半餓過活，敖里金嫌他窮，加不起租，有一年開春時，撤了佃。依欽苦苦哀求，敖里金始終不依，而且連肥料錢也半分不肯給。依欽無處謀生，終於活活餓死了！

一直到解放前夕，地下黨取得了偽農會領導權，領導農民展開減租運動，敖里金還是四處威脅：“你們若要減租，我要把所有田都抽回來，去古田山頭岐角鏡里叫鄉下哥來做長工，看你們這些人會不會一個個餓死！”

盜不講理

越富有，越吝嗇；越有錢，越貪婪！城山頂貧農鄭木利，租敖里金幾畝地種妮梨（荸薺），事先約定，收成時用妮梨還租。那年妮梨減價，敖里金便翻臉不收妮梨，一定要谷子。木利費盡心機湊足谷子，敖里金又吹毛求疵，嫌谷子太“孬”（空粒多），要上等好谷。木利跟他評理。窮人敢跟財主評理，僅這一點就冒犯“天條”了！結果木利被吊打三次，幸亏鄉親們千求萬保，才放出來。木利田種不成，家裡待不住，冒着寒夜，帶着妻小逃到福州，靠拉黃包車為生。敖里金在鄉里一天，木利就一天不敢回來，直到解放後才回到家裡。木利現在敖峯營城山連當連長。

還有一家，还不起敖里金的租，全家替他做牛馬；男的當長年，妻子把初生幼兒忍痛抱給人家，替林家少爺喂奶，大點的孩

子为林家看牛。白干了三三年，还是还不清一年的欠租。丈夫忍不住，偷跑到福州去拉黄包车，不上一个月，被敖里金抓回来，一顿吊打后，仍旧当长年顶租……

城山顶农民郑依姆，替敖里金运粪，浇柑桔园，全都办妥后，本应按预先约定的数付工钱，可是，敖里金竟无耻到如此程度：矢口不认账，硬说工钱已经付过了。依姆气急说：“我们去捧碗咒嘴（发誓），你做财主还来欺负我穷人！”结果工钱没拿到，反遭了一顿毒打。

地主秤大，要数敖里金的最大。人家百一二，他百一八，甚至百二，（注：百一二就是一百十二斤当一百斤）。农民叶魁训，还租时，二百四十斤的租，被称去二百八十七斤，敖里金还不依，说是还差租尾一斤。魁训一时脱口说了声：“财主家秤也太大了。”挨了一顿打，最后还了租尾，陪了礼才算了事。

罰 款

农民叶捷祿，孩子生病，农民小重从自己柑园里摘了几颗柑给了病孩子，被敖里金撞见，一口咬定叶捷祿穷鬼穷骨头，没种柑那来的柑子，说这一定是偷了他的。捷祿讲清原委，小重还出面作证，敖里金还是不由分说，把叶捷祿双手反绑，肆意拷打。后来拿了几十块钱的所谓罚款，才算了事。

敖里金欺侮其他小村无势的穷人，更是难以想象：有一次到温墩里收租，自己踩了鸡屎，脚跷得高高的要鸡主给擦，善良的鸡主擦了他的脚还挨了一顿文明杖……

文 明 杖

大概是敖里金的两只短腿，撑不住他那肥胖如猪的身体，因

此文明杖就成了他随手不离的东西，每次打人也都是用它。远近各乡无人不知他这把文明杖。现在闽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陈诗勇同志、杜园党支书陈诗鑾同志，都曾经挨过他这文明杖。他打起人来，不分部位，象雨点一样劈头盖脸地打。有一次，他坐轿到杜园收租，刚过排下转弯那儿，因为身体太重，压断了轿杠，好象王八啃西瓜一样，连滚带爬跌落到田里。前面那个轿伕知道事情不好，吓得拔腿就跑，亡命福清。可怜后面那位轿伕，自己摔了不算，文明杖还象落雹一样拦头盖下来，直打得文明杖折断了才罢手。轿伕被打得奄奄一息，险些儿还要进监牢做犯人。

来仔一家

来仔妻子早丧，留下一男一女，靠一块三分大的地瓜园勉强过活。想不到平地起风波，敖里金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这块地风水好，修了墓能封妻荫子，就强迫来仔出卖。买了地又不给钱，来仔问他拿，反惹了一顿文明杖打。敖里金口口声声说：

“等棺材放进去再说，难道我会欠你这两文小钱。再来囉嗦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等放进棺材去恐怕要到卯年卯月，本来就穷极了的来仔，那容久等。来仔一家断了几天炊，孩子哇哇哭！不能叫一家人全饿死，来仔心一横先把女儿送给城门人做童养媳。接着儿子也卖给福清人，可怜姐弟俩，哭着喊着不愿离开自己的亲爹；来仔看这情况，眼睛发直，呕出了两口血，连半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不久，他自己也流亡到福州去了。自此后，再也没人见到他的面……

这段血泪仇还是从他的侄儿郑中富口里听到的。不知有多少类似的血泪仇，沉没海底，找不到苦主。敖里金，这就是敖里金干的好事！

包打官司，逼死人命

現在敖峯的文化宮，就是當年敖里金的公館。這座房子的地基，一半是農民林邦係的，一半是鄉里愚眾的。敖里金占了公地，無人敢講。林邦係的地，敖里金先是強買，——農民靠種地過活，賣地就等於賣命，不到絕境是輕易不賣的。——他強買不到，惱羞成怒，仗着財勢，反咬邦係一口，說這塊地本來是他的，被邦係霸占去了。遞了一張狀紙，邦係就關進了監獄。那年牢里發生瘟疫，邦係含恨死去。邦係嫂捶胸大哭，要把屍體抬到敖里金家去，反遭敖里金一頓惡打，屍體被拋在露天野地里。邦係嫂撫屍痛哭，告訴兒子：“沒有報仇雪恨，絕不收埋屍體！”此後棺材停在果園子里始終沒埋。

敖里金有三個律師做他的干兒子，專為他謀財害命，搶地奪田做辯護。他有錢有勢，串道官僚，又有這一幫人，打官司那有不贏的道理。

摘桃的小孩

城門洲里，桃樹成林。六月大夏，正當桃熟的時候，碩果累累，一股清香撲鼻，真是誘人；可惜這些農民辛勤種植的桃林，十之八九都被敖里金強占着，種桃的人反倒連半個桃子也動不得。

一年，一個無知的孩子，看到樹上許多熟透了的桃子，實在撩人，禁不住摘了幾個，不巧被敖里金看見。他提着文明杖追來，孩子吓壞了，拼命跑開，躲到江邊沙洲里。敖里金就坐在岸上等着不走。直到潮水不斷上漲，淹沒了整個沙洲，看着涵涌的江濤把這無辜的孩子卷走，才稱心的走回去。

人們誰无子女？农民們听到那孩子被江濤卷走时，个个凄厉的惨叫起来，无不落泪。可是毫无人性的敖里金却得意地念叨着：“下次那些野孩子就不敢来偷我的桃了。”

三条人命

一九四四年，福州第二次淪陷。敖里村經過日本鬼子搶劫，又加受澇歉收。农民个个餓得面黃肌瘦，典妻賣子，沒有一粒糧食。可是敖里金家却囤積着大批糧食，不肯賣給窮人。农民手執白旗，到偽鄉公所請願，要求把囤積的糧食開倉平糶，可是被拒絕了。农民被餓得走頭無路，逼上梁山，只好鋌而走險。一天晚上，农民鄭友炳、鄭寶康、林森官偕三人到敖里金倉房里去偷糧食。不想被敖里金發覺了，馬上請來日本兵，把全村圍住，抓住三人，硬說他們是土匪，是游擊隊。日本鬼子吃夠酒肉，就把三人脫光衣服綁在空場上施刑取樂。用香烟頭燒，用火紅的通條打，還灌涼水，穿鐵綫衣。惨叫的聲音响彻敖里村。农民个个落泪，敖里金却還不解恨。寶康的妻子聽到消息，趕去看望時，三人已被打得血肉模糊。寶康只對妻子說出一句話：“不要哭！記住報仇！”在一天晚上，三人都被槍決在烏龍江的峽兜渡口上。日本鬼把他們四肢釘在木板上，用小汽艇運到江心，然後開槍掃射。尸首一具具翻滾到江心里，霎時就被洶涌的波濤吞沒了。江面上只剩下夜風在號泣。

老色鬼

敖里金自幼嫖賭出身，是個貪饕的老色鬼。公開娶了大小八房妻妾，其他“小家庭”、誘姦、強姦的就不知其數。他在家里也象個凶煞一樣，淫威十足，人人怕他。他若是不在家，大小老

婆談笑風生，只要一聲：“老板回來了！”霎時吓得鴉雀無聲。每當敖里金喝了酒，獸性大作，在他家的鄉下妹（丫頭），奶媽甚至煮飯婆全都遭殃，沒有不被他肆意侮辱的。那些被損害被侮辱的人都還得陪他笑臉，否則就絕不會便宜你！

無恥的敖里金洗澡時，一定要年青的鄉下妹替他擦背，這時他就趁機姦污。多少個佃戶的女兒被他坑害了呵！他的第五房小老婆蓮香，原就是他家的鄉下妹，先姦污后，才收為妾的。

他經常恬不知恥地對人說：“討鄉下妹、煮飯婆最合算，既可以當老婆騎，又可以當奴才使。這種奴才還更可靠，更會為家里操心問事。”

敖里金第二房小妾新姨娘，原是伙計的妻子，敖里金硬把她強占去，玩弄夠了，人也老了，便又一腳踢開。

那一天下大雨，鄉里一個二流子剛好在敖里金門口躲雨，敖里金回來敲門，偏巧新姨娘出來開門，敖里金就一口咬定，新姨娘與躲雨的二流子私通，打得她死去活來，最後無法，被逼進尼姑庵。

敖里金有個長年叫吓哥金。人家說吓哥金有些傻，敖里金却正好看中他傻，不僅叫他干重活，還把他的老婆騙到福州烏烟行里，強行姦污了……最後，弄得滿城風雨，才把人放回家……

到快解放時候，敖里金已經六十三歲了，可是他還用十五兩的金子，娶了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當小老婆。若不是一聲春雷，惊天動地來了解放軍，不知還要有多少兄弟姐妹遭到這個老色鬼的殺戮蹂躪……

受苦受難的農民多么盼望黑夜早些過去，出來個光明溫暖的太陽呀！

太阳出来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軍来到了敖里，被击潰的蔣軍紛紛向厦門方向逃竄。枪声沒停，地下党就发动农民选举了新农会。林家貴当了农会主任，林康梯、叶捷仁等也都当上了干部。可是这里面也混进了个坏蛋，名叫林傳宏。他成分虽然也是个农民，但骨子里却早已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人們叫他：“武状元”。

解放后，林傳宏假充积极，混进了干部队伍。

发动群众

傳宏当了干部，敖里金很高兴。一天傍晚，他偷偷溜进傳宏的家，对方沒开口，他就搶先說：“傳宏，听說你当上干部啦，恭喜，恭喜！”停一下，端詳傳宏一番，挺起大拇指說：“敖里是我們姓林人的敖里，那些外乡人休想动它一草一木。今天你当上干部，我們姓林的再也不会受別人欺侮了。好好干，生活困难嘛，我可以帮你忙。”說罢捧出黃灿灿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元……

“有錢能使鬼推磨。”敖里金熟記着這句話。秋征时候，他又闖进农会主任林家貴的家里。

“家貴，你为什么派我八十担谷子？共产党讲民主，福州軍管会的秘书跟我很熟，我查过了，不該出八十担。”

“我不管你什么秘书不秘书。派你八十担，一是群众意見，二是政府法令；多粮多出，少粮少出，无粮不出。”

看家貴那样斬釘截鉄地回答，敖里金伸手往口袋摸金子。

“我出八十担粮有困难，不过，可以想办法，你当干部生活有些困难，这里……”

“我是单身汉，橄榄鹹配稀稀粥，这生活惯了。旧社会几十年都熬过了，现在还怕什么？你还是早点把谷子送到农会去！”家贵同志声色俱厉地说。

敖里金討个沒趣溜了。

受到家贵的严詞拒絕后，敖里金就千方百計想破坏农会組織，到处說：“現在的农会不成个农会，象家贵既沒有錢，又不会讲普通話，告起伙来，敖里人包吃亏。”成天利用爪牙跑东走西，拉攏落后群众。

一天晚上，敖里祠堂点起成斤重的大腊烛，敖里金想召集群众开会，与农会对抗。农会知道这件事，立刻組織基本群众挤进会场，站在最前面。敖里金来了，他說：“我好比一把涼傘，打开来够整个村子人乘涼。你們沒錢用可以向我拿；沒飯吃，可以向我借。有我在，你們借貸也方便。农会不顧大家死活，派我八十担谷子，谷子拿去干什么？給外面人吃，我們都是敖里人，为什么谷子不吃，偏要讓給別人？大家想想看有沒有这道理？”經这么一說，个别落后群众开始喃喃咕咕地責备农会了：“对呀，有本領到外面去向別人拿，怎么尽是搞自己人。”“姓林的怎么会出家贵这样的败家子！”声音嗡嗡地愈来愈大。傅宏偷偷挤在群众中挤眉弄眼地说：“我也这么劝家贵，可是家贵他們总想搞过火一些，好搵功。……”这时，在前面的人忍不住裹起来了：“你有谷子不交。誰交？”“敖里金，你別想挑撥，你什么时候給过我們谷子吃？”“你出八十担还太少了！”后面人呆了。敖里金被問得无話可說，头上冒出几顆汗珠，高帽也忘了拿，就偷偷地溜出了人群……

秋征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可是，还有一些群众的認識很模糊，認為敖里金是姓林的支柱，好象有了他，能沾到一点“光”，即使坏，也还是姓林，說来說去，終究是“自家的叔伯”。也有些人知道敖里金可惡，是个坏蛋，但害怕变天，——国民党还在厦門，万一反攻，敖里金不会便宜人的，因此在旁觀望，不敢和敖里金斗争。但大部分貧苦农民和长期与組織有联系的群众，他們覺悟高，痛恨敖里金，都常常跑到农会訴苦，他們說：“我們不怕敖里金。斗争了他，即使会死也要斗，不斗也活不成。”

敖里金不斗倒，群众有顧慮，什么工作也难开展。支部便先把这些坚决的骨干組織起来，充分发动广大群众与敖里金斗争。

三抓敖里金

敖里金老奸巨猾，听到些风声，說农会正在群众中訪苦，准备斗争，便急急逃到福州烏烟行去了。

康偉、家貴几个干部开会，决定派人到福州去抓。不想第一次去抓时，傳宏暗暗报信，敖里金立即跑了，結果扑了个空。

不久，农会又派民兵在夜里第二次到福州去抓。志中負責先找派出所領取逮捕証。其他的人由家貴率領悄悄向下杭街烏烟行进发。傳宏也在里面，只是着急，却抽不得身。他們到了那里，立即把人馬分成两半，守住前后門。等待志中領逮捕証回来。正守着，忽然旁边一个小边門呀的一声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廚师模樣的人，手里提着个小籃子，看樣子是想上街买菜。他一眼看見这么多人，不覺吃惊起来，立即惊問：“你們是誰？干什么的？”

家貴急忙陪笑地說：“我們是敖里的农民，因为田租的事，想上来和老板商量商量。来的太早了，大半夜不敢打擾他老人家，順便在这儿歇一会儿。”

正談着，一个民兵插上来問：“老板在家嗎？”

“在，他沒这么早起床。”

康偉、家貴几个同志趁那廚師在談話沒注意，一拥挤进門去，那廚師只望了望，門也不关就走了。

大家走进烏烟行，开始走出来的是敖里金的儿子林家雄。他謹慎地打量着每个人，当視線触到傅宏时，心安了。便进去叫他父亲，說有佃戶来商量租子。敖里金听說是商量租子的事，立即擺起了地主的架子。头高高昂起，踱着四方步，走了出来。他一眼看見家貴、康偉几个敖里干部都在里面，臉色立时变了，渾身吓出一場冷汗，急忙轉身要走。

家霖同志忙喊：“金叔！不要走，今年收成不好，稻子歉收，我們是求請您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的。”

敖里金急忙擺手說：“不要紧！不要紧！你們收多少，算多少。那能那末認真。行里忙，我不能抽出空来。……哎！你們走了这么多路，沒吃东西，我去拿些包子来！”說着轉身就又想走。

这时志中还没有回来，手里沒有逮捕証，大家不敢下手，只好設法拖住他。几个人同时回答：“不餓！你先和我們商量下吧！”敖里金眼看不能脫逃，臉色变得鉄青。半天才說：“那末大家抽口烟吧！”一手遞过水烟筒来。傅宏看到烟筒沒人接，为了替主子解圍，忙伸手接过来。敖里金見有人接过去，便借口說去引火，走进后厅去了。

大家在外面一等不出来，二等不見面，正在着急，志中回来了。大家忙問：“逮捕証拿到了沒有？”志中說：“拿到了。馬上抓人！”大家急忙一起冲进后厅里去，可是，人早已从地洞里逃走了。

这一回虽然没抓到，但也是一次大练兵。大家都认识到敌人是狡猾的，必须提高警惕和锻炼斗争本领。第三次终于配合了安人员，顺利地把敖里金抓到了。

三斗敖里金

一九四九年旧历九月二十，城門乡完全变了样。街道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打倒地主恶霸！”“农民翻身做主”。受敖里金压迫的人多着呢！

斗争会上，不仅是敖里、城門、遑社园、謝坑、臚雷、石步各乡的人也都来了。这天小孩子特别高兴，一清早，就拍手大叫：“敖里金抓回来了！敖里金抓回来了！”

敖里金以为今天还象解放前一样来说理议租。他穿着一件绸面的新夹袍，戴着顶瓜皮帽，还没忘记带那根常用来敲人脑袋的文明杖。他挺着肚子，大搖大擺地走上台去。他家里还叫佣人、乡下妹端来一张大藤椅，一副茶盘，银打的水烟筒来伺候敖里金哩！佣人才到祠堂口，就叫民兵给喝退了。

敖里金一上台，台下就轰动起来：“打倒恶霸林傳亨”……口号声象暴发的山洪，震响古老的城門祠堂。这时，敖里金才大为震惊，叉着腿倚着文明杖呆立在台上。

“把哭丧杖扔掉，你还想用它打我们吗！”群众喊起来。一个民兵走过去，缴了敖里金那根曾经显赫一时的文明杖，拿到膝盖上“咔嚓”一声，当众折断了。敖里金垂着手，用一双仇视的眼睛四处巡视着，好象要记下每一个斗争他的人。

“跪下去，叫敖里金跪下去！”为了打掉他的势焰，群众怒吼着请求。在广大群众的威力下，敖里金只得乖乖地跪了下来，压在农民头上几千年的封建势力终于坍下来了。

第一个上台訴苦的是城山頂农民郑木利。他訴說他怎样被敖里金吊打，怎么被逼躲到福州去拉黄包車，一直到斗爭敖里金了，才敢回到自己的家。台下人听着，一双双发光的眼睛里，充滿着对階級兄弟无限的同情和对地主的憤怒！

接着上台訴苦的是老农郑中富，除了訴說自己被敖里金殘酷剝削和压迫外，还說了他叔叔来仔一家被害的事。說到痛苦处，老泪縱橫，台下許多人也唏噓哭起来。

最感动人的是年近古稀的孤老头子傅应，訴說他的儿子宝康，怎样和友炳、生官弟同被敖里金陷害，慘死在烏龙江上。老人干枯的眼里流出了慘痛的泪，最后实在忍不住滿腔仇恨，用拐杖朝敖里金打去。全場的人臉上都挂着晶瑩的泪，呼喊著搶到台前高喊：“打！打！”“活活打死他！”民兵、干部、工作組急忙拦住了怒不可遏的群众。敖里金吓得臉色发白，全身哆嗦，縮作一团。

訴苦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天漸漸黑了，家貴宣布第二天繼續斗爭敖里金。

第一次訴苦会影响很大，許多受苦的群众深夜了还主动找农会訴說。

第二天，九月二十一，第二次斗爭敖里金。訴苦的人更多；从来不敢說話的人，今天也敢在千人大会上訴苦了。敖里金的傲气完全斗下去了。

头两次斗爭的影响很大，燃起了南台島各乡反霸斗爭的烽火，迅速提高了群众階級覺悟，为各項工作的順利开展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可是，头两次斗爭，也还存在缺点，群众发动得还不够深，不够广，有一些受害极深的人还没有站起来，狡猾的敌人还没有根本打垮，他們还繼續耍着各种花招。到处散布謠言說：

“敖里金这一跪，把城門祠堂的屋梁都跪弯了。”“戏台角被跪得塌了下来！”此外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异己分子，他们公开或暗地里，阻挠、破坏着整个斗争。

针对着这种情况，工作组组长史魁元同志做了总结，傅宏蜷缩在屋角里。史同志早就注意到这个在群众中作威作福的叛徒了，这时指着他说：“在我们队伍中出了异己分子，出现了被恶霸地主收买的坏蛋。”接着用犀利的眼睛直视着傅宏。傅宏象一只困兽，龟缩得更紧了。史魁元同志的手直指着傅宏：“叛徒就是他！”“我，我是坏蛋？我，我是叛徒？……”傅宏抖颤着说。

“就是你！”史魁元斩钉截铁的回答：“我们早已调查清楚了，你接受了敖里金多少钱？”傅宏来不及分辩，把什么都承认了。他低着头，在那儿直哆嗦。“出去，给我滚出去，叛徒！”傅宏从屋角挤了出去。

干部里的异己分子被驱逐出去，群众的斗争意志更高涨了。乡里的地主、富农和一批爪牙，怕台柱真的被扳倒，就团团围住林家贵同志，明是恳求释放敖里金，暗里扬言要把家贵同志干倒！每次回家，工作组史同志，都叫家贵带上手枪。家贵同志毫无畏缩，仍旧日夜去访苦，组织群众起来斗争。

敌人使出了最卑鄙的手段，用美人计来引诱家贵同志。

家贵同志在旧社会受了一辈子苦，一九四五年就参加了地下斗争，担任地下支部的组织委员，整天废寝忘食，数年来如一日。为了便于革命斗争，他一直是个单身汉。敌人想到金钱买不动家贵，女人一定会使他被俘。结果，敌人算错了，家贵同志丝毫不为所动，敌人阴谋又失败了。

经过了长期而艰苦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在同年旧历十一月初三，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斗争敖里金大会。到会的有

工人、农民、解放军和学生以及各乡各地代表共九千余人，上台诉苦的就有一百多人。

敖里林邦保的棺材还停在菜园里，儿女们履行邦保嫂遗言：“不报仇雪恨，绝不掩埋。”这使敖里金一开始就害怕，亲自到邦保家，答应加倍偿还地价，棺材由他修墓掩埋，堵住了邦保儿女们的口。头两次怎么动员，邦保的子女都不出来诉苦。经过家贵他们反复动员，讲到了邦保冤死监狱，被敖里金抛尸露野，邦保嫂抚尸发誓的时候，一家人又痛哭起来。在第三次斗争时，邦保的儿子便毅然决然走上了台诉苦。他的控诉激起了到会群众对敖里金的一致的愤恨。台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动山岳。静静的城隍庙变成了向恶霸冲击的战场。

千年来礼教规定，妇女不得入祠堂；开斗争会时，许多妇女都去祠堂诉苦，斗争敖里金，打破了封建束缚。

“打狗要打狗头。”敖里金斗倒了，群众报了仇，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接着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

（连永刚、郑星象）

土改中的故事

不斗不相識

城門乡的农民經過减租、反霸斗争，学习了土改政策，眼睛可雪亮啦：誰是敌人，誰是自己人，全看在眼里。乡里那个該評地主，那个該評富农，心中也都有数。在土改評成份的时候，那些狡猾的地主，千方百計地想逃避农民的判決；但是，他們犹如鉄籠里的狼狗，怎么也逃不了。

这一天，大家又热烈地談开了，他們一致認为，林家訓家里只有四口人，就占有土地三十几亩，柑桔二百多株，解放前，雇长工，放高利貸，收租，用尽手段盘剝农民，应評他地主成份。可是，在自报成份时，他却自报富农成份。

这个消息一傳开，馬上引起了公憤。

“这家伙彻头彻尾的地主，还敢报富农成份。”

“这賊仔，过去吸了我們的血汗，今天还不肯坦白。”

“我們决不能让这头狡猾的狼漏网。”

“我們要斗争他！”

“我們要向他清算！”群众个个漲紅着臉，咬牙切齒地嚷着，罵着，把他的屋子团团圍住。后来工作组同志說，晚上开一个会向他算賬，大家才散开。

晚上，人們剛吃完饭，就成群結队地进了会场，他們臉孔板

得紧紧的，边走边罵着。一会儿，家訓低着头，在无数道憤怒的目光監視下，狼狽地走到会场后面的右角落坐下。

“同志們！算賬会現在就开始。”工作组沈維錐同志严肃地向大家宣布。会场顿时鴉雀无声。沈維錐同志向四周环視一陣，接着說：“今天晚上，大家认为那一个人自报成份不对头，都可以提出来，向他算賬，大家要認真地提，絕不許一个地、富分子漏网。現在，先由林家訓向大家講一講，为什么自报富农成份。”

維錐同志話一停，家訓慌忙站起来，低着头，裝着非常老实的样子說：“大家都知道，我家一貫是劳动的，絲毫沒有欺詐人，我的土地和富农差不多，所以自报富农成份。”

“胡說！你不是富农，你是地主。”

“是！你是地主，你沒有劳动，专靠剝削人起家！”

“你給我放老实些！”

“……。”群众都站起来，你一言，我一語地指着他罵，許久不能安靜。

在吵鬧声中，他低声地申辯說：“我不能評地主，地主沒有劳动，坐着剝削人，我有参加劳动，田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血汗买的。”

“你的田都是雇长工做的。”

“你在田里，監視我們做工也算劳动！”

全场又轰动起来。

工作组同志望着憤怒的人們，大声喊說：“同志們！我們一条条地提出来揭发他。”

“你是地主，不是富农！”民兵队长林家文猛地站起来，指着他說，“你放过高利貸，据我所知道的，就有二、三百担。天係那里放好几十担，依芦仔那里也有。”

“是，天梯借你的高利貸，只有两年時間，四亩多田都被你騙去，后来气瘋了。”一个大个子农民紧接着說。

“还有，烏犬嫂因为借你的錢，二亩田也被你騙去，結果逼到南洋去。”妇女会主任林雪飞气狠狠地說。

“唉呀！冤枉啊！”林家訓还想要无賴。

“什么冤枉？你还想抵賴。”

“天梯瘋癲还没有好，你眼睛放在褲袋里去了。”

“他不老实，給他拿出来公審。”

“……”

在憤怒声中，向来不爱說話的依芦仔，也站起来指着家訓責問：“你还說冤枉，过去我借你的谷子，沒过几天，一担就要还担半，有沒有？”

“他不但在这里放高利貸，在他老婆娘家臚雷那里也放了一百担。”群众林炎官大声对大家說。

林家訓被一条条鉄的事实，駁得哑口无言，只好搭拉着脑袋不吭声。

“你到底有沒有？說呀，为什么不說！”一个青年狠狠地冲着他說。

“这……这个有。”他慌張地回答。

在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白发蒼蒼的老太婆，她气得两眼都发紅了，指着家訓向大家說：“过去，我家包他的田种，三天的工錢，却要做六、七天的工。”

“从前，我在他家里做工，一天要做二天活，吃的还是番薯米粥。”农民林加品憤憤地說。

“我过去租他的田种，一年到头，除交租外，只能剩下几斤谷子。有一年，遇到旱灾，我自己又生病，結果田里絕收了，当

时，我求他少交一些租子，他差分毫都不肯，而且欠的租，还要跟借高利贷一样要纳利息。”贫农林长成咬牙切齿地诉说着。

许多人都想站起来说话，工作组沈维维同志便先站起来，严厉的眼光盯住林家训：“现在，你承认地主成份了吗？”

“刚才说的许多事情，都是我父亲做的，怎么会评我地主呢？”他还想狡辩。

“你已经三十九岁，而且有了孩子，你父亲在世，你早就成了当家人，跟你父亲一起剥削穷人，怎么会跟你无干？现在根据你的情况，我们要评你地主成份。”沈维维同志严肃地反驳他。

“你们要评我地主就地主吧！”

“没有什么就不就的，你到底是不是地主？”

“不能让他含糊，要他讲出来是不是地主。”

“快讲呀，为什么还不讲？”群众愤怒到极点。

“是，是，我是地主。”

林家训一斗倒，在会的虚报成份的地富分子，也都乖乖地站起来向群众坦白。

(穆 鐘 溪)

分 配 委 員

螺洲人陈盖山当过国民党伪军长，蛮横得很。解放不久，还没有人敢去螺洲去跟他闹退租，我去打头阵，带洲里人元官、卤弟等七、八个一起去。那天工作组张廷光同志也去了，我们胆很壮。陈盖山看见我们，怕得很，怎么讲怎么是，满口答应退租。我第一次体会到：有共产党领导，我们穷人组织起来，力量就是大。

反霸后不久，工作组老张同志跟我一起去割稻，他对我说：

“退租反霸还不够，我們还要准备分田，进行土改！”我一听说要分田，高兴得跳起来。

开会时，听到分田，彻底消灭封建剝削制度，群众都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眼睛都亮起来。工作组同志讲话时，会场里坐着数百人，連半点咳嗽声也没有。

我是洲里人，从来不干亏心事，田園桔树都熟悉，群众都相信我，工作组也看重我。到土改分配果实的时候，大家都选我当分配委员。前宅农会选五个委员，其中有我、元官、卤弟、家容和有林。

当时，做分配委员日夜沒有一刻闲。方岐洲到前宅的小桥断了，我夜夜泗过小河去开会，声音喊哑了，鸡叫了，又脱下棉袄扎在头顶上泗回去。尽管身上冷得发抖，可心里还是热烘烘的。每天，从方岐洲到前宅乡政府，一路上都有十来人截住问：“我分的田在那里？多少？”有的索性到我家里问这问那。我忙得至少有一个礼拜沒好睡过。

开分配会跟斗地主会真不同呵：对敌人要坚决斗争；对自己人却要照顾入微。考虑的东西也多的很：分田，要考虑到成份、劳力、耕牛、远近、高低、好坏，还要考虑农民对那块田園是否熟悉。寡妇牛氏，她劳力差，分给她较高一块地，耕种有困难，只好分她一块挑土田，不要什么成本，收入却好得多。穷困、做田技术差的，我们就多分给他桔树，这样他收入好，容易改善生活。林家卿是由閩北回来的，失业很久，便分他五十几株桔树。

在乡政府开分配会时，有百多个群众圍在門边議論着，不肯散去。这情景更使我们分配委员感到責任很重。工作组老張叫我出去对外边群众說說，要他們回去。我出去大声嚷道：“安安心，乡亲们，包你們滿意，分配委员一沒私，二沒弊，远近亲疏

都一律对待，自己人有話都好讲。”群众听了都叫道：“这话讲得好。”就高兴地散去。

林家欽是我換帖兄弟。他跟我說：“金官，三行排，四行排桔树，要留給我！”

三行排，四行排，五十二株，这三处桔树是全天福洲最好的桔树，以前都是家欽租佃的。分配时，我們將三行排、四行排分配給妹弟、知书、依元。闊嘴仔年紀很大了，還是光屁股，沒有褲子穿，人又瘦又干，过去給地主做长年地主都不要，七天吃不上一餐飯，生活很苦。我們將“五十二株”的桔树全部分給他兄弟。几年来，这些人的生活越来越象样了。

方岐洲方大命，这人手殘廢，又是单身汉，生活很苦。分配时，我們分給他七分田地（田地就在門前），桔園二分，还分給他全身衣鏡櫥一架。

方岐洲林依发有一块带桔田在城門洲，給城門洲的江宝材看中了，因为他有一丘带桔树的田在螺洲尾，远一些，照顧不便，他想和林依发換桔田。我知道这事后，便跟依发商量。依发馬上点头，同意換，他說：“自己人都好商量。”这事使宝材全家人都高兴了。

我自己半株桔树都不要，連我方岐洲各戶也都沒有半棵。方岐洲有些人罵我真傻，多少好坏也可以分一坪。我說：“过去地主起佃，赶出門两只脚都要洗淨，泥巴土粉都是地主的。現在有了田，还不爽快。各村各洲都有困难，桔树收入好，先让給別人。以后要栽桔树，我自己可以再栽。”

田分好了，快要过春节，家家挂毛主席象，貼春联。貧农严家全到处央人写付对联貼在飯廳柱子上。对联上写着：“吃一飯記住解放軍，飽三餐不忘共产党。”

春节后开了翻身大会，真热闹呀，我们还拍了照片。这照片至今还挂着，可惜我当时累得病倒了，没有照上去。

(林金官口述、林真木整理)

陈大妹变了

連坂村里有个陈大妹，这人平常总穿着蓝上衫，黑裤子，样子很老实。她是村高脚团的花旦。她一上演啦，看的人可就都笑得东倒西歪，没有一个站得稳的。有年纪的人都說：“陈大妹变‘活’了。”

陈大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解放以前，她整天可都是愁愁苦苦的，从她脸上看不出一丝丝笑。这也难怪，象她那样的家境，怎么会笑得出来呢？

她家里原有六口人：公、婆、丈夫和两个男孩，住在山茅楼里，租地主五、六亩薄田，吃稀粥度日。在日本快要占领福州的时候，她公公死了。家里少了这么一个劳动力，日子就更难过。地主看她家这个景况，怕欠租，便索性把田收回去了。这下真是雪上加霜。夫妻俩便只好去赚工，这家赚一、两斤米，那家赚一、两斤菜，有一顿没两顿的挨着过日子。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情况更糟了，工没地方做，一家五口只好“嘴挂猪母场”，喝南风去。饿了几天，全家人手脚都软软的，孩子连哭都没有力气了。夫妻两个盘算一下，觉得坐着等死倒不如去找活路，于是她丈夫便忍着眼泪，把大孩子带到福清去卖给人家。可是，回来时，刚走到半路，钱却被土匪抢去了。她丈夫本来就饿得只剩下半条命，再被土匪一打，精神又受刺激，便病死在路上了。大妹那时刚刚添养女儿，躺在床上，听到这个消息，“哎！”一声便晕了过去，醒来以后足足的哭了三天。但是，还有更不幸的事情

又接着来，几天以后，她的第二个儿子因为肚子饿，去偷拿日本兵的饼干吃，被日本兵碰到，砍了一刀，结果，这孩子的尸首连影子也找不到了。陈大妹抱着她剩下的一个小女儿，哭得死去活来……以后，她看见人家的孩子，有时也会突然哭起来；在晚上，睡梦时，也常常大叫：“儿，儿啊……”声音那么惨，隔壁陈有福，也常常陪她流眼泪。

你想，象陈大妹这样的人，怎么有心思笑？陈大妹什么时候变活了呢，那要从土改分田那次算起。

田是农民的命，听说分田，那个穷人会不欢喜？所以，分田的那一天啊，陈大妹很早便拖她七、八岁的女儿起了床，把昨晚特意多煮的饭热了热，赶紧吃完。一吃完饭，大妹便把她女儿花绿绿的装起来，脸上给涂了粉，抹了胭脂；两条小辫子也给扎得结结实实的，还插上一朵花。打扮完，她把女儿拉到面前，对着女儿的臉說：“依妹，笑一下给妈妈看！”依妹真的笑了一下，这下，大妹真乐死了。她把女儿往椅子上一按，吩咐說：“不要乱跑啊，等下把衣服搞脏了！”随即，自己也一是一，二是二的打扮起来。

她牵着女儿出来时，天刚蒙蒙亮。可是，村里却也已经很热闹了，鑼鼓敲得震天响，每个人脸上都笑笑的，象个喜日子。大家看见大妹母女今天突然装得这个样子，便都笑开了。她们一走到那里，那里就都是声音：

“哎哟，你看，大红花的上衫呢！”

“哎哟，你看，那头发以前乱得象苔菜一样，今天却光亮得照人呢！”

“吓，头角还有两朵花哩！”

有的妇女看见她装得这样好看，便故意问：“哎呀，妹官

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她拉了拉新衣襟，高高兴兴的说：

“什么日子？翻身的日子唄！”有的妇女还故意和她开玩笑：

“哎呀，大妹，你今天做新娘啦？”大妹“喀吃”一声笑了起来：“做新娘？比做新娘还欢喜呢！”她牵着女儿到处闖，一碰到人就打招呼。真的，要是把她结婚后十几年和别人打的招呼都加起来，还没有这天那样多哩！

会还没有开始，大妹便牵着女儿挤在台前了；工作组同志一讲话，她便碰了碰她女儿，母女两个便大声的拍起掌来，拍到手都痛了还不停。当她分到土地证的时候，她却楞住了，她紧握着土地证，象是有些不相信的样子，楞了一会，却突然转身牵了她女儿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她便把土地证有边有角地折起来，用纸用布包了十几层。包完后，她又拆开来翻来复去的拿在手里相着。相了一会，她还蹲下去，拿给女儿看，对女儿说：“依妹，红的好呢！”她女儿不懂什么，没有回答，她狠狠的亲了女儿一口，说：“崽仔！（注）”自己便也大笑起来了。

那天晚上，她一直睡不着，一个人爬起来两三次，点了灯，开了锁，从箱底摸出那包土地证来，相了又相；到了天快亮时，才模模糊糊的睡去。一睡下去啊，她可就说起梦话来了，大叫：

“哎呀，这下田分二亩一了！”接着大笑起来。她女儿被她笑醒了，拖了拖她的衣服，叫了一声：“妈！”她却没有醒，还在大叫：“毛主席啊毛主席，没有你，我死了也不会看见一寸地啊！”隔壁的陈有福，那天晚上也睡不着，他听见大妹连做梦也在欢喜，自己便也笑起来了。他点点头想：“是啊，象大妹这样的人不欢喜，那还有谁会欢喜啊！”

这以后，陈大妹一有空，便拉着孩子，自己啾啾呀呀的唱起

来，什么嘉桂芬啊，什么大翻身啊，唱得挺有劲，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学来的！几个从她门口经过的，听见了，便一下子传开去，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大妹也会唱？”所以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一碰到她便叫：“妹官嫂，来，来，唱一阙吧！”她呀，可也大方，有求必应，不管多少人也是啾啾呀呀的唱起来。她跟着党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公社，一步一层天，生活越过越舒心了，人也越变越“活”了。这样，大妹的阙便从家里唱到街上，再从街上唱到高脚团去了……。

（注）“歌仔”是福州土话，即傻瓜的意思。

（練尚高）

林碧英互助組

我們互助組剛成立的時候，一共只有五個人，全是婦女，人家都叫我們是“婦女互助組”。

一九五一年初，李順達互助組搞得很出色，報紙上經常都有他們的消息。我們這裡的工作組也常常給我們讀報，介紹李順達互助組的情況，宣傳互助合作的好處。我那時是婦女主任，經常和工作組同志在一起。有一天，工作組林澄同志找我談話，動員我去組織一個互助組。我一聽，心里猛跳了一下。那個時候我雖然聽了宣傳也懂得互助合作的好處，但是，自己要組織一個互助組却連想也沒有想到。我說：“組織互助組？我什麼都不懂啊！”林澄同志鼓勵我說：“不要怕，碧英，有共產黨來領導，你是幹部要帶頭，有什麼困難我們工作組可以幫助你。”我那時也沒有正式答應，只是點了點頭。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床上翻來翻去，睡不着。我想起了過去的苦日子，想起共產黨給我帶來的益處；象我這樣一個以前在人前不敢大聲說話，連正月初一也要替地主去放牛的女人，現在能做婦女主任，都是共產黨領導好，我能夠不聽共產黨的話嗎？同時，我也想到我們潘墩的婦女，很少會生產的；我們婦女不能勞動生產，怎麼能夠真正翻身？所以我便決定：一定要組織互助

組！先組織婦女，把婦女們帶動起來！

第二天，我便去找林澄同志，把我想組織個婦女互助組的想法告訴他。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組織婦女更好。碧英，好好地把她們組織起來，做個榜樣！”我被他這一鼓勵，心更熱起來，便立刻去找幾個平常和我比較接近的婦女談。

我們這個地方過去有個老風俗：婦女只能在家裡轉，不能下田上山生產。人們一看婦女下田，就說她苦命，或者說這一家大概已經窮得象禿皮老鼠一樣了。象我這樣以前下過田的，外面閑話都很多。所以我說要組織互助組時，她們都有一些顧慮。美嬌和淑蘭是寡婦，有些自卑，平常就怕人家說閑話，很少露面，所以更是猶豫。我一再對她們說，時代變了，新社會勞動是最光榮的，人家笑那是他舊腦筋，不去管他。有一個晚上，我在美嬌家裡談到很遲，對她說紅軍鬥爭的故事，美嬌聽得很出神，她說：“哎呀，人家紅軍那時多艱苦啊！”我便乘勢說：“美嬌，紅軍這麼艱苦鬥爭，把土地分給我們，我們自己不動手做，怎麼對得起紅軍啊！”美嬌被我這麼一說，想了一會，對我說：“碧英啊，我也很想去，可是，我什麼都不會，怎麼辦呢？”我拍了拍胸對她說：“美嬌，有我，我教你，你慢慢學。”那時是土改分田不久，婦女和男人分得一樣多的田，她很高興，再加上我這麼左一句右一句，便答應了。瑞琳和金依妹以前參加過一些勞動，他們也有顧慮，覺得和美嬌、淑蘭在一起不合算，不過沒有說出口就是了。我就經常到她們家裡去，和她們丈夫談互助合作的好處，她們丈夫看見互助組里都是婦女，又有我這麼一個強勞力，所以更不阻礙她們。

我們這邊還剛在商量，外邊可就有風言風語了。有人還當面說：“互助有什麼用？我手把緊一下，你們還要做兩三天呢！”

有人見我們走過來，便說：“哎唷，互助組來了，快社，快社！”總之，我們一走出去，兩只耳朵便塞得滿滿的。我的爹媽知道我要組織互助組，也很生氣。

有一天，我和幾個人談得高興，回家遲了。爹看見我就沉下臉，一句話也不說。我感到不妙了。果然吃飯時，他忽然把碗往桌上狠狠一放，站了起來嘆了口氣說道：“碧英，爹媽老了，田里的事全靠你，你跟別人互助，可他們什麼也不會，我們家底薄，吃了虧，往後吃什麼呢？”我媽也說：“碧英啊，我們分了田，就安安靜靜的吃一碗飯吧！”我怔了一下，但想想還是慢慢的勸他們：“我就是想把田事做得更好，大家的日子都過得更好，所以才組織互助組啊！”“碧英，我不反对你組織互助組，可是你為什麼要和她們在一起呢？”我媽這麼說。我說：“媽，婦女要真正翻身就要勞動生產。你想，我從小就勞動，現在又是幹部，不去帶動婦女行嗎？”我接下去又說：“媽，以前你生了十幾個孩子，因為窮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要不是解放了，婦女翻了身，那有今天？現在共產黨號召組織互助組，我們能夠不聽共產黨的話嗎？”我這句話算打在他們心坎上了。媽在悄悄地擦眼淚，爹口氣變了，說：“碧英，共產黨的話是中聽！我是說你去教她們，那裏還有時間種田！”我看情況變了，順勢說：“不會啦，爹，我教她們，她們會了，不是也好來幫我們嗎？”我爹便沒有話說了。那時，工作組同志也常來給我爹媽說互助組的好處，社會主義的遠景，說得他們笑了。

二

三月三日，我們的互助組成立了。

第一次出工，是一早就在約定的地方集合出發。那時，我們四

个都来了，就差美娇一个。我很奇怪。金依妹说：“她一个人不好意思出来吧！”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真的，我连这点也没想到！我拉她们一起去找美娇。

美娇坐在椅子上，眼里湿湿的，象要哭出来。土筐放在她的脚边。我楞了一下：“美娇，你怎么啦？”

美娇声音有些变了，说：“碧英，我不去了。”

我看她土筐都准备好，鞋子都脱了，怎么会说不去？大概出了什么事了，我急忙摇着她的肩膀问：“美娇，到底是什么事情？”

美娇说：“我刚才走出门，碰到木柱，他笑我说：‘哧，这个样式也会挑土！’我心里一急，便跑回来了。”

我听了也很生气，对美娇说：“美娇，走，和我一起去，不要怕他！他说一句话，我们就不敢去，那才被他笑死呢！”

路上人多起来了。美娇第一次赤脚，当然不习惯，她夹在我们中间，头总是低着，好象想钻到地里去一样。我们看见人多，也觉得不自然。很多人都停下来看我们，一边嘖嘖咕咕一边笑着。有几个小孩故意跟在我们旁边跑来跑去做鬼脸。美娇轻轻的拉了拉我的衣角，我也忍不住了，挥着扁担对那些小孩吓唬道：

“走开！再不走就敲你们脑袋！”孩子们吓了一跳都跑了，旁边的人却大笑起来。我轻声对美娇说：“不要怕，美娇，心把定一些，心把定一些……”

我们走进巷子里，美娇忽然低叫了一声：“木柱！”我往前一看，木柱果然高高站在台阶上，在冷冷地笑着。我咬了一下唇，对美娇说：“我去顶他！”说完我便抢先一步，走在前面，故意和木柱搭讪：“噫，你起来了？”

木柱带刺的说：“你们互助组都出工了，我还会没有起来？”

你們这是去干什么呀？”

“去挑土！”我想他一定会笑我們，那知他一句話也不說。我故意去挑他：“木柱，你不是說我不会挑土嗎？”

木柱赶紧說：“那里，我什么时候說你？你当然会挑！”

我故意笑着說：“嗯，我也这样想，你那敢笑我們！”

走过以后，我对美嬌說：“我会做，她們就不敢笑；你加紧学吧，学会了，他們嘴就塞了。”美嬌下决心地点了点头。

三

人家都說“乞丐討过三間厝，胆便大了。”这是实在話。我們出了几次工，就也不象以前那样畏畏縮縮了。美嬌开始只能挑二、三十斤，挑着担子走路，身体摆来摆去，比我挑一两百斤还要吃力呢！有人看了，故意怪声怪气的叫：“哎唷，快来給扶一扶囉！”晚上回去，肩头都紅肿了，可是，第二天还是肩上垫着一块棉布包来挑土。七、八天以后，她已經能挑四十斤，走路也穩得多了。当时有些人就說：“美嬌不錯，学得还快呢！”

那个时候，我們几个真肯干，白天挑土，晚上学文化。我們訂了一份“閩侯人民报”。下午歇工时，我便拿了报纸，請工作组同志一边讀一边解釋；我听过以后，再回头講給工作组同志听，看看有沒有說錯。晚上，我就回来一五一十教給她們。这样，沒多久的時間，我們便从一字不識，到能够写各人的名字，認識了一百多个字。

但是八、九天以后，她們情緒都有些消沉了。我当时心里真急。你想，我們組織互助組，区委和工作組那么重視，經常檢查、帮助和鼓励我們，好端端的会消沉起来，你想我怎么不急？我問美嬌。美嬌說：“我做得那么少，可是工分却評得和你們一

样；你不要紧，人家瑞琳、金依妹会有意见，我和淑兰也不好意思呢！”我一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互助组里是实行记工制度的。那时，天天晚上都有这样的情形：晚饭一吃完，我叫一声：“来，记分！”大家便坐在一起了。我就说：“今天我们挑三条土船，每条土船五分，共十五分，每人得三分。”美娇、淑兰总是不肯。美娇说：“不行，不行，这样不公平！”淑兰说：“我做得少，不能和你们记一样多！”我总是说：“哎呀，我们现在是互助组，大家一起做，当然要记一样的。”我说着便拿出本子在各人的名字下，划上三条线。起初几个晚上，我和美娇、淑兰争时，瑞琳、金依妹也帮助我，拦着她们说：“哎呀，算这么清楚干什么呢？”可是几天以后，就剩下我和美娇、淑兰争，她们两个都没有作声了。我还不在意，人家美娇、淑兰心细，就发觉了。

我从美娇家里走出来，便急急去找工作组同志，把情况对他说了下。我还说：“你要帮助打通打通瑞琳、金依妹她们的思想，这样下去互助组可得垮！”

工作组林澄同志说：“碧英，是你不对呢！”我还以为听错了，就问：“你说什么？”

“是你不对呢，我们应该按工记分，这样瑞琳、金依妹才肯干，美娇、淑兰也没有顾虑。”我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但我又想，要是按工记分，那我就要记得最多，这怎么好呢？不过，那时我还是听了工作组同志的话，把评分的方法变了。

记分方法一改变，我们比以前更团结了，平常没事都在一起，生活上帮忙帮去，热得可真象一锅滚汤呢！那时，美娇缺粮，但她没有说出来。我看出了她有困难，心想：无论如何不要让她象过去那样去借高利贷了，我们组织互助组了，有困难应该

大家想办法！于是，我便去找瑞琳她们商量。那时，大家也没有什么余粮，但是，二顿帮一顿，还是凑了些粮，我又把打算买毛衣的钱借给她。美娇接着说，只说了一声：“碧英……”就什么也说不出了。

有一次，我病了，躺在床上，家务事都放了下来。我妈是老病，不能做事，我心里真急。她们几个便来帮助我了。这个烧火煮饭；那个倒马桶，洗衣服；连美娇也把我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她们几个还经常都在我的床头，问热问冷、倒开水送药。我爹看了很感动，他对她们说：“碧英这次就幸亏你们了……”从这次以后，他的态度就大变了，一看见她们来，就赶紧搬椅、倒茶，非常亲热。外边人看见我们五个人合得这样好，也说：“碧英这个互助组还不坏，几个人就象亲姊妹一样呢！”连木柱背后也说：“这些人倒挺团结呢！”

四

二十多天以后，连下了几天雨，河里浦里都涨满了水。那时，乡里可紧张了。你想，麦子快黄熟了，却突然涨了大水，怎么不紧张？

我的两亩麦田地势很低，眼看就要被浸到了。那一天上午，天下着蒙蒙雨，她们四个拿着镰刀、扁担到我家来了，一进门就说：“碧英碧英，走！你那块田地势低，我们先去抢回来！”我爹留她们吃了饭去，说什么她们也不肯。到了地里，我和金依妹会割，便大把大把的割，瑞琳跟在她们后面，结结实实的捆着，美娇、淑兰便一捆一捆地挑走。人多做事快，半天工夫就把两亩麦子收好打好。我爹高兴死了，他还特别煮了饭菜，招待她们。他对她们说：“你们互助组真好，要是没有大家帮助，碧英一个人

真沒法搶回來啊！”

大水很快上岸。那些单干戶，人手单薄，搶都来不及了。以前笑我們妇女沒用的荣官，他的地和我的地在一块，却被大水浸了，損失很大；对比一下，真是明显。这次，他叹着气說：“不要笑她們妇女不会做，湊在一起还不错呢！”

麦子搶收完，淑兰病了。她身体本来就不好，搶收时緊張一下，淋淋雨，便病在床上。她有一亩馬鈴薯种在桥边。那时，水还在漲，眼看就要浸到馬鈴薯田里。馬鈴薯最怕大水浸，所以，我們决定替她搶收。

雨下得很大，我們冒着雨，一边挖一边挑回来。有一次，我滑倒了，馬鈴薯撒了一地，美嬌赶紧停下来，帮我檢馬鈴薯，沒想到她自己一下不小心也滑倒了。她大笑起来。我看着她那全身上下的泥浆，不禁想起以前美嬌一年到尾穿鞋着袜，头发梳得光光亮亮，穿一件士林藍短衫，田里的活从来不沾手。現在，她变化多大啊！

經過这两次搶收，我們互助組威信可提高了。再沒有什么人敢說閑話，美嬌走在路上也有說有笑了。

五

几天以后，就連地勢較高的秧田也浸水了。乡里人都很急。林澄同志对我說：“你們互助組的秧苗要保护好，在天灾面前，互助組一定会显出它的优越性！”我那时便下定了决心：“我們一定把秧苗保护好！”我們互助組的秧苗播在一块，很集中，所以我們便决定在秧田周圍筑起一道土圍来，然后把水排出去。

我們給秧田筑了一道土牆。然后便去排水。可是，里边水一排光，外面水的压力大，土牆崩了。于是我們便分工，我去排

水，她們四個去添土，預防崩潰。有些人看見了，說我們是“鷄母扒垃圾，沒事討事做”。我們不聽他們的話，照樣做。我說：“它浸一次我們淘一次，它再浸，我們再淘。”美嬌也說：“把水淘干，讓秧苗晒晒太陽，硬朗一些，再浸，总比一直浸着好！”

我們干了两三天，那些單干戶也覺得我們這個辦法不錯了。但他們做不起來，一個人顧得上排水就顧不上添土，臨時去請人幫忙也請不到。

大水退後，我們就去撈一些糞精，買些肥田粉，和和水，給秧苗澆一澆。不過幾天，吓，秧苗可就長得綠油油的，頂苗壯。那些單干戶呢？他們的秧苗都象道士一樣，穿着黃袍，在那里彎着腰，損失真大。

有一天晚上，她們幾個正圍在我家裏談笑，忽然外面有人叫我：“碧英！”我出去一看，原來是木柱倚在門邊。我問他：“你叫我做什麼？”

“碧英……”木柱叫了一聲，又停了。

我問：“木柱，你有什麼事？”過了半天，他才吞吞吐吐的說：“碧英，你的秧苗借一百把給我好嗎？”

我想起我們第一次出工時，他那種冷嘲的口氣，故意為難他說：“這要和她們商量商量再說啊！”

她們幾個聽見木柱要借秧苗，都不肯。美嬌特別反對，她說：“我們以前被他笑死了！不借他！”我便對她們解釋：“他以前笑我們，我們就更要借給他，讓他看看互助組的好處，以後也走這條道路……”

從此，我們互助組的名聲就傳開了。報紙上經常報道我們的活動，縣委還表揚、獎勵我們。群眾都說：“互助組是比單干好，不會做的婦女組織起來也會起大作用哩！”木柱自從借苗以

后，看見我們就笑嘻嘻，滿口誇獎。不久，恒安嫂、全官嫂、金泉嫂和許多以前沒有勞動過的婦女都要求參加我們互助組；我們互助組便開始大發展了。

（林靈芬口述 練尚高整理）

王茂玉办社

一次会议

土改后的头一年，我們这里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許多貧农家底薄，食高利貸、卖青苗的都有。“镰刀挂壁，肚子塌塌”，还有一些人在哼着。

一九五二年，党就給我們指出一条路子：办互助組。这时东塔村，又象去年搞土改运动一般地沸騰起来了。街头巷尾、屋里屋外都在讲这一件事情，讲得最热烈的要算村头拳头館。特别是晚上那才热闹呢！

那天晚上，拳头館里在开变工組会。来的九个人都围着煤油灯坐着。灯火虽然不大，可也照得見每个人的臉上有些发紅。你一句他一句地就嚷开了：“我一听到办互助組，就觉得这有道理。有了組織就有力量，再选个組长领导我們生产你看这多好！”“你讲得对。現在应有个組織。以前变工时連头都沒有，各做各的，各想各的，怎能做得好。比方讲，我們有一次叫依自一齐出工帮助其榕，他搖着头說：‘沒閑，沒閑，我自己牛奶还未挤呢！’一轉就走开了。”“是呀，大家齐心站紧，和高利貸一刀两断。”……

每个人都发言十几次以上。我看条件很成熟了，時間也迟了，赶紧拉連长一把，叫他起来发言。

这連长別看他是个老粗，口才可好呢，他有条有理地先把大家的发言归納几条，肯定办互助組好，把大家的气鼓得足足的。然后他瞟了我和国良一眼，接下去說：“我还要补充一点意見，这意見是我和茂玉、国良在下午商量出来的。那就是我們要办最好的互助組，我們大家都把田地投入互助組估租，田好多估、田坏少估。这样，大家心更齐了，不会发生有空帮一帮，沒空就不管的毛病。”接着他又說了許多向苏联农民学习和我們远景等等。最后他把声調提得更高問一声：“田地估租的做法，大家贊同嗎？”

全場靜靜的，沒一点声音。过了十分鐘，其榕才有气无力地問道：

“土地估租，工作組同志还未教我們，我們乡里也沒有人这样做，我們这样做是不是可以呀？”

国良馬上解釋說：“这不要怕，苏联老大哥做得通，我們为什么做不通。現在乡里还没有这样做，但我相信以后党也一定会叫我們这样做的。我們有条件，比別人先走一步是應該的。土地估租有两个大好处：便于集体出主張，保証集体行动；另外还便于购置，以前我們单干买不起的耕牛和农具，現在就可以买了。”

“好是好，不过这以前都沒做过……”其榕搔着头說，其他人还是表示贊同其榕的話。

我連忙也插上說：“怕沒做过，我看不要怕。土改不是我們从来也沒做过？起初斗爭恶霸地主敖里金也有不少人怕，我与連长上台控訴，一些人都担心我們以后吃亏，甚至講：‘不知什么时候头落地，’但是結果呢，大家都知道，是敖里金头落地，我和連长还在呢！”惹得大家大笑起来，接着又是一陣沉默。

“其榕，你想什么？同意嗎？”我半开玩笑的对他說。“我剛才也不是反对。”他抬起头說。

不知誰建議講：“看来大家大体都同意了，为了慎重起見，我建議明天到黃山請教一下史区委，再作商量吧！”大家哄了起來，异口同声說：“有理，有理。”

請教史区委

“这么早来这里有什么事？怎么你們都臉紅气粗的，跑來嗎？”史区委馬上伸手倒了三杯开水，說：“來，請喝开水。”我用双手接了开水杯，就說：“我們有一件事情請示，我們想把大家的田都入組來估租，你看這行嗎？”史区委連連噴嘴，停了很久才說：“这样做会好？現在組織互助組就有困难，你这个更高一級，困难可能会更多。我看还是先搞互助組，以后有条件，再搞土地估租。你們意見怎么样？”这时候我們知道應該說，我們怎样有条件，但始終沒吐出半句。談了很久，三个人总是脫不了这样的內容：“我們这样矛盾少，好做。”他見我們很坚决，最后笑笑對我們說：“你們自己看看，有条件可以試做。”

我們走出区公所，沿着山旁走去。我順手向地上拔了一根草，捉弄了几下又丟去了。区委的話在我腦里翻來復去。我再一次考慮起条件來了。“史区委也認為我們这样做可以，只不过怕我們沒条件做不成。……”我話声未落，国良插進來說：“对了，他就是怕我們沒条件。我看我們条件够。”到了家，大家滿有信心，异口同声說：“今晚开个会，把我們的意見告訴給組員。”

二次會議

晚上要开会，我在家呆不住，跑到連長家去。連長在石阶边

洗脚。太阳刚落山，天老是不黑，鸟儿纷纷回来，破牆下一群小鸡还在母鸡翼下钻进钻出。我第一次这样留神去看这不相干的风景。突然有个感受：我说：“连长，我们把互助组办得象这只母鸡一样好不好？”连长说：“你讲的什么意思？”我说：“你看，这群小鸡，不管它是进去还是出来，但最终都要投入母鸡的怀抱来。”说着两个人都会心的笑起来。“你今晚发言准备好了没有？你要好好讲一下。全靠你啊！”我讲完，感到自己心跳得厉害。“你不必紧张，我已经想好了，一定成功。你赶快叫大家来。”

“昨天大家推茂玉、国良和我三个人去请教史区委，现在让我向大家作个介绍。史区委见到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笑，欢迎我们这样做，说，我们是高级的，比人家进了一步。希望我们创造条件，马上把它组织起来。好作个榜样，现在请大家发表意见。”我听了暗暗发笑，真会说服人，真配做一个党员。我转看大家，大家楞楞着不发言。“怎么？”我问自己。我以为大家怕组织后做不好闹散伙。我就把预先想好的话讲一遍。我说：“我们一定能够办起来，并且能办得好。我们都是贫农，我们生活全依靠这里，再没别的依靠，我们头髮蒂绑在一起做。将来再订个组的公约制度，保证我们行动一致。大家也知道了，我不想多讲。现在，请大家象昨天晚上那样热烈讨论吧。”

时间过了好久，大家又是痴痴的坐着不发言。我心里真焦急，装着笑脸说：“怎么的呀，你们喉咙都被瓶塞塞住了吗？”惹得大家又笑一下。原来，他们都苦惱家里人通不过。我讲话的时候，其榕还在想着昨晚的被老婆挨骂：“短命啊！鸭姆伴凤凰飞，有什么合算？结底都是你吃亏。”

“我没意见，就是……”停了半天有人这样说。

“我也没有什么意見，就是我家里的搞不通。”其榕插嘴說。

我馬上与連长、国良交換一下意見，說：“大家都同意这样办，那就好了，現在是不是这样，散会回去各人說服各人的家庭。”大家都走了。大汉依自留在后头拉住我，小聲地說：

“現在就是家里問題。其榕老婆意見才大呢！罵得几間房都会听見。”

說服家庭

我花了两个晚上的工夫，不停歇地劝我大哥茂林入組都沒見效。吃晚飯我在桌上又劝他，他反而来劝我說：“不成事，花无三日好。做事不能单凭一时热情，我看还是再等一年穩当。”囉里囉嗦說了一大堆。我見他这样固执只得向他最后表示态度說：

“假使你一定不进去，我就分出一份田地入組。”他一听大嚷起来：“你这優犬！你和他們一起做有什么好处？参加变工組一年多，你为他們跑东跑西又听尽門話，家里安安稳稳吃一嘴飯你不做！”正好連长进来，我哥哥馬上換一副和气的臉去招呼他。接着誰都不說話。連长見势头不对，拉了几句无关緊要的話后就走了，我赶紧装着送他，到了門口，我附在他的耳朵說：“赶快叫人來帮忙我。”不久，国良进来，我哥哥又是滿有禮貌地請他坐下。話說了半天，我哥哥只有一句話答应国良：“让我看一年”。国良出去与久等在門口的連官交換意見后，連官不慌不忙走了进来。談来談去，我哥哥仍然只有那一句：“让我看一年。”沒多久，連长笑嘻嘻的走进来，我哥哥拼命点头招呼他坐。連长拍着我哥哥的背說：“茂林哥，你还是入組好。你脚病不能下田，入組后我們还可以照顧你，让你干別的工作，你看这

样好不好？……。”“对，我們一定好好照顧你。”連官也插嘴說。我哥哥想了半天又是回答那一句。最后連长和連官一起走了。我和哥哥送他倆走后，我馬上說：“他們剛才說的都是真實的話，我們几个熟得好象亲人一样，他們一定会照顧你的身体。再說我們那一个不是想把組搞好，你不要怕搞不好要負一身債。”“能这样？”他迟疑很久搖搖頭說：“叫我进去沒一成。”最后弄得不欢而散，我出門向拳头館走去。

这晚，我和連长都睡在拳头館里，兩人談到下半夜还睡不着，两架床板噼噼啪啪地响，我两人都在“摊拳头”哩。

太阳还未出来，我哥哥突然进来了。連长滿面笑容地問道：“茂林哥，有什么事情嗎？”我哥哥很沉着地說：“連长，你們的好意我全知道。我現在先让茂玉入組，这样还有話說嗎。”我哥哥用很平穩的声調說完了这段話。“好，你呢？”連长笑笑的問道。“我昨晚就給你說了，明年。”

其榕老婆听到茂林让茂玉入組的消息，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吵鬧了。他是个頂会算的妇女。她看我这次入組，除田外还有一笔田本和許多工具，而她只有一块田；因此，她成了入組积极支持者。

听到其榕老婆支持丈夫入組的消息，我拉着連长連走帶跑地到其榕家問好，恰好吳用长迎面走来，手指着我說：“看你倒組，看你倒組！”我急得要和他頂起来，恨不得狠狠咬他两口。連长看风头不对，拉着我跑开了。

白手起家

互助組成立会开完已有多点多鐘了，我还在床上翻轉着。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身上担子重：以前只有我一个人，現在是一个

組。他們信任我，選我當組長，我怎么做才不会辜負大家的希望呢？用長存看我們“倒組”，王迺迺在看我們“沒收”，講得人心惶惶，軟弱的人將被動搖了，在這緊急關頭，連長、國良和我三個，堅決表示：死都要干下去，儘管只剩下三個人，對那些諷刺打擊我們的人，根本不理他，用我們的双手做出成績給他們看。我們組就這樣撐了起來，仍然有十一個人。今晚國良同志講得好，我們在拳頭館里推几步出色的“拳頭”給他們看看吧！今後我要更好遵循這些謬言做去，保證我們組健康地成長壯大。

互助組就這樣成立了，就是以後大家常常提到的那個城門鄉最早的自發社。一成立，一大團的困難象山一樣擋在我們的面前。一沒錢，二沒肥，三沒耕牛，四沒工具。我們沒有一個有一套田本的，有的根本就是想入組靠組來解決。擠了半天還是“白魚”。問其裕，其裕却總是來個反問：“我是‘瓶瓶塞’，那有錢？”有的公開講：“我就是沒有錢，才進來的，有錢還不曉得自己做？”我第一次嘗到了做組長的味道。這担子重啊！從前多少農民就是為了尋求田本，拿了高利貸，弄得傾家蕩產。我想起可怕的過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帶頭担起這担担子。我為此几夜沒好睡，連做梦都在想。

我就到處踏門路。頭一回就碰了壁。我們向富裕中農吳金伙借錢，他一句話：“你摸錯了門啦，我那里還有錢？”把我碰回來。我們又不好意思伸手找政府要，國家搞大建設處處要用錢。最後我只好“社把”（注）借了三担谷子，訂六月早稻收成後還。為了將來，我勸組員忍着心喝下了這杯苦茶。

三担谷換了一担的肥田粉。一天我們下田去施肥田粉，看見魁章正在他自己田里打界石，這是準備退兵之計，這人就是這樣死心眼。他見到我們裝做沒看見，低下頭繼續打着。還是我們先

喊了他。他发觉要把肥田粉施到他的田里去，就大喊起来：“天啊！这万万不能，田做瘦了誰負責！”千辨万辨最終还是不肯。

回来我分析了几天来的情况，干部应以身作则，做出成績教育群众。所以决定繼續踏門路。我与副組长連长、會計国良分一下工，他們管家，我对外。从此以后我常常过着奔走的生活。这一次可碰到好运：經過千說万說，三叉街牛乳厂答应把牛屎賒給我們，等到早稻收成还錢。我乐得合不攏嘴，組員也鼓起勁来，連夜去挑牛糞，虽然路途远达十几里，但沒有一個人叫苦。一百多担的牛屎，一下子就挑回来了。

有了肥料新愁又来：又沒耕牛又沒錢。談起它人人都皺眉头。再去賒根本沒这事。这时，政府知道了，真是“雪里送炭”，貸給我們一大笔款，我們先买一头牛，剩下的做副业生产的本錢。我們个个眉开眼笑，异口同声的感謝党和政府千好万好。

一場風波

笑声还没有消失，問題又陸續的来：集体养猪养魚很不順利，时时都有死亡消耗，我的心真痛啊！接着拳头館里来了一场小风波。魁章要想借錢，我向他解釋：“你應該想一想，这是史区委批准給我們买鴨养的錢，現在大家实在沒錢使用了，一个人借几元。你也借了，不能再借了。”我一說完，他簡直咆哮起来說：“我‘布施’你做組长！你怎么配得做組长！你快給我拉倒！你把錢抓紧紧的，不借給我。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通天下最痛的！你說要养鴨，現在人還沒吃！你也会养！养几十头猪剩十几头，养几百条魚剩下多少？……”他一直鬧着，我早已眼泪滿眶，面对着破土壁哭。我越想越伤心。自从組成立以来，我沒有一天睡足过，吃飯也沒心緒，脑子都辦散了。为了組东奔西走，

借錢尋肥，那一天不是雞叫做到鬼叫。在外儉食儉用，忍飢受寒，沒敢亂花組里一分錢。這次借錢，我組長為了帶頭堅決不借一片錢；你魁章借了又想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就哭了出來。恰好工作組同志進來，批評了魁章，他的話多麼合情合理，句句打中我的心坎，我越哭越想哭了。

不久買了幾百只小鴨，還是倒霉，沒有經驗，一天就死去幾只，又把我急壞了。不知誰說，這是因為拳頭館“不干淨有鬼”。魁章等幾個人逼我要去燒香化紙，求佛爺保佑，還有幾個組員也這樣附和他。還好連長出來解釋科學道理，我才免了去。

不久，史區委在敖峯召開互助組組長會議。布置春耕工作。會議正要開始，突然聽人說：我的兒子死掉，我的妻子叫我馬上回去。我怔住了，象木头一樣站在會場門口，不知我的人還以為我在站崗。我思想鬥爭得很厲害，最後決定不回去。我嘴里喃喃自語：“孩子你死了，請原諒做爹的吧，爹還不是為你們這一代過好日子，你真沒福！”我又想起老婆：“大嫂，暫時難為了你，我們窮人要過好日子怎能呆在家里，你也原諒我吧！”想到這裡，我的心也松一下，連忙扯起衣襟，揩掉噙在眼眶的兩顆大淚珠，走進會議廳。一陣掌聲，史區委上台，開始報告今年春耕生產工作。

戰勝了吳用長互助組

一天，我們和大部分是富裕中農參加的吳用長互助組在相鄰的兩塊田地上插秧。吳用長得意洋洋地叫道：“茂玉怎麼樣！”他一邊做着插秧的姿勢。“比賽吧！”我答說。“比什麼，眼看你慢了三五天。”“不要夸口，做到尾看。”其榕也應了一句。“還做什麼，慢就是慢了。哈哈！”“你們是‘地主’互助組，

除了有錢，还有什么，走着瞧好了！”我半开玩笑似的說。“没什么？好大的口气！”“不是嗎，你們有錢，笑我們沒錢，我們建組，說我們會倒；我們备料，說我們穷光蛋，肥料那里来？結果我們那样事輸你們，你們多花錢，我們‘白魚’多出力。”我又开他一个玩笑，說得組員笑哈哈。“不算功夫，是別人幫你們的忙。尽管这样，我們工作还是比你們快。”用长滿驕傲的說。

“那就比賽看吧！”国良有点生气的說。“好呀，你們能赶过我，請你們一包香烟。”当晚我們漏夜拔秧，一早就插，拼它一天就完工了。比他們早三天。

这天收工一齐回来。前面一个組員举着写着王茂玉互助組的旗子，一个組員半拉半唱說：“我們勤緊做，你們太輕松；我們忙备料，你們乐家中；我們連夜赶，你們在床中。結果插秧迟三天。”唱得用长臉孔热辣辣的，怪难为情。

有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大汉依自又緊縮地躺在床上做“好梦”，他見我走进来，跳起来抓住我的手：“茂玉，你一定要讓我去枕峯当搬运，一日能賺六七元。种田要种几个月。啊，我明天就去。”你看，这大汉貪便宜的毛病还没改，在前几个月全乡养乳牛空气大盛，收入可觀，他一看以为机会到，提出退組。当时我們向他指出这是資本主义的道路，他說：“你們曉得屁，你自己不养，还要叫我不养。”他怀着滿肚子的气离开了組，自个儿去养头乳牛。不幸事不如意，不久自己脚痛，把肥瓜瓜的牛养得皮包骨，乳量大减，急得他哭哭啼啼。他唯一指望的稻子，也因为顧了牛，顧不了田，秧苗黄得可怕；我們互助組的秧苗又青又高，人人都說全洋第一。到六月一割稻时我們每亩增产一百斤，他呢，落产几十斤。他看风色不对，夏收后硬要挤进来，秋收才沒吃亏。他又洋洋得意，心里暗暗贊賞自己的本領。

不过那次他申請入組也够他受的。起初我們都对他不滿，有的还笑他汉大懶，不肯進來。还好我們几个當事人，对組員劝了一番才收留了他。并且对他进行一番教育。想不到他今天又想溜走。我好好劝他和我們同甘共苦，他硬不听。老是說：“茂玉，我一定要去，我不能放过这万年难遇的好机会啊！”不几天，他終于又离开了互助組，到枕峯賺“大錢”了。

两个月过去了，大汉依自同时得到两个消息：一个是我們互助組，在史区委积极支持下与供銷社、信用社訂了“三边合同”，从此我們互助組要錢有錢，要做工就有工做，粉干、飴糖工一年不断。一个是枕峯搬运改用汽車，要裁減人員。大汉依自听了好象吃了两包迷魂藥半天不省人事，接着大頓大跳，大喊：“可惜，可惜！”他終于被裁員回来。当他第三次申請入組后，才下决心永不回头地跟我們走上互助合作的大道。

前面說的埋界石，大罵我的那个魁章，也大大改变了，成了个新人。他亲手拔起在自己田里埋下的界石，并且一再向我要求在自己田里施肥田粉。做各种活总是爭先恐后，干劲大得很。

依自三次入組以后，許多人都要求加入我們互助組，吳用长那个互助組，也办不成事，有几戶也跑到我們組里来了。要求参加我們組的人好象湯米圓一样一粒一粒浮进来。一天早晨，我大哥茂林又来到了拳头館。恰好我和連长在吃飯，連长赶快招呼他坐下。“我单干不成事，还是你們这样好。”他坐下来很久才說。“你看一年了到底怎么样？”連长問道。他笑着点点头。这时候，剛好吳用长也跑来。我大哥也喊道：“用长，我看你也加入这个組吧！我今天特地到这里和連长說我入組的事情。”靜了一会儿，他才难为情地說：“可以，我那个組沒干部，真不成事。”我說：“欢迎你，用长哥。”

真象母鷄誘小鷄，只一年時間從十一戶變成了十七戶。畝產從七百多斤變成九百多斤。全組沒有一個再去食高利貸了。食高利貸最多的連官也都還清了，開缺糧最厲害的魁章、其榕現在也不愁這些事了，其榕老婆不但不板起臉孔罵他的丈夫而且總是笑臉相迎，親切地呼喚。

到一九五三年一月，縣、地委派林仲鑿同志到我們組來，我們才知道我們已經是一個社，經過一番鞏固改革工作，把土地估租減少到三百斤左右後，就正式宣布初級社成立。不久，我評上省勞動模範。從此以後我們的進步飛快，屢次成為地委試驗的基點，成為今天城門公社一塊好基石。

（注）“社把”是農村中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組織。

（王茂玉口述 林山整理）

合作化高潮來到鰲峯鄉

沒提正文之前，先談談兩段真實的小故事，和一個初級社的面貌。

仙岐村里的一對老夫妻

貧農林水晶夫婦的歲數，合起來已經一百三十多了。土改時分得三畝多地。一年到頭起早摸黑地干，吃飯有保障了，但還是沒什麼零錢花。

一九五三年仙岐村組織了互助組。老兩口子也參加了。這下子田里插秧、挑糞之類的重活，再也不要雇人了。年終結賬時，除開吃穿外，還節余七十多塊錢。老人家活過了大半輩子，第一次拿了這麼一大迭的錢。他歡天喜地的買了一頭母豬，還種了幾棵桃樹，一心想望着來年得到更大的豐收。

一九五四年一月，互助組轉為初級社。這下子可把水晶伯樂壞了。他愛撫地摸摸母豬，對老伴說：“要不是互助組人多手多，靠我們兩個老不死，再活一輩子也別想買到這條母豬！如今又要辦什麼初級社了，那人手就更多啦！”他老伴也笑道：“可不是，共產黨全心為我們，這下呀，可更要賣勁干活！”

“嘍！嘍！”水晶伯迎着夕陽的霞光，拿根長長的竹竿趕着一群鴨子。他抽出旱烟筒，坐在田埂上，叭噠叭噠地吸了兩口，

看了看二百只黄橙橙的小鴨子，自个叨咕道：“社里真会安排劳力，叫我看管这鴨子。又让老婆子干些轻松活。真是人尽其用啊！”老头子正想着，恰巧社长林水妹迎面过来。

老头子连忙招呼道：“社长，社长，这鴨子全包给我养嗎？”

“是啊，水晶伯，每百只包给二百二十斤谷子，养到两斤半。”社长又笑着补充说：“要是粮食有剩的，就全给你老人家。养大了，记上八百个工分！”

水晶伯掐指一算，高兴得扬起鞭子，喊道：“成！保险养得肥肥的！”说完，欢欢喜喜地赶着鴨群回家了。

每天每天，水晶伯都带着这群小鴨，尽找些好地方让它们舒适地吃玩。要是哪只拐了脚，他就跑到诊所里要些红药水或是摘些药草，用布把它细细的包上。社员们常笑他说：“水晶伯，又带着一大群孩子上哪儿去呀！”

老头有时也回骂了两句，可是看看天天长大的令人喜爱的鴨子，又高兴地笑了。

果然，年终算了账，全社二十七户人家都有余款，平均每户增加收入将近一百块。水晶伯老夫妻两个也增加收入八十多块。

老两口笑得合不上嘴，接过一迭厚厚的钱，点了又点。走到街上，逢人就讲，还劝那些单干户早些入社。

当天晚上，老人家想起好几年没喝过酒，叫老伴上街打了几两老酒，还大模大样地炒了一盘面。

老头子呷了两口，啧啧赞道：“好酒好酒，喝完不留。”老婆子瞪他一眼，也抿嘴笑了。

过了半晌，老头起了酒兴，说道：“买它两付棺材板，往后也有个宿处！”

老伴听了，气道：“看你这老糊涂啦，好日子还没过几时，就尽想坏事。”

两个人商量到半夜，最后决定，把錢买一間小房子（五十块錢），二件卫生衣，剩下的存到信用社去。

此后，老人家干活可更带劲儿了。

丰收夜話

一九五五年一个夏收的傍晚，天边落日紅艷艷的，果树園里的鳥儿唱得正欢。

方歧洲初級农业社的社員們，喜气洋洋地挑着一担担谷子，沿着金光灿烂的田野小道，走回家去。

唐銀官，是一个爽直勤快的汉子。今天肩上挑着一百五十多斤的担子，还觉得輕松。可就是走三步停两步，老眯着眼看着社里还没割完的稻田，舍不得走。

他的妻子名叫赵如花。身体健壮，終日笑咪咪的。此刻正挑着和他不相上下的担子，跟在他背后，催道：“死鬼，还不快些。家里孩子等着呢！”

銀官回头瞧瞧，挤了挤眼，飞着大步，唱道：

紅日艷艷落树梢，
丰收忙来丰收好。
顆顆汗珠变谷穗，
生活年年有提高！

銀官的欢乐，有它一段的来历：

土改时，他在东塔分得两块地，一間房子和在三角埕地方的一块荒地。一九五三年，他搬到方歧洲来。田还在东塔，相距六里地；这时方歧洲还是互助組，因他地远，互助力量达不到，便

成了个单干户。

虽然夫妻两个劳力都是顶棒的，可是每天十几里地的来回跑，春种夏收都要落人一步。前年东塔社插秧了，他的肥料还没下田。俩口子日夜思量着把三角埕的那口池泥运过去。可是一算，得过个山坡。两个人挑一个月也挑不完，只好瞪眼干着急！

最后，还是乡里贷他一笔款，又替他到三角埕农业社借了七十六担人粪。

薄工薄肥，田底瘦瘠。稻子长得稀稀疏疏的，比东塔社的稻子矮了半截。将近夏至了，虾蟆在田里翻筋斗还能看得见，银官连自个的田地都羞得走进，怕人家笑。

夏收时，一块一亩六分的洋田收了七百斤谷子；另一块一亩七分的网田才收了六百二十斤。每亩平均只收四百斤。算一算光买人粪一项就要花三十七万五千元（旧币）。除成本外，纯收入不到八百斤谷子。

当时村里林金官互助组家家丰收；只有银官这单干户到了收成时却倒发愁！如花终日骂他死落后，自作孽。

一九五四年秋前，林金官互助组办社。唐银官坚决报名入社，在东塔那块三亩三分瘦田评产入股了。在土地划片编组包工时，起初大家都说这块田是死田，稻子不会抽穗，路又远，谁都不愿意去。金官动员说，农业社合作经营力量大，死田可以变活田。

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银官夫妇日夜的愿望实现了。春耕一开始，社里就组织了十多个社员把三角埕的那口池泥挑到东塔死田上。只有短短的三天，田地垫高了半寸多。这样一来，改变了土质，肥料成本也降低了五十块，田间管理也周到得多。

六月中旬，评比庄稼时，连素来以丰产自负的东塔社员都称

贊道：“銀官的稻子可赶过头了！”

稻割完后，晒了一天。第二天称一称。嘿！一共二千一百零二斤，比去年增产了五成七。預計除扣公粮等外，实得一千七百五十斤，比去年收入增加一倍。社里还照顾他家困难，派他去干了二十天的副业，还額外收入了二十多块钱。

你說銀官有多欢乐！

上面两个故事，是分別发生在仙歧、方歧州两个村里的事，它們在不同的地方，都說明一个問題：就是初級农业社处处都給农民带来了巨大幸福，它比个体經濟和互助組显示出了更大的优越性。可是，它还有問題。群众要求还要有进一步的提高。現在开始說正文。

当时初級社中，一般的上中农土地多，果树多。如上中农郑守科，每年只柑桔分紅就可以收入三四百元，再加上土地报酬，生活非常富裕，所以很懶得出工，而且还常常誇耀：“我不在乎这几个工分，都給你們（貧农）賺还不好？”

一般貧农、下中农都很有意見，常常气道：“我們做半死，还没有他們（上中农）土地果树分紅得多！这些問題都束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有些群众就要求办高級社了。广大群众的愿望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它預示着合作化高潮的必然到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指示来到了鰲峯乡。

这天清晨，秋高气爽。全乡都象办大喜事一样，街談巷語，无不喜笑颜开的談論着这个話題。大家忙着打扫大祠堂，整理廚灶。抬桌拿椅，准备召开全乡一百二十四人的扩干會議。

鰲峯初級社务委員郑茂炳原来有事想到福州，一听到全乡合

作化的喜訊，就立即打消了原來的計劃。幫着大會搬鍋借碗。他穿起新藍衫，頂着滿底烏烟的大鍋，見人便笑。

土改時的婦女幹部吳妹磨，有兩年沒參加全鄉擴干會了，今天也抱着外甥孫女來參加。幹部們見到她，就打趣說：“老干部也出馬吶！”妹磨靦靦笑道：“土改搞了，這樣大事還能不參加！”

會議開始，黨支部書記鄭鴻仁同志傳述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縣委擴干會議的決議。接着會議批判右傾思想。分析了本鄉合作化發展的有利條件，做出全面規劃。經過十幾天醞釀，黨支部見到時機已經成熟，便召開群眾大會。這天的氣氛比以前又更熱鬧。

一九五四年鬧退社的城山村貧農單干戶林珠華，第一個跳上台，說：“沒啥說的，單干的苦吃夠了。眼看着農業社年年增產。算啦！不用再說什麼了，今天我頭一個報名。”說完，把土地証恭恭敬敬地交給支書鄭鴻仁。

台下馬上哄動起來了。當場報名參加的就有一百二十二戶，突破了擴干會議預定的指標。

這天東塔社自己開會。情景更加熱鬧。

貧農葉依天知道了這個消息，立刻跑回家去，衝進廚房，氣喘喘地拖住他妻子，說：“細咪、細咪，真好了，真好了！”

他妻子正在洗碗，看他這麼沒頭沒腦的盡喊着，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便甩了甩手，嚷道：“哎呀，好什麼呢！有話慢慢說好不好！”

依天湊近她的耳朵，神秘地說道：“要辦高級社了。”

“誰說的？”他妻子一聽，便立刻聚神問道。

“茂玉告訴我的，還會錯？即刻要開大會了，快走快走。”

“果然好，果然好，”細咪叫了一声，連忙把手上的碗丢进鉢子里，那知鉢里的水“嘭”的一声泼出来，泼了她满身都是。她却象沒事一般，急急忙忙的跟着依天跑去开会了。

晚上开群众大会，还不到七点鐘，人便挤得满满的。連平素很少参加开会的妇女也抱着孩子，高高兴兴的坐在那里和隣近人們談笑地等着。

社长王茂玉笑瞇瞇地說：“社員同志們，消息算好啊，我們东塔要办高級社啦！跟着党走，好比上阶梯，层层上青天哟！……”話声未落，台下就大呼起来……不到一刻時間，全村六十六戶，除开三戶地富还要进行慎重審查外，其他的六十三戶當場报了名。

东塔办起高級社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大了。积肥搞得热火朝天，比往年多了一半。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高潮达到頂峯。鰲峯乡酝酿实现全乡高級合作化。

这时候乡长林金官正带着全乡主要劳动力，在永泰开荒。党支书郑鴻仁和工作組赶到永泰，把这个消息告訴了他們。

这次正好前面談到的仙歧村的老头子林水晶，也在这里参加开荒。他听說全乡高級合作化了，果树入社，土地沒有报酬，又能統一經營，发展副业等等，乐得脫下帽子，大揮大喊道：“真好啊，真好呀！”老头子狂欢失态，惹得哄堂大笑。

當場，他和大家一起报了名。

人都散了。他还兴奋地在廳上来回踱步。他見到几个上中农呆呆地站在一旁，象有心事似的，便揮了揮手，自言自語地說道：“哼！真傻！”

第二天清早，下着毛毛雨。老头子第一个起床，叫醒了隊員

們。吃過飯又塞個老烟筒，扛起鋤頭上工。

山地路陡，雨天又滑，老頭子可是走在最前頭。到了園地，他一鶴嘴（鐵鍬）下去幾寸深。

隊員們打趣道：“水晶伯真賣勁！”

老頭哈哈笑道：“人舒暢嘛！”

永泰一帶山區是片原始森林。古木參天，野草過人，荊棘頑石遍布。全體隊員們在高級合作化消息的鼓舞下，為了提早完成任務，趕回家里辦社，都冒着山區稀有的寒凍，披風宿露，不到四十天的時間開了四百二十八畝的生荒。

一九五六年一月，開荒隊員們回到家里，就立即動員一家老少，報名入社。全鄉出現了空前未有的盛況。終日鑼鼓喧天，十二個初級社相互挑戰，集體報名參加高級社，社干們挨家挨戶忙着送貼喜報。

高級社成立後，緊接着宣傳農村四十條綱要。社里制定了七年生產規劃。進行了土地劃片，一些社員不要再到七八里外去耕田了。

由於取消了土地報酬和調整了果樹分紅比例，每個工分從初級社的七分提高到一角三分。大大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以前東塔有架抽水機，本來能灌溉八百多畝田地。結果由於小社的限制只灌了四百畝。而隔村的城山初級社又常鬧缺水。成立高級社後這個矛盾解決了。開了一道三公里長的渠道，抽水機的灌溉面積增加了六百多畝。

三角埕初級社有二百多畝田肥料不足，常年有百分之三十是白水秧。成立高級社後，統一調配了肥源，統一組織了勞力，到福州租了五十隻土船，把城山剩餘的肥料運到三角埕去，施肥五百多畝。

此外高級社調配了勞力，大力發展副業生產。如煮糖糕、燒磚瓦、養雞鴨等。一九五六年每個社員在副業項內，收入平均達五六十元左右。

高級社的生產經營顯示了它的優越性。一九五六年夏季獲得全面豐收。鰲峯實現了早稻千斤畝，東塔、仙歧、三合等隊單位面積產量也都達到六百斤以上。閩東七縣還在這里召開了現場會議呢。合作化高潮給農民帶來了巨大幸福。

（鄒蘆湘、練鴻賓、劉一衡、李漢光、陳越綜合整理）

紅星高照幸福路

龙江乡石步村座落在烏龙江左岸。这村互助合作发展很快。一九五二年办了三个“自发社”、第二年就发展到十四个初級社（一社約一二十戶），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

虽然办起了初級社，但是还无法大規模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发展生产。譬如說，沿江岸一带禾苗长得特別青葱、特別茁壮；而里洋一带（二百亩）的水田因为离江岸远，地瘦，地底积水，別社的土地不社开沟排水，別社的河沟不社挖肥泥，所以亩产只二、三百斤。

乡长兼支部書記刘希瑞，早就有个主意：把全村十四个小社并成大社，大規模改良土壤，发展生产。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人們的宿望实现了，地委派干部来到这村领导建立紅星高級社。那时，它是全省第一个高級社，被称为“烏龙江畔一顆紅星”。乡支书刘希瑞兼任社长。

紅星高照烏龙江，从此，烏龙江日夜歌唱。这里說的是紅星高級社第一个年头的几件事情。

建社不久，他們就开始兴建抽水机站和渠道。支书刘希瑞和各生产队队长（多是前小社社长）第一次当“工程师”，集体討論研究决定：机房設在村头，将来可以附設榨油厂或碾米厂；渠道設在沿岸，既灌溉又防洪。他們第一次拿着紅藍鉛笔共同繪

图，到地里测量、画线。工程师用水平仪测量，他们是眼睛测量。

线路测定好，十四个生产队，四百名社员（另外一部分在准备冬种）沿乌龙江拉开了三华里长的一条修建渠道的战线，干部、妇女也投入了这场战斗。各生产队展开竞赛，闹得热火朝天。

入夜，乌龙江江水澎湃、喧嚣。几个妇女干部，第一次肩上的担，累了一天还不肯离开工地。支书刘希瑞动员她们回去休息，她们也不愿回去。

全体社员日夜苦战一个月，筑成了一条三华里长渠。清清的江水流向长渠，流向支渠，漫过一千五百亩土地。从此，这儿就永远消灭了旱灾。

根据区委多种粮食作物，超额完成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和巩固高级社的指示（社建立几个月，缺粮，没有资金），该社党支部和地委工作组同志研究决定，扩大冬种面积要达到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十，其中小麦二百亩、大麦二百亩、油菜三百亩。

这个指标在扩干会上提出时，很多人都吃了一惊。有的说：“过去这里冬季只种油菜，也有一二百亩。”有人说：“小麦十种九无收。”“劳力太紧张，搞了冬种来不及春耕、播田，明年早稻一定大减产。”也有少数干部支持这些论调，因此引起一场激烈争论。支书说：“社要服从国家计划，冬种丰收对巩固高级社有重大意义，我们一定能实现这个计划。”经过反复辩论后，终于驳倒了保守论调，全社掀起了冬种高潮。

支书动员妇女说：“解放前勤劳动也不能过好日子，现在，

办起高级社，我們越肯干，生活会愈好。妇女要彻底翻身，就只有参加劳动。”这里的妇女过去没有劳动习惯，现在经过反复动员、教育，她们也都下地劳动了。支书的妻子是福清人，来到这儿后，整天守在家里，连上街也害羞。支书动员她下地。她厌烦地说：“为什么偏偏要我下地哩？”支书还是苦口婆心动员她，后来她思想通了，带着妇女参加了冬种。

烏龙江畔喧鬧起来了。

男人揮鋤挖窟窿，妇女跟着弯腰撒下麦种。她们象刚出籠的雀儿，浴在初春的阳光里，那么欢喜、那么活跃，嘖嘖喳喳說个不休。有人說：“以前男人說妇女这也不会干，那也不会干，嗯，我看呀，肯学都会。”社长說：“这下真正平等了，不靠男人过活。”

冬种大丰收了。这份功劳应该归于参加劳动的妇女们，因为那时，男社员们都集中搞积肥、备耕工作。冬种收成小麦三万斤，大麦四万斤，油菜籽三百担，还有蔬菜等。一户預分到三百斤大、小麦。卖给国家小麦二万斤。

在冬种大丰收基础上，社里利用抽水机动力附設了榨油厂和碾米厂。这是个小小綜合加工厂。二十多名青年社员，都为自己将成为技术工人而高兴。他们开始感到学习文化的重要，都积极参加夜校学习，决心提高文化，当个出色的新工人。

有了加工厂，这里生产的大量油菜籽不必运出去，可以就地加工，而且县粮食局还从水上运来油菜籽给他们榨油。油籽渣餅又是很好的肥料。人们对社长說：“榨油厂真行，既可榨油，又出产肥料，今年冬种，一定要种它五、六百亩油菜，让榨油厂榨个痛快。”

这个榨油厂，每月純收入加工費五百元。

群众普遍欢迎小工厂。社馬达声响彻晴空，社汽油的芬芳散遍原野。

夏秋大丰收。里洋历年亩产年产量沒超过七百斤，这一年有的产量却激增到一千二百斤，一般的也增产了一、二百斤。許多社員想起过去討論冬种时，曾經坚持說：“小麦会吃早稻”。現在眼見增产，心服了。小麦大丰收，夏秋大丰收，充分說明了：人定胜天。

年終結算，除公積金外，平均每戶除分到口粮外，还領到三百五十元，生活水平超过了中农的生活水平，家家戶戶大添置新棉衣、新球鞋，迎接新年。

(林 普)

一場風波

看看再談

一九五六年春天，正当群众兴高采烈迎接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在上洋却鬧了一場風波。提起这件事，就得从严章凤这一家人說起。

严章凤本来没有什么家底，土改时分进一些地，以后买了四亩多好地。此外，还与人合伙圍洲田（洲田是江中泥沙淤积成田，种时撒了种，不犁不耨不上肥，单等收割），收了几冬，积下几百担谷子，陸續买下許多木材，和兄弟章鏘、章佑合盖一幢新楼房。乡里人揚傳，說他兄弟修祖坟时挖到了十三斤黄金，才有錢盖新房。这话是不知底細的人乱說的。其实，这幢新房，剛盖时只先蓋椽，以后每年积錢續修，至今还没有完全盖好。

章凤哥在生产方面有一套本事，劳力强，技术高，不但田里犁、播、耨……百般俱熟，还学会造船、盖房子、看鴨等手艺。章凤嫂也非等閑人物，她精明能干，又是高小毕业。这两口子，对互助合作的态度是变化多端的。办互助組时，章凤嫂认为自己地多活細人手少，变工互助合算，就叫章凤哥入組。搞了一陣，她覺得无利可图。她說农忙时人家不能全力帮她；可是去帮工的，她又嫌人家这样那样的，于是就叫章凤哥退了組。兴初級社，他們也进了，不久又退出来；退了又进，进了又退。鬧了几番，再加上章凤哥耳朵軟，听老婆嘴。因此，人家称他夫妇是电影“閩江桔子紅”中的福祥夫妻。

这天，章凤哥从地里回来，见乡里鑼鼓喧天，广播简直响，一打听，原来是要办高级社。他心中暗想：事不关己，难道退社两次了，还要试第三次吗？他扛起锄头，回到家，打算早早睡觉。

章凤嫂见到章凤哥，忙把打听到的新闻一一转告丈夫。夫妇正谈论间，弟弟章鏞来了。

章鏞和哥哥大不一样。他从土改起就一直当干部，还常常上戏台演戏，参加文艺宣传活动。他为人活泼好动，除了吃饭、睡觉在家，整天忙生产忙工作，到处跑。一九五五年，他入了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加积极了。如今合作化高潮到来，干部分片包干动员群众入社，章鏞包干动员章凤。

“风吹单条竹。单干碰着风呀雨呀的，你个人怎应付得了。还是入社吧！这好处很多。”章鏞对哥哥说。接着又替他算细账，劝说一通。

“你是干部，当然要说好。我还是看看再说。”任你千劝万劝，章凤哥不变主意。

還是入了社看看

慢表章凤哥在一旁观望，且说合作化高潮席卷全乡。几天来，上乡群众闹腾腾的，申请入社的递申请书，送喜报的送喜报，顷刻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都入了社。

这时惊动了一户富裕中农严拱民。严拱民绰号番仔民，早年是伪海军，为人机灵圆滑，几年来积了不少钱。回家后买了好田，生活富裕，想个人生财发家，对合作化是不欢迎的。这阵子，他见到干部挨户动员群众入社，惟独不找自己，心中想：共产党不动员我入社，其中恐有文章，便去找社长严木林要求入

社。社长說：“按你現有田产、农具、劳力情况来看，入了社怕会减少收入的，还是先在社外看一年吧。”他听社长这样說，就越“坚决”要求入社。他說：“不管怎样，我跪也要跪进社来。”

章凤哥見比自己富裕的严拱民都入了社，心里很是不安，老問自己：“不入社行嗎？入了好嗎？”又和章凤嫂商量。章凤嫂說：“我看明天还是去报名好。”章凤說：“入了社，要是沒好处，秋后又得退，还是看一年吧，你說呢？”章凤嫂气了：“要看，你就一个人看，我和孩子不能羈在你褲带上轉。人家都进了社，我們走私家路，总是沒好处。”章凤哥笑着說：“好，这回还听你的，以后可別又派我的不是。”

第二天，章凤哥报了名入社。別人跟他开玩笑：“‘福祥’，到秋尾你又要再退了。”章凤哥連忙分辯：“这回不了，杀头也在社里。”嘴上这么說，心中还打算盘：“先入了看看。”

哎，还是退社好

高級化后接着春耕，大搞积肥运动，支部提出口号：“有土必挑，有肥必积，男女齐动员，日夜大苦战”。苦战一个多月，共积了三十二万多担肥，改換了二百多亩田的土壤。被評为区的积肥先进社。

章凤哥干得累极了，回家倒头便睡。章凤嫂又开始冷言冷語了：“那一代也沒見做得这么狠，曉得年尾能分几个錢？”又說：“別这么死心卖勁了，看人家严拱民，跑一趟福州，就賺了不少。鬼也要使紙錢呀，家里沒錢了，知道嗎？”

早說黑說，終于有一天，章凤哥不到社里干活，过江到馬尾做商販去了。

群众干劲足，苦干一春，早稻丰收，平均亩产六百多斤。会计整天低头嘟嗒算账，算出每个工分可得式角。社长严木林知道了，大喜，忙将消息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大伙情绪高极了。但事后一细查，原来会计算的预分数不是贯彻上级指示的“多分少留”的原则，而是“全分不留”。社干一研究，想按一工分式角，预分百分之七十，留百分之三十做生产资金，秋后结算，但又怕群众情绪会受影响，低落下去，最后还是决定不打折扣，全部照发，秋后再多留资金。

预分结果，社员普遍增加收入，买布添新装，大家喜洋洋。只是章凤哥、严拱民等几户，平常热衷搞个人副业，工做得少，预分也少。于是，他们嘟咕开了：“做又狠，管又严，分又少，真是不如单干好。”不过，没有多少人对这话感兴趣。

章凤嫂拿到预分款，老大不自在，半天，说了一句：“这够做什么用！”章凤哥想：“看秋后吧！”

秋后，收成不如早季，又留生产资金，每个工分折一角七分。一些富裕中农不满了，在街头巷尾大谈论。严拱民说：“今年粮食分得真多呀，嘴都要吃歪了。”他想退社单干，又没伴，势单力薄，看章凤是个好对象，就经常到他家串门。对章凤哥说：“最近做豆腐皮相当赚钱，不用多少本，至少有加三利。”章凤哥应道：“现在怎做得成！”“退社呀，我们合伙干。”“能社退吗？”“社章明白写着退社自由，怎不行。”

从此，章凤哥脑子里天天打算盘，七上八下的老觉自己入社吃亏，一心想退社。

事有凑巧，社长严木林有个哥哥，外号木林七，人不坏，唯是看钱重，分毫必争，又是墙头草，随风倒。被严拱民怂恿，整天拿着报纸到处念。当时正是大放大鸣期间，牛鬼蛇神出洞放

毒。严拱民讀的报，正登載着高談什么退社自由的文章。他一念讀，严拱民逢人便說：“社长哥哥都要退社了。”

风起波生。漸漸地，在严拱民、章凤哥周圍聚集了一批要退社的富裕中农。

捲起退社風

几天来，三五成群的要退社戶聚集在章凤哥樓房上秘密开会。

严拱民对大家說：“人多力量大，要退社得多找几个人。”

商議决定：动員更多的人退社。

第二天，严拱民去找貧农宗金，他想要是貧农能退社那就好說話了。他一开始問宗金的收入情况，宗金冷冷地說：“不坏，比哪年都强。”他又說：“現在許多人都說社里賬目不清，大家都想退社咧！”宗金說：“退他們的吧！我是軍属，說什么也不能退。”說得拱民扫兴而归。

他又跑到貧农永陞家里。永陞直截了当地說：“万般起头难，开始免不了有缺点，以后就会好的。”

他又跑到貧农宗汉家里。宗汉家人口多，单干根本干不开，他說：“沒社就沒我，就是餓三天我也不退社。”

党支部和社干們看到严拱民等活动得凶，怕一条泥鳅攪渾一池水，决定召开社員大会，把事情公开出来，好让大伙討論，并进行教育。

那天晚上，社員在祠堂里开大会。說也怪，要退社的和不退社的自动分坐两边，各談各的事，界綫分明。会上，支部書記簡單总结了高級化以来的成績，也談到工作上的缺点，表示今后要努力克服这些缺点。但这些話，严拱民他們听不进去，他們故意

不斷地打呵欠，來表示他們的厭煩。

接着，叫要退社的人報名。嚴拱民、章鳳哥、木林七等站起來，此起彼落地提許多問題：

“是不是要還給我們原田？”

“什麼時候我們把牛牽回來？”

“糞船怎麼辦？”

.....

支部書記再三要求大家靜下來，向他們解釋：有問題可以商議解決，不一定要退社。但是，嚴拱民却說：“既然退了，我們走吧！”高聲一喊，他們散走了。

章鏘他爹見章鳳等退了社，也想退，章鏘在旁看出老人家的意思，就說：“爹，还是在社里好。我是共產黨員，說什麼也不能退社，你要退，我們就只有分家，你這麼大年紀了，真的捨得和我分開嗎？”說得老人家動了情，不退社了。還有幾戶也是猶豫不決的，經耐心教育，也不退了。

“單干團”還要鬧

退社的人還常在章鳳哥樓上開會。群眾叫他們作“單干團”。“單干團”還要鬧，鬧着要拿回原田。

對這件事，社干研究了好幾次。有的人比較偏激，認為只能給退社戶壞田，叫他們“苦一苦”。但大部分人不贊成這種意見。他們認為還退社戶原田有困難，因為土地已由社統一划片了，不好抽；可以換給同量同質的土地，並堅持說服教育，等待他們覺悟，重新入社。

但“單干團”堅持要原田，一方面派人上縣上省去查政策，

一方面要硬闖。有個叫孔清的，兒子阿標是共產黨員，老头退社，阿標堅決不肯，結果兒子帶了媳婦小孩，和父親分了家。嚴拱民見孔清退社堅決，成分又好，就慫恿他鬧。孔清被慫恿，腳膀上就插把快刀，裝作真的要跟人拼的樣子，社員見到他都避開去，他就越發翹起尾巴了。

划田退還時，還原田不礙社里的，全部拿回原田，其他調換同質同量的田地。一宣布，“單干團”鬧起來了。支部書記嚴五妹很氣憤，說：“你們要就要，不要再入社好了。天下的東西那有都一模一樣的，你的紅土田換社的黑土田還不行嗎？”

嚴拱民怕有的人再進社，就作“思想工作”，要大家發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要就一起進社，要就一起單干。他又動員大家去告狀，告狀要花費，每人交了二元，約定誰中途又入社就不能退回告狀費。

一面告，一面鬧。那天春耕積肥開始，嚴拱民叫“單干團”先把土挑到原田，先下手為強。有幾戶胆小不敢吭聲，其餘人議定第二天清早比社里提早半小時出工。果然，次晨五點半，天才蒙蒙亮，“單干團”一行十幾人，在章鳳哥的洲仔田里干開了。

社的青年突擊隊隊員們知道，也趕來挑土，兩班人馬在一塊田里趕開了，你一担，他一担，開始誰也不吭聲，默默緊干。章鳳哥看到章鏞也在場，一時按捺不住，上前把青年突擊隊運土船的跳板搬走了，青年隊半點不讓，也去搬“單干團”的跳板，雙方都停工，在田里對罵。

當天夜里，“單干團”還是在章鳳哥樓上開會。嚴拱民火上澆油，說：“光用嘴不解決問題，如今打人犯法，我們就用糞潑。”

章鳳哥心中懊悔，想：搬跳板不該自己去。章鳳嫂也怕丈夫

惹禍，在一旁嘮叨，被章凤哥哼了一声，她那里肯让，一直数落到半夜。

第二天拱光生产小队在田边浦里挑土积肥，挑没几担，没耳出来拦阻：“你们挑够了，现在留几担给我刷墙壁。”拱光说：

“刷墙壁迟早不误事，积肥可误不得。”说完，低着头照旧挑，没耳不声不响，拿起粪瓢，朝着拱光劈头盖脸泼下去，泼得拱光满身是粪。

“单干团”闻讯欢喜，泼粪成了他们与社斗争的武器。

社员们都很气愤，有的说：“他们再这样凶，我们就把他们绑起来，看看还敢不敢这样横恶！”支部、工作组听说，就劝大家不要急躁。

坚持说服动员

支部又召开退社户开会，答应重新换一些好地给他们，他们还不赞成，坚持要拿回原田。为了好找借口，他们决定办假社，推章凤哥当社长。计划在要回大片土地后，私下再分回各户，表面上算个社，收入个人负责，农忙时可以变工，这其实还是单干。章凤找社干说：“我们跟大社合不来，自己成立初级社，划给我们一片地就行了。”社干和支部研究后，答复他们说：“你们既跟别人合不来，就你们几户组织一个生产队，队长由社里派，副职你们选。”他们一听直摇头，假社也没办成。

随后，“单干团”和社员又几次在田里冲突。社长严木林的哥哥木林七，和木林以及另两户社员合有一艘粪船，船入了社，木林七退社后要去撑船，木林对他說：“社里已另外搬船给你们单干户了。”木林七不听，强要撑船，两兄弟在船上推来搡去，

木林七不当心掉到粪塔里去。大伙闻言，又气又好笑。

上洋社員和“单干团”斗争的事傳开了。上級指示支部、工作組一方面在不損害集体的前提下調換好田給单干戶，另一方面耐心动員說服，爭取和分化单干集团。不合理要求一概加以回絕。支部根据上級指示开会研究，批判了某些人对待退社戶的粗暴态度，决定干部分头动員說服单干戶，爭取他們重新入社。动員章凤哥的工作又包在章鏘身上。

章凤嫂几天来心事重重，她担心丈夫当单干头，鬧起事情总得吃亏，又看到社里已播了种，自己顧了吵鬧誤了生产，盘算一番，夜深人靜时分，叫醒章凤哥，劝他干脆再入社，在外头也不成事。章凤哥一听，气得跳起来：“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入社听你的，退社也听你的，这回我要自己决定了。”嘴上这么說，心里也在七上八下。

“看你以后倒霉！”章凤嫂抱怨地說。

从此后，她怕惹事，不許单干戶再在她楼上开会。

因为章凤哥退社的事，章鏘不知和他哥哥吵了几次。現在再去动員他，有些不好意思。但一想到这是党的任务，又是为了自己兄弟好，也就硬着头皮去找章凤。跟他算細賬，說道理，还答应如果他重新入社，一定按人尽其才的原則，安排他看鴨子。章凤哥看鴨子技术特別高，一向收入不少，听說社里让他看鴨子去，心中早已愿意。章凤嫂对这点尤其滿意。再說，自己这样鬧，人家社里还这样照顧自己，規劝自己，人家是为了什么！当下就慫恿章凤哥再入社。章凤哥一則碍于面子，自己鬧鬧吵吵得罪社里父老，如今有何臉面再入社！二則当初单干团約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自己怎好失却信用！因此还是犹豫不决。

章凤嫂习惯于当家作主，她不管章凤哥是否同意，暗地写了

重新入社申請書。生米煮成熟飯，章風哥只好和單干團分手了。

也有幾戶經社干動員后，和章風哥一起入了社，其他人見大勢已去，再開無益，也各自散去。剩下嚴拱民想鬧也鬧不起來。交代一下，此人煽動鬧事，以后查明問了罪。

一場大風波漸漸平息了。它的尾聲是“單干團”分回告狀費，每戶分回三角六分。

下文如何？

要問下文如何，只要說兩樁事。

第一樁。許多退社戶重新入社后，孔清还是不入。他起早摸黑地苦干，總想增加收入。這年年成不差，早稻長得很好。孔清喜得合不攏嘴，天天盤算着好光景怎樣過。眼看豐收到手了，老天好象有意要跟他為難，颳起了台風。合作社里敲鑼報警，全體出動搶收。老孔清兩眼昏花，恨不得騰雲駕霧飛到田里收割，可本領再高，也割不完三畝多稻子。后来，兒子阿標在社里搶收已畢，幫了他一把，才讓稻谷搬進了他的家。這一下，老头子受到教訓。晚稻一播完，不等收秋，就主動要求重新入社。跟他一起入社的还有木林七等人。

第二樁。以后办起公社，章風哥割斷資本主義思想尾巴，積極勞動，被評為積極分子。有时大伙湊在一起，提起過去那場風波，章風哥就第一個臉紅。而章風嫂就說：“幸好我当初有主見……。”后来，大隊缺一名會計，領導上擬請章風嫂出任，章風嫂又想干又怕担不起重任，至今还在考慮再三。

（葉秀期、黃健生、鄧一衡）

此路不通

一九五三年冬，一天晚飯后，城門乡（现在是城門人民公社的城門大队）林家祠堂开群众大会，宣傳总路綫。会前，几个干部正在一起研究扩大剧团組織，加强总路綫宣傳的問題。忽然，有人插进話来：“社长，我愿意捐几担谷給剧团。”社长兼党支部書記黃珠英回头一看，原来是富农林家鍾，正待开口，支部副書記林知深搶先答道：“等你脫掉富农帽子再捐吧！”这一說，周圍的群众都哈哈大笑，弄得林家鍾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狼狽地退到門口了。过一刻，他又笑嘻嘻地湊近黃珠英，說：“社长，人来得少，我去叫大家。”沒等回話，就急忙忙奔出門外。当他回来的时候，左手拿两条板凳，右肩扛两条板凳。站着的人，見到凳子都乐意接过来坐。林家鍾这就又搬凳子去了。

从此以后，凡有开会無論大小，林家鍾必到，通知人、搬凳子，总少不了他。

一次动員修水利，林家鍾第一个报名。

合作社記工員忙不过来，林家鍾主动来帮助。

写个标語什么的，林家鍾笔头最勤。

五六年乡里实现高級合作化，允許规划富农入社，并可以按情况改变成份，林家鍾連夜写申請书交給党支部。

問題摊在支部会上研究。

黃珠英說：“林家鍾很积极。”

林知深說：“他当过三青团分队长，底子不好，还得看看。”

乡长兼总支副书记林佑民支持黄珠英，說：“党对富农現在是寬大的。”

林知深說：“寬大不是沒有原則的。”

林佑民跳了起来：“难道我沒有原則？”

于是付表决，黄珠英、林佑民得胜。林家钟这就入了社，改了成份。

这还不止。黄珠英认为党员林雪飞没文化，当不了社的出納，把她撤了，换上林家钟。

有一天，黄珠英和林佑民到瀟州办公事，順便逛逛百貨公司，時間迟了，黄珠英怕回去吃不到飯，建議去乐新楼吃一頓。

黄珠英原是貧农，土改后生活天天好起来。家里人口少，丈夫和自己都有固定收入。又养有三条奶牛，光挤奶每天就收入八、九元。請林佑民吃一頓飯，算不了什么。

剛在飯館坐定，忽然闖来一人，不是別个正是林家钟。他笑瞇瞇地端着半碗扁肉，乐得气都有些喘了，說：“再巧不过！再巧不过！”黄珠英和林佑民起先楞了一下，但一想到林家钟原是常常上館子的，也就自然了；見他吃扁肉，就叫扁肉，却被林家钟拦住了：“难得湊巧，做几碗菜，喝几杯！”边說边叫菜。

談論間，林家钟看見黄珠英新买的一块月白布，皺皺眉說：“有錢宁可买好一点的布，我家里买布多半买綢的，又大方又經穿，又不要布票。”提起布票，恰好勾起黄珠英的不滿：自己錢多，要多买布却布票有限。經林家钟一提，真有些懊悔，不覺随口說：“唉，真的，早一刻碰到你就好了！”“不要紧，我正要

給小孩买块布做內衣，你这块計給我好了，等下再去揀一块軟綳，揀顏色新鮮的。”

見林家鍾熱心得過份，黃珠英不大好意思，推辭說：身上又沒多帶錢，算了。“不要緊，我先墊！”林家鍾說。吃過酒菜，拉黃珠英進了百貨公司。

回路上，微風徐徐吹來，几杯黃酒落肚原是熱烘烘地，現在分外舒暢，說說笑笑，三個人都心滿意足。

從此，建立了酒肉之誼。春節，林家鍾全家總動員，大辦春酒，請黃珠英和林佑民以及全體幹部“賞光”。有些幹部去了。大吃大喝之後，又被請到螺洲看戲。回來又吃夜宵。第二天，家里東西吃完了，索性請客人上福州樂新菜館，晚上到天華戲院看戲。戲散吃過點心時已半夜，客人走不動了。林家鍾作東道到底，請大家到榕樓旅館過夜。於是，一席春酒，竟延續三天兩夜。

吃了人家的怎好不還敬！黃珠英回家也就大辦酒席。一個社長總得比出納更出色些。她盡量賽過林家鍾的排場，也請大家飽醉個不亦樂乎！

你來我往，感情深厚了。上館子，逛戲園，成為常事，只要彼此點點頭，眨眨眼，一伙人就上福州。日子久了，黃珠英和林佑民覺得林家鍾十分疏財仗義。林佑民患貧血症，但因家口負擔，沒錢“補體”。林家鍾就暗暗塞十塊錢給他，說：“身體要緊，拿去打肝精針吧！自己人嘛，不用客氣，推來計去給人看到反沒意思。”見林佑民沒蚊帳，林家鍾又買一床送他。黃珠英一次患胃病，林家鍾親自送她到福州住醫院。真是關心得無微不至！

為了表示對林家鍾高度的信賴，黃珠英把高級社公章交給他，再把私章也交給他。

林家钟的父亲叫林傅添，为人善于钻营，是做生意的老手。他暗地纠集了七户富裕中农，组成投机集团，大做黑市生意。如今，儿子掌握到高级社公章和黄珠英私章，他就大展神通了。用公章伪造一张“自产自销”证，做生意可以漏税；用黄珠英私章打领款条子，贪污、挪用公款都十分方便。每次抢购、套购物资都在数百担以上，资本十万余元，跑南平，跑上海、广州，这样的生意，怎不一本万利！赚了钱拿一些送给林佑民等人，说：“你不挂名搭一份暗股吧！这是分红。”林佑民、黄珠英既得了红成，就开一眼闭一眼给林傅添以种种“方便”了。

高级社有五条土船，黄珠英专拨两条给林傅添使用：为他运送李干、荔枝，在闽江上大模大样地来来往往。

夏收正忙，黄珠英帮助林傅添在各生产队中抽出强壮劳力，为他到福清搬货。“每天工资一元五角！吃饭不用米票！来当工人吧！”诱走了四十多个农民。

春耕积肥，黄珠英不仅不将拨给林傅添的两条土船调回运肥，反而“照顾副业”，把另外三条再拨给林傅添运货。各生产队只好向外租船了。林傅添心一狠：“要堵合作社的路就要堵死！”到附近各地高价租船，不让合作社租。有了船，就用比国家价格高一倍半的钱去抢购、套购马铃薯和柑桔五百多担，运到天津、上海，赚了九千多元。

林傅添用行商证向高级社预购马铃薯、荸荠等。订了货却迟迟不起货，时间久了，马铃薯和荸荠烂了许多，剩下的收水后重量大减，合作社吃了大亏。黄珠英等人不理不睬。

合作社生产搞不好，收入减少了。林傅添对社员说：“种一世田能有多少钱？看我，上一次馆子用的钱你们得挣半年。到底

是做生意好啊！”

資本主义气焰囂張，部分群众受資本主义思想侵襲，不安心农业生产。更多的群众和干部大不满，說：“黃珠英是武則天，寵信奸臣。”向黃珠英提意見，不被接受反遭打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挫折了。于是有不少人消极抗辯：退社。

支部副書記林知深不和黃珠英等同流合污。于是他被孤立了。林佑民、黃珠英做了亏心事，見林知深常常跑县委，怕他去彙報，恨之入骨。他們不但在党内排擠林知深，而且在群众中破坏他威信。林佑民对落后群众說：“統购的定产太高了，都是林知深好高，在县委面前逞功。”凡是群众不滿意的某些措施，責任就都推到林知深身上。林知深要到县委揭发他們，怎奈自己还不知他們的真正内幕。

另一些立場稳定、和他們作斗争的干部，却被調虎离山，派去参加古田水电站的建設。

但是，一手掩住天下人耳目是办不到的。

一九五六年八月，县里派来一个調查农村經濟的工作組。他們在調查过程中，发现群众情緒不对头，对黃珠英等大有意見；同时，稅务局发现林傳添偷漏稅活动，派人来調查处理。工作組見到这种情况，建議进行整社，县委批准了。

社員們初步揭发了黃珠英等的錯誤。林傳添父子在四下活动，說：“人家是石头，我們是鸡蛋，鸡蛋还碰得过石头？”工作組鬧一番就走了，干部还是干部，到那时你們就要倒楣啦！”

在干部会上，一批評黃珠英，她就大哭大鬧，喊冤枉。召开群众大会，会前黃珠英等竟一窩蜂似的涌到福州看戏，使大会开

不成。

林佑民还伪装正确，骗取信任。他建议税务局同志查林傅添的账。查来查去，查不出毛病。原来林傅添有两本账。税务局同志接到群众报告，说林傅添家里藏一百多担私货，但会同乡长林佑民去搜查时，总是扑空。

整社的结果，只批判黄珠英的强迫命令和讲究享受，属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问题。撤销了她社长的职务，仍保留支部书记的职务。

群众发动不充分，搞得不彻底。不过是暂告一段落罢了。

这一番斗争教育了林知深。他知道社员们心中不平和愤慨，他相信这番斗争只是前奏，社员群众一定会进一步起来揭穿和粉碎林傅添、黄珠英等的罪恶活动。他发现自己以前不依靠群众是个大错误。从此，他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准备着下一步的战斗。

一九五七年六月，农村开展“鸣放”。县委决定以城門乡为重点，又派来一个工作组。

工作组深入到各生产队，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反映说：“这才象真正的共产党。”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就将心里话都倒出来。问题的性质确定了，问题的严重性显露了。工作组了解到支部党员有相当一部分受到资本主义思想侵蚀，有的人甚至发展到做投机生意，象黄珠英、林佑民就更严重。于是决定整党。

全体党员集中整党。另一面发动群众彻底鸣放。大字报、小字报贴满街。黄珠英和林傅添等人的罪恶被彻底揭露了。八月中，根据群众的正义要求，先后三次举行千人的反对反动富农的斗争大会。随后将林傅添、林家钟逮捕法办。

黃珠英、林佑民受到黨紀處分，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林知深站穩立場，和蛻化分子作鬥爭的事跡受到表揚。他被選為新的支部書記。黨的新的領導核心很快地建立了。群眾靠近黨了。

在整黨、大放大鳴基礎上，接着展開大辯論，出現了新的社會主義高潮。

（李鵬英）

果园里的斗争

城門人民公社位于閩江下游南台島的东南部，这地方是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在这四季常春的綠洲上，盛产着馳名全球的福桔和雪柑。全社共有柑桔园一千九百九十四亩，果树七万一千零一株。此外还出产水蜜桃、龙眼、荔枝等。产品收入占全社經濟收入的一半。农民們称这为搖錢树和聚宝盆。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这里有过一場关于果树問題的激烈斗争。

一九五五年秋后，城門跟全国广大农村一样，风起云涌地掀起了合作化大高潮。一部分拥有多量果树、多年坚持单干的富裕中农，随波逐流，抱着观望态度加入了高級社。

高級社一建立，就着手处理果树入社問題。經過民主討論，采取“分等定价”的办法折价入社。

办社头一年，柑桔丰收，产量提高百分之二十。許多社員象生头一个孩子那样欢喜，連夜搓草繩，架扎柑桔树，生怕杯碗大的果实压断了树枝。但是部分資本主义思想較严重的富裕中农，却发牢騷讲怪話，不甘心丰收果实归全社所有。有的常假裝鋤草、割菜、挑粪桶到果园偷摘柑桔；有的干脆砍掉果树，故意再种上幼苗，好騰出地来自己再种些甘蔗什么的。

一九五六年底，刮起了一股反冒进的歪风，一部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气焰更加嚣张了。城门的林傅渠和敖峯的林金全、林长盛、林福潮等，联合了十几户上中农上书中央，要求果树退社。

当过伪乡长的林傅涵也乘机兴风作浪，大叫“收入太少了，生活过不下”，要高级社除了给他劳动分红和果树折价的钱以外，还要另外给他三百元。

当时一些干部在右倾思想的指导下，片面强调从经济上团结富裕中农，实行让步，把原来已折价入社的果树全部改为“按比例分红定期折价入社”，也就是将果树总收入扣除成本、税收和“三金”外，其余百分之六十归劳动分红，百分之四十为折价款，发给树主。照这样按比例分红，四年后，全部果树才归社所有。

我们退一步，他们又进攻一步。他们抓住某些生产队因缺乏经验，对果树管理不大好的缺点，又大叫大喊：“贫农不会种柑桔，生产搞不好，我们的收入还是没保证。”要求把果树归给原主经营。当时部分干部又片面强调“种柑桔的技术复杂，富裕中农有生产经验，应当给他们管理。”好了，一变再变，索性将果树还原主经营，劳动分红也归原主，这实质上等于恢复单干。

这下子这批人可翘起尾巴啦。有的一年收入几千元，上工时，叼支香烟、骑上自行车，车后面绑根锄头。在途中拐到小菜馆里喝上两杯，到园里锄了两下，然后躺在树荫底下，悠然自得地唱道：

一日三酩老，（注）
吃饱树下倒；
南风吹过来，
神仙没我好。

城門有个小队，一共十五个人。其中八个富裕中农在夏收大忙时，全不下田。还大搖大摆地走到田旁，故作慷慨地說道：

“大伙加油干哪，沒啥說的，工分都让給你們！”

富裕中农林知灼的母亲端碗羊肉綫面倚在門口，对着剛走过街的貧农二俵嫂，故意大声說道：“搞什么統购統銷，弄得缸底都朝天啦，只好吞这杂粮。”

一九五七年春天，城市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波及到农村。一些不法地富分子便妄图趁机复辟，联合一些富裕中农，在“統购統銷，农业合作化，工农关系”等問題上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公开組織反动果农会，出布告，还要挾支部書記盖章承認。走私买卖盛行一时。富裕中农林傳渠套购了一百多担的馬鈴薯进行黑市买卖。每担七块的成本以十三块钱出卖，大发橫財。在他的煽动下，城門村掀起一个小小的鬧退社的风潮，經過一再說服教育，結果退了五戶。林家渠最后还坚持說：“田宁可一亩不要，給我果树就行！”

事实沉痛地教訓了我們，对富裕中农的团结，不能单纯从經濟利益上照顧，必須通过严肃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这才是解决問題的根本办法。

一九五七年七月，农村展开了一场社会主义大辯論。貧农起来講話了。党坚决依靠群众，組織了坚强的队伍。通过算細賬、訪問工厂和前后对比的方式，进行了两个月的大論战。彻底駁斥了少数不法地富的无耻謔言，并对上中农的自发資本主义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通过辯論，也澄清了貧农中的一些模糊認識，清洗了包庇地富分子进行非法活动的党内蜕化分子黃珠英、林佑民等人。

通过这场激战，教育了富裕中农，他們开始意識到資本主义

的道路是走不通了。可是，有些人生产情緒依旧低落。还有人心存不滿，借口剪枝私自砍伐果树四百多株，拿回家当柴燒。經過严厉批評教育，才制止了这种行为。

貧雇农的覺悟提高了，合作社大大地巩固了。

二

一九五八年二月，开展了“双反双比”运动，猛攻三风五气，进一步的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貧农紛紛指責部份富裕中农一脚踏社会主义船、一脚踏资本主义船的錯誤。

群众要求解决果树入社問題，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斬断资本主义的尾巴，提高生产情緒，实现大跃进。当晚我們立即召开貧农、下中农會議。

在会上，剛剛提出这个問題，話沒講完，台下就欢騰起来了，全体到会的人举双手贊成。七十多岁的郑清官老婆婆立即站起来，笑咧着嘴說：“我們早就这样想了，过去都是你們干部擋住的。”台下兴奋地交談起来，哄得厉害，眼看着話講不下去了，索性让大家大鳴大放。这会一直开到十一点多鐘，干部一再催着大家回去休息，却没有一个人肯走。群众依然在会上一口气写了六百多張大字报。

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貧农生产队长林知庄就欢天喜地的敲鑼招呼队员們出工。郑清官老婆婆也扶着拐杖挨家挨戶地动员妇女們参加春耕积肥。

这个生动的事实，深深的教育和鼓舞了干部，增强了干部的信心。

果树入社后，有些富裕中农私心未死，經常窩工；企圖把果园荒蕪，找到借口再夺回产权。

这时，我們就指定党委委員王茂玉专门負責，挑选人員組織貧农专业队，經營果树生产，并提出“小年变大年”的口号。这个消息一公布，貧农更加欢騰了。可是有的富裕中农却在旁边冷言冷語。一天，上中农林家灼用手架在自己脖子上对我說：

“专业队要是能搞好果树，就砍下我家灼的头来！”

我笑道：“头很宝貴，先安在脖子上吧，以后等着瞧。”

貧农們都別了一股勁，果树专业队一組織起来，就提出“干在园中，吃在园中，不完成任务不收工”的口号。城門大队沒到三天，就把二百多亩園地的草除得一干二淨，还抓了三張大芋叶的柑桔虫。

鰲峯的专业队长、党支部委員林能清，一天不到果园林便觉得难受。三角埕专业小队林家礼、林燦弟，連夜赶到福州购置剪刀，虫钻等工具。

老农王茂金是王茂玉的胞兄，他最有意思。一听到成立果树专业队，就兴高采烈的說：“共产党干事就是实在。社会主义好，有活大家干，有福大家享，哪能再走地主的道路！咱們也要爭口气，干个样子給他們看看！”果园变成了他的家。每天一吃完饭，他就扛着鋤头到园里，这棵树上摸摸，那片地里鋤鋤。挑起河泥，能頂上最棒的小伙子。歇午的时候，他独自在树下东瞅瞅，西瞧瞧。無論是钻到树干里的天牛，还是在树皮中的纏皮虫，都逃不出他的一双有經驗的眼睛。

柑桔的大小年之分，是有史以来沒有解决的問題。起初有些干部和专业队員信心不足。我們根据条件和可能，反复动員教育，打通思想，同时組織了老农和县里派来的技术員王瑞貞与农科所的陈祝山、陈威发和尤哲等同志进行詳尽研究，分析产生大小年差别的原因，采取了“多施肥、勤鋤草、疏水道、灭虫害、

修剪环枝”等一系列的土洋結合的技术措施。同时在各专业队实行三日一檢查，十日一評比，一月一总结的工作制度。开展了紅旗竞赛。

三月底，我們的愿望实现了，我們胜利了。

一片片的果园林中盛开着橙黄的桔花，芬芳扑鼻。每一百朵的花儿就結了八十多顆的果子（往年只有一半）。它預兆着将要来临的大丰收。

在事实的面前，原来思想不通的富裕中农低头認輸了。

过去最固的富裕中农林家渠带着他的妻子，到支书林金官家里，請求原諒他的錯誤，要求入社。林金官批准了他們的要求。这些富裕中农在党的不断教育下，有了很大的轉变。在专业队里还发挥了他們的专长。

一九五八年十月，林能清和王瑞貞到浙江黄岩县参加全国七省果树会议。中央首长对城門公社非常重视。会上林能清作了典型报告。

从杭州开会回来后，专业队的干劲更大了。他們的每一滴汗，每一分辛劳，都取得了应有的收获。沿着烏龙江岸，亿万顆紅桔，都长得又大又紅。丰收的捷报頻頻傳到党委办公室。队员們乐得抱住摔跤，相互奔告說：“小年变大年啦！小年变大年啦！亩产四千三，产量翻了一番。”

今年搶桔的小孩，可犯了經驗主义的錯誤。他們老是空着袋子，垂头丧气地回家，嘟囔道：“往年桔子都会掉下来，如今肥施足了，一顆顆都粘在枝上，真气人。”

能清从杭州一回来，就使用了在全国現場会议上学到的高压快速切苗法。他和林知国及社里的农具厂的同志，还共同发明了高压剪，工作效率提高了二十倍。

茂金伯在挑河泥中笑着对曾經去过杭州的王瑞貞說：“你这孩子，开一次会就迷上了西湖，一回来就是什么苏堤呀，平湖呀，我看就沒有我們的烏龙江好。来年我們建議全国現場會議到这里来召开。那时候，請代表們坐上我們公社的汽車，在几十里的园地上大逛一通。我們每条小河边都栽上各式各样的花，园里再排上石桌石椅，請他們到这柑桔公园里，吃个痛快。嘿！那时候，我們每个园里都插上一面大紅旗，上面写上：

天下柑桔城門数第一，
一包甜水漲破你肚皮！”

旁边人听了，都哈哈地笑了。

(注)即三鞭老酒

(唐如翼)

奶 牛 入 社

一九五八年春，我們真是干劲冲天，白天黑夜鬧生产，大家忙到有酒也沒有空喝。可是，一些占有果树、奶牛的富裕中农，整天还在数牛毛，称牛奶，做资本主义的好梦。社里派工，要他們下地干活，总是推三托四不肯去。还哼着：“园有搖錢树（果树），家有聚宝盆（乳牛），一天劳动三点鐘，胜过合作一月工。”他們不用劳动，整天喝酒吃肉，还宣揚：“一日三砵老（喝好酒），吃飽树下倒，南风吹过来，神仙沒我好。”这些人拉社会主义后腿，这怎么算入了社？我們都看他們不上眼。

这时，党提出果树、奶牛入社，我知道了这事，急急忙忙跑回家，想先把自己跟人家合股养的一头奶牛，带头牽入社里，作为我們的实际行动。

我妻子看到，一把拉住，猛的哭起来了：“你只要嘴張一下，就把牛牽去入社。这头牛我看了二年半，从小养到大，都是我一手办的，你不心疼？”

哎呀，这本是一件欢欢喜喜的事，我真想不到她搞不通。我便对她解釋：“我們是貧农，走社会主义大道，我們應該有志气，最坚决。”

“用不着多說了，反正牛是我养大的，不干你的事，不入社，总不会叫你当犯人！”

她还搞不通，我的心火起来了，头頂簡直冒了烟。可是，急

躁不能解決問題，還是好好地問她：“你說這頭牛從那裏來的？”

“入了社，勞動來的！”

我趕緊接上說：“是啊，勞動來的。我們解放前不是整年勞動，結果一家光光的，我還要跑到福清縣給地主看牛。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我們一家怎麼有這好日子，怎麼有牛？”

她給我一說，心里好象開朗了許多。她不哭了。後來，我又叫工作組老鄭幫助她，打通了她的思想。她高高兴兴地把牛喂飽，牽到社里去了。

我們貧農的奶牛帶頭入社，這可把某些富裕中農弄得慌起來了。象林家力，非常頑固，死死抱着資本主義的鐵算盤不放，把牛關在自己的牛欄里，不入社；跟他說理，他裝蒜。大家火得只好貼出大字報來批判：

林家力，林家力，
養奶牛，收柑桔，
參加社，做形式。
希望你，改主意，
快入社，靠集體；
增收入，按勞取，
大家好，個人喜，
不入社，何道理？

大字報火力很猛，又經過大家的說服，辯論，林家力兩頭奶牛也牽出入社了。可是，夜長夢多，這個晚上他睡也睡不着，半夜又跑到社里要牽牛回去。我們連夜又跟他展開辯論，駁得他啞口無言，便又借口：“牛入了社，你們不會管理，牛養得只剩牛骨！”有的富裕中農還譏諷我們：“連牛毛也沒摸過，怎麼會飼

养牛哩。”

一連几天，我們坚决和資本主义思想展开斗争，他們却暗暗地将我一軍，跑到我家里吵鬧，在我老婆面前咒罵，把她气坏了。有个傍晚，我回家，她一見我，就不高兴地咕嚕：“自己牛入了社，就好了，何必还要拉別人，裝黑臉，和人家結冤結仇！”

我便对她严肃地指出：“你这話不对，我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着大家好，这又不是做坏人，更不是专为吃飽飯跟人家結冤結仇。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啊！”

“你这人就是……”她听我一說，也讲不出理由再阻止我什么了。

全大队八十四头奶牛，都入了社。党派我当畜牧队长，我当然坚决服从分配，就是有困难，也得承当起来。

开头几天，可忙啦。我跟社长王茂玉他們五个人，整天忙着評奶牛的等級：甲等，乙等，丙等……这要評得好，大家才沒意見。叶国良他們，要把城山的大王宮，三天內改成牛栏，工作都很紧张。我的妻子也不滿意。她对我說：

“你又不是缺脚廢手，自己会下田，全年干它两三千工分，自在些过日子，何必又找这个畜牧队工作的麻煩？”

哎呀，她对这又弄不通了。我只好对她細細地說：“人穷志气大，人家說我們牛毛也沒摸过，怎么懂得养牛。我們要为社爭一口气，麻煩就麻煩一些，也不碍事。”

“你不知道！我是說耕田也有过年过节，风大雨密也能歇工，你跑去干畜牧队，一年三百六十天，整个人都絆在奶牛場，不論风霜雨雪，一天也不能停的。”她好象还是从爱惜我出发，一五一十地把心里話都倒出来了。

“你說，我們不干，誰喜歡干？”我又氣又好笑地問她。她搖搖頭沒話說了。

春雨不斷下着，天氣還很冷，為了讓牛場早建好，大家勁頭很大，常睡在牛場旁小竹棚子里。牛舍沒修好，牛擠在一起癖性不對頭就要你踢它咬地嚙，同時也為了警惕壞人，半夜三更常常起來巡巡看看。一天夜里，我睡着了。恍惚看見兩頭牛鬥了起來，攪得許多牛亂沖亂闖，互鬥起來。我趕忙跑前去阻攔，突然林家力那頭牛向我撞來。我大叫一聲……醒來了。

我點上風燈便去巡一巡，牛呼哧呼哧地朝着燈光看。我發現一頭牛的腿正卡在水溝里，要再掙扎兩下就會扭壞了。我趕忙幫它拉出腿來安置好。第二天說起這件事，大家都哈哈大笑，說：“你這夢可做得妙呵！”

過了不久，我就考慮起飼料來了。開頭幾天，我們都是買蘿卜煮好喂牛，這個成本很高。我的心里總在打轉：怎樣使牛喂得飽，奶量產得多，飼料成本又低，社里收入才能增加。

一天，鄭仕丰對我們說：“奶牛入社了，我的技術留着也無處使用，也跟着入社好了，只要我懂得什麼，一定教給大家。”於是，他就談到用蜆子煮湯喂牛，可以使奶量增加，成本也低。他說，過去他本想這樣做，那時單干，人手少，忙着牛，又忙擠牛奶，沒力量去撈蜆子。他這個意見，我們帶給黨支部研究，大家討論了一下，認為有道理。因為，過去有錢人家，婦女分娩吃豬腳奶水多，窮人家婦女分娩後，沒錢買豬腳，吃些蜆子湯，奶也會多起來。再說，蜆子價錢便宜，社里自己又有養殖蜆子，成本低，便決定試用。

頭一天，我們用蜆子煮湯喂牛，牛吃了，都瀉肚子了。這一下我們可慌了，心里一陣急一陣，趕忙討論。後來發現蜆子煮湯

沒有洗清潔，不衛生；便把蜆子洗淨后煮湯，牛吃了還有一些瀉。我便跑到福建農學院、省畜牧場去請教。他們也認為蜆子煮湯可以吃，不過要用些鹽，還要吃些青草。這好比種稻，不能單單使用人糞一樣。這一下，竅門弄通了，牛真的愛吃蜆子湯，奶量也增加了。有兩頭牛，本來產奶最多的，一天只擠十八斤奶，現在一天能擠二十五斤奶。牛的奶量增加，大家信心更大了。後來不知從那里又聽來一個“對牛彈琴”的辦法，說是“牛聽了音樂就會增加奶”。於是我們便買了個廣播機安上，牛聽了很愉快，奶果然擠得更多了。現在奶量比入社前總產量增加百分之三十。

我們養的牛，奶量增加了，牛也養胖起來了。林依柱一頭牛，本來很瘦。入社不久，有一天依柱嫂挑草來賣，人家問她：

“依柱嫂，你那頭牛在那里？”

她認來認去，眼都認花了，也認不出。還好她記起自己那頭牛毛顏色，最後才認出來。她看了又看，對人家說：“牛胖得我認不得了！”

方仁那頭牛，本來癖氣很怪，要三個人伺候。擠奶時，一個人打扇子，一個人牽鼻子，一個人擠奶。現在，這頭牛入了社，也變成好性子了。只要一個人，雙手都能擠得出奶。

鄭仕辛今年五十開外了，近來勞動還會哼出小調來。人家問他為什麼？他說：“入了社，也不再傷腦筋了。”因為，過去他父子兩人，整天忙着伺候牛，去年整年勞動只干二百多分，又要計劃錢，又要考慮柴米，年年也沒什麼錢剩下，人又要愁心愁腹。現在，牛入了社，生活不用愁了，半年農業就搞了一千多分，當然日子好過啦。

本來，担憂自己奶牛入社，會變成“牛骨頭”的富裕中農，現在也承認：“社里有辦法！”了。

“社里有办法”，这句话倒说得满对！办公社后，我们的志气更大了。我们要在这一片野坡上，建起可容千条牛的牛舍，还有挤奶亭、生育室……。对着牛舍，要筑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以后我们用大卡车装着牛奶，送到各城市、各农村、各工厂去。

（郑羽官口述 许渭善、李乡瀾整理）

連坂社水稻高产記

一个黑漆的夜晚，西北风吹得厉害，連坂村街道上靜悄悄早就沒有行人。这时，供销社里的土电灯还閃閃发亮，挤滿了人，空气热烘烘的，还夾着酒味，一点也不感到寒冷。农民靠在櫃台边，一面飲酒御寒，一面談論社长黄宝洛提出要創造亩产千斤水稻高产紀錄的事。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亩产千斤，除了鉄树开花，日头由西出，才能办到。”有的說：“这話不对。有心打石石能穿，有心种田就能增产。”

他們正在吵得难解难分，忽然呀的一声店門开了，走进一位体格魁梧穿着本地衣衫的农民，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社长黄宝洛从区里开会回来了。他一進門就向大家扫了一眼，接着向大家說：“時間不早了，白天够累了，天又冷，早些休息去吧。”老农黄云玉看他走近身边，就讓出座位，說：“宝洛，你一九五二年戴紅花上华东，听說今年又打算上北京見毛主席嗎？”

“想，誰都在想呢，但是只怕沒条件囉。”社长也笑着回答。这时有人插嘴：“能搞千斤稻子，何怕沒条件呀！”黄宝洛一怔，心想他們怎么这样灵通？这消息也知道了。于是順水推舟地反問一句：“你們看搞得来嗎？”共青团支部書記，生产队长林立开接口說：“可不是，剛才大家正在爭論这个問題，有人說什么鉄树开花，日出西山才能办到呀。”社长說：“能不能办到，全看大家有沒有信心和决心呀。大家知道，解放前一工田

(七分土地)一年只收三百来斤还算好,解放后产量翻了一番,今年党提出大跃进,再翻一番我看没问题。”“对!大跃进翻一番没问题。”一群小伙子同声地拥护黄宝洛的话。

第二天,黄宝洛立即召集积极分子和老农开了几次座谈会。大家一连讨论好几夜,想出了许多办法,主要是深翻、密植、施肥、选种,和加强田间管理等。最后黄宝洛又和工作组老林等作了具体研究,算了细账,提出具体措施,拟定了计划,然后在—一个晚上,召开了社委会。同时吸收几位老农参加,讨论这个计划。会上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只有老农黄云玉若有所思地停了好久,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计划倒不错,怕的是太密了会倒伏,不一定能高产。”他的意见还没说完,就被性急的立开打断了,他站起来说:“你什么事情都是前怕狼,后怕虎,按你这样,准是十事九不成。”黄宝洛看了他一眼,用眼光批评他不该截断老人家的意见;他笑着对云玉叔说:“是呀!我也顾虑密了会倒伏,你老人家有什么办法没有?”黄云玉看到宝洛很重视他的意见,不觉高兴起来,就建议说:“不怕,古语说的好,水来土淹,兵来将挡。依我看,我们可以早些防止。前几年我耕一块田是用河泥,猪牛粪草木灰做肥料,结果粮秆粗壮得象牙筷一样,你们是不是可以多加一些这类的肥料看看。”黄宝洛听了点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老农刘世寿等也很积极地想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使这个丰产田计划订得更完整了。

丰产田计划经社委会通过后,黄宝洛又决定拿到社员大会上广泛征求意见。到了这天晚上,年上七十的老农刘大伯也来了。他的须发和银一样白,可是精神还很饱满。黄宝洛特地搬了一条凳子请他坐。“刘大伯,天这样冷,你老人家还是早点去睡吧!”黄宝洛对刘大伯客气地说。刘大伯摇摇头说:“听说你们

要种試驗高产田，这是千古未有的事，我听听也开开眼界呀。”原来黄宝洛新法种田的事，早在群众中傳开了。

人到齐了，黄宝洛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宣布开会，把丰产田的計劃向大家詳細的讲一遍。大部分社員都用好奇的眼光，瞧着社长，靜靜地听着，只有一小部分人唧唧咕咕地在交头接耳。他讲完就征求大家的意見。老农黄朱坦站起来，說：“我有意見。直播密植我也做过，密植不比稀植好，一季亩产想收上千斤都是难上难。”他剛說完，就被青年团员黄理寿駁倒了。黄理寿說：“你过去搞的直播和这个方案根本不一样，那时你犁得又淺，播得又稀，下肥又少，草长得比稻子高，当然达不到。”老农黄云玉也接着說：“你說一季亩产千斤稻都收不到，难道你把五二年宝洛与衣灿互助組比賽的事都忘記了嗎？那一年你也看到宝洛早稻亩产不是收到 909 斤，今年再加一把勁，亩产突破千斤关也并不是太难事。”黄珠坦被大家駁倒了，可是他还不服气說：“你們不要光讲得这样好，有本事敢不敢和我比一比，看誰谷子收得多。”林立开队的几个青年小伙子一听，都站起来說：

“好！就比賽吧，我們輸了送你十罇酒，让你喝个飽，赢了只要你承認自己保守。”黄朱坦又搖搖頭想了想說：“不比不比，社长在你那一边，你們要什么給什么，我要什么只怕沒处討，你們当然要贏我。”社长黄宝洛为了鼓励大家开展竞赛，馬上当众表示：凡是試驗田，尽管大胆干，只要社里有，有什么給什么，不管是誰的試驗田。群众听了，个个拍手叫好。最后，黄宝洛宣布：种試驗田的任务，交給林立开队来完成；还說他也亲自参加，不获成功，絕不收兵。

散会后，林立开叫全队队员留下来开会。他們队有五个党员八个团员。黄朱坦原来也在立开这个队，可是現在他却拉了些人

也到另一边商量，唱对台戏去了。

种試驗田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深翻，可是犁手黄云龙被拉到黄朱坦那边去了。黄宝洛找他来犁田，他犁几下就叫：犁深了牛拉不动。黄宝洛亲自接过犁尾来，果然有些困难，只犁十几步犁头就打破了。黄云龙笑着说：“看，凡事不能勉强，勉强了就会出问题。”黄宝洛在田里想了一会，便向立开要过把锄头来，把已经犁翻的土块打碎，扒到两边，露出下面的土层来，然后说：“我们一遍犁不深，多犁几遍，就能深翻，并且边扒土，边犁田，边施肥，你们看这样干好不好。”立开说：“行！只要能深翻增产，我们多花些工也没什么。只要决心硬，不怕地球翻不过来。”他们就这样完成了深翻一尺的任务。

下一个战斗就是积肥运动。不论河边或山口，到处都是积肥的人群。高产試驗田里肥堆如山，一共挑了两千多担又黑又松的河泥。

原来这块田离池河边有一里多路。过去一亩田最多用河泥四五百担，今年搞試驗田，为了改良土壤，他们出动了七架水车，连干三天三夜，要把这条河里的水全部俾干。不想干到第三天，眼看水要干了，却忽然下起三阵大雨，把已俾干的河水又装得满满的。这时有些人谑笑地说：“天养人，肥磊磊；人养人，只是骨。人算不如天算，你们还是不要幻想了吧！”可是队员们却坚强地回答说：风大雨大，不如我们劲头大，不挖出河泥不收兵。他们又排起队伍，冒着雨俾起水来，汗水雨水混在一起。又经过几天几夜苦战，终于把一段宽八丈深五六丈的河水俾干了。社员们不怕路滑人倒，一个个挑起河泥运到試驗田里去。就在队员们向河水争肥拼命苦战的时候，黄朱坦这边不惜成本地把一担担人粪挑到他自己的試驗田里。后来人们算了一下账：黄宝洛試驗田

里，每亩只花三十多元成本；而黄朱坦的試驗田里，一亩就要用了四十多元。

春耕开始了。山上野花开得十分嬌艷。田野里到处可以听到男女社員們愉快的歌声。犁手黄云龙，这次他又負起試驗田的蒔田任务。由于思想通了，这回蒔得特別用心。整片田地蒔得象猪油一样軟潤。黄宝洛和林立开两人就用耙板把土地整得和鏡子一样均匀。黄朱坦看到这种情况，暗地里也牵一条牛把自己的田又重新耙了一遍。

老农云玉叔接受了社长交給的育种催芽的任务。老人的責任感真是超过常人，他育种比撫育嬰兒还細心，天冷怕种籽受冻，就把种籽移在灶鍋旁，上面还盖上被棉袄，一夜起碼爬起来三四次，冷了加温，热了就潑些冷水。黄宝洛經常跑到他家里看看，見他这样，心里說不出的感激，特地买了香烟犒赏老人。到播种的那一天，云玉拿出催芽的种籽来，誰也不得不心服。种籽播下后，田間管理是重要的环节，特别是今年播种季节比过去提早了半个月，这时又有人議論，早播会烂秧。而黄宝洛早就預料到这一点，因此对秧苗撫育得格外小心，一天总得到田里看他五六遍。有个晚上，天冻得很，天上还下着点点的雪花，半夜里黄宝洛不放心，穿着棕衣拿着手电筒到試驗田里去看看，他剛到田边就发现有个人正蹲在田头干什么。“誰？”黄宝洛警惕地喊起来。“社长，是我。”黄宝洛一听声音就認得是云玉叔了。原来他也是怕种籽受冻特来灌水的。两人在田头又談論了一陣才一路回家。

当葱綠的秧苗露出了水面的时候，黄朱坦那一块丰产田才播下种籽。由于試驗田的秧苗长得好，打破了早播会烂秧的論調，大家无不心服黄宝洛的本領高。但这时从反对的方面又来一个新論調，說秧苗太密了，将来一定沒有好收成。黄宝洛、林立开等

并没有动搖，他們为了使秧苗长得更均匀，发动全队队员都下田去帮助整苗。这一天，黄朱坦也跟着下田去。在下田前，黄宝洛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整苗的方法。下田后，男女社员都一排一行细心地整苗，把密的地方拔起来，插到稀的地方去，把弱的去掉，把强的留下来。使秧苗长得格外整齐粗壮。这时只见黄朱坦手里拔了一大把秧苗一棵也不插，林立开便在后面喊叫：“朱坦！你为什么不把秧苗插下去呀！”黄朱坦说：“我不能见死不救。今天看到你的秧苗这样密，将来不烂死也会不出穗。那时不要说千斤，就是连四五百斤也收不到手！依我看拔掉一部分还可救一救。”立开说他总是不听，黄宝洛便叫大家停工休息一会。大家一上田埂，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黄朱坦理直气壮地说：“秧插太密，一定会死！”青年团员黄宝登马上火起来说：“好好的秧，你怎么知道会死呢？”黄朱坦不屑地看了宝登一眼：“你怎么知道种田呢？我对你讲我去年也做过直播，半月密半月稀，密的倒伏了，稀的没倒伏，结果稀的比密的多收百多斤。你看密好还是稀好？”这时老农黄云玉插进来说：“你能瞒得了宝登，可瞒不了我。去年你那一丘直播，每亩只施六十担河泥，二十担人粪作基肥，肥料不足，而且只犁三、四寸深，当然密植不好。可是今年情况不同，今年肥料下得足，又是翻得深，眼前庄稼象兰花一样，拔掉高产从哪里来？”这些话说得黄朱坦一句也答不上了。林立开接过来说：“我们不是已经订过合同，各按各的计划干，夏收见高低吗？怎么你又来阻挠我们的计划呢？”黄朱坦说：“谁来阻挠你们？你们要知道这些田都是向社里包产的，减了产全队都得赔，那时免不了大家要受累。”这一句话引起一小部分人顾虑起来，有的也附和着说：“是呀！种田还是拿稳一些好。我们还是多拔掉一些吧。”黄宝洛看到这种情况，便

立即向大家宣布說：“我們這一丘高产試驗田，目的不是增產一兩成問題，而是要增產一二倍的問題，如果不大膽進行技術革新，按老規矩種田，千斤稻子從那裏來？今天如果同意把好苗拔掉許多，就是同意放棄高產田的試驗。我們絕不能這樣做。萬一失敗了，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再說，一兩丘田也不至影響大家的生計；至於田要不要你們隊里賠產呢？社委會已經決定，凡是試驗田失敗了，由全社負責。”這一下隊員的膽子又壯起來了。

經過整理後的秧苗，顯得格外整齊，長得象蘭花一樣美麗。在一次田間檢查評比中，全社公認為“狀元田”。鄉黨委何書記、縣委馬書記和省委溫部長看了，無不滿口稱贊。而黃寶洛、林立開等，他們還不滿足。他們想盡了一切辦法加強田間管理，這時的關鍵問題，是如何使秧苗扎根深、稻秆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學習了海澄黎明社的經驗，創造了“淺水勤灌”，適當烤田的兩個法寶。淺水可以使稻莖不至被積水浸得軟弱；烤了田，可以使稻根往下扎，根扎得深稻子就不易倒伏。這新辦法，使老農黃雲玉等看了也都拜伏。而黃朱坦那一丘田呢，水還是滿滿的不肯排，雖然稻子也長得不錯，可是莖部太軟，已發現傾斜倒伏現象了。黃寶洛請他到自己的試驗田來看看淺水勤灌和烤田的辦法。他感動的對社長說：“這辦法實在好，我連想幾天也沒想出來。”黃朱坦回去後，也照樣的干起來，才挽回了他那塊豐產田的早期倒伏的危險。

有一天下午，黃寶洛、林立開正在研究工作，兩個年青的小姑娘跑進來——一個是林立開的小妹妹，一個是姑娘黃玉英，她倆一進來，就向社長說：“社長，不好了，我們豐產田發現了小飛蟲，有的葉子都被吃白了，據黃朱坦說是太密了所以會上蠟。”

黃寶洛一聽，馬上站起來對立開說：“我們到田里去看看。”他們一到那里，就見有幾個農民在那里紛紛議論，見到黃寶洛、林立開來了，就朝社長迎面走來，說：“社長田里蟲很多，快來想辦法呀。”黃寶洛等下到田里細心地檢查一遍，然後說：“沒關係，這是浮塵子，剛開始，容易撲滅。”大家見社長說有辦法，心平靜下來了。

為了撲滅蟲害，林婉貞、黃玉英等按照社長的指示組織了一批婦女上山採龍舌蘭，晚上就動手切的切，榨的榨，把龍舌蘭榨出液汁來，然後同石灰水攪拌在一起，再加上水，又配上六六六粉製成治浮塵子的土農藥。屋子里七手八腳，好像工廠一樣。到半夜時，一共配制了十幾桶。第二天清早，社長就親自帶領一批青年男女社員，帶上噴霧器，分片圍剿害蟲。黃寶洛這幾天身體有些不舒服，昨晚又熬了一夜，頭有些暈。他為了撲滅害蟲，不肯休息，仍堅持下田去；但剛噴射一圈，腦子里頓覺天旋地轉，眼里冒金星。他勉強地走上田埂，一不小心，便不由自主地撲倒在田埂上了。林立開看見社長倒下去，連忙丟了噴霧器趕過來，一面喊他妹妹，幫忙把社長扶起來。過了會，社長醒來，他看到大家正手忙腳亂，便安慰大家說：“不要心慌，沒問題，歇一歇就好了。”說着就打發各人繼續除蟲，自己還想站起來繼續干，可是林立開等無論怎樣也不許他再干。他只好由林立開兄妹攙扶着回來了。他雖然病在家里，心還在田間，第二天一早又下田去檢查藥效。他見一只只浮塵子早死得一干二淨，不覺心里高興了。

到了五月端午節，試驗田的稻子已出齊穗子，穗穗長得又長又大，迎風吹動真象一片汪洋谷海。來參觀的人群絡繹不絕，無不滿口稱贊。黃寶洛、林立開等對着自己親手栽培的稻子，也愈

看愈爱，一天总得看它二三遍。有段时间，黄宝洛在县里开会，总是记挂着自己家里的试验田，放不下心，一连好几次打电话回来，问长问短。

一个下午，天上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下了一场大雨。这可把在县里开会的黄宝洛急坏了，他连打几次电话都不通，想冒雨回来，可是会又没有开完，到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十点钟了。他不管天多黑，路多滑，马上连夜赶回来。还没到家，就先到田里摸摸稻子。稻子仍然是竖立着，不过硕大的稻穗带着雨点略有些倾斜。再摸田里的水，早就排干了。他心想这一定是立开等人干的。这小子真不错啊！回到家里，他身上的衣服早已淋湿了。他的妻子告诉他：“今天下了一场大雨，黄米坦的丰产田倒了一半，我们的试验田还好，没有什么问题。”黄宝洛忧愁地说：“眼下没问题，可是现在穗子一天天沉重下去，只怕稻秆经不起，迟早还会倒。”他妻子说：“是呀；今天晚上我到店铺去买东西，也听人家在谈论这事，说什么你想盖仓房，只怕盖了草房！”这一夜，黄宝洛又深思了一夜。还好，第二天天气转晴，烈日晒干了雨点，穗子又竖立起来。这天晚上，黄宝洛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林立开、黄云玉、黄依淡和楊仁用等十几位男女社员。这时大家心里都很欢喜，都为今天天气转好而高兴，不少人存在麻痹大意的思想，以为今后丰收在望了。黄宝洛指出说：

“现在离收割时间还有很长，稻穗一天天的沉重，如不想办法预防，还有倒伏的危险。”接着又着重指出：“这一段是最艰巨的阶段，正象保守派所说的：这是我们要盖仓房还是盖草房的斗争。希望大家都想想办法，防止稻子倒伏。”这话象警钟一样，大家的头脑被敲清醒了。怎么办呢？沉寂了一会，没人发言，结果还是林立开打头炮。他拍着桌子说：“我们总不能让稻子倒下

去，也不能让保守派笑我们无能！社长，我想用竹竿把稻子围起来好吗？”黄云玉笑着说：“你真是神仙讲天话，那里去拿这样多的竿子，再说稻子那样密，人怎样走进去？”黄宝洛沉思了一会，说：“立开提的也算是一个办法。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再提。”他们要求一人献一计，结果真是人多计多，总共提了十几条办法。经过讨论，同意了两条办法：第一是用竹竿搭架；第二是田旁挖沟排水烤田。第二天清早，黄宝洛、林立开发动社员献竹竿。林婉贞、黄玉英等姑娘发动妇女搓草绳。这个办法传出后，群众都觉得奇怪，黄朱坦讥笑说：“还是在田边筑墙来得保险！”革新派丝毫没有动摇，打着一千多条竹竿，到田里小心翼翼地从田沟里，背着风向用竹竿搭起架子。整整花了两天功夫，把田里扎得和天罗地网一样，吓得风神雨怪也无能为力了。群众称赞说：“真是立开有干劲，宝洛办法多，敢想又敢干，干劲翻翻天，吓坏保守派，低头拜下风。”

稻子一天天灌浆结实，穗粒饱满，黄澄澄的象黄豆般沉重地下垂。从远处望去，只见稻穗不见稻叶，真是一片金黄。小姑娘林婉贞数一穗稻子，足足有一百二十八粒，乐得惊叫起来：“玉英，你来看这一穗稻王吧！”玉英跑来一看，也喜笑叫好。一会，玉英发现旁边还有一穗更长的稻子，便拉了婉贞一把说：

“那一穗比这一穗更多呢！”真的，这一穗足有二百多粒，大家估计亩产可收千斤。林立开生产队全体社员无不兴高采烈地准备收刈的农具，把镰刀磨得快快的，谷籬的绳子也换了全新的，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收刈的那个日子早些到来。

谁想还不到预定的收刈日期，六月十五日清晨，广播机里就播出台风的警报，全体队员马上开个紧急会议，决定提前收刈，立即抢收丰产田，不让丰产田损失一粒谷子。过了中午十一

点鐘，全社抽出了四十个全劳力和几十个妇女参加刈稻；十三个男女社員負責打谷子。黄宝洛亲自带动社員搶收搶刈，指揮大家排了队，一人四行。男女社員个个如下山猛虎一样，开了镰，只听见一片刷刷刷的声响。老农黄云玉刈了一把，用镰刀掂一掂，足有二、三斤重。黄朱坦今天也来参加收刈。調皮的姑娘林婉貞和他是并排，便問朱坦：“五叔，你看能收多少呀？”“好好好！真的想不到会有这样好收成！这片起碼有千斤呀。”黄朱坦慢吞吞地回答說。一伙小伙子听了都叫起来：“今天天变了，老五思想也通了。”林立开也打趣着說：“老五，明天給你十罐酒吃得完嗎？”你一言我一語，說得朱坦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这时风吹得紧，烏云如飞箭般扑来，黄宝洛叫大家不要只顧說笑，赶紧收刈。这时，正在城門帮助收刈的省县领导同志都聞到喜訊赶来“道喜”，連連称贊好稻子，問黄宝洛这个奇迹是怎样做出来的。黄宝洛干脆地回答說：“靠党的正确领导，和社員的干劲得来的丰收。”

緊張的夏收結束了，亩产平均收了一千三百多斤，不但高产試驗田計劃得到实现，并且有百亩的早稻亩产平均千斤左右，这个鉄的事实，不得不使稀植派的口服心服了。

（林仲鏗）

刻苦鑽研的人

八月，公社一建立，县委馬書記和乡党委何書記就亲自来到了农具厂，帮助成立滾珠軸承研究小組，提出了：我們要大搞技术改革，为滾珠軸承化——农具半机械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农业生产革命的号角，振奋人心的战斗的号召。因为当时农具厂設備簡陋、职工思想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厂的领导上，首先作出一項决定，以試制滾珠軸承为題目，全厂职工开展一次大辯論。

馬上就要試制滾珠軸承？这題目多新鮮呀，大家辯論得真是熱鬧极了。有的說：“什么是滾珠，这家伙我还没有見面过哩，怎么就叫我做起滾珠軸承來了。”有的說：“沒見面怕什么，摸一摸就成朋友了嘛。”敢做的和不敢做的两种意見交鋒了，特别是五金車間，爭論得最劇烈。在一次会上，老技工吳可玉摆着老資格說：“不要說我們生产不出来，就連上海大机器厂造出来滾珠軸承也赶不上进口貨，我們就說能造出来，也保証不能用。”一些思想保守的人也附和地說：“靠我們那两个老爷式的手搖鉗床，怎么行呀！”这么一来，可激怒了一个青年工人李依德，他一骨碌站起来，气呼呼地說：“我看能行！滾珠軸承反正是人做的！”一講完又很快地坐下来。李依德今年才十九岁，还不大习惯在大場合講話。他从脚踏車修理店調米不久，摸过滾珠，脚踏車裝上了滾珠軸承，騎上去又輕又快，这使他非常喜爱这个东西。这时，会上許多人也都紛紛地說，我們要听党的話，要敢想敢

做，不造这东西，怎么能够实现农具半机械化呀？

这天晚上，厂长林文欽組織了李依德、林依夏等七个人成立技术小组。大家都围在厂长的临时办公室里，公社工交部部长梁敬春也在场领导大家讨论，把党委的指示和希望对大家说了，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这七个人谁也没有造过滚珠，他们第一步就研究造打滚珠的珠宅；大家说得很投机，越讨论精神越兴奋，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间十点多了，谁都没有想回到宿舍去睡，都说：“说干就干吧，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这样，几个人就七脚八手地在铁炉中生起火来烧铁打珠宅；李依德专门负责在珠宅上钻珠孔。没多久一副珠宅造好了。接着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来试打滚珠，李依德拣一粒原铁放在珠宅中，抓起铁锤就打，锤了十几下，揭开珠宅一看，打出来的不是圆珠子，而是个椭圆形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大家笑起来：“怎么打滚珠会打出橄榄来了！”李依德说：“不忙，不忙。”他忍着性子又连续打了几次，打出来仍然都是“橄榄”。这时，李依德的头上冒出汗珠来了，他焦急而惊奇的眼睛盯住珠宅，寻求毛病在那里，一边又抓起铁锤想再打看。林依夏心急了，推开依德：“你个子太小，没力气，让我大力士干一下如何？”李依德说：“不要，我再打看。”林依夏不由分说把铁锤抢过来，举起袜子大的臂膀，一口气锤了十几下，锤得地都震动起来，停下一看，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打扁了。时间已过十二点了，七个人都不甘心，还是干下去，每个人都打一粒，可是打出来不是尖形就是扁形。弄得大家又气又好笑。厂长林文欽走来安慰大家说：“你们不要灰心，今天晚上干不成，明天晚上再干，最后总会成功的！现在时间已经迟了，为了照顾身体，不准再干！”大家看厂长态度很坚决，不敢违反，都回宿舍去了。李依德好象被车间粘住了，手里

拿一副珠宅边走边看。林厂长拍一拍依德的肩，笑着说：“回家去吧。”接着又亲切地说：“依德，这事情全厂最熟悉的算是你啊，为我们公社，你应该多动脑筋找窍门，出色地干它一下。”依德点点头说：“我知道。”

夜深了，李依德回到家里，点上煤油灯，见他的哥哥李依明正呼呼地睡着。他伸手把李依明推醒问道：“依哥，这个，这个为什么打不圆啊？”说着把珠宅递给李依明，李依明翻来复去的摸着珠宅，也摸不出头绪，急着喊：“把煤油灯拿近来。”依德手上拿油灯，嘴上囉哩囉嗦说：“不是打成橄欖形，就是打成腰鼓形……”李依明看了好久，也说不出道理，双手一伸，打个呵欠，扫兴地说：“去睡，去睡，明天再干。”李依德虽然不敢再麻烦哥哥，但他那里肯去睡呢，还是拿着珠宅在灯下好象玩珠宝一样反复地琢磨。李依明又叫道：“你该疯了吗？半夜三更还搞什么滚珠，赶快去睡！”李依德只得吹灯，上床躺着，可是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觉，他第一次经历了这样不平静的夜晚。后来，他又抓把手电筒悄悄地爬起来，在他哥哥修理自行车的抽屉里找到一颗滚珠，这是多圆滑的家伙呵！自己真能造出这样子的滚珠吗，想着心里有点怕了。这时他耳朵里好象又响起厂长的声音：

“你们不要灰心……应该多动脑筋找窍门……”突然，他记起以前在自己店里做钥锁模型的事，赶紧开门到田边抓一把泥土，象小孩塑佛一样，捻成一团，用刀分成两片土型，把滚珠放在中间，慢慢地合拢，然后再分开来，与铁的珠宅一比较，找到了毛病：发现铁珠宅中间圆孔太深了些。他跳起来喊道：“找到了，找到了！”这一来，把哥哥吓醒了。哥哥摇摇头问：“老天爷，你没有去睡呀！”“哥哥，找到了！”李依德说着拿珠宅给哥哥看。这时，村里公鸡已喔喔地在啼了。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李依德跑到廠里，廠里門還閉着，靜悄悄的。他也顧不得作息制度，從廚房打門進去，飛似的跑上樓，闖進廠長的寢室，看見林廠長還在燈下聚精會神地看書，他一怔，忍不住喊道：“廠長，我研究出來了！”說着把兩套土鉄珠宅送給廠長看，并把昨夜的研究經過說了一遍。這時依夏等幾個人聽到這消息，也都披衣跑來。廠長握着依德的手說：“還是你有辦法，我剛才把這本講滾珠製造法的書看了又看，也看不出道理來。走，去試驗！”

李依德和林依夏幾個人又重新打了一套珠宅模型。廠長對依德說：“現在你要慢一點鉗，不要再鉗過深了。”依德拿起鉗，不知怎的，手有點發抖，鉗一下就拿起來看一次。依夏、依美幾個人在一旁壯着膽：“手拿‘浮’一點，沒關係，一定成功……，”李依德滿頭大汗，好半天才鉗好。但試打的結果，又不是想象的那樣容易，挖了好久才把一個珠子挖出來，一看又是一個“橄欖”。這“橄欖”一跳進李依德的眼簾，象炮彈爆炸一樣，把李依德的腦子“轟”昏了。但他沒有倒下去，馬上又定神下來。林廠長說：“我們要忍耐些，別太急躁。我來錘錘看”。錘出來的，也還是一個“橄欖”。和昨天晚上一樣，每個人都要打一個，打出來的不是“橄欖”就是“腰鼓”。每個人都拿一粒珠，在那里發呆。李依德蹲下來看珠宅，咬着牙說：“可能又鉗深了些，再做一套珠宅試試看怎麼樣？”廠長點頭贊成。新的一套珠宅又造出來了。廠長拿着珠宅說：“來，依德，我把住你鉗。”鉗着鉗着，啪噠一聲，洋鉗斷了。依德撿起洋鉗的頭，看了又看，感到多么可惜呀！無意間看一看鉗嘴，他吃驚不小，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定神一看，大喊一聲：“唉呀，原來這把洋鉗嘴不圓啊，你看！”廠長一看，果然是鉗嘴不圓，就鼓勵李依德

自己去做一把。沒多久，李依德就造成圓嘴的土鉗，他得意地自言自語：“現在才算圓的了，以前我以為洋鉗最標準，沒想到它不圓。”他謹慎地把土鉗裝上去，繼續由廠長把住珠宅，李依德在上鉗，好容易才鉗好。接着，裝上一粒原鐵就打，這一次沒打几下，發現下面原鐵會轉動，手指稍稍一轉，原鐵也跟着轉動起來，又象打又象磨，大家越看越高興。十多分鐘時間，一顆圓滾滾的滾珠滾出來了！廠長情不自禁的笑得起來說：“我們成功了！”全廠頓時歡騰起來，許多人都喊道：“滾珠造出來了！趕快向黨委會報喜吶！”

其實，滾珠造成了，僅僅是制造滾珠軸承的開始，珠套還沒有搞好。廠的領導就派李依德到省農具試驗廠去學習，回來以後，李依德的鉗勁更足了，他和林依夏以及鍛工車間的老師傅們合作，只花一天的時間制成了第一個珠套。

這時廠里沒有車床，如果用手工來鉗珠套的陰痕，一個人一天還鉗不上兩三套，而且規格也不一致。廠長又動員大家用土辦法做土車床。木工車間共產黨員歐水官听了廠長的話，就對木工們說：“打滾珠、造珠套找到了竅門，現在做車床，就看看我們吧！”當天他就和廠長商量，跑到福州城內去拜訪旋玉器的工人們，看他們坐着能把玉器旋得又巧又亮，回來後便根據這個原理，創制了手搖的土車床，一個人搖，一個人車，一天可擣它十幾套。

整個制造滾珠軸承的工具解決了，廠里即設立滾珠車間，大鉗滾珠，大擣珠套，一天可制成三四十套成品。這時十八九歲的李依德，不但成為很好的車工和滾珠軸承的裝配工，而且成為小師傅了。他每天都是第一個來到車間，來配裝珠套，鑒定質量。

同時，鄉黨委又調來一百多個人投入滾珠軸承的生產。這些

人有的是种田的，有的是打銅打鍋的，有的修脚踏車的、修鐘表的，有的做豆腐的……今天全要变成制造滾珠軸承的工人。附近几里內的許多农民都主动地跑来工厂报名，要求参加学习制造滾珠，連六十八岁的江治嫂拿到公社的介紹信也跑到工厂里来了。

这一天晚上，农具厂召开欢迎农民参加工业生产的晚会开始了，李依德第一个上台介紹自己在党的領導和支持下打珠制套的經過；他今天晚上胆子大了，講話声音很响亮，說得大家笑逐顏开，掌声不断地淹沒了他的話声。青年农民郑茂直也代表新工人上台講話，保証好好学习，在最短時間內，当个熟練的工人。

新、老工人在一起，很快地就結成新的朋友和师徒，他們为了共同的愿望，如饑如渴地学习工业生产技术。經過七天的苦战，出產了滾珠軸承一千套。同时又創造和改进很多工具和操作办法。不久，全厂又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的高潮。裁料，打珠，打外环，裝配……日夜苦战。在城山的面前，响起了一陣急鏗重打的撞击声，和着八月之夜的田野的虫声，奏出了夜的暢想曲，他們为农业半机械化在进行着紧张而愉快的战斗！

这种战斗的声息，很快地傳遍了全省。

八月十六日，这一天早晨，太阳紅通通地从烏龙江东面升起来，农具厂門口挂紅結綠，橫匾上的紅幕条写着：“向农具半机械化进军”，厂門口的馬路上已經排滿了板車、打谷机、切薯机、水輪机等等，象受檢閱的队伍一样，拉成长长的一列，在靠东的池塘边还安裝两架水車。这些农具一半是裝上滾珠軸承，一半沒有裝上。让全省各地来宾来鑒定一下那好那坏。公社副社长王茂玉一清早从家里出来，就在那里把各种农具表演一番，連連称贊：“有办法，裝上滾珠軸承足足輕了一半！”他热情地向工人們說：“你們好，为农业生产立下大功啊！”中午全省农具改革

現場會議，在城門召开了，各地代表分批觀摩，对城門农具厂的滾珠軸承，异口同声地稱贊着：質量已赶上安徽。在大会上，省工业廳奖励給农具厂一台中型电动車床。从此农具厂迈步朝着土洋相結合的道路前进，它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完成了党交給它制造五千套滾珠軸承的任务，使全社所有的水車、运输板車都装上了滾珠軸承。

(林山)

三 攻 三 叉 港

螺洲乡有条河，叫三叉港。

这条一里多长、二丈多宽的小河通向烏龙江。潮漲了，江水翻着細浪，漲滿了河床；潮退了，只有河中間还有些浊水，靠岸的地方，尽是黑油油的河泥。庄稼汉看了就想：要是能把这些河泥用作柑桔树的肥料，該多好啊！但是，三叉港每天总是潮来汐去，能有多少時間让你去挖泥呢。

一九五五年，村里成立了初級社，党和政府号召多积肥料，增加生产。于是大家自然而然地談起三叉港来了。当时，店前和吳厝两个初級社建議合作，把通向烏龙江的港口堵住，向三叉港要肥料。天喜和依靡他們几个人最积极，馬上行动起来，整天找破船拆木板；又扛来了五六条大石板，准备做拦河土坝的基石，东奔西跑，忙个不停。但是社干部还是有顧虑：一来这样大的工程沒搞过，万一搞不成，浪费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呢？二来冬耕冬种的任务也很紧，不可能把全部的劳动力都調来支援。后来决定抽調三十多个社員試試看。

严冬腊月，刺骨的北風呼呼地叫着，有时还夾杂着小雨。天喜、依靡、茂玉他們几个貧农，带头起早摸黑，穿着单衣、短褲，站在冰冷的河泥里鋪石板、搬木头、挑土、砌拦河坝，虽然

北風吹在身上冷得刺骨，但他們心里都是熱烘烘的。參加攔河的有些中農可不同了，他們計較工分，干起活來馬馬虎虎。天喜他們頭一回搞這樣的工程，沒有經驗，攔河壩剛築起來，就發動大家挖河泥，沒想到壩底不扎實，几陣海潮一沖，堤壩漏水了。天喜、依馨、茂玉趕快丟下土箕，拿過鐵鍬，忙着修補；可是，潮水越漲越高，几个浪頭猛撲過來，河壩塌了。挑土的人們一看，丟下扁担、土箕，拔腿跑上岸去。原來那些信心不強的人說話了：“我早知道，要能堵住潮水，我就爬回家去。”天喜他們看看汹涌的潮水，沒有完成任務，很難過。

攔河壩塌了，但是也挑回了二百多担河泥。這河泥作用可大啦，把它用作柑桔樹的肥料，秋后，花開得密密層層，果實累累，比去年增產百分之三十。社員們都說：“三叉港的河泥真是無價寶，就是看得到拿不到。”

二

一九五六年底，高級化以後，地富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紛紛造謠破壞，說參加合作社不能增產，煽動中農退社。在爭論中，貧農舉出攔河積肥使大量柑桔林增產百分之三十的例子，駁倒了他們的謬論。通過這場鬥爭，天喜他們越想越覺得應該馬上把三叉港的河泥全挖上來；社里的幹部也堅決支持。於是他們總結了一九五五年的教訓，準備再度進攻三叉港。

這次的准备工作比前次充分多了：河壩上搞了一個水閘，浪濤沖擊最猛的地方加了木板，勞動力增加了兩倍，而且絕大部分是貧雇農和積極分子，勞動熱情很高。攔河壩重新築起來了，它經受住了一天浪濤的沖擊，到晚上，江水才沖進來。

這次挖回河泥五千多担，全部給三叉港兩岸的柑桔林作肥

料。按理說，這年是柑桔的小年，但是因為增加了肥料，卻變成了豐收的大年。起先鬧退社的人，現在再不叫退社了。天喜、依磨他們對這次的勝利，並不感到滿足。他們認為在和潮水爭分秒的戰鬥中，人力還是太少了，加上零零落落地出工、吃飯，浪費了很多時間。

三

一九五八年八月，城門人民公社成立了。螺洲加入了城門公社。今年春天，省委號召大搞積肥運動，爭取夏季大豐收。螺洲大隊的社員們行動起來了，挑戰呀，寫決心書呀，鬧得熱火朝天。他們提出了響亮的口號：“不徹底征服三叉港決不罷休！”

但是，根據過去經驗，要征服三叉港需要大量木板，現在市面上木材供應很緊張，怎麼辦呢？大隊長依竹和黨支書桂官到處找群眾商量，研究解決辦法。他們找到了依高。依高過去養過魚，跟河水池塘打了十多年交道，對修堤攔水滿有經驗。他建議說：“河泥里加些稻草、外面加木板，筑寬一點，也許能行。”

第二天，半夜里，到處響起鑼聲。人們成群結隊涌向三叉港。一場緊張的戰鬥開始了。天喜、依磨帶領着筑堤專業隊，脫下棉衣，首先下河去了。潮雖退了，稀泥一直淹沒到他們的腰部，冷風一吹，個個凍得牙齒格格發響，但他們卻越干越有勁。挑運河泥的社員們看了，挑着土箕跑得更快。

攔河堤又高又寬，超過了烏龍江的最高水位。不馴服的浪潮在它身旁吼叫着，但始終沒法越過這堵“鐵壁銅牆”。

從家務中解放出來的婦女們，也來參加挑河泥了。有個名叫愛英的婦女，過去沒有干過重活，身體也不很好，這次卻向身強力壯的老鼠仔發出挑戰。人家笑她不是老鼠仔的對手，她說：

“今天輸了不要緊，总有一天會趕上的。”依福嫂第一次干這樣重的活，挑着土箕一顫一顫，吃力得很，大家看了不禁哈哈大笑。依福嫂紅着臉，放下土箕大聲地說：“笑什麼，別把人家看死了。”小美玉跟她解釋：“人家笑是高興，不是挖苦你，何必生氣呢？”依福嫂也笑了：“小丫頭，我也沒生氣呀，我心里高興跟你們打趣的。”

中午，勞動大軍在河邊吃過食堂送來的飯後，又開始了緊張的勞動。干了一整天，河堤仍然屹立在三叉港口，兩岸的河泥堆積如山。天黑了，火箭隊的隊員們還不肯收工，要挑燈夜戰呢！

深夜，北風呼嘯着。依竹和依慶睡不着，他倆想到今晚還有一次大潮，怕河堤不幸，便出去檢查河堤。他們站在岸邊，見潮水漲滿了，可是水位還很低。依慶詫异地問：“怎麼今晚潮水變小了？”依竹用手電照了又照，也驚奇地叫道：“那是潮變小了，明明是河堤比我們築的時候增高了二尺多，真怪！”原來，火箭隊隊員和幾個幹部，在收工以後，還把河堤加高了，準備明天把所有的河泥全部挖光。想到社員們沖天的干劲，他倆會心的微笑了。

兩天以後，螺洲大隊的隊員們徹底征服了三叉港，挖了五十幾萬担河泥，為夏季大豐收打好了第一仗。社員們都感到這是人民公社帶來的好處。有個社員寫了一首詩：

人民公社力量大，
兩天挖空三叉港；
河泥堆上南天門，
眾神錯把天梯認。

(劉 簡)

荒山变了样

我們这里有一座城山。过去这山是很可怕的。一条弯弯的小路通到山顶，路旁都是野草乱石，树木上还挂着许多死猫，摇摇晃晃的，又臭又难看。

离山路不远的荒丘上，有一座伽蓝庙。不时都有乞丐、难民饿死在庙里。拆庙时，在石墙隙里，还发现一小罐铜元和三百颗子弹。也许，这里曾经是乞丐们的“秘密金库”，是小土匪临时弹药补给站。

在伽蓝庙的上首，是麻疯人墳塋和“死婴堆”。附近还有什么狐狸洞。旧社会迷信传说：这里时常有迷魂鬼出现，讲得活灵活现。因此，在山背里，有一座“威灵显赫”的大王宫，人们供奉大王来管这骇人的鬼怪。

但是，人们还不能放心。每到天黑或是狂风恶雨的时候，就无人敢走过这里。

这就是过去的城山。

解放后，有人说城山以后会变成仓前山（注）；可是住在城山的有些人不相信。有位社员说：如果真有这一天，我也看不见。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乡里搞“五化”，为了迎接奶牛入社，敖峯支部决定在城山建工厂和畜牧场，要在几日内先将大王宫改建成大牛舍。副社长叶国良去螺洲县建筑社接洽，建筑社派了六

位工程技朮員來到城山看場地，前後測了三次，估價要數千元，時間至少需要九日才能完工。

支部考慮時間緊迫，經費也沒有這樣多。怎樣才能做到“多快好省”呢？最後決定還是自己干！組織了土木建築專業隊，由我當隊長，帶領林有遷、林知棋等十幾個人，大鬧城山。

我們大踏步闖進“大王宮”。大王還坐在宮里。在舊社會里，那些迷信的人都說，這大王很威靈，沒人敢在宮前打盹；說什麼以前有一個補鑼工人在大王宮過一夜，第二天走到中途就死了。說得真嚇人。這次我們來時，有的人還有些胆怯。我喊道：“‘大王’這次有七八十頭乳牛入社，要住你這裡。”說罷，大家都哈哈地笑將起來。

搬走了大王，我們大興土木工程。可是工具實在少，連簡單的瓦刀、灰犁也缺乏，七、八人合用一把舊鐵錘。但我們干得頂有勁。砌石基、填地面、造柵架、拌泥漿、刷灰水、修梁換柱……大戰三晝夜，把一座可怕的大王宮改建成了整齊的牛舍。

接着，我們就在山腰開辟畜牧場，建新豬舍。支部抽調男女青年數十人，擴大了土木建築專業隊。

但是我們隊里沒有人會技朮設計。要建什麼樣子的宿舍讓我們的大、小豬住得舒服，真是茫無頭緒。這時，我就和土技朮員一齊去省農場毛豬舍訪問，量地、畫樣子，找毛豬場負責人談經驗。訪問回來就馬上測地建舍。

這時，有些保守的人就東一句、西一句說了：在這死人成堆的地方怎麼能建設得好，這簡直是做死人事。有的分明知道我們只會種田和織布，沒有這門技朮，偏偏稱我“工程師”。我听了又氣又好笑。你笑我不是“工程師”，我便真的做做工程師給你看。我和隊員們約定，不管怎樣，苦戰半个月，蓋成規模相當可

規的猪舍，摆在这过去认为可怕的地方，让保守派睁开眼睛看看。

說实在話，我当时連什么叫“平方”、“立方”都弄不清楚。不懂就学！我跟家齐、知棋、守焰几个人，請实验小学教师教算术，学了几个通宵，学了一些简单計算方法，便着手設計。

这几天我們都在整地基，挖出不少的棺材骸骨，专由一个师傅收殮，整地的队员越干越有劲，进度极快，挖出的棺材特别多，这位师傅对付不了了。有人开玩笑对在旁边做粗工的妇女說：“现在妇女思想解放了，敢不敢来捡骸骨？”姑娘林雪华冲口說：“我来！”她真干脆，动手就干，还說：“活人都不怕，何况死人！”大家听了又好笑又感动，七手八足一下子把基地上的骸骨清理完了。

很快，一座象样的猪舍架子搭了起来。这天正忙着上屋顶鋪瓦。屋顶上人手忙不过来，男人又不够。这里妇女从来没有上过屋顶，过去大家都认为妇女上屋顶是最不吉利的事。这老例趁这次也给打倒吧。我笑笑对妇女們喊：“你們上去帮个忙吧！”东塔春官老婆名叫依芳姐应一声：“我来，”“胡都”一下便上屋顶了。接着又有两个妇女也上去了。有些上年紀的过路人都摇头道：“不得了，諸娘上天，这房子不会塌，也会崩。”她們听了，低声罵句：“老封建，”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我們就全靠这批男女队员，連續建了一座加工厂，一座猪飼料加工場、一座猪分娩室和母猪舍等，一共十四間，外加一座奶牛場。数百只黑、白猪睡在猪舍里，“希胡希胡”一下一下呼吸着，一天天肥壮起来。奶牛也整整齐齐的排列在这美丽的牛舍里，每天都搖着尾巴听广播机唱歌，增加乳量。

公社成立后，这座城山越变越可爱了。小山路变成大車路，在伽藍庙上下地方，也盖起了加工厂、罐頭厂、农具厂等。馬达

呼隆隆地响，山上山下一片欢笑声，人来人往真热闹。到晚上，月亮照着高高的烟囱，各车间整齐的窗口射出明亮的灯光，不时还闪着电焊的火花。看着真是惹人爱。我们还知道：在公社的建设规划里，确定把城山地区建成轻工业区。柑桔桃李加工厂、制糖厂、搪瓷厂、家具厂、综合日用品制造厂、制鞋厂等都要建在这里。规模都非常可观。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望将来，我们城山人那一个不是感动得流眼泪呵！

几个月来，来参观的人天天不绝，各乡各县许多代表和省、中央一些首长都到我们这里来参观，看了都叫好。我心中非常感谢党的领导和支持。我们城山人看见这好景象，就编了一首歌来唱：

想城山，说城山，
过去一个荒蕪山，
自从今年建厂场，
荒山变成仓前山。

（注）仓前山在福州市里。

（林伯欽）

拖 拉 机 来 了

我头一次“会见”拖拉机是在电影银幕上，它真象狮子一样在田里跑着，在它屁股后面，一块块黑油油的泥土从地底翻滚上来，使我不由自主地拍掌喝采起来。我心想：我们在什么时候也用拖拉机种田呀？有了这东西，不管是春耕还是夏收，只要它轰隆、轰隆几下，就全部解决问题。这样，我们不但能够抽出一部份劳力去搞副业，而且粮食产量还会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幸福。可是，这家伙脾气大，一块一块豆腐干大的田容它不下。想到这里，我真佩服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真英明，叫我们组织起来生产，把田地连成一大片一大片，原来也是为了这个。

有一次，我去开农业合作社会议，领导同志说，我们将来要用拖拉机耕田。我听得心里热呼呼的。说实话，我想念它，就好象想念我好久不见的老婆。在电影上看它，总是隔一层膜。什么时候我能亲眼看它在我們城門的田里跑呢，到底在一九五几年呢？人家都说会到来的，会到来的！可是我总希望它能快些到来。

一九五八年春天，閩侯县委在城門杜园村举行拖拉机现场观摩会。给我盼到了，我亲眼看到好几架紅丹丹的拖拉机整齐地停在草地上，它尾巴牵着的犁啦、耙啦，全是新的，象鏡一样地发光。那都是我們工人老大哥亲手造出来的。我非常高兴！我看到了我們国家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的工

人老大哥真是偉大。当时，我越看越高兴，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又爬上去坐坐。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一直舍不得离开它。我們真想把它帶一架回去。县委許書記看透了我們的心，他對我們說：“再过一些時間，你們就会有拖拉机。”我听了这句话，比討了老婆还高兴，回家后，一連几个晚上都在睡梦中叫起来：

“拖拉机来啦！拖拉机来啦！”社員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見到我就問：“拖拉机什么时候会到？”我每听到这样問，就肯定地回答他們說：“过几天就会到。”

說到来就到来。过了几天，乡党委書記對我說：“今年春耕，你們排下洋耕牛比較缺乏，明天农科所会开拖拉机来帮助你們。”当时，我高兴得要跳起来。党對我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呵！爱拖拉机的人不止我一个人，社員們听到这个消息，个个都乐得不成样子，当天晚上，我們連夜到水田里去鏟除田埂，直到半夜，还不肯回去。老农林逢春說：“我一想起拖拉机，不知怎的，老勁就特別大。”我村双目失明的老伯母，也摸着幫我們燒开水，她激动地說：“我明天也要去摸摸拖拉机是什么样的。”

第二天，真象正月十五看龙灯，太阳剛出山，男女老少，成群結队地从四面八方水田走来，跑呀嚷呀，一下子有上万人团团圍在水田的周圍，真是人山人海。这时，有几个老头来纏我。張依华伯伯焦急地問我：“怎么这样迟了还没有来？”我对他說：“依华伯，是我們起得早，不是他来得迟。”从四里远的連坂村来的七十一岁的刘施寿伯伯看着我說：“对呀！我听說今天拖机会来，昨天夜里醒来好几次，結果，第三次鸡叫我就起床了。”張依华叔叔也說：“我种了三四十年的田，从来都是破犁柴耙，肩膀做路。今天换用机器种田，当然会高兴得睡不着。”大家正热烈地談着，突然間，从农科所那一边的馬路上，傳來轟

隆、裏隆的馬達聲。一個耳尖的小孩大喊一聲：“拖拉機來啦！”就朝着聲音的方向拼命跑去；他一跑，所有的小孩也都跟着跑起來。這時，大人也裏地一聲都圍到馬路邊來。原來開來的不是拖拉機，是一架大型的軍車，大家見了哈哈大笑起來。中農林知干看着駛遠的軍車，對大家說：“拖拉機好是好，我就怕在我們水田里不能用，你們看！馬路這樣硬，汽車駛過去都有車輪印，拖拉機和汽車一樣，在這爛泥田里怎麼駛得動呢？”老犁手林加蘭也說：“用牛犁田，使用起來好掌握，拖拉機那樣大，田邊田角是不是能犁得到呢？”我說：“許書記說過，水田也可以用拖拉機，大家等下看看就曉得。”

我話剛說完，一架嶄嶄新的拖拉機就裏隆、裏隆地向我們開來。開拖拉機的青年一手扶着駕駛盤，一手舉得高高的，笑着向我們招呼。一大群小孩跟在拖拉機後面跑着，叫着。這時，全場的人都高興地圍上去，掌聲象打雷一樣地響起來，鞭炮比過年放的還多。雙目失明的老伯母，笑着對我們說：“在那裏，給我摸摸看。”我把她扶到拖拉機跟前，她摸摸車頭，又邁一步摸摸車輪，然後笑笑說：“和我做小孩時看見的汽車一模一樣，共產黨真有本事，汽車也可以用來種田。”許多老伯伯，老孀孀，還有青年人，也都這兒摸摸，那兒瞧瞧，看得直出神。

拖拉機下田了，大家都全神貫注地看着，總怕它陷到田里去。真怪，它若無其事地在爛泥田里一畝又一畝地爬去，爛泥在它的屁股後面好像噴泉一樣嘖嘖、嘖嘖地滾起來。有的人看得高興，褲腿也顧不得卷，就嘖嘖，嘖嘖地在水田里跟着它跑起來，沾得滿身滿臉都是泥漿。當時，我也高興地跑到田里去，用腳在這裡踩踩，那裏踏踏。真厲害，凡是在拖拉機犁過的地方，泥漿都有膝蓋深，我伏下去用手捏捏泥漿，那些泥漿真象豬油又滑又

粘。当拖拉机在田角转弯时，屁股后面的犁非常听话，乖乖地挨着田埂走。林加兰赶紧跑过去看看有多深，因为太紧张，猛不防两脚都陷到田里去，膝盖深的泥浆把他的脚粘得死死的，闹得全场大笑起来。大家都说，用牛犁田从来不会犁得这样深，这样均匀。

社员们亲眼看到拖拉机后，就更加想念它，连坂村六十七岁的老农王则银一见人也说：“拖拉机真行，一架能抵上二三十头水牛，政府如果能送一架给我们多好！”有的说：“看我们本领怎么样，放个水稻大卫星，说不定政府会给我们奖一辆拖拉机哩。”说得大家心里都痒痒的。

七月十五日早晨，我们全乡的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的衣服，欢欢喜喜地去参加庆祝早稻丰收的大会。那一天，连坂村的社员不用干部通知，百分之百都来参加大会。有些妇女，干部动员她留下来看家，她死也不肯，她说：“我今天打扮的这样好，就是要去看开拖拉机回来的。”从来不讲究打扮的王则银伯伯，也穿起了娶媳妇时穿的新衣服，好几年没有刮过的鬍子，那天也刮得干干净净。他笑嘻嘻地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当许副省长在主席台上宣布奖给我们一架拖拉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那时，我高兴得喊出声来……；我看到王则银伯伯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给奖时，我们都紧紧地围着拖拉机鼓掌，放鞭炮。那天的掌声和鞭炮声，比前一次更响，更热烈。在人群中，王则银伯伯走到拖拉机旁边，用手拼命地摸着，然后，激动地对大家说：“今天，我终于得到了盼望许久的拖拉机，我感激党，我永远不会忘记党的恩情。”

八月间，我们一办起人民公社，就买来了四架拖拉机，我们一共有五架拖拉机啦！现在在我们村子的东、西、南、北，都可

以聽見拖拉机的嘍嘍的聲音，听去好象在唱：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們公社不久就会普遍地使用拖拉机种田。

（林銜官口述 楊鐘溪整理）

筑 路

“林更回来了沒有？”

在寂靜的夜里，突然送来了党支部書記唐如宝低沉而帶着沙哑的声音。这晚党支部开了一晚会，討論如何开展五化运动，各生产队和党、团等小组都分配了任务，其中有一項是分配城南团小组修筑一条公路。为了搶时间，書記連夜赶到城南通知团小组长林更。

“什么事，支书？”馬上从屋里奔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留着短短的头发，端正的五官上，特別显露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简单爽快的性格，使他抛弃了那些不必要的客套，他既不說“請坐”，也不嚷“喝茶”，迎面就問“要干什么？”

“党支部决定分配你那团小组修一条公路。”

“哪一条？”

“从区前到閩侯一中那一段。”

“哪里派来的技术員？”林更想，筑公路当然要派技术員的。他还想問問什么时候动工，那知支书“噗哧”地笑了，捶了一下他的手臂，故意拉长了声音說：

“呵哈：你要技术員？什么也沒有，就是要你們白手起家，要修一条至少板車可通过的路。五天完成。怎样，团小组长？”

林更瞪大了眼睛，但“团小组长”这句话使他明白了一切。党交給团的任务沒有完不成的理由，青年人就应该敢作敢为。

“好，我去找谷森、家海商量。”

支书早摸透了他的脾性，也不再多說，走了。任务就这样接受下来了。林更急急忙忙地奔出門，去找团员谷森、家海，把任务告訴了他們。他倆开口也是問有沒有技术員，林更笑笑把支部书记对他說的話說了說。大家沒在这問題上多說什么，就合計如何开工的事。

从区前到閩侯一中原是沒有路的，过去人們如果要从閩侯一中到区前，或由区前到閩侯一中，总得繞过魚池，拐弯經過費厝林，再穿过山鼻小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条又窄又不平的靠脚走出来的小路，一到雨天不知滑倒过多少人。要从这条路上挑粪、运粮更是艰难。現在在这里筑条公路，再連貫城門与閩侯一中大路，就可組成公路网了。

几个团员一边想着公路的起、終点，一边討論着要用什么东西代替仪器进行測量。

“可以用插紅旗办法定路綫。”家海同意谷森这个意見；提出了一个难处：“沒有水平鏡怎么办？”

“有了！过去电灯厂在这埋电灯杆时，也只用竹竿和眼睛，我們也可以用这办法拉直綫。”林更轉动了一下大眼說。

“对！”家海受启发也活跃了，“还可以用播田繩当水平鏡。”他們連夜糊旗、找繩、拿竹竿做測量仪器去了。

翌日，太阳剛从五虎山对面露出头，三个青年人各持着不同的“仪器”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工地”。路过队部門口时，只見唐支书迎上来說：

“好哇，馬上动手了。青年人是應該这样。拿去，这个給你們。”

支书說着就遞过一个嶄新的布尺。这大概是昨晚赶买来的。

“党想得真周到呵！”三个人心里都觉得热呼呼的，劲头更大了。

到了区前，林更跃上鱼池的石栏张望，家海站在他脚边，谷森直对着区前左边的垃圾堆眨眼。

过了一会，林更突然跳下，从谷森手中抢了一把红旗，插在垃圾堆上，叫着：

“这里可以做起点！”接着他又在旗旁插上一根竹竿；家海忙拿第二竿爬上垃圾堆，跑到二三十步远的粪坑旁插定；谷森就眯起一只眼，细看两竿是否相重。

“你们三个干什么？”测到老头有元叔的自留地时，他惊奇地问。

“你还不知道吗？这里要筑一条路，我们先出来测量。”三个人自豪地回答。

有元叔见自己的自留地要去几寸，心中有些不爽快，但一想起前天在动员会上表示了要为五化贡献一切的决心，就不好意思阻止，只是吱吱喳喳的说：

“你们也会测量？这可是工程师做的事呵。真是，没翅想飞上天——打死我也不相信。”

“那你就看吧！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

他们又继续测量下去。綫路上有两棵桃树要砍掉，还要“占用”几寸麦田。测到溪尾山时，家海在前面先上了山，测好了綫路，正想钻个空插竹旗，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钻不下。林更和谷森赶快跑过来看，一端详，林更笑了起来：“傻瓜，这是岩石，竹竿怎能钻进去？”三个人都停住了，直穿过呢？还是拐个小弯？直穿过需要打岩，这工夫太大，甚至还需要炸药什么的，怎么办？

“拐个弯吧！从山鼻过。”林更出主意說。

“对，把山鼻鋸掉。”那两个笑嘻嘻地說。一把紅旗又插上了溪尾山鼻上。

紅旗穿过了一片老桔林，又跨过了一片麦田，直达果树园。为了尽量保存几棵好龙眼树，又拐了一个弯，才接上了正对閩侯一中大門的公路。

全部路綫測完后，太阳才爬到半天高。半路上他們碰到了唐支书，就把他拉走了。唐支书忙到现在还没吃飯，但看到他們勁头那样足，也就不作声地跟他們去了。到了工地，他們沿着紅旗走了一趟，唐支书滿意地說：

“可以，开始干吧！这条路就名青年路。”停頓片刻，看了看三張兴奋的臉，又补充說：

“今天下午各生产队还不能抽出人来，最早要等到今晚。”

“今晚就今晚。不过，我們三个下午就要动手了。”

下午，他們用播田繩在地上拉水平，同时記下了各块要填或要挖的深度。測量工作做完了，林更揮起鋤头挖垃圾，谷森、家海也都跟着干起来了。

晚上，三个生产队一共只来了六十个青年。林更告訴他們怎样做法后，就拉开嗓子叫道：

“我們都是青年，青年就應該出色地把这青年路修好，让那些不相信我們能筑路的人看看。”

林更知道今晚人来的少的原因，是因为有許多人仍然不相信他們能修出一条公路。他心里又急又怕：急的是人少；怕的是万一筑不成，岂不被人笑掉了牙？他說那些話，一面是給青年打打气，一面也是給自己壮壮胆。

他們把路分段包干，重点攻破。这里地勢多是高的。汽灯照

得“工地”上雪白。青年人虽然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但干劲仍然十足，一锄、一镢、一挑不停地干着。到收工时，垃圾堆已经不见了；一段平坦的路基出现了。

第二天早晨，打夯的声音响彻林野。工地上忙忙碌碌，有人锯树，有人挑土，有人抬石，远远地望去乱团团的，走近一瞧却是井然有序。林更等三个青年团员，不仅是工人，还是工程师，总指挥。在“呼哟”，“嗨哟”的劳动声音最响的时候，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拿着土箕来倒垃圾，一见这段路快修好了，几乎惊呆了，她以为走错了路，细细地环视了四周一遍，开口问道：

“怎么只有一个晚上，垃圾堆就变成马路了？现在我这箕的垃圾要倒到哪里去呀？”

青年们全笑了，“嗨哟”的声音更响了。

晚上，高地镢平了，低地也填满了，路样更明显了。欢腾的劳动歌声和越来越多的汽灯，引来了很多的人们。他们见路在青年的手下一尺一尺地形成，心里有些痒了，……。有元叔也到了自己的自留地，见了这情形，非常感动地说：

“共产党做事就是快。献几寸地修咱们乡第一条公路，我也乐意了。”

群众与青年们正在闹哄哄的，唐支书兴冲冲地赶来了，他兴奋而简短地告诉大家：

“后天县委马书记会带江苏参观团来咱们社参观，我们有没有信心提前修成公路，把汽车欢迎到区前来？”

要让汽车破天荒第一次开到村里来，这激动了所有人的心，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五天工程三天完成，迎接参观团！”

當場就有許多群眾要求參加築路。

次日早晨，參加築路的人數，從六十人增加到三百多個。大家互相挑應戰，形成了你趕我，我趕你的熱烈場面。這樣苦戰了一天，到晚上八點鐘就把公路全部築好了。

汽燈光照着這新修的四百公尺長的公路，引得大家高興得不願回去。

垃圾堆清理了，沒有了臭味；野外的桃花和麥穗的清香，隨着陣陣夜風送入人們的心肺。夜，現在分外顯得清新、美麗了。

第四天早晨，當新修的公路上，出現了幾輛卡車時，全鄉人都奔來把卡車團團圍住。司機簡直無法開車。站在江蘇參觀團車上的縣委馬書記大聲地向大家喊：

“祝賀你們多快好省地修了第一條公路！參觀團的同志現在還要參觀你們的各个方面，前面的人請讓開一條路，讓汽車開進去……”

如雷般的掌聲，淹沒了馬書記的話。聽到汽車馬上要開进村，大家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了：

“公路上雖常看到車，但開進村子里來，這還是盤古開天地以來第一次啊！”

（李喬英）

猪 宝 宝

这两天，城門螺洲大队店前小队飼养員天泉伯养的小猪，突然有十几只不吃东西，生病了。这时，他孩子又出麻疹，真不凑巧。

深夜四点多，天泉伯还没有合下眼。天泉嫂醒过来，擦了擦眼皮，顺手往孩子头上一摸：“哎呀，他爹，順子燒得厉害，赶快叫医生！”“哦，我看看猪就去。”天泉伯輕手輕脚地披上棉袄推开門走了。

他三步两步地赶到猪舍一看，糟糕！十几只小猪躺在地上，鼻子里喘着粗气，病得很严重！怎么办？先給誰請医生？小順子还是小猪？他心里焦急，一时拿不定主意。

天泉伯大半輩子都是过着飄泊生活。解放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四十多岁才娶上媳妇。如今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才小順子一个孩子，夫妻俩把他看成命根子。本来小孩子出麻疹没什么，抓把药吃就行了，但在天泉夫妇看来，跟天塌下来一样，不得了。这孩子长得很逗人喜爱，天泉伯一回家，他老远就跑过来，樓住脖子爹呀爹的叫个不休。这会儿，小順子可爱的苹果臉儿又在他眼前浮动起来……

他仿佛觉得有人正对他說：“天泉呀，这些猪都是公社的财产，你不能不管！”

“对！我不能撇下这群小猪不管，請了猪医生，再給孩子叫

医生也不迟。再说小顺子有他妈照顾，没什么问题。”

天泉伯顾不上吃早饭，急急忙忙抄着小跑走了。走得太急，脚趾头撞在石块上，出血了，他不在意；裤子被荆棘划破了，也不在乎。他气喘吁吁地赶到乌龙江的时候，偏偏医生不在家。怎么办呢？去给孩子请医生，还是继续去给病猪请兽医？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下阳去请另一个兽医。等他请到兽医回来，已经中午十一点多了。

他回到饲养场，马上生火、熬药，把小猪抱在大腿上，用小汤匙往猪嘴里灌药。每灌好一条猪，他感到心上掉了一块石头。

下午三点多钟，他把全部病猪都灌了药了才想起应该去给顺子抓药了。

可是，当他经过另一座猪舍的时候，发现里面的小猪一下子全拥过来，隔着栅栏嗅着他的裤管“吁——吁——”直叫。“哎呀！怎么这样糊涂，忘了喂小猪！再饿些时候没病也会饿出病来了！”于是，他又忙着把南瓜洗干净，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煮了给猪吃。

就这样，他和小猪磨蹭了一整天，到五点多钟才回家。一踏进家门，天泉嫂劈头就责问道：“孩子病了也不管，幸亏大嫂子帮忙。要是指望你，请医生抓药，孩子老早就没命了！”天泉不吭声走到床前见孩子睡得正香，额上冒着汗珠儿，他亲了一下小脸蛋，放心地笑了。

天泉嫂越说越气，嘴里嘟囔着：“把自己的地瓜，拿去给公社喂猪，也不先说一声；天天挑猪料经过家门，从来不进来看，你呀，心里那有什么家。”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因为饲料供应不上，公社只拨给他三担糠，并且告诉他，正在想办法，过几天就能解决。可是五十多

头猪光吃糠的话，三担糠两天就吃完了。要是两天后饲料仍供应不上来，那怎么办呢？因此他到处去找饲料，到附近机关学校拾番薯皮，跑到离螺洲一里远的地方捞水浮莲，到住户人家把一瓢半瓢的洗米水都淘来。尽管这样，猪饲料的供应还是很紧张。果然，不久糠完了，番薯、水浮莲、洗米水也没了。怎么办呢，找公社去吗？不，他知道办了公社后养猪增加，饲料不够，不能给公社增加麻烦。于是，他来不及跟妻子商量便把自己家里的地瓜拿去给猪吃了。

“依妹呀，你说，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公社的猪饿死吗？这些猪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呀！‘喝水不忘开井人’，依妹，你忘了当初我娶你的时候，被子还是借来的，家里除了一口破锅外，什么也没有！可现在——”他扫了妻子一眼又说下去：“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是卡机；孩子脚上穿的是皮鞋。”他又指着放在床角的两床棉被：“这也是今年才买的。”

天泉嫂见他提起过去的苦日子，不由得鼻子一酸，理屈地垂下头去，停了一下，才缓缓地说：“我只是气你，孩子病了抓把药也不去。”

天泉伯接下去说：“孩子病，你能照顾他，迟会儿请医生也没关系，可是小猪病了，我不去照顾谁去照顾呢？不快点请兽医，小猪的病就难好了。”

天泉嫂再没有说什么，她知道自己怪错他了。

再过十几天，就过年了。

旧年三十晚上，天泉嫂把菜热了又热，一直等到七点多钟，天泉伯才两手背在后面，哼着小调回来了。小顺儿病已痊愈，从屋里窜出来，一下子抱住他的腿要压岁钱。“好好，爹给你。”天泉嫂白了他一眼：“天还这么早，舍得回来啦！我还以为要等

到明天早上哩！”

天泉伯装着沒听见，拉着小順儿的手，坐下来就吃，酒喝得太多了，臉孔脹得通紅。

“嘿嘿，宝宝全好了，长得真快，再过两个月，准有一百斤！”天泉嫂以为他讲的是小順儿，接嘴說：“宝宝过了年才六岁，再过两个月也沒有一百斤！”她見天泉伯不答应，大口大口地嚼着年糕，朝自己直笑，才明白他讲的是猪。

天泉嫂知道他喝醉了，又好气又好笑：“今晚你給猪弄什么名堂来着？叫人家长等久等，跟等菩薩一样。”

“沒，沒什么。过年了，我怕它們吃得太油，晚上着涼拉肚子，到大树底下抱了些草，給它們加床棉被，所以回來晚了。”

天泉嫂听了笑弯了腰，見他尽說些沒头沒脑的話，也逗他一句：

“老的呀，我看你明天要早点起来。”

“为什么？”天泉伯問。

“大年初一，給猪拜年呀！”

一家人都“哧哧哧”地笑了起来，小順子笑得最厉害。

（葉淑蓮）

当好后勤部

公社成立时，分配我们这些人到商业部门来，有些人认为做生意没意思，一时想不通，不愿意干。后来社党委书记说：“你们真有些糊涂，这是公社工农兵学商中必不可少的商呀！你们小看它？”说得我们都笑了，我们就开始干开了。

我们要做的是：为生产，为生活服务。

一开头我们就遇上了困难，因为这里以前经营分散：店外有摊、摊外有担，重重迭迭。综合性小，门面又大，品种也不多，不能满足社员需要。这就需要重新调整。

我们开始摸底了，要摸清各队的情况，比如：食堂用膳人数，群众购买习惯，商品流通情况等。于是按情况分类，有的队人多就多设商店，人少就少设，不过每队都有个供销分处。这就组成了商业网。

为了防止过去那种人浮于事的现象，我们就精简人员。这一精简可厉害，原来有七百七十人，精简以后，只留下三百三十七人，抽出了四百多人支援工农业生产。留下是什么人？多是妇女和老人。

原来供销处人员多是些轻年力壮的人。这里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成立供销处，这项工作新，又很复杂，因此那时都派了些年轻力壮的人来干。这次合理分配劳力，公社动员了家庭妇女和老人出来参加商业部门工作，以女换男，以弱代强。这样一来，又出

現許多“穆桂英商店”、“黃忠商店”。

公社食堂成立后，購買力集中；生活和文化水平提高，布匹百貨和圖書需要量增大；生產大發展，工具配置更重要。這樣，沒有的要新設，比如圖書供應站，現在圖書已經有五萬多冊了。原來太小的要擴大，比如布匹和百貨商店，以及生產資料供應站，有的要獨立設立的，就分出來。以往這些店是混雜在一起，象生產資料與京果合店，棉布與圖書合店，真是折藕接甘蔗，很不合理。

在人多交通發達的隊里，還發展了飲食業，好象城門，就擴建一欄餐廳，餐廳內還設各色美酒、香煙、水果的專櫃，它可受人歡迎呢！

要問服務員的服務態度怎樣，那是特等的好。上面講過，服務員中多是女的。她們志氣可高，她們說：“我們雖然以前沒做過，但只要拿出革命干劲來，努力學習提高水平，一定能做好工作。”她們真的這樣做了。看到各生產隊人都忙，她們提出口號：送貨上門。食堂里的副食品都是她們用車送去的。春耕、夏種、秋收、積肥、抗旱、搞五化等，她們都是送點、送茶、送藥到田間，到工地。而且去時還隨帶鐮刀或是別的農具等，趁社員休息時幫他們割稻、踏車等等。

你不明白怎么也送茶送藥？是的，本來只要送糕餅饅頭，但服務員想：社員們勞累得汗流多了，口一定干渴，沒有茶水糕餅怎么吞得下？因此就連帶送茶水去了。她們又想，在緊張的勞動中，免不了會受些外傷什么的，所以就領了些藥帶去。這給社員們很大的鼓舞。他們常說：“為了答謝服務員給我們送來茶點，應該多干一個鐘頭！”

在收工的時間里，她們還挑貨郎担深入各村各戶，免得社員

要东西时，得跑出来买，这样就使社員能好好休息。

平时，她們也学福州那样，通宵供应。你看到沒有？每間商店都有个小窗，那就是給社員們半夜买东西用的。这样的小窗很方便，半夜起床，免得開門，也不妨碍社員购买。

唔，你要听商业怎样服务生产？这可多呢！

現在农村里，一年四季劳力都是緊張的，我們为了尽量节约各生产队的劳力，今年七月份起增設了个蔬菜收购站。我們亲自到生产队收菜又送菜。俗話說：菜头水果尾。比如剛上市的花菜，价格較高，我們就把它卖到福州去，买些便宜的菜回来，这样既省他們劳力，又有利潤，又能常常变换菜味。

最近为了响应号召，尽量供应城市蔬菜需要，所以我們派了专人，深入到蔬菜区如杜園等，有計劃地指导生产。

生猪生产，情况也是这样。各食堂要按計劃飼养。为了鼓励多养，就定了条例：凡是超出計劃的头数，可以由食堂自宰自食。鸡鴨等也是这样。現在各食堂都养了許多。一两年后，我們就可以大量供应市場需要了。

我险些忘了告訴你最重要的事了。在这次爭取秋季丰收中，我們可真是起了后勤作用。

第一关就是要深耕。現在我們耕地主要还是靠耕牛，可是現有耕牛一共只有一百三十八头，要在十四天內深耕完一万五千亩田，这是不可能的。需要馬上采购。我們供销社接受了这艰巨的任务，四出购买，真是“山高路长不怕远，万里奔波找貨源”。我們在“山高志更高，路长勁更长”的口号鼓动下，千里迢迢到处跑。可是那一县不在爭取高产？那一处不需要牛？人家还需要我們支援他們呢！那有耕牛卖給我們！这問題险些把我們难住了，后来大家聚集一起，把情况分析一下：山区里連作少，收种

時間也不同，也許有竅門。我們就向山區奔去。結果租到一百九十五頭牛；還訂了合同，以后再互助。這樣既趕上了深耕需要，又節約了采購資金，社員們都伸出大拇指稱贊我們說：“真行，多虧了你們！”

到施肥時，我們又接受了製造土化肥、細菌肥料的任务。我們就以土代洋，大想大干。我們中間的嚴福春，看，他就是坐在你對面，你看，他又在研究什麼啦！他敢想敢作，製造細菌肥料。本來，這要用糖和地瓜粉，在磚頭上繁殖。這種方法，原料難買，速度又慢。嚴福春改用坏地瓜放在三合土的壘上繁殖，試驗成功，受到了縣里通報表揚。噯，嚴福春同志，你何必不好意思呢？這是光榮嘛！這樣，大力推廣又造了土化肥和代人糞，又收集了兩百多担魚骨、豬骨肥。供應肥料這關又過了。

到了秋季，晚稻丰收。這就需要許多竹筐，市場上貨源缺乏，我們就到食品公司等處去購買他們裝貨的竹筐，同時又大力推廣了日本式鐮刀。這鐮刀確實有它的好處，社員們反映說，割起來如同青峯寶劍一樣！真是多快好省。公社成立後，我們一共供應了工具五萬二千多件，比過去翻了三番。

要詳細講起來，真是幾天几夜也講不完。總的來說，我們這工作，雖是後勤，但樣樣都要跑在時間的前頭。我們干出了一些成績，是全靠黨的領導和政治掛帥，這點是誰都有的體會。

（張振漢、孟木炎口述 李喬英整理）

炊 事 員

我在食堂做炊事員。提起这工作，我自己心里就頂高兴。你想吧，有我們炊事員，許多人就省得去摸鑼摸灶，我們一个人能替那么多人服务，这还不好？这还不光荣？

可是在解放前，这却是一項沒人看得起的苦差事。那时不叫“炊事員”，都叫你是“煮飯婆”。有一段时间，我在福州洋駁船陈文清家里煮飯，这个人轉弯抹角算起来，和我还是亲戚呢！可是亲戚有什么用？那时候有錢才是亲，象我这样穷的，还不是一样受气？平日劳累都不說，单是伺候他打牌，就已經很够受了。每天晚上，他打牌总得打到半夜三更，我呢，也就得伺候到半夜三更，又是湯又是茶又是点心，忙得团团轉；一下伺候得不滿意，还得挨他一頓罵。我有苦沒处說，真是不平等！要不是生活所迫，打死我也不愿意去做这差事。

解放后可就不同了。象我替粮站同志和小学教师炖飯时，他們对我就很客气，背后也总夸奖我好。我自己做起来心里也覺得很愉快。

去年四月，正是大跃进，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社里为了使大家集中精力搞好生产，便决定办一个食堂，但是炊事員不够，我知道了，便去找党支书商量。我說：“我去食堂当炊事員你看怎样？”支书那时还顧虑我年紀大，怕經不起劳累，便劝我說：“做食堂炊事員辛苦呢！你年紀大了，不很适合吧！”我那里肯

听他的话。老实说，正因为是食堂，我才爱做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欢喜“做团体”。辛苦一些有什么要紧？人家社员生产劲头那么大，我们能够照顾他们的地方为什么不多尽些力量。所以，我下决心要去食堂工作。

做炊事员说实在话也不容易。几百罐饭，要炖好些时间，加上社员出工早，我们每天都得深夜两三点钟起床。开头大家真有些不习惯，连睡觉都得提着心。我怕大家睡得太熟误了事，影响生产，所以一起床，便到其他炊事员家里一个个叫起来。我对他们说，要是迟起五分钟，你想，这么多社员该要浪费多少时间！因为老是担心起床迟了，所以有时候也闹了笑话。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醒来，一看，哎呀，外面亮光光的，我想这下糟糕了，准定误时了，急忙跳下床。可是出去一看，吓，原来是满地月光。

日子久了，却引起我那个“老的”担心呢！他总怕我太累了，一直劝我：“社里事情多得很，为什么一定要揀这个做！”我半夜三更出去，晚上食堂的人都回家了，我还要拿起扫帚扫扫地，把饭厅收拾得整整齐齐才回去。他看了不很高兴，有时劝不了我，就生气起来。我知道他是替我着想，就是眼光看不远，说话粗鲁，所以从来没有跟他顶碰。其实，顶他也没有用，顶一句他还你十句，你想吧，我们老夫妇了，还吵吵闹闹的象什么！我人虽累一些，精神倒顶愉快。一天，有户人家搬到我们那幢房子来住；你想，搬家嘛，当然总免不了要乱一乱，要收拾，就得花好多时间。我因为心里实在放不下食堂，来不及把家收拾好，便跑到食堂去了。这下他可大气了。跑到食堂来：“回去吧！家都不要啦！”我没有应他，也没有回去，他可越发火气了。别人都说他不对，去劝他。队长知道这件事情，特地派人到我家帮助收拾。我们妇女主任黄美英到我家去劝我那个“老的”，给他教育

教育。第二天，吓，我們食堂里貼出了兩張大字報，一張表揚我，一張批評他。他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意思。我說：“你去看看大字報吧，一張表揚我，一張批評你，兩張還貼在一排呢！……”從此以後他大大的改變了。

當然，我們那里的炊事員個個工作都很好。大家說：“只要社員生活能過得舒暢，我們累點也很高興！”象我們煮菜的那個秉榕吧，他每次做菜，總要想盡辦法，做得花樣又多又好吃。社員們吃了都直叫好。你想，大家都是這樣，我一個人能夠不賣力？還有，我們的黨支部也是頂關心我們，黨支書自己就經常下來了解我們的情況，召集我們炊事員開座談會；我們有什麼困難，黨支部也立刻幫助解決。你想，領導上這麼關心和看重我們，我們還能不把工作做好？

為了能使社員們吃得好，我動了不少腦筋。起先，剛剛開始炖飯時，是有一些人有意見的。這也難怪，各人胃口不一樣，有的嫌硬，有的嫌爛，弄得我們左右為難。後來我們商量一下，決定各人固定一個飯罐，喜歡吃爛的，給他多加些水；喜歡吃硬的，給他少加些水。這樣一炖，真不壞！社員都反映很好，我自己心里也很高興。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社員們生產很緊張，就主動燒湯燒開水送到田頭給他們喝；有的時候，社收工遲了，我們還特地給他們溫溫飯，讓他們能吃到熱的；到了田事一緊張，我們便把飯送到田頭，省得大家走路，能多做一些工。

楊寶老漢在我們食堂里炖飯，有一天，他好遲好遲還沒來吃，我想大概他病了，他的兒子媳婦都在福州工作，家里沒人照顧，我該去看看他才對。跑去一看，果然是病了。他說他不想吃飯，我就去買了面，煮一煮送給他。我知道這是我們炊事員應該

做的。

我們做的都是我們應份的事情。可是人家却還來表揚我們呢！這個社員說我好，那個社員說我好，黨支部還在群眾會上表揚我，真把我說得不好意思了！其實，只要社員能滿意，生活過得舒暢，勞動起來更有勁，我們做炊事員的就夠高興了。

（陳藍桂口述 練向高、潘若玉整理）

卫生模范黄老妈妈

同志啊，你要我说说村里的卫生工作吗？说起来话就多囉。你看，现在我们村见不到露天粪坑，见不到垃圾堆，条条街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收拾得“六面光”。四害也消灭了，还建了医院、产院、卫生站，什么霍乱、鼠疫，这八、九年就没发生过。大家身体健康，精神好，生产劲头也大。我活了七十三岁，那见过这样的好世道，这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好啊！

想起解放前，这村真是脏。大家连饭也顾不上吃，那有心思搞卫生，霍乱、鼠疫年年发生，光说民国三十五年（1944年）夏天，村里犯了霍乱，死的人象倒蔗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天是你死还是我死。天还没有暗，家家都关门上锁，连讲话也不敢放大声。那时候，国民党理也不理，地主却出来说：“这是鬼作祟，要大家去求神拜佛。”那时一共请了十八尊菩萨，每天夜里抬着上街赶鬼，全村人有的派去抬轿，有的派去装五头花面，有的派去打锣。有一个叫亦伍的，夜里还去赶鬼，天亮就死了。唉呀，大家把喝稀粥的钱都用完了，人倒愈死愈多，地主真作孽！

再说我自己吧，养了八胎，谁知麻疹的麻疹，天花的天花，那时候病多，又没有钱医，八个孩子死了六个。我那些孩子要是不死，到现在都是种田的好手啦！

吃了这些苦，所以我一听支部书记动员大家做卫生工作就中意。从前是愁吃愁穿顾不上，现在解放了，我们当家作主了，怎

么能把个家弄得脏脏脏的。我就开始打扫自己家里。支部书记看我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就表扬我，他还说：“讲卫生，身体健康，才能生产好。只顾自己家里讲卫生还不够，只有带动大家一起来做，才能做好。”支部书记这句话可叫我开了窍，从此以后，我就去扫街，还到别人家去帮忙收拾。

那时候，还有些人想不通。他们觉得做卫生是浪费时间。就拿前院的六外婆来说吧，有一次我扫完街道到她家去，看见天井里堆着垃圾、烂草、鸡屎鸭屎一大摊，我就说：“六婆，该扫一扫啦！”谁知她粗声地说：“这里没你的事，我不讲卫生也活了七十岁啦！”我忍住气说：“你家还有孩子，可要为他们想想啊！”她反倒火了，说：“六块棺材板都背了四块了，还这么积极，我看你还是回家养养神去吧，也不怕看不到社会主义？”听她这一说，我也火了，我说：“告诉你六婆，我还要看共产主义呢！就算看不到，子孙总会看到。”这时，我想起了支部书记的话：“发动群众要耐心，他不愿做的事，你就带头做。”我忍耐着，拿起扫帚就替她扫。过了一会，她大概不好意思了，也动起手来。我满心欢喜，心想：支部书记就是能干，听他的话，就不会错。

从此以后，我更相信：要带动别人，先要自己好，要给人做出榜样来。

春天常下雨，路旁的水沟被污泥塞住，一到夏天就会长蚊子，所以，下一次雨，我就要掏一次沟。沟又窄，只能用手去掏；有时候，手指头都磨破了。

有一次，雨下得很大，一段路给雨水冲坏了。我早上吃饭，心里生怕有人滑倒，安不下心来，就赤着脚去扫泥。天又冷，路又滑，一不小心就跌了一跤。恰好媳妇赶来，把我扶起来，劝我

回去換衣服。我說：“衣服脏了可以洗嘛。”又繼續掃泥。到底人老了，經不起跌，跌一下就腰也痛，頭也暈。街上的人看見了，都跑來幫忙，他們說：“人家大媽快七十了，我們年輕輕的還能光用眼看嗎？”真是人多力量大，不一會路就修好了。

後來，我三次被評上衛生模範，我負責的衛生段，也評上了衛生模範段。

衛生工作開展了，三叉街向我提出了挑戰書。他們常常在工作的時候，邊做邊喊：“加緊啊，要和黃大媽比賽啊！”“這一次要勝過黃大媽，要爭衛生紅旗！”“我們要把衛生模範段的牌子搬過來！”

我就把我的一段人組織起來，分成四組，每組一個組長，還替換輪班值日——一條街每日有四個人負責打掃。這樣，衛生工作更有保證了，我們寫了應戰書，還寫了一張向太保亭的挑戰書。

大家挑應戰，衛生工作就越做越熱了。

我還是從家裡做起，把家裡洗刷得干淨，告訴家里人進屋要脫鞋。有一次小孫子同兵上學忘了帶鉛筆，他是光着腳的，回家來沒找到人，進房又怕脏了地板，就用膝蓋爬了進去。我們自己做得好，動員別人就不為難。

街上孩子常把果皮碎紙亂丟，我每天要去巡看幾次，後來，索性坐在門口，一看到小孩丟，就喊他拾起來。這樣過了一些時候，小孩子也漸漸習慣不亂丟果皮碎紙了，街道也更加清潔了。所以這次比賽，我又評上了模範，紅旗沒有被人得去，模範段的牌子還是挂着。

一九五三年的秋天，我當選了人民代表。開會那一天，我把出嫁時的大紅裙和大綠袄穿起來。這套衣裳保存了幾十年，過去我可沒心緒穿，可是逢到這樣好日子不穿還等什麼時候！我歡歡

喜喜去开会，会上我还讲了话，我说：

“想不到我这上七十岁的人，还有这样的光荣，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从这以后，我更加拥护共产党，我经常和党支部联系，经常去听党课，我时时刻刻记着党员八大条件。不久，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

一九五四年七月，县里派来一位女同志，宣传妇女卫生，要我陪着到她各家各户宣传。那时候，我老的正害病，心里想：不去吧？但记起党课讲：“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就去了，抽空才回来给老的端茶饭。我陪着女同志宣传，一边也把她的话记在心里，有了本钱，以后也好向人宣传。

你问我全家选墙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在我们林浦有个官父埕，这个地方，村里人叫它“绝地”，上辈人说这里原来是一个仓库，也有人說里面有狐狸、吊死鬼。日子长了，这里墙倒基塌，乱草垃圾成堆，里面的一口池，水都绿了，水面上经常浮着死鸡死兔，六月天，蚊子、苍蝇象造反一样，日头晒一下，臭得要命。我跑到党支部去请示：“我们把官父埕的垃圾拿去积肥，围墙加高，这样，又有肥料，又灭苍蝇、蚊子。”支部立即支持我，答应安排人去挑垃圾。

我一心要去选墙，坐也坐不下。那时正是大冬天，我不管风大天冷，跑到潘墩去借一副墙板，想用土筑起来，又坚固又整齐。那知道跑了老半天，也没有借到。偏偏碰到一个金官嬷，她明明有墙板却不肯借，还和我顶了几句嘴。回到家里，我又累又气，一下就倒在床上。我那老的还来劝我，他说：“何必呢，卫生不卫生是大家的事，你干吗这么傻！”我没理他，他又说：

“算了吧，七十岁出头的人了，还入什么党。”

我心里想：我要选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又不是只为自己入党。真的，七十岁出头了，还有多少时候好活？这时候还不多做些事，就没有时间做了，应该去动员几个人来帮忙，没有墙板就用石头。我这么一想，又高兴起来，先动员了媳妇，又动员我那老的，我们一家人去选墙了。

做了两天，我那老的又不耐烦了，他说：“全村人都不来，我也不干了！”我和媳妇不理他，照样选墙，我那老的不知怎的，又来和我一齐做。

我们全家选墙的事传开了，后来蔡犬命、林登友、林亦迷他们都来帮忙啦。前后经过一个多月，墙筑好了。

要说我们村的卫生工作真正搞起来，还是去年的事。去年夏天，大宣传除四害，我自己先保证做好抓老鼠、打蚊子的工作，还跟着宣传队去宣传，真正是人人动手，整个村都热心搞卫生。

公社成立后，我们村里的卫生工作做得更好了，党支部亲自出马。第三生产队保证建一座公园，要把从前没人走的后山顶，变成游玩的地方。我们第四生产队和野战连要开一个既可以出操，又可以打球的运动场。就连从前常常被人批评的太保亭，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村现在是卫生红旗村，全省卫生二等村。

九月里，我收到一张信，听我儿子念道：“黄大媽同志：經研究后决定你负责林浦大队产院工作。中共林浦支部。”儿子说：“要你去当产院院长。”我吓了一跳，当院长要有文化，我一字不识怎么能行！我就拿着信去找支部书记，我说：“支书啊，村里人这么多，你找一个有文化的吧，这事我干不了。”

支书说：“你是个评上十五次模范的老模范，卫生红旗一直在你手中，今天怎么打退堂鼓了！党决定你当院长，就为了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支部書記这么一說，我也就接受下了。

我們村里会建起产院，从前，連做梦也不敢想。那时节，旁人生孩子象猪狗一样，自己生自己料理。就因为这样，我的一个孩子生下来就中毒死了。想起这些，怎么能不好好干啊！

我来到产院后就专管产妇的事了，每月和接生員到空村去登記孕妇，給她們檢查。我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菜呀、肉呀，照顧得来院生产的产妇好好的，直到把她們和孩子欢欢喜喜送走。

不久，支部宣布批准我入党。我真象年輕了好多岁，我說：“同志們，我还要为党工作二十年！”

（黃大鵬口述 林世觀整理）

一定要把孩子带好

說起咱們托儿所，可真有趣哩！六七十個娃娃，大的小的，一天到黑咿咿呀呀地唱個不停，活象個小戲院。我們幾個老婆子忙得象走馬燈似的，雖然終日團團轉，可心里歡喜，沒有一個喊累的。

姐妹們可操心呢。天剛矇矇亮，沒等着梳頭，就到食堂里扒幾口飯，趕來上班啦。咱總要想辦法帶好娃娃，要是成天哭哭鬧鬧的，人家不說，咱們臉上也不光彩呀！那個孩子不是娘身上的一塊肉！

別瞧咱們老了，也常听報告，曉得當保姆也是干着大事呢。咱們把娃娃教養好，往後当了英雄模範，咱們也光彩！

提起辦托儿所，還有一段往事哩。

記得，頭年春天，婦女主任王美英召集大家，說如今要躍大躍進啦，社里的勞力缺得慌。要是能把婦女都放到生產上去，那該多好呀！可就是娃娃沒人照顧，叫我們老人家來商量辦托儿所的事。

起初，咱們還不曉得托儿所是啥呢。听了才知道是要着娃娃。美英還說：“現在保姆可不比過去。看好娃娃，也替生產出了力量。往後孩子長大了，成為國家的人材，也有你們老人家的——分功勞呢！”

大家听了，覺得有理。能替國家干個大事，那還不好！于

是，大家說：“那就試着办吧！”众人就推宝凤姐当了组长。

党支部說社里底子薄，凡事要白手起家。什么搖籃啦、轎車啦都是家里自个带来。社里还买了蚊帳布和毛巾。宝凤姐領着咱們几个把房子洗刷了一遍。布置得花花綠綠的，廳上还挂起毛主席象，看起来怪別致的。

古語說得好，万事开头难哪！往日在家里只看个把孙子，人也自在。如今可不同啦，一人就要看管五六个娃娃。手里抱了两个，屁股后还拖住一个。孩子剛离家，心里焦，終日哭个不停。咱們岁数大了，手脚也不灵便，顧了这又丢了那个，心里可急得慌哩！

再說，有些媳妇也不放心。时刻从田里跑回来張望，囁囁咕咕的，嫌东嫌西。社里的郭兰英剛生个男娃，可宝贵啦！有天上午，她活干了一半，急忙跑来，見到她娃子坐在站車上哭。她气得噘起嘴巴来。大家都急坏啦。跑去給美英訴苦，說：“主任呀主任，换个别的活吧。只要这副老骨头能支撑得住，啥事都行。就是受不了这閑气！”

美英笑瞇瞇地千劝万劝，才算是把咱們留下来。随后，她又召集媳妇开会。說要設身处地替咱老婆子想想，一个人看管五六个孩子，可不是簡單的事。媳妇听了，覺得有理，往后也沒再說什么閑話了。

美英又叫宝凤姐上台晒托儿所学习先进經驗。她回来高兴死了，笑道：“人家办得可好哩，啥事都干得干淨利落。扫地的扫地，洗衣的洗衣，煮糊的煮糊，个个娃娃都养得白胖胖的，哪象咱們乱哄哄的，啥事都沒头緒！”

这下可有了方向啦。我們几个訂了“五保五心”公約。要保証及时接送孩子啦，比耐心，比安心，比娘心什么的。事情也值

日輪班着干，平常互相幫忙。房子一禮拜洗刷三次，也常換洗尿布。娃娃穿得干淨，也睡得舒適。

寶鳳姐点子多，常領着咱們撿些碎布，做个洋囡子啦，小兔子啦，給孩子玩，孩子玩得很欢喜。金珠姐可好啦，自家的孩子哭着，大家劝她照顧些时，她却抱住人家的娃娃，說：“如今社会主义啦，要讲新道德。凡事要先想着旁人呢！”

郭兰英看了自己的孩子养得白胖胖的，非常感謝咱們，說：“我自己帶也比不上哪！”可不是嗎！木通凡如今在家里反倒呆不住了，天剛蒙亮，就吵着要到托儿所玩呢！

（新墟大隊托儿所保育員集體口述 陳越、練向高整理）

我的老婆

我結婚那年，我老婆才十九歲。不是我誇她，那時候，她長得可真不錯，不高不矮的個兒，圓圓的臉龐整天紅丹丹的，真逗人喜歡。她心靈手巧，不大願講話，整天從早忙到晚，家務事料理得一清二楚。鄰居都說：“看詩春那後生，倒討了個好老婆。”每聽到這些話，我心里也覺得美滋滋的。

我們結的是窮親，她家窮，我家比她家更窮。不過，自從娶了她，我種田她養鵝和做些副業，日子過得也漸漸有了起色。可是好景不長。結婚第二年，我們就有了孩子。多了一張嘴，我們的日子就艱難一分；這且不說，更糟的是，往後每年她總要生個孩子，第四年偏偏又來了個“躍進”，一胎生了兩個，不到十年就生了十個，雖說活着的只有七個，而這已經夠受的了。

人常說：“人多好勞動”，這話雖說不錯，但要看什麼情況。象我們家，那麼多小嘴巴等着吃飯，靠我一人勞動怎能維持得了呵！不錯，鄉里剛辦農業社我就加入了，可是農業社也是按勞分配呀，我一人自然不能拿雙份工分了。這樣一年年過下來，就欠了人家二百多元的債。一家人雖說沒餓肚子，但吃的穿的比別人就差得遠了。幾個孩子一年到頭打赤腳，穿的都是補釘迭補釘的衣裳。他們看見別人家的孩子穿戴得好，回來就吵着要新衣裳穿，特別是那兩個女孩子吵得更凶。我老婆被吵得沒法，就把孩子一推說：“向你爹要去！”孩子們就擁上來抱着我的腿央

求說：“爹，給做件花衣裳吧！”看着孩子們那一双双水汪汪的小眼睛，我心里就象螞蟻爬似的难受。我只好騙他們說：“好孩子，过几天爹就給你們买。”可是，一月两月过去了，孩子們还是連新衣裳影子也見不到。有时，我也真想等園里的菜卖了，就給他們做件衣裳，但是这么多孩子給哪个做好呢？每人都做，又哪来那么多錢！家里还等錢买米呢！

說來說去，都怪孩子多劳力不够。如果我老婆能下田劳动，該多好！而她偏偏又被那群孩子纏住了，整天圍着鍋台轉，大門都出不得。这也够她累的了。每天从早忙到晚，那么群孩子光洗洗补补就花去很多時間，何况还要种菜养鵝！有时，我劳动回来，肚里已經很餓了，而她飯还没煮好。說她几句，她往往会委屈地哭起来，說：“我只一双手，叫我怎么办哪！”她这一哭，我的心就軟了，就赶忙帮她带孩子。她脾气虽然好，从不会跟我頂嘴，但有时由于生活困难，又被孩子累得，也常常会发些牢騷。特別是看見那些年輕妇女，唱啊跳啊地下田劳动，就会急得甩筷子打碗。她常跟我說：“这日子过到什么时候才算到头啊，我晚生十年有多好！”

我安慰她說：“你放心，等孩子大了，有你享福的时候！”

她抿嘴笑笑說：“那不老了唄！”

我說：“老了就进养老院嘛！”

說得两人都笑了起来。

今年春天，社里大跃进，人們真是干劲冲天哪！她在家里也呆不住了，跟我說：“看人家都跃进跃进的，我呢，整天轉鍋台，象什么話！”你看，她也想大跃进哩！

我笑了笑說：“算了吧，你下田誰煮飯，誰看孩子！”

她說：“我都計劃好啦，老大上小学，就負責挑水，老二煮

飯，老三看孩子。”

她这主意挺不錯呀！我举双手贊成。于是，她真的跃进起来了。可是，她这一跃进不要紧，家里的事可就“跃退”了。那天傍晚回家，老远就嗅到一股焦味，一看，原来老三把飯煮得焦黃。再看那群孩子，一个个都打鬧得哭肿了眼。見了我們，都扑过来告状。弄得我倆哭笑不得。

尽管这样，这个春天她倒真的跃进了。她天天坚持出工，干劲真大呀。也爱講話了，再不象过去那么悶悶的了。

可是家也毕竟要管呀！这只有靠晚上突击了。每天下田回来，虽然累得腰酸腿痛，但她还要給每个孩子洗澡，洗、补衣服。我心想，这样下去怎能吃得消呢？看她累得比过去瘦多了。

幸好，不久乡里就公社化了。吃飯有食堂。两个大孩子讀小学，老三也进了民办小学，白天讀書，晚上回来还能帮助做些零活。剩下几个小的，都送进了幼兒園，阿姨們照顧得可好了！

“这一来，我老婆可乐啦！那一天天剛亮，她就爬起来，領着几个孩子到食堂吃了飯，送进幼兒園，就欢欢喜喜地下田了。这几年我还第一次看到她这么高兴。这使我想起来剛結婚那年她那快乐的模样来，現在似乎又恢复了她的青春时代。

公社第一次发工資，我們倆就領了四十七八元，除去吃飯，还能剩下好多。我們給男孩子每人买了一双鞋，两个小女孩每人做了套花衣服。孩子們喜得蹦啊跳啊象过年一样高兴。

有一天下田回来，我跟老婆到幼兒園看孩子。他們穿得整整齐齐正圍着圈儿由阿姨教他們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儿哩！我老婆喜得也信口唱了起来，她的嗓子虽說不太好，但声調倒挺大。我跟她說：“看把你乐得！”

她說：“就是乐嘛！”

我說：“你啊，这下子可真正解放啦！”

她指着我的鼻尖說：“你呢，不也解放了，再也不用愁吃愁穿了！”

是啊，沒有人民公社，我們哪能有今天！

（程菁泰口述 張建琴、蕭香園整理）

幸 福 的 晚 年

我今年七十七岁了，我老婆比我大二岁，儿子和媳妇在解放前几年死去，一个孙女已经出嫁，现在全家只剩下我夫妻两个人。解放前，一家三口（孙女未出嫁）全靠我教私塾的收入维持生活。那时候，穷人仔无钱读书，富人仔不给我们教，教上三、五个学生，赚的钱连喝米汤都不够。解放后，我分到了一亩六分田，生活是比过去好得多，但因为夫妻年老，孙女又小，缺乏劳动力，所以，经常还得靠人民政府救济。高级社成立时，我已经不能教书了，社里把我列为五保户，生活上的困难是解决了，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现在在公社敬老院里的生活这样幸福。

我夫妻俩是在去年八月到敬老院里来的。当时，我们除了一付铺盖外，什么也没带进来，现在用的这些桌、椅、热水瓶、茶杯、脸盆、面巾，都是公社给的。我过了一辈子，家里从来没有这样好的设备。

党支部书记还经常交代我们院里的炊事员，要好好照顾我们。所以，炊事员经常来问我们爱吃什么菜？怎么煮才好吃？我们提出意见后，他都照我们说的去做。过去在家里，上了年纪也还要摸着煮饭、提水、劈柴，身体一不舒服连饭也吃不上。

我们到敬老院的第二天，碰巧是中秋节。解放前，我家连饭都没有吃，那里谈得上过节，现在在敬老院里过节却格外舒服。一桌坐八个人，鱼呀，肉呀，丰富极了，大家谈谈笑笑心里真是

說不出的高兴。这次过年就更好了。那天晚上，各队队长都到我們这里来，爭着要我們到他們食堂去，弄得我們不知答应誰好。到了食堂，党支部書記和許多干部亲自給我們敬酒，拜年。当时，我們都感动得流出眼泪来。同志，你想想看，象我这样无依无靠，解放前会死在路边倒在路角的人，現在能过着这样的日子，怎么不感动呢？

我們大队的队长林有唐經常到我們院里問长問短，如果食堂里杀了猪，他还亲自把猪肉送来。他看見我夫妻倆衣服比較旧了，到公社来的第二天，就叫縫紉厂的師傅上門来量尺寸，給我們做新衣服。你看，我們身上这两套嶄新的青嗶嘰衣服，就是公社做的。同志，講了不怕你笑，当年，我討媳妇的时候，还没有做过新衣服呢！解放后做了一两件，也是粗棉布的。这衣服剛拿回来的时候，我夫妻倆都欢喜得晚上睡不着，拿在手上翻来复去地看，当时，她高兴得流出眼泪来了。我們不知要怎样来感激共产党才好啊。

在公社里，吃穿都非常好，根本不需要什么零用錢，但是，公社还是要拿錢給我們。干部常常對我們說，你老人家这样老了，應該买些喜欢的东西吃。我剛到这里不久，公社就发两元錢給我，这次过年又发两元，有的人还发四元、六元。

我們院里要看报的有报看，要下棋的有棋下，爱听三国、水滸的，几个人湊在一起，就能大講起来。我們村里有个七十岁的老人林加和，家里只有老夫妇两个人，儿子在南洋每个月寄四十几元回来，現在还不需耍进敬老院。但是，他每天都爱到这里来講书、下棋。同志，你可以想想我們院里該有多好！过去，我总想早一些死，認為早死早好，活着受罪。現在想法可不同了，我真希望多活几年，能够看到我們祖国更好的建設前途呢。

（林菊藍口述 楊鍾溪整理）

公社的第一个春节

我們公社化以后的第一个春节过得怎样？同志！你随便出去問問看，大家都会嘻嘻笑的对你說：“今年春节，过得真高兴！”

我和我丈夫每月都有工資。平时，我們就积攢了不少錢，想快快乐乐过个春节。想不到，公社还给社員都发了双餉。同志，对你說实話，从我嫁到財姆家以来，手边还都沒这么多錢过！那一天，我真高兴。我到百貨店去給孩子們一个人买一双鞋子。你想，我們不必愁吃了，錢又这么多，当然要給孩子們添置些东西了。噯，还不仅发双餉哩。那些家庭底子薄的，公社还主动給他們送“礼物”。

那几天，可真够忙的。忙什么？大家領了工資，就忙着买东西。这下真忙坏了我們的供应部。这边叫：“給我拿两包素会！”那边叫：“給我秤十斤桔子！”七、八个服务員就这样轉来轉去，气喘吁吁。我听供应部同志說，去年这个时候糖果只卖两百多斤，今年可就卖了七百多斤；去年素会一百多包还卖不完，今年可就卖了五、六百包呢！还有桔子啦，粉干啦，酒啦……我們供应部女主任吳秋英，那些天都是滿头大汗，头髮乱蓬蓬的，連声音都忙哑了。可是她却頂高兴呢！她說：“我們供应部忙是好事吓……”

这边还正忙着准备过节，吓，又来了一个好消息！公社要給

我們办个大会餐。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可更乐了。

农历廿八那天，食堂炊事員从清早便忙着起来了。煮肉的煮肉，杀鴨的杀鴨，弄得整个村都“呼哩啡啦”香噴噴的。敬老院的那些老人，也忙极了，在平常他們总是听听讀报，談談天，开开收音机，安安逸逸的。今天这个队长來說：“依伯，你今天晚上到我們連来会餐吧！”那个队长又來說：“依母，你今天晚上一定到我們那个連去啊！”一个老人总接到好几个队的邀請，弄得每一个老人都嘻嘻笑，可就是不懂得該去那一队好。你要是說：“哎呀，我剛才已經答应另一队了。”那其他队就会說：“不要紧，依伯、依母，你还是到我們那队去，我等下早一些来請你啊！”

这天下午四点多便都提早收工了。大家回去洗洗身子，換換衣服，吓，走出来，花花綠綠的，街上一下子熱鬧多了。我們那个队，摆了九十二桌，这样大的会餐，我从出生起还没見过呢！每桌都吃到十几道菜，肉呀，鴨呀，魚呀，蚬呀，燕丸呀，年糕呀，什么都有。我們炊事員本領又高，煮得頂合味，大家吃一碗便要誇一碗，而且盘又大，碗又深。

吃到一半，县委馬書記还和我們公社党委书记一起来食堂劝菜敬酒呢！我們本来就吃得很高兴了，再看首长这么关心我們，更是感动得不得了。大家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要和馬書記一起干杯。馬書記看見我們桌上这么多菜，他笑嘻嘻的說：“好，公社的春节过得象样，比我們机关过得还好呢！”他这么一說啊，大家情緒都更高了。搶着說：“馬書記，这要謝謝你呢！”馬書記很客气。他說：“不是謝謝我，要謝應該謝謝公社，謝謝共产党才是哩！”大家又一齐喊起來說：“是啊，真應該謝謝共产党，把公社領導得生产好，生活好！”馬書記又說：“公社办得很

好，去年取得很大成績，今年我們要來一個更大的躍進，那大家生活就要更好了……”馬書記的話說得真好，大家都噼噼拍拍地鼓起掌來。

會餐完，這邊爆竹響了，那邊爆竹又響，真是熱鬧得象什麼似的。這邊叫“評話要開場了！”那邊叫“文化宮里劇團要演戲了！”“劇團是福州來的哩！”“戲完后聽說還有一場電影呢！”大家叫嚷的真是樂。有許多老人一邊剔着牙，一邊走到文化宮去了。我的婆婆一直催我們快去，她說：“你們年紀輕，能走，還不快去！”說着又摸摸她孫孫的頭說：“去，乖，去看戲，回來可要对奶奶講戲文啊！……”真的，那一天是她老人家所看到的最歡喜的一個春節了。

我們一家人在公社里同大家過了一個快樂年，回到家里又過了一個年，一共過兩個年呢！我說，今年的大躍進，也要來個雙重的，那才够勁哩。

（王瑞英口述 練尚高整理）

方歧洲上九戶貧农

方歧洲紧靠烏龙江畔，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洲上有个小村叫方歧村。村上住着九戶人家，七戶姓林，都是兄弟叔侄，在洲上住了二十八年，兩戶姓唐，迁来才十年，和林姓結婚，全村都成了亲戚，今年都参加了城門人民公社。

快腊月了，这里的天气还是暖洋洋的。周圍十多里的果園林挂滿了紅桔，把树枝都压得弯下头来。田里的麦苗也青翠可愛。

今年是大喜年。城門人民公社的桔子，小年的产量超过了大年。

这下可忙坏了公社的采桔隊員們：日里夜里，成百上千架的梯子架滿了果園林。縱橫密布的小河里，运桔的船只穿梭不停。树上的鳥儿可倒了大霉，沒处歇脚，被赶得吱吱喳喳地四飞逃散。

一九五九年元旦，公社鰲峯生产大队的文化宮門前，張貼着一版惹人注目的詩刊。有一首詩写道：

小河清清弯又弯，
滿園桔子滿洲柑，
千紫万紅挂洲上。
今岁突破千載小年关，
更喜明年捷报大丰产。

各位同志，你道这方歧洲上的幸福景象是怎样得来的？要提

起过去来，这里面还有着許多悲伤痛苦的故事。小小的方歧村，就是中国农村的一幅縮影，村里九戶人家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五亿农民走过的道路。同志們要听，听我慢慢說来。

逼上方歧洲

一九一二年，在閩侯县尙干乡，林长佳、林依祥、林依发、林来悌、林妹仔等七戶貧农，被螺洲官僚地主好妹爷騙到“二十五步”这个地方来。

“二十五步”原来是洪水常淹，野草丛生的荒地。起初，好妹爷口口声声說：如果佃戶們修好堤坝、改良土壤，这里的果園和田地将永远租給他們，而且降低租价。七戶貧农忍飢挨餓，披星戴月地在这块土地上劳动了整整十九年，把这片荒洲开垦成肥沃的果園和田地。好妹爷不仅每年剝夺着他們劳动得来的成果——稻谷和柑桔，而且最后把他們租种的这块土地也剝夺了。

一九三一年的春天，正当桔花盛开的时候，好妹爷突然背弃了十九年前的約言，把这片土地高价卖给新主，并且限定这几戶人馬上搬家。

第二天，买主的家丁們到佃戶家里，捧鍋拆床，把他們赶走了。

林依祥的妻子牵着孩子金官，叹道：“走吧，孩子。洗干净脚，留下的泥巴总是人家的。”

佃戶們挑起破烂的家具，踏上新的苦难的路程。

一个滂沱大雨的寒天，长佳、依祥、依发胞兄弟三家从“二十五步”来到方歧洲上，用破木烂草搭起小棚，安下了家。

为了活命，又租佃了地主陈盖山和城門大少爷的土地。依祥

家里租了三亩半田，一年打粮十三担，租就交了十二担。没法子，只好借高利贷，终年米糠、薯渣不离碗，有时整天还吃不上一餐。

小金官不满十四岁，就扶犁下田，牛背遮没了他的头。

不久，流落在九江的林来保、林妹仔等四户因为受不了当地人的欺侮，也搬到方歧洲上来了。

就这样，林家兄弟七户在孤寂的方歧洲上相依为命地度着漫长的黑夜。

溺死女孩救丈夫

一九三八年冬，依发得了恶性疟疾，终日发高烧昏迷不醒。家里忍痛卖掉唯一的备做田本的小猪，依祥、来保把垂死的弟弟抬到福州塔亭医院。人穷命贱，医院除了给药和床铺外，啥也不管。

刚在坐月子的依发嫂听到这个消息，焦急地想到：“全家老少都靠他一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如何是好！唉，小女孩又没满月；叔伯都那么穷，放在家里，谁来养她？不如……”想到这里，她浑身战慄，泣不成声。

深夜，她抱着女孩，悄悄走到河旁。婴儿忽然哇地一声哭了，她又本能地紧紧抱住了孩子，露出干瘪的乳头，喂了最后一次奶。

她卷缩着身子，久久地坐在石板上，不断地吻着孩子，心里象刀扎一样，泪水滚滚。

鸡叫两遍了，不能再呆下去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咬了咬牙，闭着眼睛把孩子丢到河里去了。

她怕惊醒邻居，独自走回房间。头上包块破布，背上米糠和

薯渣，提根竹杆，支撑着产后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福州。

依发在她日夜照顾下，终于脱离危险。直到病好出院，她把溺水的事告诉丈夫，两人相抱痛哭。

灾劫重重

一九四一年，日寇的兽蹄踏进了福州。

田野荒蕪了，饥饿的难民吃尽了所有能吃的东西，大地上盗贼横行。

这个孤立在沙洲上的村庄，遭受到日寇蹂躏和匪盗洗劫的双重灾难。

年青的金官牵着村里仅有的一头牛，每天夜里披着蓑衣，躲在果園林中，不敢回家。

一个阴寒的夜里，三五十个盗贼洗劫了这个村庄。依发嫂抱住一缸谷种，拿着一根木棍，边打边喊救。有个盗贼抓住了她，把她推到河里。

劫盗扫荡了村里的一切。直到七十三岁老婆婆的一条破棉絮和一顶草笠为止。

大劫之后，依发才把攀在河边树枝上的妻子捞救上来。

不知是哪一个劫盗比较良心还是临走时跑得太仓促，他们在离村不远的岸上留下了一口锅。这算是全村最后的一件财产。

田野里的苦豆、地龙草都挖光了，村庄里空荡荡的。个个面黄肌瘦。走起路来东倒西歪。鬼子兵又驱赶他们修机场去。依祥、妹仔被鞭子打得遍身鳞伤。

村里开始死人了。

林妹仔本是兄弟中最结实的壮汉。在饥寒和酷打之下，瘦得

剩把骨头，眼窩深陷，死在床上。临死的时候，还張着嘴要飯吃。接着，他的大女儿也餓死了。

活着的人，釘了几块薄板，默默地埋葬了自己的兄弟和侄女。随后，扶老攜幼四散討飯去了。

妹仔的妻子帶走了八岁的水金和小女孩子阿妹。

半个月后，妹仔嫂抱着两只小貓踉踉跄跄地回来了。

琪花嫂子看到她只身回来，驚問道：“孩子呢？”

妹仔嫂瞪着直溜溜的眼睛，說：“換貓了。嘻嘻！还有阿妹，……日本兵拍的一声……完了！”接着，她倒下身子，翻着白眼，两腿抽搐。一会儿，死了。两只小貓窜到田里去了。

琪花看着被逼得发瘋餓死的孀子，想起了聪明伶俐的水金和阿妹，撫尸痛哭，喊道：“天哪！这是什么世道！”

鬼子走后，村里的人陸續回来了，可是貧困仍然紧紧跟在他们的身上。

牛

一九四二年，田地等着翻土，村里唯一的一条牛又被城門的慣盜“烏秃藩”偷走了。这素来被外乡欺凌的小村束手无策，老少哭了一天。

依祥只好又到地霸依壁家里借了十块光洋，把牛贖回来。

依壁露着两颗大犬牙，說道：“都是同乡人，借錢容易。我看，就这么办吧，錢不要你还，可是每年得替我犁田八亩，八年为期。嘿嘿！”为了活命，依祥忍痛接受了这个苛刻的条件。

到了第五年。一天，金官正替长侄伯犁田，依壁的大孩子气咻咻地跑来，說：“爹說今天要犁田，叫你把牛牵去。”

长侄伯伯央求道：“再过一頓飯时刻，田就犁好了。秧苗放

在田头，要是不种就枯死了。大少爷你宽容些吧，等一会儿就给你送去！”

那小子蛮不讲理，牵牛就走。牛也有感情，看着金官，动也不动。小子气得捡起石块当头就砸。矮壮的金官看到心爱的牛遭受惨打，不由得怒从心起，向前一个箭步，把这个高过他半个头的财主少爷踢个五嶽朝天，倒在田里，哇哇直叫。

长侄伯吓得死命拖住金官，骂道：“咱穷人家，怎好打人！”那小子一溜烟地跑掉了。

第二天，依祥怕惹事，把牛卖掉了。金官跟在背后直流泪。卖牛回家，走到半路，又跑回买主门前，偷偷地探望那头牛，依依难舍。

卖了四十块光洋，被依壁拿走了大半。说是要偿还他孩子的治伤费和还剩下三年的牛租钱。

夜 奔

一九四八年农曆十月十三日，夜空乌云密布。河里驶来了二条破船。

船主人唐依榜、唐银官带着全家老少，登上了岸，轻轻地敲着村人的家门。

一盏半明不暗的灯下，聚合着全村的居民。唐依榜声泪俱下的讲述着逃难的原因：“我大儿仿林前年被抽了壮丁。那时家住在扈嶼，向财主家借了十几挑谷买通保长，那知道不上一年连本带息滚到一百多担！唉，咱穷人家……”

“咱家哪能还得起呀，”依榜婆婆接着哭道：“财主天天逼租，连被子饭瓢也拿走了。眼看着没法呆下去了，就和银官侄儿一家撑小船逃来了。听说这里的乡亲待人好……”她牵着瘦弱的

孩子的手，把他的头偎在自己的怀里，說：“这苦命的孩子，在船上已經二天沒吃飯了，渾身發燒，做娘的……”她再也說不下去了。

北风刮得凄慘，灯光象鬼火一样地閃爍着。穷人知道穷人苦。全村老少黯然泪下。

金官咬着嘴唇，悲憤地說道：“天下穷人是一家。大伯，住下吧，有苦同当，有福共享！”

次晨，村里各家自动献出了杂粮，还帮客人到城門財主处租了几亩荒地。大家齐心协力帮唐家两戶除草翻地，种下禾苗。总算是一碗糠一碗菜地熬过了苦日子。

来了救星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大軍浩浩蕩蕩向福建挺进。党的地下組織积极准备策应部队解放福州的工作。

一个晚上，村里来个不速之客。他悄悄走进金官的家里。

微弱的灯光照亮了金官兴奋的臉。这个在风雨飢餓中掙扎成长的坚强的青年，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原来有个为穷人办事的共产党，而且是快到来了。他笑了，第一次自由而又欢暢地笑了！

从此之后，金官日夜忠实而又机警地掩护着地下党员的活动。

八月十七日，共产党来了。这是个难忘的日子。

方歧村九戶貧农第一次抬起了头，快乐而毫无顧虑地走进鄰乡，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金官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跟随着党，在村里举起了第一面紅旗，参加了全乡的斗霸减租运动。第一次减租，全村分到了三十三担谷子。

这天，全村老小笑咪咪地端着雪白的米飯，奔走相賀。

依祥爷爷笑道：“这辈子头次吃香米饭，恩情不忘共产党。要是妹仔弟还在，该多好啊……”讲到这儿，不禁泪下。

城門区里第一村

一九五〇年，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回了土地。

在乡里工作的金官和青年們領回了土地証。

金官一进门，就告诉依祥爷爷说：“爹，咱村分到了三十四亩田和一百多棵桔子树。这下可算是翻了身啦！”

“什么？”依祥爷爷瞪着半瞎的眼睛，问道：“咱村分到了地！”他笑得合不上嘴，“这下小孩們可享了福啦，往年滿洲紅艷艷的桔子是人家的，手拈也不敢拈。如今可好啦，这政府可算是为咱穷人！”

金官接着说道：“爹，我和元官商議过了，桔子树少，要让给别家！”

老人听了，点头贊揚道：“好孩子，做得对，有福不能占先！”他千次万次交代孩子要种好地。病了，独自扶着拐杖到田里摸摸谷穗，也觉得舒暢。

这年，全村丰收，家有余粮。

金官請了三个彈棉师傅到村里，全村彈棉被。

小孩子們乐得在棉花堆里打滚。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抗美援朝。金官随同乡里七个干部連夜到区上保証提早超額完成捐獻任务。

第三天，方歧村九戶人家把土改后第一次收穫的余粮晒得干干的。由元官領队，挑挑担子插上了紅旗，喜洋洋地挑到区里，得了全区的第一名。

記者來訪問時，老人們都說：“鬼子的難咱受夠了，怎能讓朝鮮兄弟叫人糟蹋！一兩担余糧那算得了什麼！”

一九五三年金官當選城鰲鄉的鄉長。金官是黨的忠實的兒女。幾年來從洲上到鄉里，來回十幾里地日夜奔跑。冬天，有時半夜了，洲上的橋被水沖走了，他脫下衣服，跳到刺骨的河里，泅水過岸到鄉里開會去。當上鄉長後，他仍然關心着村里的老少，幫助元官工作，在他耐心的培養下，元官和占姐於一九五六年加入了共產黨。他們叔孀兩個接下了金官的担子，領導着全村奔向幸福的道路。

一步一層天

一九五三年起，方歧村的九戶貧農在黨的引導下，毫無猶豫地選擇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也許，有的同志會懷疑地問道，難道一點曲折都沒有？

是的，貧農的本色就在這裡。尤其是這九戶貧農在長期同甘共苦的生活中已經深刻地体会到集體力量的偉大，養成了互愛互助的優良傳統。

他們常說這句話：“咱村是翻透身了，聽黨的話准沒錯。”

事實本身也說明了互助合作的優越性：

一九五二年八月，大旱四十二天。烈日如火，土地都裂開了。互助組（全村只組織一個組，元官當組長，占姐當副組長）動員家里老少，不分晝夜地踏水車、開渠。他們不要政府的分文貸款，從數里外的關山下挑了四萬八千多担的肥土。不但戰勝了災害，得到全县抗旱第一名，而且畝產從二百多斤提高到八百多斤，獲得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第一次大豐收。

唐仿林一家從解放前每年一百零四元的收入增加到六百元。

家家有余粮，梁上挂腌肉。

一九五四年轉入初級社，接着在一九五五年轉入高級社。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更为显著了。唐仿林一家每年收入从六百元增加到九百元。这个高級社养了二十多头猪和二百多头鸡鸭，增加了一笔大收入。

一九五五年，全社除生产基金外，还积累了四千多块钱。有人开始想盖房子了。

在毛主席的象前

一九五五年四月，金官帶領乡里的垦荒队到永泰县开发山区。

沒过两个月，金官回家。剛走进村里一看，全都变了样啦！

六幢新木房紅紅綠綠的排列在果園林中，全村老少，欢天喜地的象过节一样。

金官嫂笑嘻嘻地迎上来，說：“快来看看我們家的新房子。哎呀，家里可真好。叔伯們都說几年来你为村里干了不少的事，所以呀，大伙儿就替我們盖了三間新房！”

金官看到社員們的欢乐和大伙儿亲如骨肉的团结，心里也兴奋起来。

他独自走到过去的住地，破房的影子都不見了。方歧村人民用自己的手抹去了奴隶生活的最后一道痕迹。

他徘徊了片刻，走回房里，在毛主席的象前，端詳了好久好久……他笑着，剛毅的臉上挂着泪珠。

一九五五年末，依祥爷爷病重。依发杀了一只母鸡，煮了一大碗面，端到他屋里。

依祥爷爷躺在床上，搖着头，指着挂在梁上的燻魚腌肉，說

道：“三弟，我吃的有的是，別替我操心！”

依發答道：“二哥，如今翻了身，我當弟弟的才能煮上這碗雞湯面，吃些吧，物輕意重呢！”

兩個老人家談起了幾十年來的生活，象小孩似的邊哭邊笑，都說毛主席好。這是兄弟倆訣別前的最舒暢的一次談話。

人民公社好

房子蓋好了，可是一到晚上村里怪靜僻的，只聽見樹葉簌簌的響聲。

旗花婆婆叨咕道：“鄉里都按上廣播機啦，我們也按上一個吧。好听听政治听听戏，增添增添知識，夜晚也熱鬧。”

一提議，馬上全村都贊成。第二天大伙三元五元地湊合起來，買了電綫到廣播站請求裝廣播，廣播站的同志滿口答應，送了一架擴音器。社員們興高采烈地栽上了杆子，把廣播器安在食堂的外面。晚飯後，社員們聚合在播音器下，靜靜地听時事新聞和音樂。小學生們偎在祖母的懷里，娓娓地講解着他們所能聽懂的節目。

逢這時候，旗花婆婆常叨念道：“如今世道太平了，媳婦們可真能添養，哪一家的孩子不是三個五個的。村里八十口人，單孩子就四十二個。方歧村可算是財丁兩旺啦。我看，要改名叫添福村哩！”

如今，老一輩的男人除依發和依榜還健在外，其他都先後過世了。後一輩青壯年都露了尖，走遍五湖四海干大事了。留在家里的，都扎實能干、勤勞團結。要有哪個後生偷懶，老人們就會拿過去悲慘生活的例子勸導他；再不，就開個檢討會，批評批評，便改正了。

公社成立后，方歧村社員編一个小队，張占姐当小队长。大伙生产十分卖劲，每天結队出工，早出晚归。大队长經常来检查生产，总是翘起大拇指称赞：“你們貧农队是好样儿，干得实在！”

別乡的人經常称赞方歧村人，有詩为証：

方歧村人亲又亲，
东厝西屋不分鄰；
貧农生产团結紧，
八十口人心連心。

村里家家戶戶都挂了毛主席象。老人們有时还暗自朝拜，祝毛主席长年长寿！

素来忠厚的依榜爷爷說：“有这日子可就行啦！”可是后生們却笑老人家笔筒子看天，眼光淺。都說公社过些年要盖三层大楼，他們要搬到新村住哩，远的不說，眼下村里小食堂还要养八头猪、百只鵝，还准备利用村后大粪池搞沼气灯呢！

（ 陳 越 ）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我黃寶洛

去年八月十号，我突然收到福建农学院的来信，打开一看，是一份聘书。原来农学院要聘請我做教授。我当时心里乱了一陣。你想，我懂得沒几个字，做什么教授？“大概是他們把聘书写錯了吧？”我赶紧拿着聘书去找在我們这里实习的一个农学院同学，問問他。他对我說：“真的，我們学校要請你去講課。你有很丰富的实际經驗，我們很需要这样的土专家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翻来复去，睡不着。你想，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以前連书都不可能念，現在却一下子要去給大学生講課，自己怎么能够放心呢？我一想到，坐在台下听的人，他們都念过很多很多书，我心里真有一些害怕了。

我出生在一戶很貧苦的农家。从七、八岁起，我便开始看牛，帮田事。家里米缸底經常朝天，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用稀稀粥来度过。当然，那时更說不上讀書。有时，一大早，我騎在牛背上出去，看見那些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孩子，他們都穿得整整齐齐的，背着书包上学校去，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羨慕。我想，我要是也能象他們那样去上学，那多么好啊！有好几次，我下决心回家要和父亲說，可是一到家里，看見父亲那苦苦的臉，看見擺在桌上的三粒浮、四粒沉的稀粥，便只好把話吞下去了。

家里沒有人識字，那真苦！有一年，我爹到林浦地主六磨家里交租，地主欺侮我們不識字，故意把我們多算走两百多斤。

地主家里有人打算盘，打得嘩嘩叫；我父亲呢，不識字，不会算，只能用瓦片在牆上划行行。等到交完谷子以后，我父亲发觉自己的份几乎都沒有了，他臉吓得慘白，赶紧慌慌張張的把那行行搬手搬脚的算起来。一算，才发觉被地主多拿了。第二天清早，父亲便赶到地主家里去算賬；地主連理也不理，只拿出那張記數紙，抖了抖，大模大样的說：“黑字上白紙，錯什么！”父亲怕田被他收回，不敢和他爭。我們一家只好圍在一起哭了大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不止一次呢！我母亲那时不懂得地主狡猾，不懂地主剝削我們的道理，她总是說：“这就是我們不識字的苦啊！”

到我十岁那一年，母亲便想办法要让我去讀書；父亲不答应，他說：“我們現在做都不够吃，还讀什么书！不識字只好不識字啊！”母亲哭哭啼啼的和他吵，她說：“就是会餓死，也要让宝洛去讀！我們这一輩尝够了苦，也要让孩子将来有个出头啊！”我那时也吵吵鬧鬧的要去，我們的穷亲戚知道了，也都劝我父亲說：“哎啊，让孩子去吧，将来也有出头的日子！”我父亲被这么多人一說，再想想不識字的苦处，后来便也答应了。那一天，他紧紧的摟着我：“宝洛，不要怪你父亲，不是做父亲的不肯你去念啊……”說着，他眼泪便簌簌的流了下来。我心里真难过。

到了正月，我父亲便咬紧牙关，向放高利貸的借了几十斤谷，給我做学費，送我到隔壁村去讀書。可是我們穷人家的孩子就是上学去了，也沒有安閑。你想，家里本来是把我算做一个工的，我这一走，許多事情还能不积下来？所以我白天虽然听課，晚上却得帮助家里做事，不能溫习。要是到了农忙，干脆連課都不能上了。有好几次，我剛剛走到学校，家里却托人吩咐我回去

了。你想，这个样式能讀出什么来？

在我十二岁那年，家庭更困难了，哥哥没法在家里生活下去，便跑到长乐去做长工；父亲为了一家人能有几口米湯充飢，不得不整日在外面轉圈，这里求求，那里借借，这样，当然沒工夫干田活了。有一天，父亲对我說：“宝洛，我看这样下去也不成事，你不会讀出多少字，家里田事却又悞着，我看你的书就索性放下吧，我們不是讀書的命啊！”說着，他連連叹气。我知道家里的苦，沒話說，咬着嘴唇答应了。那天晚上，已經很迟了，我們三个人还没有去睡，都沒声沒息的坐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說不出的难过。突然，母亲长长的叹了一声，把我拉到她身旁，她叫了一声“宝洛”，眼泪便一下子流下来了，她不成声的对我說：

“宝洛，你就勤紧做两三年，等你哥回来再去讀吧！你不要难过，怪都怪你爹媽沒本事啊……”

这样，我在家里便当一个勞力使用了。我那时想：这一生和书本是沒有緣分了，要讀書，就等下一世吧……真的，以前穷人家孩子要讀两个字是不容易的。你想，书都不能讀，怎么还敢妄想教书？……

我躺在床上，愈想就愈不平靜了。象我这样一个以前被人家看做是“臭牛屎”的孩子，今天能够做到这个样式，我要是还不感謝共产党、毛主席，那还去感謝誰呢？我再想到，今天，党給我一个任务，要我去教书，我能够不去嗎？当然不能。我一定要去教，而且要教得好好的，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給我的大恩情！

想到这里，我翻起身来，点了灯，决定要立刻动手写講課提綱，要准备得很有把握的去講，才能講得有条有理。

但是，写什么呢？我拿着笔伏在灯下一直想。叫我講理論，我实在講不来；要講就只能講我所熟悉的，所做过的事情。我下

了决心，拿稳了笔，在簿子上歪歪斜斜的写下“水稻丰产经验”六个字。我决定要和同学们谈谈我怎样选种，我怎样密植，我怎样防倒伏，我怎样利用浅水灌溉……主意一定，便在簿子上写下“我……”但只写这么一个字，我的笔便突然停了。

说句实在话，我一开始做田，就是很注意怎样把田种好。我们租六磨那五亩多田，都很坏，产量很低；我经常都想，这几亩田要是产量能提高，我们生活也许就会好过些呢！所以一有闲，我心里便在盘算，想办法。我那个时候决定要多施肥，想肥料一多田一定就会好起来；可是，我们这么穷那里有錢买肥料？要肥料都只好自己积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很早起来，到路上去拾牛屎猪屎；平常稍稍有一点空，便带了土筐，到一里外的地方去，把土一担一担的挑回来，这样辛辛苦苦的搞了不知有多久，那瘦死死的田，才渐渐肥了过来。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也就很注意选种了，平日间经常在田里巡视，一看见有硬硬粒多的穗，便摘了来，揀了又揀，一年一年的培育着，好容易过了几年，所有的田才都播上这种好种子。

那一年，田里肥下得多，又全部都用好种，又经过一番精耕细作，所以稻子长得特别好，整整齐齐的看过去很爽快。我那时想：这下该好了些吧！同村人看见我稻子长得这么好，都称赞我，很多人还都向我要那好种子。我们全家都在暗暗高兴。

可是，欢喜没过悲又来了。到快收割的时候，地主却来这里巡了一巡，他看我那里稻子长得好，便笑笑地点点头。这头一点，鬼主意便来了。第二天，我父亲便被叫去。他对我父亲说：

“你那五亩多田……我要收回去了！”我父亲吓了一跳，接不上气的说：“怎么，我们做好好的要收回去？我们又没有欠租啊！”六磨冷笑了一下，说：“田是我的，我要给谁做就给谁做！”说

完，便轉身走掉。我們全家那時真愁死了。你想，田要是被收回去，那明年做什麼？最終，我父親只好想法，花了一担多的菜和馬鈴薯做人情，托六磨的一個親戚去疏通一下。結果，六磨說：“講句實在話，我那好田，給別人嘛，至少可以多租四、五百斤……現在這樣吧，給你們面子，假使你們也肯加租，這塊地就再租給你們吧！”我們那時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承受下來。這次以後，我父親就連連嘆氣對我說：“寶洛，你不要費神了，田做好有什麼用，做半死還不夠地主加租呢！”其實，那個時候，不要父親說，我自己也已經夠掃興了。有個晚上，我在房子里愈想愈氣，便把桌上一杯選好的種子倒到窗外去了……

一直到了解放以後，我才又開始細心的試驗起來。你想，田是自己的了，不好好干，還想什麼呢？一九五一年，我們閩侯專區開了一個評種會，我被評了第一名，政府表揚我，還獎給我一架嶄新的水車。我心里真感動。我們黨和政府真是太好了！這以後，我的勁頭就更大了，我想盡辦法要從各方面來試驗，提高水稻的產量。那時，政府真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每年單單農貸就有一千元左右，我們要什麼肥料，政府就撥給我們，象去年我們搞高產田，政府單是過磷酸鈣就撥給我們一千兩百多斤。政府知道我在搞試驗，還派了許多幹部來幫助我。象有一次，我選南特號時遇到一個困難：揀不出穗子中的紅粒，省農業廳就派了一個人下來幫助我，結果，我們南特號就選得很成功。黨和政府不僅在物質上支持我，在精神上還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鼓勵，從解放到現在，我被評了十七次的勞模，參加過全國勞模會議。

真的，我自己知道，要是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和鼓勵，我是什麼也做不出來的……想到這裡，我便把簿子上的“我”字划掉了。我想，我那天站上台去，第一句便應該對同學們說：“一切

成績都屬於我們共產黨！要是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也就沒有今天的黃寶洛……”

（黃寶洛口述 練向高整理）

王 茂 玉

我出生在一个貧农家庭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光着屁股被我老爹带着往山上跑田里鋤。我九岁就学会了种田。我們苦人仔那有地主少爷們的“福气”，过去人說：“財主仔金仔銀仔，穷人仔柴头椅仔。”現在看来，做“柴头椅仔”也有好处：使我从小就欢喜劳动，不懂烟酒嫖賭那套玩儿。因此，我不仅会种田，还无师自通地学会打繩、补架、箍桶等十几种工艺。村里誰家桶散了，都是拿来請我尽义务給修好。乡亲们都說：“有茂玉在，箍桶担不要想进村。”

我从小养成这样一种犟癖性：身子一天不动彈，就象病一样难受；一件活碰到我手上，总欢喜捉摸一番，摸出了新門徑，好象得了金子一样高兴，摸不出，几天都不要想好吃好睡。当我种田种到二十几岁，就逐渐体会出一条道理：种田看来好象是粗活，其实是細活，越鋤越深，是一門大学問。这时我有个理想，把水稻亩产提高到一千斤。这个理想我从来沒敢說出口，只是放在肚子里想。我第一步就注意选良种。当时稻种太杂，稻穗粒数又少又小，实在不行。后来听說“南特种”是好种，我就想在田里做試驗，培育南特种。我着手建“試驗室”。可是我家只有一間矮矮的木房子，小得象个鳥籠，又分两层，楼上放两架床就很挤了，楼下也沒空地方。我不管这些，做一个木架放在床下，把买回来的几个甕子贴上标签安置在木架上。永安来的南特号种到

手，經過晒干揚淨，簸箕篩，坐在小椅子上一粒一粒地挑選，把最大最鮮艷的放進甕子里去。我經常在選完種走出房門時，總要回頭看看我的試驗室，樂得閉了眼睛張開嘴唇。有了良種，再加上精耕細作，真的第二年一畝多收了兩百多斤谷子。全家人都非常歡喜。

一畝地多收兩百多斤谷，在那時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這消息立刻傳開了。鄉親們听了非常歡喜，紛紛挑谷來換種，我們一家人都非常樂意，除留一點自己用，樓梯下的谷子一下子換光了。有的換幾斤也覺得高興。

有天，門口突然響着粗野得象豬叫般喊茂玉的叫聲。听聲音就曉得是惡霸敖里金，我馬上出去應接。我應聲一落，他馬上又張大豬嘴叫：“你要等到什麼時候送租？”他手靠在文明杖上，豬頭略略向上。我趕緊答道：“因為鄉里愛我種的種，要換，換來換去，因此遲了幾天。現在我正想送去。”他走近一步說：“等下送去是可以的，不過，剛才你也說了，稻子長得滿好，大丰收，這當然是我田好的緣故，所以明年要加租一担。”我馬上千求萬求請他不要加租，鄉里親戚也幫我說盡了好話，我哥哥還親自到他家里哀求，都沒有用。他倒威脅說：“你不要，我就把田租給別人。”我們也想不租他的田，但沒有辦法，只得含着眼淚咬緊牙關答應照加。這實在掃興，我的畝產一千斤的理想也就破天了。

共產黨來了，我們窮人見到了青天。我听黨的話，立刻帶頭組織起變工組，一九五二年辦起了自發社，我當上勞動模範。一九五三年初級社正式成立，我當了社長。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是我最難忘的日子，我入了黨。從此我的眼睛更亮了，看得更遠了，我下更大的決心要實現解放前無

法實現的願望——亩产千斤粮。

五月是稻子成熟的时节，也是选穗的好机会。这时我是多么舒心如意呀，有几百亩的田任我去挑选良种。我天天利用空闲时间去找，眼睛看花了，也找不到一穗满意的。因为我对选良种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夏收开始了，社里大忙起来，我还依然利用一切机会把选种工作坚持下去。吃好饭，我就下田去挑选。我走在路上，总象我最理想的穗子在田里什么地方呼唤我，惹得我一边走路一边看稻穗，生怕埋没“良才”。由于聚精会神在物色良种，竟时常把路走错，闹笑话。终于有一天中午，在一丘田中发现了一穗我最理想的新穗：穗大，秆大。我如获至宝，把它轻轻摘下，松松地握在手掌心，一路上翻来复去的看，到家马上存入新置的甕子里。接着陆续发现了很多理想的稻穗，十几个甕子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良种。以良种种的庄稼，很快就见效了，第二年夏天稻长得如剪刀剪过的那样平，非常好看。鉴定结果，有一种长达一尺的稻穗，每穗平均二百多粒，稻秆粗壮，不易倒伏，亩产一千六百斤，比“南特号”高一倍。后来人家把我培育的良种叫做“茂玉一号”。不几天，各地纷纷来换种，最后只留下两穗，后来还拿到省里去展览。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生产要学东塔社，办社要学老大哥。”我非常感动：我作出一点点的成绩，就受到党和群众一再表扬和支持，没有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我能作出什么呢。

“茂玉一号”穗粒还是少，我总想叫穗粒再多长些。一九五四年，我和黄宝洛同志到海澄参观水稻，一见倾心，那里的水稻穗粒又大又多。我想摘些，介绍员说：“还没熟，不要摘。”我不管，还是偷偷地摘一穗放在袋子里。回来一种，因为地气冷，变了种，收成比“茂玉一号”差。经过几次试验，穗粒还是没有

增多。

几次失败，我没有灰心丧气，倒给我总结了一点经验：不能光靠选穗培育来增加穗粒，还要找新的门路。

一九五五年我找到了新的办法。有一天，农科所同志告诉我“杂交”培育的方法，我听了惊讶半天，这个名称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请他详细讲，以便一一记在心里。我欢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就地作试验。回来我就仔细观察，发现乌壳尖种穗大粒多，秆粗耐肥，产量较稳定，但它的缺点是容易脱粒。另一种乌梨尖恰好不容易脱粒，产量也不错。我决定让它们俩来“结婚”。中午天气暖和无风，是穗子扬花的时候，正好是进行杂交的好机会。我不肯放过这良机，天天埋在教场田洋里作试验。日头象火一样热，我的眼睛给汗水流糊了，衣衫也湿透了；我擦擦脸上的汗，依然耐心地操作，连午饭也不回去吃。到了日头偏西，肚子哇哇叫，才回去吃中饭。一天，我刚从田里走上田埂，社员吴用朽高兴地喊道：“社长，试验成功一定给我们一点啊！”我笑笑应道：“可以。这种今年才试验，数量不多，各队都要分配一些。”他竖起大拇指笑道：“我们的社长真公正！”

这年夏天杂交过的种子播种的田，谷穗都是沉甸甸的，大家都叫好。田间鉴定结果，新种比乌壳尖耐肥秆粗，抗虫抗倒伏性也强。每穗平均有四百五十粒，比原来多了几十粒。估计亩产在两千斤以上。大家把它叫做“茂玉二号”。同时试验成功的还有“太冬”和“红壳朮”杂交的“茂玉三号”。

后来，我又陆续培养了許多良种，有的去年已送到保加利亚等兄弟国家去。

一九五八年全国来个大跃进，我心更热起来。在党委直接领导下，我们的水稻研究小组也成立了，我当组长。公社成立后，

我們的工作条件更好了。过去迫我加租的恶霸敖里金的大房子，做为我們的研究室，里面还設有图书馆。在长长的桌子上，排滿玻璃瓶子，里面裝滿水稻良种标本。白壁上还挂着竹竿长的禾稻，穗子又长又粗，让各地人民来参观。壁上还写着毛主席的話：“富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真有意思。

去年跃进一下，我們“城門紅专大学”也办起来了。我馬上报名去当个好学生；嘻，沒想到何書記却要我去当“教授”。我去講了一些农业科学知識。这样一来，我們的帮手可多啦。一九五八年秋收，参加选种的就有四百多人，共选出优良品种七千多斤，比去年增加三倍。真是，旧社会越做越扫兴，新社会越做越起勁。

人越有勁，就越想学习。一九五三年乡里来了抽水机；学吧，我手摸着机器，心里真痒。当时一有空就跟机师、年青人混在一起，沒好久我学会操作了。年青人笑我“年老学閻猪”。当然囉，社会主义机械化生产嘛，只会捆繩，打繩等能頂得了嗎？

一九五八年五化运动开始了，要先在东塔耕作区平整土地，迎拖拉机耕田！当天晚上我端端正正的坐在灯下，学做“設計師”我粗硬的手抓一把鉛笔，往头发里搔着，一直考虑着这些問題：那一丘和那一丘合并，道路沟渠如何合并，劳动力怎样組織，……仔仔細細地想了又想，然后画一張原田分布平面图。第二天天剛亮，我赶做了一把木輪尺，冒着风雨到田間丈量設計。苦战了一天，把平整土地設計图拿出来，人家又称我“农民科学家”。十天以后，东塔耕作区几百块小田已連成五块整齐寬闊的田地。接着，拖拉机就在这片平坦的田野上跑着叫着。看那駕駛拖拉机的小伙子，神气真足，我又从心底里羡慕他来。我現在虽然当公社副社长，工作多了，如有机会我真想再来个“年老学閻猪”。

（王茂玉口述 叶國良、林山整理）

永不褪色的紅旗

——記失去雙腳的共產黨員張科林

在我們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里，每時每刻都涌現着許多創造奇蹟的人，處處都可以看到激動人心的事情。這裡，寫的是閩侯縣城門公社浚邊村一個失去兩隻腳的共產黨員，當年他為革命勝利獻出了一雙腳，今天他還在為偉大的建設事業貢獻着殘而不廢的身心。這個頂天立地的人，有如一面永不褪色的紅旗，他的名字是張科林。

定叫荒山桃紅柳綠

去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和暖的陽光照耀着大地，一切都抹上了金色。田邊上柳樹吐出淺綠色的嫩芽。遠遠看去，山坡上好象披上了一層青紗。張科林扛着一把大鋤，迎着晨風，上青梁山開荒去了。青梁山離浚邊村有三里多路，山路崎嶇不平；這是他回到鄉里的第一次戰鬥。自從安上兩條假腿以後的這八九年來，他還沒走過這樣的路。走一步，冒一陣汗，沒走幾丈遠，兩腿又酸又痛，內衣全濕透了。張科林回過頭來看看，村子炊煙裊裊，才發覺已經中午了，而自己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這樣來回一趟半天時間還不夠。半天跑路半天生產怎行？他坐在田塍上沉思着：象我這樣的人，能參加開荒生產嗎？他翻來復去一直想：能，一定能，困難總是人克服的。他想起了八九年前剛裝上

两条假腿时自己是怎样练习走路的，那时假腿刚装上，不要说走，就是连站也吃不消呵！现在不是走得好好的吗？既然在平地上走路没问题，走山路的困难同样难不倒我！想到这里，张科林象添了股劲似的，忽地站起来，迈着有力的步子，继续前进。到了山脚下，仰起头望望：这山可不低啊！他顺着山边好容易走了一段，看样子再向上走不行了；膝盖下面是假腿，弯不过来，走上坡路肯定不行；于是他便弯下身子用两只手撑在地上爬。但是，左臂里至今还嵌着敌人的五颗子弹，伸起来比右臂短两寸，伏着爬一只手支撑不住，于是，他便侧着身子爬……。爬呀，爬呀，衣服被荆棘扯破了，手指甲里塞满了泥草，涨得难受，他全不理睬。爬着爬着，脑子昏沉沉的，他在山坡上坐了片刻，往下一瞥：那绿一块黄一块的田畴，象绶子般的，村边的闾江就象一条银色的带子，眼前还有娇嫩的桃花……。家乡多么美好的风光啊！张科林感到心胸十分宽阔。他又看看山上，光秃秃的一片，不禁自言自语道：看吧，过不了几年，定叫你桃红柳绿，果树成荫。他抽完了一袋烟，又伏在地上，拚着全力往山上爬。不一会，终于到达了山腰中的一片斜坡地。

这时，社员们已经吃过午饭，大伙都上山开荒来了。张科林在山上用胜利的微笑迎接大家。人们以惊奇、疑惑、敬佩的目光看着他。他的弟弟张科题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他：“你怎么不等大家一齐来，摔下去怎么办？”他擦擦额上的汗，笑道：“和你们一道来，你们不抬我才怪呢！”收工的时候，他弟弟要驮他回去，他没答应，说：“你不要把我当小孩子，我能上也能下，你让我试着自己走，开头难，以后就好了，这有什么可怕的。”

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卸下假腿，大腿上都肿红了，膝盖上的皮肉被假腿磨烂了。他不声不响地敷上药，用纱布包包扎

扎。夜里，伤疤发炎，疼痛使他一夜沒有睡着，但他沒吭一声。第二天，他沒上成山，坐在家里悶的慌，心里忖道：上山的这一关一定要闖过！他指着大腿自言自語的說：“你也太嫩了，一定要磨練磨練。”歇了两天，張科林又上山了，七八天的功夫，他終于学会走山路，爬山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一鍬一鍬的开出了两亩多荒地，还在山坡上鏟了草皮五、六十担，埋在地下作肥料。在两亩多的荒地里，他种下了一百二十多棵南瓜，七百多棵玉米，七十多棵山芋，五十多棵芋头，还有綠豆、白菜……真是五花八門。

山洞为家，百折不撓

荒开了，庄稼种下了，培植起来可不容易啊！下了几場雨以后，黄黄的地里长出了嫩綠的幼苗。張科林开始为施肥做准备工作了，不能挑担，每天上山就背上点肥料堆在地头。春末夏初的天气；雨天多晴天少，雨后山路滑，他一步也不能走，下山更困难。不过，这也难不倒他。張科林朝山腰里，挖了个大洞，在里边安了个鍋，备点粮食，还放块門板当床鋪，碰到雨天他就不下山，自己燒燒煮煮，干疲劳了就在洞里躺上一会儿。有一天，雨特别大，山上的石头冲到田里来了，地里积满了水。他冒着雨下田搬石头、挖水沟。雨大地滑，假腿活动不方便，一不小心，跌到山沟里去了。这一跤摔得他昏过去了。这时山野里一个人也沒有，他倒在山沟里半个多小时以后才苏醒过来，觉得全身疼痛，手臂、膝盖好几个地方火辣辣地，仔細一看原来是擦破了皮。进山洞歇一会儿呢，还是繼續干呢？歇吧，眼看一片嫩綠的幼苗被雨水淹沒心里舍不得；不歇吧，实在又支持不住。就在这十分矛盾的时刻，他又一次記起自己离开部队时，政委同志对他說的

話：“你的身體殘廢了，但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永遠是堅強的。在今後的生活里，你會遇到各種想象不到的困難，怎樣對待生活對待困難？我想你會按共產黨員的標準作出決定……”。若干年來，每當張科林碰到困難和苦痛的時候，他就想起這段話，一想到這段話，他渾身就充滿了力量。現在，他又抖擻精神，用鋤把從山上滾到地里的石頭撬掉，接連挖了三條水溝，直到地里的積水淌盡了，才鬆了口氣，坐到山澗里舒暢地吸起煙來。往後的幾天，他趕着晴天，把地的圍岸加到二尺高一尺寬，還在四邊栽了一百多棵樹，保護圍岸。

一個多月以後，當南瓜結得有拳頭大，玉米長到尺把高的時候，張科林累倒了。鄉里村里的幹部和群眾天天來看望他，安慰他。

黨和群眾的關懷，使他感到自己無窮的力量。在臥病的日子里，張科林常常想起“把一切獻給黨”這本書。這本書他是很早就讀過了，他一直都拿吳運鐸同志當做自己的學習榜樣。當他病還沒完全好的時候，又強打精神出席了一次黨的會議。鄉支部書記劉希瑞大大表揚了他，說他是一面永不褪色的紅旗。會議結束以後，劉希瑞語重心長地批評了他：“老張，你以後要聽聽大家的，按着自己的性子猛沖猛干是不行的。你也要看看你的身體，有些事情實在不能做的就少插手，要實事求是呵！”張科林感激的說：“老劉，我一定聽你的話，以後一定能做什麼就做什么。”

“張叔叔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張科林病一好便參加了夏收夏種，在村子里的十個打谷場上，都留下了他的足印。每天他都要去各個打谷場上跑几遍，看

看谷子打的精細不精細，見到有些社員攢谷子不四面攢，就提出意見，要大家多攢几把。乡里展开了积肥运动，張科林不能挑河泥，就用草耙子在塘里沟里扒，在村头巷尾扫垃圾，結果他一人积了二百多担肥料。

他和学校里的几个小朋友在村子的北头种了一块試驗田。插秧开始了，他两条腿不能下水，便用一块小門板摆到田里，上面放着小凳子，右手插，左手推門板，插一把秧，門板往后推两下。門板坐着的地方沉，水又深，泥又烂，不知有多少次跌倒在田里，两条腿深深地陷在冰涼的泥水里，浸得伤疤刺痛。但他咬咬牙，把腿拔出来，繼續不停的插。这种坚韧顽强的毅力感动得孩子們流出了泪，他們說：“張叔叔是我們学习的榜样。”

鋤草的时候到了，他和小朋友們分工，小朋友鋤田中間的草，他負責拔田边的草。在灼热的阳光下，他拖着沉重的身子，在狭窄的田埂上一边爬一边鋤，数不清的杂草被他一根一根的拔掉了。草淨肥足，田里的稻子比周圍的几块田长得好，連續两次得到了紅旗奖。

秋收的时候，当他和小朋友們在收割自己的劳动果实时，內心的激动再也抑止不住了。在这块田地里，在这片金光灿灿的稻禾上，他洒下了多少汗水啊！休息的时候，他坐在田埂上，摟着一个頂小的孩子，一边吸着烟，一边兴致勃勃的对大家說：“今天我們劳动为自己，也是为大家，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全部拿出来，才对得起今天的时代。要做好一件事不会沒困难，但是困难就这么回事：你怕它就克服不了它，你比它硬，它就听你的了。”他把烟斗里的灰敲了一下，又領着孩子們繼續收割了。稻子在微风里摆蕩，起伏着金色的波浪，張科林一边割一边講战斗故事給孩子們听，故事講完了，孩子們报以清脆的歌声，田野里

处处呈现着丰收和欢乐的景象。

钢铁战线上的驍将

初冬，閩江两岸，千百万人正在为钢铁而战，为粮食而战。在这沸腾的人群里，張科林不愧是一員钢铁驍将。

自从公社党委发出日产五十吨铁的号召以后，張科林的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着：炼铁要有铁矿，什么地方有呢？他記起了人們过去說过的在山旁的小水沟里走一走，脚上尽沾着黑沙土，心想莫非这就是铁砂？他决定到山上去看一看。

天还没亮，張科林起床了：他把两只二十多斤重的假腿装上，裹了又裹，綁了又綁。急急忙忙吃了早飯就上山了。翻了几个山头，他累得上气接不上下气，有时就在山上爬着。就在他十分劳累的时候，山腰里的一条明彻的溪水躺在他的面前了。在溪水拐弯的地方，他把手伸到水里。多么凉爽啊！他全身顿时轻松起来。只見碧清的溪水里源源的黑色砂粒随着溪水流下去，他高兴得叫起来。山那边来了几个社員，大家一看，果真是铁砂！

第一个铁砂源地找到了，張科林并不滿足，他又轉到春梁山脚下，先在一块稻田里挖了一臉盆砂，洗一洗，看看这块地里含砂不多，他又走到紅薯地去挖。他把坡上坡下和田的中間各挖了一臉盆砂土，洗的結果，坡上砂多，坡下少，但也不比稻田多多少。他想：既然靠山坡的地里有砂，那么道路旁边也一定会有的。他走到路边去挖，路边的土硬得象石头，鏟子插不下去，挖是不行了。咋办？鏟子不管用，就用手慢慢扒！原来铁砂往下墜，經過风雨冲刷，沙土很少，留下的尽是铁砂。这是多么珍贵的发现呵，虽然用手扒很慢，他却越扒越高兴。手指头被磨破了，不覺到痛，太阳偏西了，也忘了吃飯。他的心被铁砂迷住

了。見到路边有几堆黃土，他也去挖了一臉盆，洗了一下，鉄砂可真多，一臉盆竟洗出五六兩。見到干涸的水沟里有很多陷下去的塘，他想鉄砂是往下沉的，塘里一定也不少，他挖了一臉盆，也洗出了很多鉄砂。他不顧疲勞，不顧飢餓，不顧疼痛，那裏有鉄砂，就往那裏挖，巴不得一下子把地下的寶藏全部翻出來。

从霞光滿天的早晨，到明月當空的夜晚，張科林一刻不停地在洗鉄砂。沒有兩條腿，一只膀子又不靈便的人，怎能比得上一個四肢健全的人洗的砂多呢？別人洗三盆，他才洗一盆。“趕上去，一定要趕上去，決不能落在別人的後面。”每當大家回去吃中飯吃晚飯的時候，張科林就偷偷的留下來，這時他什麼都不顧了，索性把兩條腿往塘裏一伸，揀只大水桶，裝滿砂，拚命的洗，衣服搞濕了，他不感到冷，冰冷的水刺着腿上的傷疤，他不覺得疼，為鋼鐵而戰的思想蓋過了一切。估計大家快來上工了，他才不聲不響的順着小路回去吃飯，從不讓別人知道。

用臉盆脚桶洗砂，效率低，把工具改進一下該多好啊！他琢磨了几个晚上，終於做了个元宝形的小木槽桶，兩頭高，中間凹，上面釘个手提把子，砂裝進去，只管放在水里漂。洗得又快又干淨，泥沙漂走了，剩下的尽是鉄砂和石子，再用竹笆子一濾，全是鉄砂了，沒有一點雜質。他的这个創造，立即推广開來了，使洗砂的速度加快了四倍。

为下一代艰苦劳动

公社成立以后，村子里要办儿童食堂，当时只有三間空房子，別的东西一件也沒有，困难真多。張科林自告奮勇的去担当筹办儿童食堂工作。他跑了好多路，到蔣宅、臚雷去借蒸籠，又

把自己家的水桶、盆罐、碗筷送到食堂去。在他的影响下，很多社員都把多余的廚房用具、桌凳、碗筷送給食堂。这个四百多人吃飯的食堂，在他筹划下只花了八、九元錢就办起来了。

为了改善伙食，他还帶領孩子們栽了六千多株菜，把自己养的九只鸡也送給了食堂。每到开飯，他总是帮年岁小的孩子盛飯打湯，直到孩子們吃完了，他才吃飯。現在，張科林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兒童食堂里工作，从对食堂人員进行思想工作到帮孩子盛飯，什么事都管，一天从早到晚真是沒个閑的。一天晚上，炊事員林瑞英怨声怨气的說：“一天忙到晚，这工作沒什么意思。”他听到了，严肃的对她說：“劳动不分什么高低貴賤，越是艰苦的事，越是不被人注意的事，才是最有意义的。让孩子们吃饱吃好，全心全意为了下一代，这是非常光荣的劳动呵！”

在党教育下成长

張科林現在是閩侯城門人民公社龙江大队的党支部委員，今年才三十九岁。在旧社会，他尝尽了人間的苦难；家里沒有田，只有半間破草房。在生活的逼迫下，他的两个弟弟卖了，一个弟弟給人家当长工。他三岁時，父亲死了，連块棺材板都沒有，母亲出外流浪討飯。張科林六岁时就給人家放牛放鴨子。到头来，还是連張嘴也糊不过去。以后，又被反动派抓去当兵，吃尽了苦头。

一九四五年一月，張科林投奔新四軍，他觉悟高，打仗勇敢；当年的四月里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張科林的生活道路上展开了新的一頁。由一个被压迫、被剝削的劳动者变成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他曾为了这个崇高壮丽的事业，在枪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战斗，以至失去了两腿。一九四六

年的一月，在山东賈汪和国民党反动軍隊作戰中，他率領尖兵班冲开了七道圍牆門，爬上敌人的碉堡，塞进手榴彈，一声巨响，碉堡里的八个敌人炸死了七个，一个当了俘虏，为后續部队的胜利前进开辟了道路。在这次战斗中他被評为二等功臣。第二天，当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作瘋狂的反扑时，他帶領战士们掩护大队撤退，不幸負了重伤，两条腿的下半截被敌人的炸彈炸掉了。此后，他在医院里躺了一年多，不断与伤口的痛苦作頑强的斗争。出院后，他又在殘廢軍人教养院里度过了几年。一九五七年他在省民政廳工作时，正值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他就带头响应这个号召，坚决要求領導上批准他回乡生产。

× × ×

高度的共产主义覺悟，对党的无限忠誠，坚韧頑强，舍己为人，这是張科林同志的最大特色。一年来，他的事迹不知感动了多少人，教育了多少人。这一年来，他接待了无数的来訪者：工人、农民、軍官、士兵、学生、作家、詩人、演員……，每当訪問者問起他的那些动人的事迹时，他总是謙遜的說：“我没有什么，这都是党教育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呵！”

(贊伊)

郑 鴻 仁

一九五二年入冬以来，城山村互助組长郑鴻仁越来越感到苦惱：他这个八戶組成的互助組，每逢到了农忙季节，組員們都要你爭我搶的先干自己田里的活，爭先恐后的結果是影响了生产，大家又不滿意。目前，有些人的田，冬耕翻土还没有完，冬种又要开始了，有什么办法才能安排得合理，让大家滿意呢！

这年年底，地委派来了工作組，要在城門試办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鴻仁听说要办初級农业社，土地入社，由社里統一經營管理，高兴得飯也吃不下，就去找工作組。

工作組林仲鏗同志把重点試驗办社的情形对他談了一些，又說：“各村比較，我們认为东塔的群众基础較好，决定在东塔做試点，先办一个农业社，做出一些經驗，然后再推广各村，普遍办社。”鴻仁一听，急坏了，他想：难道我們城山就是落后村，就不能先办社？主意拿定，便对林同志說：“老林，我們城山頂也先办一个农业社試試看，我們一定能办起来，你看怎样？”林同志想，其他干部听到办社，对于土地入股，社員投資都感到辣手，而鴻仁却这么急着要办社，信心也很大，便回答他說：“可以研究研究。”

鴻仁办社心切，很想学习一点經驗，便跟着工作組到东塔去看看。他从东塔回来，馬上先和茂炳商量了一下。

茂炳是鴻仁的姪子，年齡却跟他差不多，两个人跟兄弟一样

很合得来。茂炳很敬服鴻仁，又念过几年书，能写会算，在互助組里当記工員，是鴻仁的得力助手。茂炳听說要找人商量办社，便急着要去喊人。

鴻仁問他：“你先找什么人？”

茂炳想了想說：“找宗文、木利、还有矮四、忠潮。”

鴻仁点了点头，說：“对，这几戶都是貧农，跟我們一条心，办社就是要依靠他們。我問过工作組，象金官、忠俊那样的老中农也需要团結进来。”

两个人分头把这几戶都找来了。

老中农金官、忠俊是組里的富裕戶。金官精明能干，技术好，外号“三多”：土地多，人口多，顾虑多。他首先单刀直入的提出了一个問題：“要办社，政府能貸多少款？”接着，道出了他心里的話：“我看哪，还是让东塔先走一步，东塔王茂玉办了社很不妙，养鴨，鴨死，魚塘里的魚也溜去了，你看，这有什么好办的？”

忠俊听金官一說，心里也犹豫起来。不过他是“牆头草”，吹东风向西倒，吹西风往东歪，胆子小，耳朵軟，一时拿不定主意。

茂炳、木利等几戶貧农积极拥护鴻仁，主張办社；但鴻仁覺得戶数太少，又想把几戶老中农也团結进来，便告訴大家不要太性急，繼續发动大家入社。

鴻仁有心要找金官，便向金官的田里走去。金官正扛着木犁回来，鴻仁笑着对金官說：“你看看，土改分田以后，田丘多起来了，你这个犁手，犁起田来牛也不好打轉吧。”鴻仁見金官同意他这个說法，又接着說：“土地入股，办起初級社，就能并丘不要这么多田墜了。”金官是个精明人，当然知道鴻仁的来意，

他想了想，在心里打了一阵算盘，说：“我是算这么个账，我有五亩田，入了社，按人口劳力分配，我恐怕只能种三亩，我家不是要减少收入。再说，我的农具也比别人多。”鸿仁向他解释道：“你这个账算得不全面。土地入了社，人多好干活，每亩的产量增加了，三亩收成能抵上五亩。农具是折价归社，农具多也不吃亏。金官，我们世代都是这样做，一把锄头一把犁，一辈子做半死，结果还是愁吃愁穿，‘牛出力来牛吃草，东家（地主）吃米我吃糠’，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如今再从单干变成集体，大家的生活都会富裕起来。”金官听了，心里打着算盘，觉得鸿仁说得句句是实，句句有理，又见他态度亲切，是个办事的能手，便同意入社。

鸿仁又跑到忠俊家说了一阵。忠俊抽着烟，对入社的事不肯干脆答应。鸿仁猜出他的心事，便恳切的对他讲：“看起来，你是比那几户贫农富裕些，可是比起敖里金来，你可又差得远。敖里金有田园、果树，粪船无数，可是这是一家富千家穷。敖里金在土改时被斗倒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我们办起社，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互助，生活生产上的困难都有办法解决。”

忠俊听到敖里金，心里动了一下，忽然反问：“你家能拿出种子？”鸿仁毫不迟疑的回答：“我宁肯家里没米吃，也要第一个拿出谷种来。”忠俊的心里又动了一下，思前想后，也答应入社了。

金官、忠俊这样的老中农肯入社，要求入社的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一九五三年年初，初级社便在城山村成立了。

社成立后，首先碰到的困难是缺乏资金买肥料，没有肥料，就好比打响了锣，演不出戏。社里的贫农愿意出钱，实在拿不

出；中农有錢又舍不得拿出来，而且还放出空气，說本錢都是加一五利息借进来的。

鴻仁为这事好几夜沒有睡好覺，四方形的臉龐漸漸瘦削下来。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已經大半夜了，他老婆埋怨他：“一天到晚去办你那个社，人心又不齐，怎么能办好？还是把自家那块番薯園收拾收拾吧。”鴻仁心平气和地說：“有心凿石石都可以凿穿，后屿郑依轡都可以办社，我們城山也一定可以办。”他想来想去，覺得一定要有人带头投資，才能解决資金問題，可是誰带头最起作用呢？

过了几天，他召集了一个会，研究社員投資問題，會場上，許多人靠着柱子，吸着旱烟，不声不响。

鴻仁第一个站起来說：“我是个貧窮戶，我投資两担谷子。”

大家都知道，鴻仁家中的口粮都发生困难，看他投資两担，都感到惊奇，但鴻仁那副严肃認真的样子，又很使大家受感动。茂炳等几个人接着报了投資的数目，舍不得把錢拿出来的人也参加了討論，會場变得活跃起来。經過研究，几戶中农也情愿以加一五利息向社里投資。接着又向銀行貸了一些生产資金，“戏”算是准时演出来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鴻仁那两担谷子，是事先托別人以加二息借进的，他为了撐住場局，帶動大家，宁肯自己吃亏。

他这样一心一意苦干为大家，还依然受到一些单干戶的冷言冷語。象宗臣、启东这样的人，吃过晚飯后，常常拖着木屐，噙着旱烟管，悠閑的坐在石条上扯談，看見剛收工回来的茂炳，就嘻皮笑臉的說：

“茂炳先生，好早收工呀！”等社里人走过去，他們又議論着：“鴻仁做死人事，办什么鬼社，每晚評工記分，又吵又鬧，

象狗打架一樣。”

鴻仁并不把这些諷刺嘲笑放在心上，他決心用農業社的成績來回答他們。他心上最大的事情就是把社办好。

當時，社長不脫產，也沒有補貼的辦法，鴻仁要管理全社的事情，早晚開會，吃不好，睡不好，又和一般社員一樣的勞動。有時，他實在太累了，還是拼命干，自己是社長，什麼事也不能落在社員後面。冬耕犁田是個重活，又要技術，天寒水冷，鴻仁天天是跟在牛尾巴後面干這活，工作組有事找他，也都是跑到田里去講。

鴻仁任勞任怨，村里的許多人都知道了。

有一次在祠堂里開基層會選代表，一開始，仔係就站起來講話，許多人都知道仔係過去對鴻仁有意見，怕他在這個會上來報復，都很注意的望着他鄭重其事的說：“城門頂的人都知道我仔係嘴臭，人粗魯。兩年前，因為桃樹問題，我和幼係嫂爭吵，當時鴻仁查土地証斷給幼係嫂，我心不服，憋了一肚子氣，跑到鴻仁大門前去，煙杆塞在腰里，雙手插腰，把鴻仁罵了一頓，從上午罵到下午，從大門口罵到天井，鴻仁不急不氣，還是做他自己的事，晚上還到我家商量我孩子服義務兵役的事，全不把白天的事放在心上。鴻仁不罵我，可是我心裡更難受。我說，鴻仁實在好，是個好黨員，好幹部，鴻仁一定要當上這個代表。”大家一聽，都拍手叫好，一致選舉鴻仁當代表。

鴻仁一年到頭很少穿鞋，這次去開縣里代表會穿了一雙青布鞋，村里有人跟他開玩笑，問他：“鴻仁，你這雙‘依奶鞋’是哪里出口？”

原來鴻仁當了社長以後，工作忙，工分比一般社員得的少，平常總是打赤腳，最多穿雙草鞋。這次因為要去縣里開會，他老

婆才利用他嫂嫂的一双膠鞋底，給他做了一双布鞋。其实，鴻仁并不注意这些事，不穿鞋也一样上县里开会，只要两只脚能跑路給社里办事，他就非常高兴了。

鴻仁从县里回来，首先解决了并社問題，接着就领导大家修建水渠水閘。

正是冬天，整天刮着西北风，又落了几天雨，气候变得异常寒冷。鴻仁知道修水利是并社后的第一件大事，也是明年增产的有力保障，一定要鼓起大家干劲，把它早日修好。他自己沒有棉衣，便穿着棕衣，泡在水里，接連干了几个通宵。

这时，他儿子有病，家里的粮食也困难，他老婆着急的对他说：“你自己是个铁打鋼鑄的人，你也得管管家里的事！”鴻仁安慰他老婆：“馬馬虎虎，将就将就，沒有米吃，先把后門山自己那几株番薯挖起来吃，以后再想办法。千万不要叫出来，让人知道。现在是修水渠要紧。”

鴻仁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修渠上。他看見，在冷雨中，大家又冷又晒，便把借来給儿子看病的一元钱拿出来，买了紅糖，煮成糖稀飯，給大家吃，暖和暖和身子。他对于修水渠是一点也不肯馬虎的。

社里要扩大冬种面积，現有的五只耕牛怎么也不够用。五个生产队因为爭着用牛，关系搞得很緊張，社里又沒有現款去买牛，怎么办呢？鴻仁在党支部会上彙报了这个情况，区里知道后，就写了介紹信到石碑区去借。鴻仁想：“石碑是山区，山高林密，我們这里是平原，大家都走不慣山路，还要把牛赶回来，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决定自己和老农郑仕丰去一趟。

鴻仁去后，性急的社員們一天要跑到村前看两三回，看看沒有人影，就担起心来：“怎么还不回来，听说石碑大山里还有老

虎，不会有什么危險吧！”

第三天半夜，鴻仁和郑仕丰牵了两头肥壯的黑水牛回来了。鴻仁脚底磨出了几个大水泡，他却根本不管它，欢天喜地的跑到社里来，看見社員們早都睡覺了，又跑去把两只牛喂得飽飽的，才回家去。

第二天天一亮，社員們听說社长牵回来两只牛，都跑来看。郑仕丰兴高彩烈的对大家說：“这只叫肥兔，那只叫烏雞，山区的人真好，人家社长湯貞昌領着我們选了两头最壯的牛給我們。就是山路陡，路不好走，路旁就是万丈深坑，跌下去骨头都要摔碎。鴻仁牵着牛在前面領路，从清早到半夜，足足赶了一百多里，連碗茶水也沒喝。要是叫我一个人去，借到了牛也沒法拉回来。”社員們見社长这样千辛万苦的借来了牛，个个振奋，連山壩里从来沒有种过麦子的壩田也种上了小麦。

这一年，春天来的特別早，滿山的桃树都吐出桃蕾了，眼看丰收在望。这是多么令人喜欢的事呵！誰也沒想到，会由于这些喜人的桃树引起了一場大风波。

有一天，郑宗任在白云山下看着一片盛開的桃園，不觉又勾引了个人打算。他原先有一百多株桃树，年年自己管自己卖，是他一項很大的經濟收入。現在桃子又要大丰收了，可是桃树已經入了社，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要摘就摘，要卖就卖，卖了錢在福州爱吃就吃，爱玩就玩。他正想得出神，看見副社长林伯欽走过来，便喊道：“伯欽，你这坪桃树花开得多好，要不是入了社，今年收的桃子，你父子两个吃用不完。”伯欽說：“自己自愿入社了，还有什么話說。”郑宗任說：“自愿？現在許多人都說桃树还是不入社好。”伯欽想了想，說：“有这么的事？我們赶快找社长商量商量看。”

两个人急冲冲的去找社长，把桃树不要入社的意见向鸿仁讲了一遍，宗任还特别提到群众对桃树入社有意见。鸿仁听了很生气，批评了他们：“什么群众有意见？你们当社干的自己有桃树，思想动摇了，是不是？”伯欽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郑宗任在后面无言可谈，扭头走了。

到了晚上，村里的空气就有些变样。三三两两的人在交头接耳，看见工作组同志走来，就转过脸向别处看。鸿仁看得明白，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和工作组商量了一下，当天夜里召开了社务委员会。可是郑宗任托病没有来参加。

在社委会上，鸿仁把他的意见说了出来：“我们城山不比别处，桃树收入，是一项相当大的经济收入，桃树山园不入社，个体生产就占了三、四成，人在社里，心在桃园，农业社怎么能办好？桃树山园入社，这是政策，绝对不能动摇。”他的态度很坚决，鼓起了大家的信心。交代大家多加注意，防备有人乘机闹事。

深夜时候，民兵郑依国巡逻到村东口，看见北尾里隐隐还有灯光，他轻轻走过去，听到一个沙哑的嗓音在说：“不干则已，要干就把他干垮……。”依国回来把听到的话告诉了鸿仁。鸿仁安慰依国说：“不要怕，有共产党领导，农业社怎么也不会垮。”

接连两天，城山村真象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青年人的笑声和歌声都没有了，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每个人都象在准备迎接一场严重的斗争。富裕中农不愿出工了，城山下安着的水车上的龙舌头也被人打掉几个，农具保管室里，有两部水车不见了；个别伪保长、伪军官乘着郑鸿仁和一些贫农社干不在的时候，在街头、田边，大算倒账，说：“办起合作社，日日夜夜开会呀，造

冊呀，不知道一年油火紙張要花多少錢，這都是白花哩！”有人就一唱一和地說：“不僅這個，還有幹部補貼餉，我們收一粒谷子，這個花那個扣，分不到半粒到手！”說得一些新社員搖頭伸舌，覺得入社有些靠不住。鄭鴻仁聽到反映：外面風浪很大，暈船的人也不少！可是，他自己心中有底，土改以來城山群眾是聽黨的話，不會相信一些造謠破壞的；特別是全村絕大多數是貧農，合作化是出於他們自願的要求。因此，他一方面把城山的情況彙報黨支部，一方面親自組織幹部群眾積極生產。副社長林伯欽，社干鄭宗朝、鄭金官，隊長鄭與官、鄭宗謀，社員鄭依國、鄭守正等一大批幹部貧農積極分子，緊靠在鄭鴻仁身邊，跟着鄭鴻仁走。只幾天時間，就把春小麥鋤了草，施了肥，桃樹園也進行了初鋤；可是有一批人還是不參加生產，消極怠工。幹部商量了一下，決定召開一個社員大會，把道理說透，思想問題弄清楚。

大會上，社長鄭鴻仁總結了辦社以來的成績，分析了當前生產上存在的問題，也適當的檢查了自己對財務工作抓不夠，公布不及時，並提出今後改進的意見。他說的話，言正理順，又誠懇又實際。大多數社員聽了都很高興，這時候，只有鄭宗任站在走廊底下，有心無意地看着天上朦朧的月亮。他的兩隻手抱在胸前，好象在等候什麼事情發生。果然，會場中一個黑灰臉龐的社員站起來了，用破鑼般的聲音叫喊着：“合作社辦不好，我們要退社，其他我們不管！”這是鄭仕位，他這一說，好幾十對眼睛瞅着看他！接着後排一個老头名叫鄭與乐的也站起來說：“是！我也退社，你鄭鴻仁當社長，把全村的桃樹都拿去入社，把我們喉嚨都捏住了……”他說了這一句，又感到後悔，尾音無力地低下去了。這時會場情緒紛亂。鴻仁並不慌張，他站起來對社員們

說，有人一時性急，話講得過火了，我們不多計較，可是退社是件大事，大家要好好考慮，不要上了別人的當。接着工作組老鄒說了几句，安定了大家的情緒；他說有人要退社的事明天再開會討論。

接着，黨支部和工作組對這件事專門開了會，進行了研究討論。會上也有人認為，可以把山園桃樹退還社員，爭取多數人不退社，鞏固農業社。支委鄭鴻仁和大多數人反對這種做法。鴻仁說，只有堅持山園桃樹入社，才能真正鞏固農業社，一些政治不純的偽軍官偽保長思想動搖，實在要退就讓他出去，我們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來鞏固農業社。討論結果，採取了鴻仁的做法。

鄭鴻仁回村以後，根據支部的決議，全面發動群眾；一天晚上，召集了四十多個幹部、貧農在社委會里開會，鄭鴻仁只說几句话：“你們都是幹部、貧農，總會記得解放前我們過的什麼日子！解放後共產黨領導我們走互助合作道路，也就是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你們看我們這條路有沒有走錯？”坐在門限上的貧農積極分子鄭依國馬上接着說：“誰說走錯了？沒有合作社我依國土改分的田，恐怕早又給富裕中農買去了！今天又要當長工了！”臥干鄭仕高說：“只有不想勞動的人才不願意辦社，我們死也要把社辦下去。”有人說：“他們不辦，我們要辦！”會場轟起來了。鄭鴻仁看到這個情景，臉上堆滿了笑容，對大家說：“城山社一定能鞏固下來，我們幹部、貧農，團結中農，大家一條心，展開兩條道路的鬥爭，隨你什麼風也吹不倒！”這話說得大家喜笑顏開。

開了這個幹部、貧農會議後，大家對辦社的信心更加堅定了。可是鴻仁和工作組老鄒並沒有放鬆警惕，他們發覺宗任、宗化等幾個人有時在夜里猜拳喝酒，聲稱鴻仁不敢把社長當下去

了，他們要把宗任推出来当社长。原来是这些伪軍官、地痞、流氓要想夺取农业社領導权。鴻仁在党支部工作组支持下，决心要打赢这一仗。

經過了准备，又召开了全体社員大会，郑鴻仁首先說：“大家看，城山社要不要办下去，我們該走那一条道路，大家发表意見！”話一講完，会場里大踏步走出一个臉色黝黑的中年汉子，他叫郑木利，挺直地站在讲台边用激动的声音說：“我和大家都記得，过去国民党地主恶霸逼得我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沒有共产党早就沒有城山村了！我們要跟共产党走，死也不退社。”接着一个个子稍高的中年社員，也急急地走上讲台边停了一会儿，象才記起一桩心事一样說：“我們城山社办起来后，哪样生产都不错。你們想一想：你們的土地桃树都不会比我多，难道我不怕吃亏，你們还怕什么？我看大家还是同心协力好好商量把社办好！”这个說話的是老中农郑史介。大家都为他的現身說法打动了，几十个人众口一声：“是！我們要把社办下去！”“誰不愿意办的，就让他走！”会場里的人，絕大多数喜气洋洋，只有宗任那一伙灰溜溜地低着头不喘气。于是会議在充滿着愉快和胜利的信心中結束了。

第二天晚上，再按生产小队召集社員討論，大家重新表示态度。让那几戶富裕农民和伪軍官、伪保长、地痞、流氓退出去。第二天，新的社員代表会馬上誕生了。在会上，郑鴻仁总结这段风波时說：“經過这次的风波，不但給我們明确了农村中要坚决依靠貧农，而且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城山社永远不会倒，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一定会成功！”

一場风波平靜下来了，村前村后又响起了快乐的歌声，田里的麦苗很快长成半人高，迎风搖摆。

城山社巩固以后，社员的干劲更大了。郑鸿仁白天领导着社员大闹积肥，兴修水利；鸿仁嫂和茂炳嫂等一大批妇女，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的也脱掉鞋袜，卷起裤筒成群结队到田间参加了劳动。她们不但白天干，晚上还点了汽灯闹生产，修抽水机渠道，日日夜夜都听见她们劳动中的说笑声。这一年生产备耕工作就搞得异常火热，秧苗插进水田里没有几天时间就长的绿油油一片，春麦、水稻、桃子都丰收，把城山社的所有谷仓全装满了，每一户社员都增收了五六百斤至一千多斤的粮食，现金分红也有增加。而退社单干的农民中，好多人连国家公粮任务都完不成，银行、信用社贷款还挂着账。傅朱林哭丧着脸跟郑鸿仁说：“今年真倒霉，退社单干走死路，明年连口粮都接不上了！”

十月底，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照耀着城山村，大家欢天喜地的念着：“有些人好像是缠足女人；前怕龙后怕虎……”郑鸿仁更乐的裂开嘴说：“老郝，你看，我们不是走了弯路，而是走了正路，毛主席说的一字一句都正合你我的心意！这下我们全乡都要大闹合作化了！”就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城山村退社的农民，重新又回到合作社里来了。郑鸿仁也担任了乡的党支部书记。

敖峯乡在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指示的指引下，很快从十五个初级小社并为一个全乡五百户的初级大社。以后，在全国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同时，又办起敖峯高级农业合作社。不久敖峯和城门合并为城门乡，郑鸿仁担任了城门乡的党总支副书记，领导着全乡一千二百多户农民掀起生产大高潮。就在这个时候，鸿仁因积劳成疾，癌病发作。他知道自己病很难治好，躺在病床上，还在为农业社操心。他对老郝说：“我过去是个拉黄包车的人，今天党培养我担任了总支书

記，組織上一再關懷我的病，送我進醫院治病。我恨不得多活幾年，好好為黨做幾年事，把農業社辦得更加富裕起來……。”社員們去看他的病，他除了查問社里的情況，就催着大家趕快回去，不要誤了工，耽擱了生產。在他逝世的前幾天，他還勉強支持看報紙，對新社會充滿了無限的喜愛，對他親手辦起的農業社充滿了強烈的信心和樂觀的感情。

（林真木）

美 滿 婚 姻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个夜晚，乡里的剧团在我家門前兩谷場上演高脚戏，宣傳婚姻法。

戏里有个童养媳，头纏白布，背个小包袱，額前还貼了两块膏药，哭哭啼啼地回娘家。

她一进门就扑在娘身上，哭道：“娘呀，你害得我好苦呀！男人抽大烟，日里夜里打我。說我人穷骨头贱，由他养来由他騎。这沒良心的上月害癆病死了，公婆罵我是尅命星，赶我回家。娘呀娘，当初不該貪他家的錢，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她娘听了，抱着女儿哭得伤心。

不知怎的，我也跟她俩一道哭起来了。

后一出戏名是“婚姻爭自由”。戏里有个女孩子，自己找了个对象。爹娘嫌他家穷，不肯做这门亲事。这女孩有志气，把男子帶到自己家里，跟她爹娘說理。她指着爹唱道：

你做爹娘的沒良心，
想专制包办我婚姻，
不管女儿一生幸福，
貪財礼害我一世苦辛。
如今政府实行婚姻法，
你俩老不得阻碍我自由婚姻！

她爹娘被說得啞口无言，只好答应。俩口子欢天喜地上区政

府登記去了。我看着看着，也乐得拍起手来了。

戏演完了，人都散了，月儿也偏西了，田里的小虫噤噤喳喳的叫得使人难受！

我不想回家，只身坐在树下，想着自己的身世：鬼子来的那年，我才四岁。家里没吃的，妈为了养活我，把我抱给王家做童养媳。王家开酒店，穿好吃好。奶奶和大娘看我精灵，还算疼我，让我念几年书。可是那男孩小我三岁，低我半个头，夜里还撒尿呢。寒天时候，两条鼻涕挂在嘴上。我一见到他就恶心。放学回家，在路上常和他打架。长大了，要是也象戏里的男人那样欺侮我，那就倒霉透了。要是能象后一出戏里的女孩，找个好对象，夫妻恩恩爱爱的，同甘共苦，该多好呀！想到这里，心里卜通卜通地跳，只怕被人知道似的。

第二日清早，我偷偷到剧团里要了一本婚姻法。剧团团长——矮个子志忠，见了直笑，羞得我急忙跑到河边。我翻了一下本子，识字不多，看不下去。可是却认得上面一段字：“男女恋爱自由，第三者不得干涉。”我欢喜极了，政府替我们女人撑腰咧！

我坐在沙滩上，抬头望望对河的五虎山，心里想着：“我心中的人要是住在那里，他能划个船过来，把我接去，两人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可是，脑子再一想，“哎呀，他是谁？家里的奶奶、大娘肯吗？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有了主，还找对象，厝边邻舍不会笑我吗？”想到这里，觉得孤单单的，很难受！

可是，我又记起工作组林木桂同志说的话：“只要自己想得正确，双方同意，有胆量争取，政府一定支持！”他还说道：“寡妇也可以找对象。过去乡里的寡妇有六不能：一不能哭，哭了人家会说这女人生来哭丧脸，所以死丈夫；二不能笑，笑了人

家会说这女人楊花水性，丈夫沒死二天，就裝笑臉，想找野汉子；三不能呆家里，呆久了，人家会说这女人生来沒出息一副孤独相，哪配有丈夫；四不能上街，上街了人家会说这女人心里痒，想找汉子啦；五不能吃坏的，儉吃些人家会说这女人心里有鬼，想积錢財办嫁妝；六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人家又会说这女人好吃懶做，所以丈夫被吃穷死了。这是封建思想，不把女人当人看。如今解放了，男女平等。”我想着想着，又有信心了，天长地久，总有一天我的心愿能够实现的。

那时，婚姻法宣傳正熱火。村里有些青年都动起来了。老人们看不順眼，日夜咒罵。有的干脆把媳婦女儿关在家里，不让她們出門。家里怕我出事，不让我上学。还是大娘疼我，叫我上夜校。

夜校沒上多久，有天晚上放学回家，村里一个后生依珠跑来，嘻笑道：“替你介紹一个好嗎？”

我疑心他有鬼，問道：“誰？”

他說：“秋官。”

秋官，不是常坐在我背后的大个子嗎？人长得挺俊俏，睫毛长长的。夜校的不少学生上課时有的嘻嘻哈哈地说笑，可是他却咬根鉛笔，专心听講。今晚还靦靦覷覷地跑来問我生字，臉漲得通紅，弄得我也很不好意思。听说他是团员，挺能干活，上次还动员家里带头繳公粮，乡里常表揚他哩！可就不知心地怎样。我想着想着，把背后的依珠忘了。

依珠等急了，問我：“到底怎样？”

我迟疑了一下，想答应他，又不敢开口，只是 着嘴笑。

依珠看看我，笑道：“同意啦，明晚柑園里見。”他說着就跑了。

我急得在背后叫他，說：“依珠哥，你等一等……”

他边跑边回头，說：“等啥，有話明晚跟他說。”

次日，我心里又惊又喜，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干不成。說起来好笑，把醋当成虾油，一碗菜炒得酸溜溜的。挨了奶奶一顿罵。

晚上，月儿格外亮。我心里慌張，总怕被人发现。

一走进柑園里，依珠跟我做了个鬼臉，一溜烟跑掉了。秋官站在树下，象根木头，一声不吭。

我心跳得厉害，臉上热烘烘的。路上准备的話，一下子都忘光了。他看看我，我瞧瞧他，都談不出話。后来，还是我先开腔說：“时候还早。”

他也呆头呆脑地答道：“是早。”又不作声了。

真急死人！我鼓起了勇气，問道，“你为什么找我？”

他撥弄着树枝，低着头，吞吞吐吐地說：“这……不知道……。”

我听了，又气又好笑，問道：“你家光景怎样？”

他答道：“我家人多底子薄。”

我說：“人好是宝。如今年代，看人不看錢……”說到这里，我臉也燒得不行，很难为情。

他听了，笑道：“不嫌我家穷就好。”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他的思想，过后再提亲事。于是說：“我們年紀都还輕，先联系一段時間。婚姻的事情以后再提。不过，不要影响劳动生产。”

他点头答道：“是呀，事久見人心。”說着，眨着长长的睫毛，又不吭气了。

他講話总是那么簡簡單的几句。可是不知怎地，从此之

后，我的心就离不开他了。

起初，白天不敢見面，都是在夜校里傳紙條，約定晚上相會地點。再不就是借着鄉里解放軍演電影的時候相會。

日子久了，我們的感情也漸漸好起來了。可是，事情也傳開了。

奶奶知道了，哭罵道：“鳥兒長大了，想張翅膀飛啦！有主的女孩，還想找男子，好不害臊！你不想想，從小到我家里，給你吃，給你穿，沒想到你忘恩負義。”她又說道：“你表姊就是嫌秋官家里窮，不嫁給他。”

我答道：“人窮志氣大，我自己會干活。”

她听了，越發罵得厲害。

厝邊鄰舍的親戚也來幫腔，教奶奶假裝尋死來威脅我，再不就是把我關在家里，不給我吃的。

我脾氣倔強，听了心里氣，可就是不理睬他們這一套。

有一天，秋官見到我在柑園里翻土，他過來幫忙。

秋官真行！胳膊粗粗的，揮起鋤來，渾身是勁兒，我怕他累了，勸他歇歇。他總是笑笑，說：“不累。”

不知是誰告訴奶奶，她老人家扶着拐杖氣咻咻地跑來，指着秋官罵道：“你這個不要臉的，拐人媳婦。我園子荒了，也不要你干！”

秋官看了奶奶一眼，低著頭，走了。

奶奶死活拖我回家。走到街上，幾個看熱鬧的老婆子站在門邊，指手劃腳地說：“看那小妖精；有了主，還想野漢子呢！”

秋官他爹娘受不了鄰舍的閑言冷言，也罵秋官沒志氣，叫他趕快打消念頭。

從此以後，秋官一見到我就遠遠地避開了。

那些日子里，我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心亂如麻。我平素很少哭，這次可哭得厲害。大娘勸我早些死掉這條心，我不答應。奶奶還是日夜咒罵。

一天，在家里實在呆不住了。我偷跑到田里找秋官。可是，到處都找不到。以後，想找工作組的同志和社長談談。剛到門口，心里害臊，又不敢進去。

我回頭走到沙灘上，望見了五虎山。想起頭年晚上演戲的事，心里難過。

恰巧，社長林尤成收工回家。他是黨員，我的舅舅，一見到我，就拉我坐下，笑謎謎地說：“別傷心，婉英，你的事兒社里早知道了。干得好，要給鰲峯姑娘做個榜樣！”

我說：“家里不社，怎麼辦？”

他答道：“沒關係，有黨給你撐腰。社里和工作組早就研究好了！”

我急忙問道：“有什麼辦法？”

他笑道：“別性急，孩子！今晚先找秋官去。你們可要商量好，要雙方摸透性子才行。婚姻大事可不是鬧玩的。社里的計劃，明天瞧着吧！”

我听了，可真高興。晚上找到了秋官。他也變了樣。見到我，笑道：“都怪我不好，沒志氣。今天支部也支持我們，要我們大胆地干。”他看我一眼，低下頭，難為情地說：“婉英，事情不成，大家沒臉，要干就干到底！”

我听了，樂得抱住了他，又笑又哭。他摸摸我的頭髮，瞧着我，又沒說話。

次日清晨，社里果然派了一批青年到村里，一連幾天挨家挨戶宣傳婚姻法。有的還吓唬一些多嘴的婆娘，說：“婚姻自由，

別人不得干涉。要是逼出人命，你們要犯國法，坐監獄！”

這法子真靈，往後，厝邊鄰舍再也沒人敢瞎說了。

奶奶看見硬的不行，就拿了大捆毛綫和一些金子給我，細聲細氣地說：“婉英呀，我家過去待你不好，別介意，這些玩意兒先收下吧！往後再寫信叫你爹在城里買好的！”

我又氣又好笑，說：“錢是你的，心是我的，我不要！”

奶奶急了，和大娘叨咕着早些叫她孫子跟我結婚。

我知道了這件事，跑去和秋官商量。兩人都同意提早結婚，先下手為強。可就是怕奶奶裝瘋作死，拖住不放。那時快過年了，我想起奶奶常說要到尙干鎮的姑娘家里玩。於是，我想了個點子。

夜里，我說怕冷，邀大娘一起睡。我給她訴說婚姻自由的道理；要她幫助我。我偎在她怀里，說：“娘，你也是受包辦婚姻的苦。爹娶了二娘，撇下你一個人，冷清清的。”

她流着淚，嘆道：“孩子，我知道你的心事。”

果然不久，大娘就跟奶奶說：“媽，你上尙干玩去吧。婉英有我看着，你老人家放心吧！”

奶奶中了計，歡歡喜喜的走了。

奶奶一走，大娘就幫我張羅婚事。和秋官他媽一塊上福州買嫁妝辦酒席。那時封建思想還沒洗清，結婚還講場面，搞老套樣式。

不巧過門那天，金鼓都吹了，我剛要上轎，奶奶回來了。

她一進門，就哭倒在地，罵道：“你們沒良心的，瞞着我老婆子。你走吧，我也不想活啦！”她說着，要跳樓去，幸亏把她攔住了。大娘舍不得我，也流淚。

這個家我好歹也呆過十二年。爹在外頭除匯錢回來外，不

管家事。全家老少平时也还和气。乍时离开，心里也觉得难过。我扶起奶奶说：“你家养育我十几年的恩情，我忘不了。啥事都能依你老人家，就是婚姻这事不能。往后，我常回家里，看望你们。”

过了门，拜了公婆和祖宗，总算是办完了这场大事。

秋官家里为了娶亲，借了一百多块钱。有人编了小调笑他，说：

穷秋官，贫漂亮，
倾家荡产娶新娘。
头天进门吃稀饭，
二天出门没鞋穿，
哎呀呀，愁死我秋官！

秋官听了很生气，说：“干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我说：“对，咱俩是村里第一对自由结婚的。社里和工作组常跟我说，要做个好模样。让人家学习。家里虽欠缺些，只要夫妻感情好，省吃俭穿，勤紧生产，早日把债还清。看他们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乡里的习俗，除了寡妇，其他妇女都没有下田干重活的。我在家里料理家务，有时也到田间帮些细活。公婆看我勤快，都疼爱我。

秋官能干，心地也正。耙草、犁地、插秧、种桔、剪枝、抓虫，样样都会。

别看他面素，心里可热着哩！平常他凡事都抢先，怕我劳累。说起来好笑，有天夜半了，我胃痛。他摸黑到区里医院拿药。在路上摔了一大跤，腮摔坏了，一拐一拐地拿瓶药水回来。可是我的胃痛倒好了。他见了，扶着右腿，边摸边笑道：“真好，

省得吃葯，葯水可苦呢！”

沒過多久，家境漸漸好起來了，債也還清了。一家老少過得暖和，秋官對工作更加賣勁了。

社里拿我們的例子向全村宣傳，號召大家學習我們。村里的人也都稱贊說，自由結婚就是好。個把死腦筋，看不慣的也沒啥話好說了。我和秋官一出門，孩子們就跟在背後，嘻嘻哈哈地唱道：

林秋官，好福氣，
娶個新娘真秀麗；
雙雙下田雙雙歸，
夜晚燈下同學習。
金黃谷子滿倉里，
紅紅桔子掛滿林，
哎喲喲，秋官好福氣！

秋官聽了，看着我笑，我也笑了。秋官說：“不如改個：呀哎喲喲，感謝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社里宣傳兵役制，召集婦女開會。要我們動員丈夫、孩子參軍。

我聽了黨支書尤成舅舅的講話，想起鬼子來耐受的苦。是呀，保家衛國，人人有責！秋官是團員，也合條件。那天秋官到柑桔加工廠去了，不在家。我就替他報了頭一名。尤成舅舅和工作組林木桂同志聽了都很高興，要我下午在大会上講話。

吃完午飯，社員都集合在祠堂里。台下黑壓壓的一大片。我見人多，心里慌。尤成舅舅和工作組同志給我打氣，叫我上台。我一走上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說了：“黨號召青年參軍，保家衛國，人人有責。我們婦女不能拉後腿。我替秋官報頭一名。

我在家里保證努力生产，照顧好全家老少，好让秋官在前綫杀敌立功。”

話剛說完，台下就哄起来了。青年們都鼓掌喝采。可是有的老头在背后就嘖咕道：

“我說沒錯，这騷貨又想吃‘鮮魚’了。”

“是呀，秋官家底薄。她哪能受得了！过門剛一年，就巴不得送丈夫去死，好改嫁！”

婆婆是老实人，她在家只是哭道：“秋官走了，一家十口人，老的老，少的少，要靠誰养？”

我听了，独自走进房子，躺在床上，心里乱死了。夜里翻来复去，老睡不着觉。心里想：“我也是为了秋官好，进了軍能有学习的机会，进步也快。”可是，轉过身子又想：“这些日子，我一步也离不了他。他走了，要有个三长两短，那不是应了人家的閑話？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人家就是不說，我也要伤心死了。”唉，想来想去，心里越想越乱。干脆把被蒙住头，不想了。可就是睡不着觉。

次日清晨，我头也沒梳，就去找党支部。走到門口，恰巧遇見志忠，他现在是党支部宣傳委員了。他一見到我，就把我拉到树下，說：“怎么沒睡好觉？心里难过？”

我点点头，也不知道說什么是好。

他拍着我的肩膀，笑道：“你做得对，不要听人閑話。你和秋官这段的美滿姻緣是那里来的？飲水要思源，对嗎？秋官上部队学軍事学文化，能文能武，多好！家里有困难，社里会照顧的。青年人要进步，就得往大处想。人人都不去当兵，国家誰来保卫。誰不疼爱自己的丈夫儿子，可是要为更多人着想，是嗎？”給他这么一說，我的心开窍了。

晚上秋官回来，听到这消息就怨我，說：“报名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不先問一声？”

我說：“人家都說团员进步。替你报头一名，这是为你争光的呀！”

他听了笑笑。沒說什么。可是过一会儿又唉声叹气了。

我瞧瞧他，低头說道：“我爱你，是爱你的进步，真心实意。你难道怕我变心？还是舍不得我？”

他摇摇头，說：“都不是。就怕你身子細，家里人多担子重，受不了。”

我伸出胖胖的手，說：“人家会的，我婉英一定会！”随后，又把早上志忠同志对我說的道理讲了一遍。

他听了，笑道：“你真好，真进步！我当团员的还能落后！”

快分別了，話也多，談到天亮还没說完。

清晨，我跟秋官一起到公婆屋里。秋官說：“爹，娘，解放后，我們家才有吃有穿。沒有共产党，你儿子也娶不了亲。做人不能忘本。”

我也說：“秋官到部队还能学技术、学文化哩！”

婆婆瞪了我一眼，噘着嘴，說：“你巴不得叫他走。往后你来当家，我不管。誰知道你存的什么心！”

我笑道：“別操心，婆婆。有我婉英在，也有家在。我婉英不会变心！”

公公躺在床上，叹道：“我老命也不长了，你倆自己照着办吧。”

这时，社里干部也来了。經過千說万說，才勉强說服了公婆。

我連夜綉了个枕头送給秋官。在欢送会上，我和他互相做了保証：他保証要勤學苦練，掌握技術，不讓一个敌人爬上大陆；我保証在家里好好生产，照顧家庭。

那天，我送他十几里路。口里沒說什么，可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秋官走了。公公常生病，躺在床上。我心里难过，可沒說什么。

每日我半夜十二点起床，挑滿了水缸。歇一会儿，三点多又起来煮飯。天亮了，安頓全家老少吃完飯后，就扛起鋤头上工去。

一挑粪就有一百多斤重。头日，我滑倒了，尿屎撒了一身。

碰巧生产組长、团员林家启过来，他接了我的担子，說：“回家去換身衣裳，我們在田里等你。”

我到田里，家启就教我插秧、耙草。他真耐性，扶着我的手，二遍三遍地教也不煩躁。还对我說：“支书說你是村里青年妇女第一个下田干重活的，要我們帮助你，好在村里做个榜样。”累了，歇歇再干。日子久了，身子也硬板了。

社里也真关心，秋官沒走几天，就到家里問寒問暖。看我家境有困难，就发补助金。我病了，还叫队里的同志給我替工。还經常鼓励我爭取入团。社里有开大会，就表揚我。

就这样，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我慢慢学会了生产技术。腰也不痛了，挑起上百斤的担子，一点也不費勁。

秋官到部队里，每月都寄信回家安慰老人，还寄回津貼費。沒几个月，我参加垦荒队到永泰县开发山区，評上积极分子。

公婆看我这样死命干活，秋官在部队里生活得好，老人家心

里也欢喜，常帮我料理家务。一些老婆子也变了心眼，常对我婆婆誇道：“你家媳妇真能干，我家那个还頂不上她半个呢！”后来，村里慢慢有些年輕媳妇也下田了。

一九五六年，团支部批准我入团，村里評我軍属模范，还选我当妇女主任。哎呀，我那点象个模范，什么也沒干好。那年我生了女孩子。秋官听了，很高兴，常要我到厦門去玩，要看看孩子。可是工作脫不开。沒去成。

今年成立公社，选我当副大队长。这下可愁死了我。年紀輕，文化又低，怎能干得好呀！前些时候，我到厦門去了一趟。秋官見到我和女儿，他乐得合不攏嘴。部队真是个好学校。秋官口才比前好得多了，看問題也准，还当了班长。

部队的連长也真有趣，見到我就笑說：“副大队长来啦，我还是你的下級呢！”他指着秋官，說：“我把这个班长交給你，可得要好好管教管教他。”羞得我沒处躲藏。

連长还要我向全連介紹公社的事。战士们听了，都很高兴，說：“有了这样好的公社，咱們就更加安心、更有勁头了。”他們可真关心公社，問个沒完。

回家时，秋官买了几本书送給我，說：“如今当干部了，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要驕傲，要关心社員，听党的話做事！”

同志，前些时候，支部剛通过我入党。有了党和毛主席，才有我婉英今天这样美滿的生活，才有妇女的翻身日子。这些事，我都記在心里。我向党保証，要团结营里的妇女同志，終身跟着党走，听党的話，做个好党员。

（王婉英口述 陳越整理）

一块柑桔园的变化

这一块柑桔园，说起来话可长啦。

二十多年前，这里有一个倒塌了很久的破祠堂，遍地杂草丛生，乱石碎瓦堆积如山，从来无人过问。附近人家把死猫死鸭也往这里扔，成了野鼠老蛇寻食的场所。

但是，就象杜園坪这样的空地，也早都落到在螺州开祥丰店的地主的手里去了。我央三求四，才向与祥丰店地主有交情的笑面虎陈敬涛转租过来。地租占每年收成的六成，其中陈敬涛得一成。地坏，租金又高。但能租到地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生活总算有了个指望。

这块废地上的杂草、瓦片、乱石、鼠蛇不是几天或几十天可以清除完的。当时，我带着九岁和十岁的两个孩子，成年累月，起早摸黑在这里砍杂草、揀瓦片、除鼠蛇。过路的熟人看见了，都吃惊的劝告我：“在这样的地里干，能有什么出息，石头上长不出柑桔来。”但是我怎么能不干呢，人穷，那里会租到更好的地呢？我不想办法种出柑桔来，日子就没有法子过。我六岁起就整天跟着父亲在果园里，摸弄柑桔树。那一坪果园是我祖先世代培植下来的，果实年年都长得很出色，可是年年都是負債，利滚利，利加利，最后柑桔果树都归了财主，才算还了債。全家被迫离开果园，过了四年多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今天能租到这块园地，就好象流离失所的孤儿找到了过夜的地方。我想用自己的血

汗，让这块地长出果树，结出柑桔。我父子三人，不停的忙了一年多，才把这块地清理出来。

可是，解放前在这块果园里，年年演的都是悲惨的戏。

刚栽下柑树苗的头二、三年，柑树的枝叶还没有遮盖住周围的空地，我就在空地上种了一些蔬菜，想增加一些收入换米吃。可是，地主的眼睛象刀口那么利，看到果园里长出了青菜，又起了坏心。

有一天，我正在果园里除草，眼看着这些青菜快要卖钱了，心里很高兴。这时，祥丰店的狗腿陈敬涛从对面慢步走来，皮笑肉不笑的对我说：“兆栋呀，你真勤，这些菜栽得太好了。收成时不要忘记告诉我，还是按‘五一四’的分法。”我一听，觉得这是欺人，就对他說：“这是怎么回事呀？‘五一四’讲的是柑子的分法，这几棵菜是我贴工夫栽出来的……。”我的话还没说完，陈敬涛就板起一副兇臉，說：“兆栋，你要知道，沒有地你怎么能种出青菜，地是祥丰店的，不是我的情面，怎么会輪到你来种？还是听我的话为妙，免得事情鬧大……。”那时候，有錢有勢的人說話，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一双，穷人讲一百句也是白搭。眼看着长得象花那么好看的大白菜，被財主挑走了，我心里真疼呀！以后連种几条葱也要按“五一四”分。他还一边拿一边罵着，一点不讲理。我一家七口，被剝削得只好挨飢受冻。

种柑桔的人，一心盼望丰收年头到来。有一年，雨水均匀，是柑桔的大年，我第五个儿子也是这年生的，真象是双喜临门。果树上吐出了嫩叶，花也开得特别好，走进果园就聞見扑鼻的清香。我心里想，这一下总可以还清債，留下明年的生产本钱了。要让每一朵花都結出大柑子，就要施下大批肥料；我是宁愿让人受餓，也不让果树缺肥。我向人借谷子，利息高到八成、甚至十

成。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果園里，剪枝、培土样样都做得比別人強。我天天在果園里，都好象看見柑子在長大。丰收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誰知道收下了柑子時，價錢還不如番薯，雪柑賤得如糞土。我收了三千多斤柑子，沒法賣出去。又費了好大力氣，最後才賣給了又序的行商，可是要等他在上海賣完時再給錢。這個喝人血的商人，一去就沒有回音。三千多斤柑子，一個錢也拿不到。但是討地租、谷債的却一步也不放鬆，我只好把家里可賣的東西全賣光，弄得家貧如洗，每天吃野菜吃糠過日子。大人咬緊牙關忍受飢餓，孩子們受不了，整天哇哇哭叫，真叫人心痛如刀絞。為了救活四個大孩子，只好忍痛把第五個孩子賣給福州小橋一家米販。那時也有人想來打這塊果園的主意，可是，我是寧肯賣掉孩子，也不能把果園讓出去。

為了培植這棵柑樹，年年都欠下還不清的債。家里生活一年窮一年，剩下的孩子，一長到十歲就離開家，到福清給地主放牛。

日本鬼子來了以後，日子就更慘了。鬼子見人就抓，好多田地都荒了，果園里雜草長得有人高，成了鬼子牧馬的場所。不光是我家，好多果農家里，幾天沒有火煙是很平常的事。家里沒法過，外面又土匪如毛。我為了謀生，冒險到福清一帶賣燈罩，換回番薯片，可是就連壞番薯片也先後被搶三次，還險些送掉老命，我大兒子為了掙錢給家里買番薯米，挑得過重，人又半飢半飽，壓壞了身子，死在福清一家客棧里。我聽說後，一清早趕到那里，客棧老板不肯讓我見死屍，更不肯白天埋葬，怕被人看見，以後不敢住他的客棧。我對老板說好說歹，才在半夜里把屍體從馬樓遞下來，用舊草墊裹住，埋在后山上。我前思後想，抱住冰冷的屍身，真想和他一起埋進土去。

我唯一的希望只有这坪柑树。我不分日夜的干，把全部精力都花在果园里，每年也都比别人多收一半；可是收下来的柑子，还都是落到祥丰店地主手里去了。白天想，夜里盼，烧香许愿，指望这坪柑树能成为自己的，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在旧社会，象我这样的人，望穿了眼也得不到这坪柑树。

解放了，我才算偿了心愿。土改时这坪柑树全部归我了。我乐得不敢相信，白天黑夜安静不下来，我在果园里转来转去，果园里的松土被我踏实了，被我踩出一条条的新路。

我把这坪柑树伺候得比谁家都强。人老眼花了，看不见捉虫，我就带着小孙子去捉。他看见虫眼喊我，我就用桔锥去锥，不管花多少工夫，也要把虫捉尽。所以不管是大年小年，我都年年增产，年年当模范，省上、县上，都给我送来奖状、奖章。

一九五三年在县里开会，果农模范共有三个，我和木贵睡在一张床上，我们交谈了生产经验，木贵详细的告诉我一个增产办法：“把今年结柑的枝子剪短一些，刀口可以很快封皮，明年又会开花结柑。”我采用这方法后，效果很好。要是在旧社会，这样的好事，谁会来告诉你啊！

赶到合作化，果树要入社时，我真舍不得，几夜没有睡好觉。田地我都不心疼，我心疼的就是这坪柑树。这果园里，那一条路不是我踩出来的？人老心眼死，经大家一说，我才明白不但是这坪柑树，全社园全城门的柑树，都有我的一份，如今是集体所有制了。

今年，社里拿我这坪田做高产试验园，我心里可真是高兴。我管捉虫、整枝这些细活。挑土、上粪由党支部书记带领头干。今年要争取大大增产，我开始不大相信。今年是小年，不减产就了不起了，怎么还能增产？到了正月柑花开了，我也觉得吃惊，到

了三月，結子了，我一看，比去年还好，到了六、七月，柑子一个个长得象拳头那么大。我嘴里不講，心里也觉得奇怪。果園就在我家門边，可是我还是不放心，我在園里搭了个草篷，住在里面。全社人都一心爭取大丰收，我不能損失一个柑子。

七月底，忽然听說台风要来，我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柑子都长得压弯树枝了，刮一場台风，少說也要减产一、二成，这可怎么办！这时候公社已經成立了，大大小小一条心，听說要防风，好多人都来帮忙。党支书詩鑾領着人，用毛竹、席篾在果園外面搭了一个篷，擋住了台风，果園里一顆柑子也沒有吹落。要不是办了公社，那能有这么大力量。这使我更加明白公社的好处了。

摘柑那天，好多人都来看，省委書記和苏联专家也来了。我这块果園从来也沒有这样熱鬧。

柑子摘完过了秤，收了一万多斤，省委書記和我一起照象，还說要拜我做老师傅。我活到七十二岁也沒有这么喜欢过。我这个揀瓦片、除杂草、忍飢受冻，苦了一輩子的老头子，能得到这么大的光荣，真是做梦也沒有想到。我現在領社里的特級工資，不愁吃穿，和过去的苦日子簡直不能比。我觉得越活越年輕，越老越有勁了。

过一年，我們公社还要在这块果園里搞丰产田，这一回我信心很大。我天天催着上糞，天天去看吐蕾了沒有。其实，吐蕾最早也要到正月底，時間还差一个多月。我是又高兴，又发急，一心要創造出全国最高紀錄。

这块小小的柑树園，从滿地杂草乱瓦到今天丰产一万二千多斤，就好象我这个人从旧社会到今天为人民公社，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呵！

（楊兆棟口述 薛行瑛、小捷整理）

一个小榨油厂的历史

这个小榨油厂，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办了十五年都没办成，直到解放后一九五四年，我们成立了红星高级农业社，靠了集体力量，才把它办起来。现在先从头说起吧！

龙江，历来盛产油菜。四月，油菜熟，春风吹，乌龙江沿岸一片金花花，无忧无虑的天真的牧牛童骑在牛背上漫步在这花的世界里，顺口唱着：

乌龙沿岸好春光

油菜花开千里香

但是，乡亲们望着这丰收景象，眼睛里却凝聚着蒙蒙的愁云。原来，这里的农民年年种油菜，可自己却没有一座榨油厂，每到油菜丰收时候，福州的那些黑心黑肝的商行中间人，就乘春末农民没有米下锅的时节，拼命压价盘剥。农民饿着肚子，为了活命，只好忍痛卖出，得到的价钱往往够不上肥料本。有时商人原先来订购了，但后来看到其他地方的油菜价钱可压得更低，盘剥得更多，就不来领货付款，农民们用尽心血培植出来的劳动果实，就白白糟蹋了。自己种油菜却闻不到油味，真是要哭没有眼泪。

一九三九年，正是抗战期间，原来在福州当过榨油工的水桂

伯和一些同是失业返乡的小职员，商量在家乡合伙办个小油坊谋生。水桂伯卖掉了二亩地，山东瓜他爹（马尾造船厂职员）也卖掉三亩。还拉七、八个亲戚、小学教员、医生来投资，置了一座破房子，一个石磨，一条土榨木具，聘了外乡五个工人，就这样办起油坊来。

这个油坊是季节性的。四月开工，六月停工。规模很小，日产油百斤。就是这么一个小油坊，乡亲们可欢喜啦：“以前油菜籽没处换，现在自家有了油坊，又有油卖，又有油吃，多合宜！”

但是抗战时期，处处闹饥荒，人们连口都糊不上，那有錢买油。油价飞跌，头一季本錢捞不来就散伙了。只有水桂伯还不死心，叫她女儿、山东瓜、天茂、魏哥等八个青年，利用旧土榨木具为乡亲榨些油，赚些油渣饼（肥料）。或是替商行代榨，赚些工錢。每年只能干二、三个月。这样干了四年，土榨工具裂坏了，他们又沒錢买新的。天茂年青，不愿这样了结，就用鉄綫箍，可是一榨，籽就象黄蜂一样扁出来。天茂把土榨木具一摔：“贫苦人永远干不成！”从此，散伙了。

水桂从十几岁起就因生活所迫流浪到福州城去学艺。他从童年漂泊到老，依然飢寒一身。这次为了办油坊，下决心把田卖掉。不想厂未办成，却断送了祖业几亩地。水桂伯只得眼泪盈盈地又离別家乡上福州去当伙計。

在旧社会里，只有有錢人才能走得通，穷苦人想办个榨油厂也不可能啊！

二

福建解放了。一九五〇年农村里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

运动，推翻了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贫雇农土地还了家。水桂伯也分到了二亩地，几十年来脸上的辛酸愁纹舒展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失去母亲的孩子回到了家”。

这年夏秋大丰收，稻穗沉甸甸的，压得粗壮的稻秆弯下腰。第二年春，家家户户的油菜地都吐出新苗，人们又想起办油坊啦。水桂伯听说福州久和油厂出租土榨内旋机（土机器），便和大家商量。大伙都拍手赞同，天茂说：“如今是我们农民的天下啦，地主、奸商打倒了。今年油菜大丰收，更需要多多榨油。咱们这些种油菜的人，也该自己闻闻油味了。”

水桂伯和天茂两人兴冲冲地拖架货车上城租土榨内旋机，租回来不懂得安装，大伙看去只是铁杠、螺旋钉、铁环，又喜又着急。喜的是有了铁机器，焦急的是安装不来，最终由久和厂介绍一个木匠下来，把它安装好。

这时油菜籽已由国家统购，供销社就派本乡业务员响官来与他们订了加工合同，并帮助领导加工油菜籽。这样就地加工有两大好处：一是不要搬运费，二是油渣饼可以卖给乡亲做肥料。季节性的榨油坊办起来啦。老乡们都欢欢喜喜把担担菜籽挑进来，一个老汉放下菜籽，看着那铁家伙舍不得离开，走一步一回头，最终对大伙说：“哎呀，我从种油菜起，没有一年不受奸商勒索、欺诈。现在，真正好，我们跨出门槛，便到油厂了。”可是这个厂只开工两个月，到一九五二年又垮了。

原因是这样：小榨油厂用的是土机器，牛拉石碾，每天只能碾五、六担籽，出油还不到两百斤。出油率低，每担籽比别处的大厂要少榨三斤，一天就少榨十五斤。供销社响官见经营困难，便提说：“我们应该采用新技术，去买架会碾粉的机器来。”这下说中了大伙的心。水桂伯说：“我做伙计的时候，听人说尙

干一个油坊有台碾籽机，几小时能碾几十担籽，碾得又多又细，我們也去买架来。”

供销社馬上借給他們二百元款，可是，响官和天茂跑遍福州城也买不到。天茂說：“我想碾籽机是两个圓棒，碾面机也是这样，不知能不能代替碾籽机！”大伙同意去試試看。天茂、响官就各拿把油菜籽去城門一个互助組里找碾面机試一試，果然能碾出来。

于是他們从福州买了架大号碾面机回来，一开試，大伙都圍着看，那曉得一筐籽倒进去，三四个人抱着搖也搖不动。原来，在城門試时，只用两把籽，如今这么多，沒有大匹馬力动力机，根本不行。要想再去买动力机，可是个人哪有那么多錢呢？最后沒有办法，只好停下来了。

单干底子薄。虽然解放了，又有供销社的支持，可是单靠个体力量，要办工厂还是办不起来啊！

三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乡里成立了紅星高級农业社，这是全省第一顆紅星，省人委送来一台抽水机。水利机械化啦，大伙开始了更新更好的集体生活。

紅星高照幸福路。冬种面积激增三、四倍，国家也需要更多的油，社里便大量扩种油菜，并决定买架碾籽机，用抽水机作动力，重建榨油厂。一方面滿足国家需要，一方面增加社里收入，另外油渣餅还可以作肥料。一九五五年春天，三月油菜开花，福厦公路两旁有望不尽的花浪。姑娘們甩着双瓣提着竹籃来采摘油菜花，田野里响起愉快的山歌。四月里，紅星社榨油厂成立了。水桂伯捋着銀花花的胡子說：“以前人称我老祖師，那是空名，

現在却是真的了。”当运碾籽机的帆船到岸时，刚好下大雨。响官、金官、元官等几个青年，笠笠不戴，蓑衣也不穿，打从风雨里把它扛回来。妇女们围着他们笑道：“欢喜得疯啦，为啥连笠笠也不戴呀！”他们回答：“这些年，想着它，盼着它，不带笠笠也不怕呀！”

社里生产的油菜籽统一由县粮食局收购，然后再由县粮食局就地委托榨油厂加工。供销社经理对大伙说：“以前单干办不成榨油厂，如今成立了全省第一个高级社，集体力量大，就办起来啦。”说得大伙乐呵呵的。

县粮食局规定出油率：每担菜籽出油三十四斤。水桂伯吃惊地说：“从古到今，顶下天来出油率也没有这么高呀！”响官对他讲：“水桂伯，你还是旧眼光啊，为国家增产油嘛，还嫌多？你这还是用老一套方法来计算啊；以前是土法榨，现在是机器榨。以前是给别人榨，现在是给国家榨。再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啊！”水桂伯听了也哈哈地笑了。

开工，抽水机发动机隆隆地响，带着碾籽机两个轮飞转，几十担籽，二、三个钟头就碾成又白又匀的粉末，怎叫人们不喜欢得流泪呢。元官说：“我看着飞轮转，不吃饭，不睡眠，也干不累。”

他们日夜加班苦干，日产油六百斤，比解放前多六倍，出油率超过上街油厂，赢得全县第一。两个月就将本乡的油菜籽全部榨完了，为国家生产油一百八十担，为社积累资金二千元。

水涨船高，一九五六年，红星高级社和三个初级社合并成龙江高级社。这年，随着合作化高潮，掀起了生产高潮，全县油菜大丰收，县粮食局菜籽堆积如山。龙江社决定扩建榨油厂，派党支部书记桂仁同志来当厂长，并拨款再置一架内旋机。响官到福州各

机器厂訂做，各厂工紧不收临时訂貨。最后找到五金厂，五金厂要图样。响官绞尽脑汁，自己画了一个，大伙看了都称赞：“响官真有办法，可当工程师。”内旋机做好了，人員增加了六名。由季节生产改为全年生产。

两台内旋机，一台碾粉机，大伙心越干越热，出油率超过全县水平。这年，实际开工九月，榨了四千担菜籽，为国家生产油五百担。

四

一九五七年，从陰云里刮来了一股反冒进的邪风，风力有十級大，一下子把龙江高級社刮散成六个小社，榨油厂就象失去娘的孩子一样，无依无靠，正巧厂的两台内旋机也坏了，又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大伙都是家口多，靠加工費生活的。生活困难起来，厂眼看又要垮了。

桂仁同志，真是好党员，好厂长。他召集起大家，用宏亮而沉重的声音說：“现在，高級社散了，我們厂就由乡党支部来直接领导。党支部沒有錢，可是我們有觉悟，我們要发挥集体力量把厂保住；国家需要油，我們的厂决不能散，我們不仅要办下去，还要想法扩建。大伙想想看怎么办。”

刹时间，大伙从一片迷茫中突然感到了党的力量，就象过去他們在烏龙江上运肥时，在狂风怒浪的黑夜中，突然看到前面的灯塔，心中立时清楚起来。他們异口同声回答：“我們可以勒紧褲带，这个月不发工資，把錢拿来修理机器，买内旋机，坚决把厂建成。”水桂伯說：“厂是我們的宝贝，什么不要，也不能不要它呀？”

桂仁厂长领导大伙团结起来，齐心苦战，从鸡叫做到月儿

出。他总是最早来最迟回去，砌新灶、打三合土、安机器、筑牆、盖瓦，样样都做，事事自己带头。在暴风雨里，他领着青年上山伐樟树；在暴风雨里，他划着“鴨子船”穿过浊浪去魁歧买木材。生活最苦的时候，他就鼓励别人。当大家没有白米，只能做杂粮、芥菜掺豆腐渣的飯时，他一面吃一面說：“嘿，这是十錦飯，真香。”大伙都没有钱了，他向社、队借了一百多元，按家庭人口分給大伙，他自己家口很多却一点不要。

这样苦战一个月，坏事变成好事，不但修好机器，还把新厂也建成了。新厂是一个大庙宇，前头是抽水机房，后头是榨油厂房。抽水机也是榨油厂碾籽机的发动机。新厂面临广阔平静的烏龙江，江上白帆飘飘，汽艇往来。新厂建好后，满载茶籽的帆船乘风破浪到来了。那天，大伙兴奋地争先恐后把茶籽一包包扛到新厂里。

茶籽到厂里，又产生了新的問題，他們以前都是加工油菜籽，加工茶籽还是第一次，困难很多：加工茶籽需要經過焙、碾、榨。他們的焙灶小，一天只能焙五、六担籽，太少了；焙的技術又不高，不是焙焦了，就是焙不足。加上榨的技術差，所以多是流渣，出油率很低，或是干脆榨不出油来。这样干了十多天，大伙情緒又低落了。元官是个急性人，順利时三日三夜不吃飯都可以，受挫折时洩气也最快，他嘟囔着說：“这么干，什么时候才能領到加工費？杂菜飯还要吃多久？”

一个新的任务提到厂长桂仁面前来了。必須突破技術关。他馬上召集大伙开会。这些天，他虽然年紀还輕，胡子也苦长了，就象一丛燒焦的乱草，他說：“人家榨油厂能榨出油来，我們也一定能榨出来。我們能够勒紧褲带把厂建成，也就能够想办法榨出油来。我們自己不会，可以到上街油厂參觀去。”他們去參觀

后，学习了先进經驗。厂长桂仁和水桂伯日夜不离灶，反复試驗，摸出了焙籽的火色的規律。响官看到了四川油厂介紹的摻糠榨油法，防止流渣，經几次試驗也成功了。結果出油率超过全县水平。合同規定每担出油十九斤半，他們出油二十一斤半。在这些日子里，大家都日夜熬眠。大伙劝水桂伯去睡，他說：“你們年青人不想睡，我老年人更不用睡了。”这时候，元官也說：“現在我又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啦！”

只六个月時間，他們就为国家加工茶籽三千担，产油六百担，茶餅有二千四百担，超額完成了任务。

五

一九五八年，鑼鼓喧天大跃进，龙江乡又成立了龙江高級社，人們欢笑声还未落地，整个城門区十六个乡又联合办起人民公社，人們更放声笑了。人民公社是初昇的太阳，照亮共产主义的偉大前程。龙江榨油厂直接归公社領導啦。

这一年，榨油厂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业务，学会了榨糠、榨花生、芝麻、向日葵。榨糠也克服了不少困难。

人民公社成立，榨油厂直属公社領導，大伙干劲更高，吃飯的問題解决了，大家可以专心一致大鬧技术革命了。天茂想出操作罗盘化，就是說，过去土榨內旋机一架要四人推，現在改用罗盘轉，只要用两个人，速度又快。响官想出把帆船上拉帆原理用上來，一台土榨內旋机也只要两个人。技术革新，真是百花齐放。

水桂伯六十七岁了，該进敬老院了，可是他又来这里摸摸，那里扫扫，厂长天茂（桂仁調到生产队当队长）对他說：“水桂伯，你胡須这样长了，休息休息吧。”水桂伯激动得胡子发抖地

說：“我老了，還有些經驗，重活干不了，還能干輕活，現在大建設，需要人才，我能夠為國家多盡一點力也是好的啊！”結果，他就留下來，不想還能抵過一個全勞力。此外他還常常走到土榨內旋機旁指點指點。因為他是這個廠的最早創始人，人們都尊敬地叫他祖師。他的多年的宿望實現了。廠辦起來了，公社成立了，他怎麼能捨得離開這個為公社創造財富的工廠，離開這個集體勞動、集體生活的大家庭呢。

榨油廠隨着人民公社的蒸蒸日上，也一天天發展起來了。今年公社冬種油菜擴大到四千畝，明年榨油廠可忙不過來啦！根據工農業并舉的方針，公社正計劃再把榨油廠擴建，買架新的內旋機來，適應這個新的變化。生產增長了，人們生活改善了，光按公社說，將需要多少油啊！如果再加上供應城市的數量，這個計劃又落后了。到那時候，這個小榨油廠就要變成大工廠了！

現在公社的四千畝油菜，已經吐出綠苗了。

（林 普）

从黑夜到天明

同志呀，讲起从前的日子，真是太苦了。我二十一岁死了丈夫，到地主陈畿士家做工。他是个大地主，父亲陈宝琛是清朝宣统皇帝的太傅。这个封建地主家里有婢女、厨师，大约雇了二十多个佣人。他专挑选二十岁左右没有结婚的女人，说有了丈夫，要常常回家，事情就少做了。其实他们早就不怀好意。他们还常常买丫环来做礼物送。你想想看，一个好好的人给他们拿来东西送，这难道还是人的世界吗？

还是从我婆婆说起吧。我婆婆从小就在陈畿士家做工，因为生得不好看，长大后，就被送给他家的工人陈桑甘做老婆。我公公因在地主家劳动过度，常常生病，很早就死了。我来陈家时才十五岁。过门那天，他们还先带我到畿士家千拜万拜，连他家手上抱的孩子都拜过。我那时候膝盖又痛，心又怕，拜完后站在那里连头也不敢抬，只听见“老爷”说：“以前怎么没有看见过？”以后又觉得好象有人站在我面前好久不走开。我觉得很奇怪，就偷偷把头稍微抬起一看，啊！原来还是那个什么“老爷”盯着我；我赶紧把头低下，满脸热烘烘的，心里非常难受，只听见那个“老爷”鼓掌称赞说：“很好，很好，生得很俊呀！”当时我心想：真该死，官家人也这样粗鲁。心里又急又气。

我们结婚才三个月，畿士就把我的丈夫叫去泉州一带，替他家做称盐工作。你不知道，畿士是个很大的官僚地主，又是一个

大資本家，他家房子很多，很大。螺州、福州有他的房子，北京也有，他家开的商行就有好几家，泉州盐行公司也是他的。可怜我丈夫在那里象牛馬一样，都是从天亮直劳动到深夜。日子一长，他的身体就撑不住，病了；病了也不让回来。没日没夜地拖下去，结果得了肺病，吐出血来，人瘦得只剩下骨头。经我们千求万求，才让他回家。唉！他才在家里休息一两天，狠心的地主就要他去做工。那时候那里有咱穷人说话的机会，可怜我丈夫只好拖病做工，白天做工还不算，晚上还要替他们写信写公文，夜夜写到三更。一拖再拖，病愈拖愈厉害，结果病到连床都爬不起来，没多久就死了。我抱着四岁的小孩哭倒在他身上，我婆婆也抱着儿子大推大哭。

丈夫一死，畿士马上要我到他家里做工，我不肯去，天天哭，哭得眼睛都肿了。后来畿士的老婆又对我婆婆说，叫我带孩子一起带到他家里做工。我不愿去他家。婆婆对我流泪说：“人家有钱有势，怕不好得罪啊！”“妈，你别为我操心，畿士家我一定不去的。我自己到别家去设法找事做。”经过倒粪桶的依婆介绍，我到了陈依号家去煮饭。我很高兴，把孩子也带了去。才去没有几天，被畿士家里知道了，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到依号家，骂依号竟敢把他要雇的人雇去。依号一看信，惊得要死，叫我马上离开他家，说：“成林嫂呀，不是我不中意你，畿士老爷刚刚来信，说是少奶奶要你去服侍她，你就快去吧！”我听完大哭，跪倒地上求他做好事，千万不要叫我上畿士家去。正在这时候，畿士又派人来对依号说，如果敢存心与他家作对，就要当心这条狗命。这时候，我婆婆也跑来了，我抱住她大哭。婆婆抚摸着我的肩膀说：“去吧，孩子，穷人命苦有什么法子。”话还没说完，眼泪就一直掉下来。

回到家里，我一直哭个不停。起初我想死，以后想到孩子，又只好大哭起来。我天天流泪满面，怨自己命苦。在家里没饭吃，母子俩经常饿着肚子。饿肚子我甘愿，就是不愿到地主家去做工。

过了几天，缙士老婆带着几个丫环到我家来。她穿着一身绸缎，穿着红缎子鞋的两只脚交叉着，坐在椅子上。她两旁站着三四个丫环。我怕得带着孩子发抖地站在她身边。她对我讲：“你到我家后，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婆婆在我家做工，我一听说她儿子还没讨亲，就拿四百元送你婆婆把你娶过来。当然囉，四百元钱我也很心疼的，但是我也非常爱你。”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还是用四百块钱买来的，伤心得又大哭起来。地主老婆身边的丫头也劝说：“是呀，我家少奶奶既然爱你来，总是会照顾你的，怕什么，不要哭了，快叩头答应吧。”婆婆怕得罪地主，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去吧，少奶奶会照顾你的。”地主老婆一走，我就倒在床上大哭起来。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怎么办呢？逃走吗？不行；去吗？我害怕。想着想着，觉得不如死了好。半夜时候，婆婆呼呼睡着了，我把心一横，偷偷爬起来替孩子盖好被，拿起绳子要上吊，可是回头看看睡着的孩子，眼泪就象下雨似的淌下，心里想自己死了孩子怎么办？孩子才四岁，没了母亲会不会被人糟蹋死？想到这里，把绳子放下，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久，他们又要我到福州去服侍少奶奶。可怜我那四岁的孩子，哭呀，叫呀倒在船头硬要跟我去，我叩头央求他们让我把孩子也带走，他们不肯。孩子拉着我的衣角不放；地主的心多狠，把孩子硬拉开，抱起来扔到岸上，命令船公马上把船开走。船离了岸，孩子在岸上拼命地哭呀叫呀，我的心象被捣碎一样的痛，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唉！黑心肝的人呀！

同志呀，我的苦水是倒也倒不完的。有钱有势的人什么也不讲理，原来替少奶奶梳头的女人，被“老爷”无缘无故赶掉，叫我去替。有一天，陈宝琛嘻皮笑脸地拿一套新衣服叫我穿上，说今天客人很多，叫我要好好地在旁边服侍，不可有一点差错。我一听大吃一惊。到外面我一见到人那么多，怕得脚一直发抖。我站在旁边替他们点烟火，倒酒。那几个客人也不是货，个个眼睛都瞪得象虎眼一样，圆睁睁地一直瞧着我。陈宝琛骄傲地说：“怎么样，我家这些佣人都生得不错吧。”我那时候脸红得象红纸一样，心里怪难受，赶快要跑出去，刚跑几步，就被地主老婆叫住了。她恶狠狠地说：“不要出去！害什么羞，没正经假正经，多做几次脸皮就厚了。站到这里来！”她这一说惹得全部客人都哈哈大笑。那些人的笑真象野猪叫一样的难听。我心里又怕又恨。

地主的房子很大，都是好几落，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养鸡鸭牲畜的，地主嫌那里脏臭，从来不敢去。我们佣人一有什么事，就跑到那里偷哭。哭到很伤心的时候，索性放声大哭。那个地方很偏僻，我们就是在那里把天哭塌了，他们也不知道。平时，我们把那个地方称为“流泪处”。有一天，我跑到那里哭时，见到已经有五六个佣人在那里哭得很惨。她们都是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和我一样，天天受绅士的气。我劝她们不要哭，说哭也是白流泪。我一边劝她们，一边自己的眼泪却一直往外流。可怜这几个年纪轻轻的孩子，却也同我一样苦命。我们又恨又气地大哭起来，骂陈绅士父子一家人都是野货养的，比野兽还凶残。骂完以后，大家又抱在一起大哭起来。

不久，该杀的陈绅士把我叫回螺州去看房子。那屋子很大，

沒有几个人住，一到晚上真有点害怕。有一天，畿士派一个人来，說今天傍晚他要同几个朋友回来，叫我把房子打扫干净，把床铺也都准备好。等到天黑，还不見他們来。大家都以为他今天不会来了，都回自己家去。晚上十一时多，我已經睡了，畿士回来了。那天晚上，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見他回来，我心里的确很害怕。我开了門，就赶快替他倒茶、燒热水。他喝完茶、洗完臉，就往房里走去，連看也不看我一眼；这时我才吐了一大口气，心想大概今晚會平安吧。誰曉得他从房間走出来，說綢被子要放在下面，花被放在上面，要我进去重新整理。等我一跪上床，他就走过去把門关着；說时迟那时快，我才轉过头来，他就跑过来把我抱住。我怕得一边大哭大喊，一边拼命掙脫。他一見我喊得这么大声，手稍微一松，我就象一匹脫了韁繩的馬，往門外直冲，一直跑到家里，哭倒在我婆婆身上。千刀万剐的畿士还派人来質問，說他那天回家，我茶湯沒准备好，講我一二句，我不高兴就跑回家，問我这是什么道理。你看，这还有天理嗎？他講这話还有人的良心嗎？我当时真是啞吧吃黃連，什么話也不愿意講。畿士派来的人还說：“他家少爷說，他雇的工人要等他用到不用后才可以走，随便跑掉或是自己不干的，都要报官处理。”我婆婆一听，怕得劝我快回畿士家，說孩子她会照顧好。村里人怕得罪陈畿士，也都劝我要忍耐些。第二天，畿士母亲来叫我回黄巷，我哭着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訴她。想不到她把臉一翻，指手頓脚地罵我：“哎呀！我孩子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人，你竟把他講成那个样，野貨呀，土婊呀，你若不愿去我家做工，你就索性給我走开，用不着血口噴人！”天啊，想不到連他母亲也这样坏。我再去还不是送死，我把心一橫，就跑到后街光祿堂吃菜（即吃斋，就是帶发修行的人）去。

幾士父亲从北京回来，一听说我到光祿庵堂吃菜，气得象瘋狗一样地大跳大叫，写了一封信送到菜堂去。堂主見信上写着：

“不准你收留我家的佣人，否則，就放火焚你菜堂。堂主惊到脚都軟了。她慌慌忙忙地要我馬上离开。我大哭，跪在她面前哀求，不要把我赶走。她們怕連累，怎么說也不肯收留。我婆婆听到这消息，从螺州一直赶到福州，她本来就不肯让我去吃菜，說我有孩子的人还吃什么菜。当时我心生一計，要婆婆先回去，說等我同菜友告別后就馬上回去。婆婆走后，我就拿起包袱到菜友那边去。菜友听完我的哭訴，也流下眼淚，有一位就留我同住。我天天关在房子里，不敢出去。当家的以为我走了，沒再查問。可是時間一久，我們的生活开始发生困难了。一天，那个菜友外出借粮，我不得不自己出去买菜。唉，誰知菜买好正往回走，不巧碰到陈幾士。他笑嘻嘻地說：“成林嫂，怎么好久沒看見你了，你現在住在那里，可怜你婆婆一天到晚东問西問地找你。嘻！最近你臉色好多了。有空到我家去玩玩！”我沒有理他，慌忙跑回来，到庵堂把門一关，就到在床上喘气。我偷住庵堂，不想后来竟被当家的知道了。她把我叫出来，沒有赶我走，倒安慰了几句。我想当家可能也可怜我了。嘻，原来这是她和陈幾士的詭計：有一天，当家的煮了两碗点心，叫我端出去給客人吃；我端着点心走到外面一看，天啊，你說客人是誰？原来还是陈幾士父子。我把点心在棹上一放，赶快跑了。心想完了，这地方看来也是呆不住了。后来，經過菜友的帮忙，我又逃到亭头去，給人家煮飯。

在亭头沒有住多久，我又病回螺州来了。以后，我就自己学織布，卖油，每日省吃儉用，把省下来的一点錢，送我孩子去讀書。生活才安定下来，不料日本鬼又打进来了。他們在螺州大搶大抓，乡里人躲的躲来逃的逃，我油不能卖，布也不能織。沒法

只好再到賊杀的陈畿士家去做工。

后来，日本投降了。那时候世界很乱，听别人說是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这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共产党，只是听别人說共产党是专门替穷人做事的。我当时什么也不去管他，只盼望儿子讀書出头。讲起我儿子的事情来，我又是高兴，又是伤心。我儿子名叫霞生，村里跟他同学的几个人都叫他霞生哥。这孩子从小就跟着我受苦，所以长大后，非常懂事。这时他中学快毕业了，鄰居都劝我到畿士那边求他替我霞生找个事做。我不愿意去，霞生也叫我不要去，說他已经托人找了。我听他这么說，心里很高兴。畿士这鬼，见我霞生长大了，初中也快毕业了，对我们忽然客气起来。常常叫人送糖啦，送餅啦。一而送，一面对村里人說，他的心最慈善，看到别人沒飯吃，沒衣服穿，心里就难过。听到这些話，我很生气，对孩子說：“我不是早就告訴你，这个人很狡猾，他送东西，一定有鬼的。”霞生听完笑說：“不要紧，是他自己要送来的，也不是我們向他要，怕什么，送什么来就收下什么，我还怕他不送来呢。”停了一下又說：“媽，你別怕，送来的东西我那几个同学会帮忙吃。”說完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那时我还是卖油。霞生要我到財主家做油生意，說要和他亲热些。我暗想：天啊，难道霞生也欢喜去巴結那些財主？我生气地說：“这事情我办不到，你爱巴結他們，你就自己去吧！”他笑着解釋說：“这样做以后会有好处。”我因为疼爱他，也沒再說什么，答应照他的話做去。說也奇怪，我这样一做，那些財主对我也都好起来，他們不但时常向我买油，并且托我带信。我把这些情况告訴了霞生。他很高兴，要我照旧这样做下去，并叫我以后把信都帶回来給他。这样，地主跟官家（做官的人）之間来来往往的信件，都一封封地落到我儿子手里了。那时候我看到

霞生把信都一一拆开来看，看完以后就跑出去，心里感到很奇怪。我想孩子大概不甘愿从前给地主欺侮，现在要来作弄作弄他们，心中不禁暗暗欢喜，说孩子真有志气。

这以后，我房里经常坐着我儿子的许多同学，年龄都很轻。他们把门关着，吱吱喳喳交头接耳的谈着。有一回，我从门缝望进去，只见他们谈得十分高兴。我想这群青年人也许想结婚，整天才那样东跑西跑地找人（对象），现在大概是怕羞，才把门关着小声谈。第二天，我就去试探霞生的心事，告诉他不要急，我会替他找一个。“妈，你想想看，我们几代都要去地主家做工，现在我结婚，以后老婆、孩子不是也要替财主做工。”他这话刺痛了我的心，我痛苦地告诉他，现在不结婚也好，只是不要天天到外面跑，在外边学坏了。

一天晚上，风雨很大，河里涨起大水，从上游流下来很多杉木，霞生说要和同学去捡木材，拿着斗笠卷起裤管匆匆跑出去了。我怕风雨危险，不管怎么说，还是留他不住。原来，他们都不是去捡什么杉木，而是到河岸去开会。那时候，他们怕地主知道，都是选择大风大雨天和大黑夜来开会。这事我到以后才知道。

过了一些时候，霞生忽然要我向畿士商量搬到他家里去住。说身体不好，想在他家休养；因他家的房子大，空气比较好，条件是我们替他看房、洗屋，料理一些家务。畿士觉得他不花钱，又有人做工，就一口答应了。

我们搬到地主家住后，霞生的同学，就常常来玩。有一回，霞生听我说地主家今晚没人回来，晚上就带着一个生人进来。这人高个子，脸黑黑的，身上穿着一件很旧的对面衫，很象是个补锅的。他进来一句话也没说，就直往房间走。两个人在房间里不知

說些什么，以后只見霞生自己一個人走出來，把門鎖上。我心里很納悶：這是什么人呢？過了一會兒，又來了一群人。霞生對我解釋着說：“媽，他們都是我的同學，我們今晚在這里開涼風會。”說着就叫我先去睡。我躺在床上，翻來復去睡不着，心想那個補鑼的為什麼要偷偷地關在房里，難道想做賊嗎？不會的，我孩子說的有道理，他們都是窮苦人，都是好人。可心里總不放心。我悄悄起來，從門縫往里面看，只看到他們整齊地圍在桌子旁坐着，那個補鑼的站着念些什么，其餘的人拼命在寫，我霞生也拼命寫，又看到牆壁正中央挂着一張人象，牆壁兩邊還貼着一張寫滿了字的紙。我想聽到底是在說什麼，可是那個補鑼的講的聲音很低，一句也聽不清楚。這時正好有個人走出來，我拉住他低聲問他們是在做什么。他笑了笑說：“成林嫂呀，不要怕，我們是在開涼風會，那個講話的人是在講故事。我們都在學寫字，咱窮苦人沒錢上學，只好自己來學。”我這才放了心，就吩咐說：“寫字嗎，很好。不過房間要收拾得跟原來一樣，不然他家小姐知道了會大罵。”第二天，我很早起來煮飯，又偷偷到那房間去看，一個人影也沒有，房間都收拾得跟原先一樣。我心里不禁暗暗誇贊。吃飯時候，我對霞生說：“同學來玩是可以的。那個補鑼的你怎么認識的？”他听完，一句話也沒說。停了好久，才輕輕說了一句：“媽，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說着便拉我到房間里去。他說我們都是受壓迫的窮苦人，祖父、祖母和爸爸、媽媽做了一生的奴才，假使不起來跟地主反抗的話，就要永遠做他們的奴才，永遠做馬讓他們騎。我听他說的蠻有道理，激動得有些想流淚。他見我動了心，就接着說：昨天晚上不是開什么涼風會，而是討論要怎么起來反抗地主。那個三十來歲的人，是他們的領導人。他還說他們昨天晚上開會被地主知道了，

等一下，敌人可能会来抓人，他們馬上就要离开这里。說他們中間有一个同志肚子痛不能走，要我把他好好藏起来。說完他就要走。我只点点头，流着眼淚看他走。他走后我把那个同志藏起来。半夜，那个同志說肚子痛好了，要出去找霞生他們，我一直把他送到村外。我一直想我霞生和这个同志在路上会不会碰到危險。我恨地主，心想天地报应，戏台上不是做过么，乱世出英雄，真的有此事，我儿子他們就是乱世的英雄。那天，我整夜都沒睡，第二天天还没亮，我連煮飯也沒心思煮，穿好衣服头也沒梳就跑去抽籤，求菩薩庇佑我霞生他們。

一个晚上，风刮的很大，窗門被吹得吱嗒吱嗒发响。外面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躺在床上，想起我那个苦命的孩子，現在到底在那里？会不会被坏人杀了，他若死了我今后要依靠誰，……。我想了很多，有以前的，也有現在的。眼淚一直流下来，枕头都流湿了。大概是在夜深三更的时候，忽然听見鄰居的狗在吠，过了一会又一点声音也沒有。差不多又过了半点钟左右，好象有人在輕輕敲我家的門。起先我还以为是风吹門声，以后越听越清楚，是人敲門。爬起来穿好衣服，灯也不敢点就蹑手蹑脚地摸到門边去，小聲地問了句：“誰？”只听見外面低聲回答着：“媽，我回来了。”我一听是霞生的声音，赶紧把門开了，霞生象一陣风似的，扑了进来。他看到家里一切如常，心里很高兴。我要煮东西給他吃，他却叫我把灯吹熄，自己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他用手不停地敲着桌沿，想着什么。我借灶里的火光暗暗地看他，发现他瘦了，下巴尖了許多。他吃完东西，才問我这几天来村里的情况，也告訴我那天他們都逃到山上去了。因为不放心我，大家叫他回来看看。說要在家住二天。我們母子談得很高兴，談得很久，天快亮时，他說要出去找一个人，又走了。次

日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他才回来。这次回来和从前大不同啦，滿臉笑容，不过講話时还是叫我把灯吹熄。他說晚上最好不点灯，这次他不但問我村里情况，也問起他走后我的生活过得怎样，地主有沒有来欺侮我，以后又給我讲了許多革命道理，叫我和他們一块革命，說我在家危險，还是一起上山好。我心里想，在家里地主天天来，問我儿子那里去了，說我儿子想造反；敌人說我若不把儿子找回来，就要把我抓去，他們經常在我房子周圍打轉轉。听霞生这样一讲，我覺得眼睛突然亮了，讲得好，三十六計，走为上計，我决定跟他一起上山。次日，霞生照旧在天未亮前出去，到晚上八九点鐘才悄悄回来。这次回来他臉上有点緊張。告訴我，这几天外面空气很緊張，他們有三四个女同志受敌人追查，来不及逃跑，要我在明天上午以前設法把她們藏起来。他說：“媽，情况很严重，我今晚馬上就走，那三四个女同志和我一样，家里有母亲，但是她們为了革命，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她們都是很好的同志。”讲到这里，他严肃地看着我，停了半天，然后才牽着我的手說：“媽，我知道这样做很为难你，不过需要这样做，現在也是你倒苦水和真正参加革命的时候了。我本来想把你也一起帶走，現在看起来，已經不可能了，你还是留在家，替我們探听一些情况，过两天会有一个同志来找你。

儿子走后，我就一直想：那三四个女同志藏在那里好呢，想藏这里也感到不安全，想藏那里也感到不保險，想到快天亮了，还想不出一个好地方来，急得滿头是汗。后来我終于想出了办法，菜堂有些菜友也是受苦人，和我都很好，倒不如跟她們商量，把那几位女同志分散藏在那里，假裝吃菜，也只有这样做才比較安全。这个办法果然妙，我把女同志藏到那里去后，敌人始終沒有发现。

听说山上的生活很苦，没房子住就睡在临时架起的草棚里，也没有床铺，有时候没东西吃就只好吃草根，吃野菜。这时候已经是冬天，晚上睡的时候风吹进来，冷得把身子缩成一团。同志们都瘦了，我霞生也变得又瘦又黑，常常咳嗽，身体很坏，在山里有病也没处医。

霞生他们在山上活动的事，后来被反动派知道了。他们派军队包围这座山。霞生带了一部分人，暂时躲在畿士家里谷仓后面。畿士家的谷仓很大，里面有好几层，我们把谷子移到前面，后面腾出空地住人。屋子里原来还有个修理工人，他是专替畿士家修理房子的，平时也受畿士的欺压，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也把他争取了过来，替我们放哨，当通讯员。他在仓库屋顶拆个洞，又装了个吊桶，有什么信，就放在吊桶里往里面放。吊桶成为外面和里头的联系工具。我在外面替他们收集情况，有机会也偷偷进去看他们。他们为了工作，也经常派人出来活动。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度过一个月左右。反动派抓不到霞生他们，非常懊恼。有一天，畿士忽然回来了，说要搜仓库。我心里非常害怕。我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霞生，大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逃过搜查。经过讨论，决定还是不转移，把外边伪装好一点，跟敌人斗智。清仓那天，我把一道道门上的锁打开，外表上极力装出镇静的样子，心里可担心得很。咳！老天爷真有眼睛，那些清仓的人都是怕死鬼，他们也怕当真里面钻出个共产党来，那他们可就没命了。他们慌慌张张看了一下，查到最后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心里才象放下一块石头似的，高兴得不知怎样说才好。地主家有个特务。他搜仓虽然抓不到什么，可是每天仍然象狼狗一样直在仓库四角嗅。情况还是非常紧张，对工作的开展十分不利。党考虑为了保存力量，决定转移。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心里很急，怎

么轉移呢？人在房子里，外边又都是特务，不要說十几个人出来有困难，就是一只鳥从里面飞出来也会引起那些狗腿注意。想了好久，我从椅上猛站起来，自己对自己說：“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設法把他們帶出来。只要他們能安全，我一个人又有什么要紧。”我連飯也顧不得吃，就跑去跟一个船公商量，趁畿士还没回家前，用运书的名义，把人裝在书箱里，一箱一箱扛到船上。霞生他們就这样地逃出了虎口。

福州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解放的。快解放那个时候，我們的同志到处都是，搞得反动政府吃睡不安，畿士連出街也不敢了。反动派抓不到人，惱羞成怒就把我抓去，罵我是土匪婆，是共产党。我現在胆子大了，也更机智了，我說：“什么叫做共产党，我都不知道，我天天只知吃菜，沒当土匪，也沒管你們什么党。”地主沒办法，把我关了几几天，又放我回家。我回到家，探听反动派的情况，偷偷給同志們送信。有一天，一个卖盐的人，到我家門口，問我要不要买盐。他見身边沒有人了，就悄声告訴我說，后天就要解放了，明天晚上游击队从山上下來，要藏在我家里，叫我做好准备，我一听高兴死了。赶紧东借西借准备了四斗米，等他們回来后好煮飯給他們吃。哎呀，我把門关着，在家里一点鐘等过一点鐘，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时时往外看，看看天暗了沒有，他們来了沒有。同志呀，我講起来你会好笑，我那天快活得連兩頓飯也忘了煮，心也不知飞到那里去了，一下子摸摸这个东西，一下子又摸摸那个东西，整天里一件事情也沒做。好容易等到天黑，事情都很碰巧，这天晚上剛好雨下的很大，畿士家里的特务見雨这么大，都偷偷溜回去睡。我看到这情形，高兴得不得了；但又很担心：我們的同志会被雨淋。等呀等呀，越等心越急，他們会不会在半路上碰到坏

人？我把头伏在門上一直听着，听外面有沒有声音，看有沒有人影。半夜，忽然听到有輕輕的脚步声，我的心不禁卜卜地跳起来，想一定是他們来了，但又怕不是。我只好沉住气等着。脚步声慢慢近了，到門前忽然停住。我听到了敲門声，我不敢馬上回答，又听见外面叫着：“是我們，媽媽。”嗨！你說我当时多欢喜啊。我刚听到“是我們”三个字，就已經把門門开了。他們一个个穿着黑衣服，从門外进来，我乐得眼泪都流下来了。虽说只要天一亮，世界便是我們的了；可是現在等一分鐘，就象有一年那么久啊。

福州一解放，幾士便象老鼠似的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有一天下着細雨，我們公安局人員到他家里抓他，他从床上爬起来，穿了雨鞋就走。这个人从前的走一步都得我們用轎抬，今天因为下雨路又滑，他走了几步就要跌倒，哭丧着臉求我們一起坐車，說車錢由他付。其中有一个他家从前的工人，气憤憤的說：

“坐車？我們不需要，今天就要讓你滑一滑，你才知道以前我們是怎么苦！”結果这个狠狠的地主只好一路上跌回来。一到螺州，群众都跑来看，很多妇女抱着孩子咬牙切齿地大罵，說：

“你也有今天！”开公審会时，群众一个接着一个上台控訴。我也上台大罵：“你这千刀万剐的，多少条生命死在你手里，若不是共产党来，我不也会死在你手里，天地报应，你也應該有今天……。”

土改时，共产党分給我土地和屋子，村里的人都很尊敬我，要我当干部，說我是革命老媽媽。我沒忘掉党給我的恩惠，也沒忘掉牺牲了的同志，我在村里积极工作，以后也就入了党。今天大家又选我当螺州党支部組織委員，我說不会做，他們都說不要紧，群众会信任我。我听了，也沒再說什么。我心想党救了我，

难道我今天不应该为党为大家做一些事嗎？

(程秀真口述 劉一涵整理)

幸福来自斗争

解放前，我全家三口人：父亲、弟弟和我。母亲早就死了。那时我家连一寸地也没有，向本村地主陈义远租了二亩荒地来种。起先，陈义远嫌我家穷，怕交不起租子，不肯租。他说：“人穷命穷，土地也会被种穷的。我宁可把田地抛到大海里去，也不租给你。”我们农民没有土地怎能活下去呢，我爹一再哀求：“老爷，求你行行好事吧，租给我二亩地吧，庄稼人没地种怎么活啊。”“你活不活与我啥相干？说不租就是不租。”陈义远咆哮起来，叫狗腿子把我爹推出了大门。后来，经我爹再三请求，和本村中农陈朝俊的担保，才肯租给我们。租了这二亩地以后，我们全家都起早摸黑地在那荒地上忙着，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我那时虽然才十二岁，但干起活来顶得过一个大人。只要田里长出庄稼，只要能搞一碗饭吃吃，就是累折了腰我也感到快活的。夏初，粗壮的庄稼长出来了，全家愁苦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们把一切都寄托在这二亩瘦地上。谁知道不幸的事又来了，到了快收成时候，突然受到旱灾，二亩地总共只收了一担多谷子，连交地租都不够。一年的血汗，全家的希望……整个都落空了。陈义远三番五次上门迫租，并威吓说：“租要是不交清，我就把土地收回去。”我父亲只得向高利贷者借了五担谷，交了地租。

二

高利貸越滾越多。到了第二年，五担谷子一下子滾成十担，再过一年就是二十担，……就这么連本帶利成倍地加起来，就象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越背越重，最后压得喘不过气来。

地租和高利貸迫得我們活不下去了，种地不頂事，不得不設法另謀生路，向一个鄰居借了二元錢做本錢，我和父亲挑着草包到福清去卖。三天去一趟福清，所賺来的錢还买不到一斤番薯米，路上餓得走不动的时候，便到山上树上采些野菜野果来吃。不想吃了毒草，臉、腿都肿得好大，紅通通的，痛得要命。

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搶劫、掠夺，原来就很穷的村庄，被搶劫得一貧如洗。农民的生活更加苦了。那时我已十七岁了，由于穷困的煎熬，长得又瘦又小，看过去只有十二三岁。父亲老了，家里的生活要由我来承担。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床前，說：“我老了，家里生活眼看难以过下去，你就把弟弟卖了吧。”我知道我父亲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想出这样的主意的，因为他是最爱我这个弟弟的。我說：“就是餓死了，我也不能卖弟弟。”于是为了生活，我便离家到老远的福清去給人家挑担子，用自己的力气来維持可怜的家庭生活。

三

过去我祖父在世的时候，父亲曾經向大地主林傳亨（又名敖里金）借了五十元錢給祖父治病。欠下这个有名的恶霸的債，真害得我們好苦呵！

一天，林傳亨坐着轎子，拿把文明杖，到我家来討債。他一进门，二话沒說，就一把抓住我父亲嚷道：“姓陈的，你还不还

錢？不還，就把你的兒子給我做長工抵債。”他注視着我，象要把我吞下去似的。我父親哀求道：“老爺，你要我給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把我兒子抓去。”“我問你要錢！”林傳亨敲着文明杖說。

“你瞧吧，我家連吃的都沒有，那來的錢。我不是有錢故意藏着不給，求你再寬限我一些時候吧。”父親還沒把話說完，文明棍就從他頭上披頭蓋臉地打下來。我見他這樣橫蠻，氣憤極了，長久積壓的怒火一下爆發了……我掄起拳頭，直挺挺站到林傳亨面前，問道：“你憑什麼道理打我父親？”林傳亨看我氣勢汹汹，怕吃眼前虧，便轉換個口氣說：“要說理也行，那你就明天拿錢來！”說完搖頭晃腦走了。欠林傳亨的這筆債，利上滾利，我家還了好多年都沒還清。林傳亨利用這筆債，對我家大加勒索，每次來看到什麼中意的東西，就隨便拿走，連抬轎工人的工錢都要我家出。沒錢出時，便把我家一條破棉被也給帶走了。

地主的剝削及偽政府的壓迫，就象兩股絞索把我們套了起來，叫我們喘不過氣。我一件衣服穿了十六年。我父親一世只穿了两雙鞋子，霜雪天他也是赤足，只有走親戚時才穿上，並且是等走到親戚家門口時才穿上，出來後又脫了。一九四六年，我結婚所用的棉被，還是我父親結婚時用的。

四

我經常想：這種象鍋里熬油般的痛苦生活，什麼時候能結束呢？假如能將騎在我們頭上的地主、官僚推翻，讓窮人過好生活，那該多好啊！那時“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官僚互相勾結，到處張牙舞爪欺壓窮人。憑我一個人單槍匹馬的，怎能將他們打倒，又怎能讓窮人翻身呢？

后来，我听到人们传说：世上有一个共产党和解放军，是专门救穷人的，他们到那里那里的人民就翻身过好日子。以后又时常听到他们打胜仗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高兴，想着：“假如共产党解放军能到我们这里，该多好啊。”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日夜盼望的一天到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地主、反动官僚打倒了，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

五

解放后，村子里组织了农会，诗勇当了农会副主席，我当了乡民兵小组长。我干起工作来，更加起劲了，白天和地主逼减租减息，晚上开会研究，每天不闹到半夜是不能睡觉的。经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眼睛熬得红红的，人也瘦下去了。诗勇见我只顾工作，身体也不管了，一再劝告我：“诗璧，干革命工作重要，但也得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我说：“没关系，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做了国家主人，不好好干怎能对得起党啊？”说完两人都笑了。

一九五〇年，县委工作组叫我去县上训练班学习，使我的眼睛更雪亮了。学习回来后，投入了反霸斗争。头一个斗恶霸敖里金，我真高兴极了，想不到我积压了十几年的冤仇，也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六

一九五〇年，我和诗勇到县上开会，带回来一个不平常的好消息：土改。

土改的消息一传开，村子里的穷苦农民都欢喜若狂地说：

“和地主算总賬的时候到了。”

可是，事情沒那么順利，狗急跳牆——地主舍不得这些剝夺来的财产被分掉，临死之前，还想要掙扎几下。

地主陈义远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糾集了几个嘍囉到处威脅利誘农民說：“陈义远兄弟都是中农。”在評成份会上，陈义远假惺惺地說：“我們大家都是兄弟，过去，我义远也沒亏待你們，你們沒糧吃，我就借給你們。至于利息嗎，那是應該的，那有借錢而不給利息的，这样那能算是地主呢？”义远皮笑肉不笑地囉嗦了这么些后，接着他的兄弟陈敬兵、陈金濤就在台下面大嚷道：“对，不是地主，是中农。”台下群众一听，裏的一下又鬧开了，都大叫：“他不是地主誰是地主？”我看到这种情形，就站起来說：“过去地主一直騎在我們的头上，我們每个穷苦人都吃够了苦头。現在共产党領導我們翻了身，我們一定要打倒地主，搬掉压在我們头上的这座大山。”我越說越激动，自己也不知这几句話是怎样說出来的。接着我又說下去：“我們都是受苦的人，誰是地主，誰不是地主，大家心里都有數，他就是想賴也賴不掉。”我的話剛說完，群众就都紛紛上台訴起苦来。有的說陈义远包租轉佃把农民劳动的血汗都給刮去；有的說自己的儿子被他害死了；有的和他算了細賬，說他占田三十多亩，柑桔三百多株，又替大地主敖里金出租土地五百亩……。一切都鉄証如山，陈义远强辯不过，在罪証面前不得不低下头。

七

“天有不測风云”，誰知在土改胜利之后，却发生一場不尋常的风波。

我們这乡包括三个自然村：杜园、敖山、乾元。这三村过去

經常鬧宗派，村與村械鬥，是常有的事，特別是杜園和敖山、乾元兩村之間的矛盾更深。直到解放後，矛盾才逐漸平靜下來，可是還有隔閡。

一九五一年四月，重整鄉政府、重選幹部。那時有個叫陳文法的，是乾元村人，原先是國民黨屏南縣的人事科長。這人有點文化，能說會道，再加上假裝積極，偽造證件，在選鄉長時，他就利用乾元、敖山農民的宗派思想，騙取了兩村群眾的信任，結果當上了鄉長。

俗語說：“壞人上台，壞事就來”。陳文法當了鄉長以後，就和地主勾勾搭搭，把惡霸、流氓陳詩暖安置當副鄉長，把國民黨的中統特務吳炳清安置當民兵隊長。這些人當了權，就到处進行破壞活動，污蔑和謾罵共產黨，聲言：“要替地主伸冤，把土地還給地主。”平時他們不干正經事：貪污公款，吃喝玩樂，甚至把地主的老婆都勾引上了，弄得人心惶惶。杜園被他們搞得烏煙瘴氣。

那時，我是鄉政委員和治安主任，詩勇是鄉農會秘書。我們处处為人民辦事，受到廣大貧雇農的愛戴，但卻成了陳文法等的眼中釘。他揚言：“不把詩勇、詩鑾干倒，就不做人！”他們商量好，陰謀的第一步，先把詩勇干倒。

他們首先糾集一群壞蛋，捏造了一份陳詩勇的“罪狀”，蓋了鄉政府的印送到區上；同時就在當天，吳秉清便帶了幾個民兵將陳詩勇扣押送到區上。

當天晚上，積極的幹部和民兵基幹都來我家開了個會。會上，空氣沉重，每個人的臉上都布滿了陰雲，大家都在為陳詩勇的突然被捕感到難過。

“詩勇為什麼被扣起來？”沉默了一會兒，幾個幹部紛紛問

我。我說：“誰知道，大概是文發這群壞蛋搞的鬼。”

“對！一定是文發搞的鬼。文發一當鄉長，我就知道不是個好東西。詩勇一定是被他們陷害的。”

“他媽的，真見鬼了，我非把陳文發這傢伙揍死不可。”一個民兵基干暴怒地站起來，說着就向外面跑。

我一把抓住他，嚴肅地說：“先別急，人已經被扣去了，光盲干反而會把事搞壞了。救人如救火，我們應趕快設法，把人救出來。”正說着，忽見一個基干民兵帶了一個人進來。這人瘦個子，歪戴帽，一副下流樣子，正是大流氓陳仲經。這時他還擺着一副滿神氣的樣子。

那基干民兵說：“我在外面站崗，看見這傢伙躲在牆邊偷聽。我想一定不是個好傢伙，就把他帶了進來。”

誰知，那流氓却滿不在乎，架子十足地說：“我是奉工作組的命令來監視詩變。你們要阻礙我，我就扣押你們。”基干民兵一聽這話，都火了。真是翻了天了，流氓竟敢來扣押基干民兵！我們一氣之下，一頓狠揍，把他趕了出去。

在這個會上，我們決定出去給上級報信。不想，陳文發、吳炳清等為掩蓋事情的真相，早已命令人把群眾和幹部都監視起來，村子的外圍都布了崗，不准任何人出去。情況相當嚴重。

第二天，我假裝下田插秧，繞過崗哨抄小路急忙跑到城門找區委書記。

區委書記聽了我的匯報後，問我：“你敢保證詩勇沒有血債嗎？”

“我說敢保證！假如詩勇有血債，我願意和他受同樣的處罰。”

區委書記點點頭，思索了一會，然後用他有力的大手握着我

的手說：“很好，你先回去，文发这家伙我們會处理他。”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因我太兴奋了。到家里，晚上我又召开了干部和基干民兵會議，把这个消息告訴大家，个个都高兴的拍手叫好。

會議正开的热烈，吳炳清帶了几个人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原来我上午到区里去时，在路上被地主的亲属陈远健看見了，他回来就告訴陈文发。

“詩鑾！你上午到哪里去了？老实說来。”陈文发惱羞成怒，还没等我进門就大声責問。

“下田插秧去了。农民，除了干活还到什么地方去。”我心平气靜地答道。

“胡說！”他更加大声咆哮起来：“我看到你到这里去了，你还装蒜。”

我抬起头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心想：看你还猖狂到什么时候？我說：“随你的便，你說到那里就到那里。”我滿不在乎地回答。

“你到区里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說，把你送到区上和詩勇同样处理。”

我說：“随便。”

这群坏蛋看从我的嘴里实在掏不出东西，就干脆把我关起来。直到半夜，才放我回去。我临走时，文发还威脅：“要小心点，否則你要吃亏的。”

他的話我理也没理。

过了不久，区里来了人，同来的还有区长和武裝队，把地主陈秩官、陈文发、吳秉清等都被逮捕起来了。乡里开了扩干会和

群众大会，狠狠地把他们斗了下。文发等分别判了徒刑，得到应有的惩罚。暗藏在杜园的反革命和坏分子被清除了。人们欢天喜地的庆祝自己的胜利。

八

一九五二年九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啊。

以前，我那一股子革命干劲还只是出于对敌人的痛恨和翻身后的兴奋；入党后，我干工作便总觉得有一股子新的力量在推动我，那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

一九五四年，我担任了臚下乡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对我说：“诗鸾，今年是合作化大发展的一年，各乡都没经验，问题很多，你是不是能在你乡搞出一两条经验来。”当时我心里很害怕，答应呢，还是不答应，一时说不出话来。区委书记早猜透了我的心思，说：“别怕，大胆地干吧，失败也没关系。”党的鼓励增加了我的信心，我立即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那时臚下乡，有臚下、天福、杜园、敖山和乾元五个自然村。我决定在杜园搞一个试点。因我在杜园工作的时间长，三个初级社也是我办起来的，情况熟悉。我参加抓坤林初级社工作。这个社存在的问题：一是很多富裕中农还没入社，他们还在自己的果园、奶牛上打算盘，作资本主义的好梦；另外有小部分极贫苦的贫农入不了社。如贫农刘妹子要入社，社员不让她入社，说他：1.劳力不强；2.没有财产农具；3.人老了。刘妹子没有办法，急得哭了起来。我想：贫农不要，这成什么合作社，于是我开了个社员大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入合作社就是为

了我們大家好，使我們共同搞好生产，都过好日子。假如穷的入不了社，富的不入社，怎能做到这一点呢？”經我这么一說，大伙儿的思想慢慢通了。有的說：“是呵，合作社是为了大家好，才办社啊！”

刘妹子和其他特别穷的社員，也都欢欢喜喜地入社了。一些日夜在作资本主义好梦的富裕中农，也慢慢感到不入社是不好了。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发展到高潮，全村七个初級社合并成一个高級社。全村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户都入了社。大伙儿干劲更高，我們干部决心更大，貫徹“勤儉办社”的精神，农民一年的收入平均增加到一百七十元，百分之九十的农户增加了收入。社員的生活有了改善，平均每人每年做了二套衣服，全社修理了一百多間房屋，新盖了一百間，差不多每户都有棉被二床。假如不是合作化，那能这样。

全乡的各个合作社和附近外乡的眼睛都朝着杜园瞧，他們說：“杜园能搞得好，我們也能搞得好。”群众办社的信心更大了。

現在又經過几年的发展，我們由高級社又成为人民公社了，人民的生活比以前又提高了。再回想起过去来，这真象进入了天堂，我永远忘不了党給我們带来的好日子！

（陳詩鑿口述 王瑞生整理）

